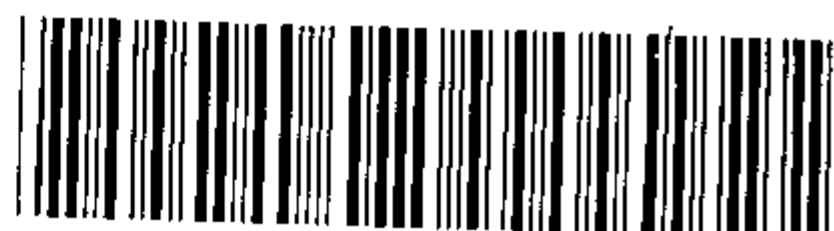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人物傳

第四十八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編



国防大学 2 064 3824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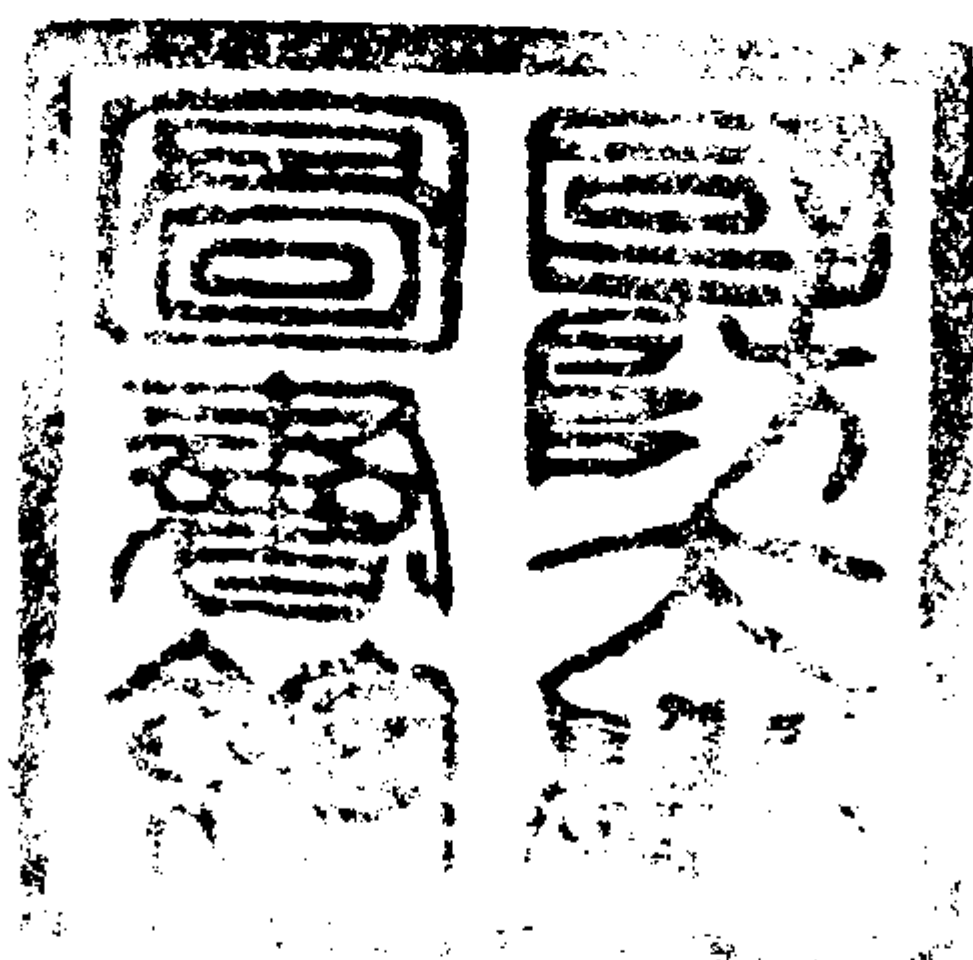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四十八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会长 何长工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校对 杨 莉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四十八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会长 何长工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10 插页 280 千字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400

ISBN 7-224-01677-2/K·237

定价：（精）5.60 元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习仲勋	马文瑞	马齐彬	王首道	乔明甫
刘澜涛	杨尚昆	李正文	肖克	陆定一
何定华	陈丕显	林蕴晖	胡立教	莫文骅
康政	程子华	温济泽	裴桐	

副会长：李新 胡华

副主编：陈志凌 杨世兰

参加本卷审稿人员：彭明 陈志凌 巨彩丽 王敏
吴殿尧 南岗 侯兆水 高军 郭洛夫
翟作君 戴知贤

责任编辑：郭洛夫 王敏

中共党史人物傳

陳平石著

朱理治同志的

一生，是革命的

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李先念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



刘 少 奇



谭 政



陈 明



朱 理 治



郭 影 秋



李 范 五



曹靖华



唐亮



罗 明

说明：本卷缺程克绳、吴德峰照片

目 录

刘少奇.....	朱元石 黄 峥	(1)
谭 政.....	乔希章	(131)
程克绳.....	唐华如 潘长德	(164)
陈 明.....	陈仙海 赵 良 邱林忠 张兆声	(180)
吴德峰.....	中共保康县委党史办公室 柳希荣执笔	(191)
朱理治.....	陈 牧 张文杰	(210)
郭影秋.....	王俊义	(244)
李范五.....	赵俊清	(274)
曹靖华.....	冷 柯	(299)
唐 亮.....	王辅一	(321)
罗 明.....	黄奕明	(353)

刘 少 奇

朱元石 黄 峥

寻求革命道路

刘少奇，名绍选，字渭璜。湖南宁乡县。祖籍江西。1898年11月24日，诞生在花明楼炭子冲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族中平辈九人，刘少奇排行最后，称呼九满。

宁乡地处湘水下游，东屏长沙，北抵桃江、益阳，南邻湘乡、湘潭，西接安化、涟源，属湘中丘陵向滨湖平原过渡地区，历来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炭子冲，距宁乡县城30多公里，到长沙首府也不远，不算太偏僻。“冲”在湖南、湖北意谓丘陵中的小块平地，也指在此所建村落。这里山多田少。清朝时，人以烧炭为生，故名。

父亲刘寿松，粗通文墨，为人忠厚。母亲鲁氏，精于操持家计。有兄三，姐二。对刘少奇较有影响的，是他的二哥刘云庭。农家子弟劳动早，刘少奇6岁便看牛、捡柴、铡草。8岁启蒙，先后在柘木冲、罗家塘、洪家大屋等地读了六年私塾。因嗜书如命，被誉为“刘九书柜”。这典故大概出自宋朝人吴时。吴时博学能文，以其美名“书橱”传世。

1911年辛亥革命，清皇朝的统治似大厦之崩，纷纷解体。刘云庭时在长沙新军当兵，该部亦起义响应。刘少奇有机

会读到刘云庭带回的一些革命传单和书籍，很受启发，一剪子绞掉了头上的长辫。

两年后，刘少奇考入宁乡县城立第一高小，成为新式学堂的学生。几年中，他学习成绩优异，并选读进步书刊。“民国”的先驱者孙中山、黄兴等，成了他十分崇拜的人物。

可中国是多难的。赶走清朝皇帝，又来了窃国大盗。1915年，袁世凯公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刘少奇参加学校游行，胸挂“毋忘国耻”条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后，刘少奇更义愤填膺，演讲街头，声援讨袁义师。不寐之夜，刘少奇开始为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而焦虑。

1916年夏，刘少奇考入宁乡驻省中学。他人渐长成，英气勃勃，钦慕岳武穆“精忠报国”故事，忘情“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诗句，萌发好男儿投笔从戎、以身许国志向。同年秋，他改考谭延闿在长沙创办的陆军讲武堂，以赫然头名录取。但壮志多磨。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毁于战乱。刘少奇只得重新寻找道路。

1919年，刘少奇再度求学，作长沙私立育才高等中学毕业班插班生。这一年，他为五四运动大潮吸引，来到北京，并想留在北京这个爱国学生运动的中心求学。他随意考了几所高等学府，虽然都榜上有名，但不是嫌学制过长或学费昂贵，就是觉得专业不如人意，思虑再三，结果都放弃了。一个偶然的念头，促使他拜访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李石曾和范源濂。获得他们热情鼓励和推荐，工读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

育德中学素有进步传统。辛亥革命时，曾是同盟会在河北地区的秘密集会场所。五四运动中，师生大都投入爱国狂澜。在这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杂陈书架，传于手头。师生们还自办刊物，激扬文字，谈说纵横，慷慨陈义，介绍国内外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等。在这样的环境里，刘少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思想的冲击和洗礼。虽然他后来由于留法班从1920年秋停办以及内囊空虚等原因，未能踏上去法国的征程，但他的眼界已大为开阔，原有的牢笼再也不能锁住他救国拯民的欲望，使他萌发了对红色苏俄的神往。

1920年，刘少奇返回长沙，由长沙俄罗斯研究会负责人贺民范介绍，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主攻俄文，为留苏作准备。在此期间，刘少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刘少奇等一行，从吴淞口乘船，经长崎、海参崴进入苏俄，再经伯力、赤塔等地，于同年夏抵达莫斯科。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等轮流旁听，见到了列宁。不久，他们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该年冬，刘少奇与罗亦农等一起，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工运领袖和白区工作模范

1922年春，刘少奇离开莫斯科，同年夏归国，先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奉调湖南，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和长沙泥木工人斗争。9月，他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派遣，协同李立三领导安源路矿罢工，与李立三共同

起草罢工宣言、制定斗争策略。他以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的身分，领导安源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罢工斗争。他在领导和指挥罢工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无比机智勇敢，和正确运用斗争策略的才能，深得工人群众的信任、爱戴和拥护，名震安源。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旗帜大张，安源万余工人争先恐后，纷纷加入工会。安源罢工的胜利也推动了两湖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1922年12月，汉阳钢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的工人联合起来，建立了汉冶萍总工会。

1923年4月，刘少奇与志同道合的何宝珍结为伉俪。从此何宝珍跟着刘少奇走南闯北，同甘共苦。后不幸被捕，1934年就义南京雨花台。刘少奇痛悼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①

不久，安源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李立三调离安源，刘少奇先任俱乐部代主任，8月正式任总主任，并担任汉冶萍总工会主任。他致力发展工会事业，健全俱乐部组织，促进工人团结，维护工人利益，纠正“左”倾错误，还呕心沥血写下许多总结工人运动的重要文章。从1923年8月到1925年4月，他发表的文章有《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救护汉冶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一步跟着一步，出色地指导了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北洋军阀对工人群众变本加厉镇压，工会被一律查封，工人运动在全国转入低潮。唯有安源，在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立取守势，不骄傲，不盲动，不冒险，巩固内部，坚守

^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何宝珍》第12卷。

阵地，拿拢地方绅商，渡过许多危险，继续取得有限度的斗争胜利，使安源工会“搞得有声有色，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中心之一，被称为小‘莫斯科’”^①。邓中夏曾极口称赞，安源工会是全国工人运动低潮中“硕果仅存”、“组织最好的工会”^②。

1925年5月上旬，刘少奇以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参加筹备和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他为大会起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等重要文件，作了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根据时代特点，对中国民族革命中各阶级的地位所作的重要分析，与毛泽东在同年年底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重要观点一致。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被选为全总副委员长，成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领袖。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不久，在上海发生了内外棉七厂日本厂长率领流氓打手枪杀中国工人的事件，激起了上海广大工人、学生的反抗。中共中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进行反帝斗争。为了加强上海工会的组织力量，中央还指示李立三、刘华等，马上在上海组织成立上海总工会。刘少奇也随即到上海组织全总办事处，参与指导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上海市总工会成立后，刘少奇还兼任市总工会总务主任。为实现全上海“三罢”斗争，他夜以继日，不

①肖劲光：《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77页。

②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缅怀刘少奇》第16页。

辞辛苦，抱病工作，与蔡和森、李立三等并肩而战。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之时，全市即举行了20余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5万余学生的罢课。在反帝浪潮的推动下，绝大部分商人也举行了罢市。刘少奇以其经验，认为工人罢工非有良好的组织不可，否则一经外来压迫，即行涣散。他要求上海20万罢工工友一定要使组织严密而巩固，不存依赖思想，独立地坚持罢工到底。另一方面，他又力求国际上的援助。他致电赤色职工国际及苏、捷、英、法、日等36个工人团体，呼吁他们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还与李立三一起致电英国工团，表示欢迎他们派人来上海调查五卅惨案真相。在各方的声援下，上海工人的大罢工，坚持了三个多月，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觉悟和战斗勇气，揭开了中国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奏。

毫不停顿的连续战斗生活，严重损害了刘少奇的健康。他病倒了，且病势日趋严重，11月，由何宝珍护送回湘休养。12月，刘少奇遭湖南省反动政府无理逮捕。消息传出，全国震惊。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驻上海办事处，正在开会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各地的工会和团体，纷纷驰电救援，严厉谴责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要求马上释放刘少奇。何宝珍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也加紧四出奔走，上下营救。通过关系，疏通省议会，请宁乡籍议员及绅士出面保释。

1926年1月间，刘少奇出狱。稍事休顿，即赴革命派集中的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他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邓中夏等讲话，盛赞他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精神，说他是工人阶级的最奋力最勇敢的一位战士。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病重，刘少奇代理林的职务，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一起

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4月，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投入主持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工作。5月1日至12日，大会召开。他代表全国总工会，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报告。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各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政治态度的比较和分析，刘少奇雄辩地排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可能性。他指出，一年来，尤其是五卅运动中，中国职工运动的极大发展，各种奋斗事实，“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①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工人阶级应切实同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进行中国革命。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不能彻底的”，工人阶级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要与资产阶级合作，但要“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刘少奇的报告深入浅出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的路线，阐述了工农之间结成联盟的理论等，使与会的工人干部受到了教育，也影响了同时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广东农民大会。会后，刘少奇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和秘书部部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右派借口北伐，要求工人停止一切罢工，农民停止打倒宗法封建特权的行动，企图限制工农革命。8月20日，刘少奇以悼念廖仲恺遇难一周年为文，披陈大义，强调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能成功，但中国工农阶级，是社会各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中之主要力量。担负中国国

^①《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民革命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一定不要忽视这个主要力量”。“孙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其所以尚未成功的缘故，就是没有得到占有国民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廖仲恺之所以伟大，在于他“确实了解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及工农群众所占之位置。”^①刘少奇犀利的笔锋，明确地向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告示了应作怎样选择，不可执迷不悟；并实际上已提出民主革命要实现以工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以李立三为主任，刘少奇为秘书长，直接指挥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湖南等省工人运动。刘少奇即于北伐军攻克武昌后的10月间，先期到达革命旗帜高扬的武汉，为全总迁址武汉作准备工作，并兼任了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等职。在这里，为适应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他下榻未及安稳，便立即领导筹办起工人运动讲习所，亲自参加讲授。为了总结我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他领导编写出《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和《工会经济问题》三本理论专著。这三本专著科学地及时地解决了北伐军攻克武汉、南昌等地后中国工人运动大高涨下的新课题，对促进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1927年1月上旬，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刘少奇先后作组织报告和修改工会章程的报告。会上，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等35人被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向忠发任省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林育南、项英分别任外交、宣传、组织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2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亦由广州迁到武汉。在全总成员未到齐之前，先由项英、刘少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5页。

奇、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日常工作。期间，由于英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仇视，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为庆祝国民政府迁汉和北伐胜利，在江汉关与英租界交界处演讲时，英租界当局竟调动水兵登陆寻衅，酿成“一·三”惨案。武汉市民群情激愤，顿时演变为强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刘少奇不顾个人安危，活跃在第一线，参与领导了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活动。

3月，江西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秘密杀害。刘少奇听到消息，无比愤慨，撰文尖锐抨击蒋介石，指出：在蒋总司令坐镇的江西，竟有国民革命军军官枪杀工会委员长之事，“值得国民政府及全国革命民众的严重注意”。文章义正词严地要求：“蒋总司令如果没有改变他前此拥护民众利益的主张，断不能纵容一班反动派如此凶横残杀工人领袖，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枪毙凶手，肃清一切反动派，保护真正工人的工会，并从优抚恤死者。如其不然，那我们不能不怀疑现在总司令所坐镇的江西了。”^①当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在南昌兼任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的郭沫若，对这惨案也十分愤慨，曾以政治部名义报请蒋介石对凶手倪弼“免职查办”。蒋介石虚与委蛇，表面上假作批准，暗地里却不让电告赣州执行。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总结教训，讨论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确定紧急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出席会议，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

^①《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35页。

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 11 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会上刘少奇和毛泽东等一起，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但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仍然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负责全党的领导工作。

5 月 17 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率部叛变。5 月 21 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接着叛变。6 月 10 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酝酿反共。会后，唐生智回师武汉，镇压工农运动。

在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刘少奇不遗余力，利用一切机会在工人中进行反蒋动员。6 月 14 日，他在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大声疾呼，要一致反对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等人的叛变行为，应“立即削平湖南叛乱”。在刘少奇的促进下，会议作出《武汉工人目前政治主张》的决议案，提出了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拿办许克祥并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明令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八项主张。6 月 19 日至 29 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上，刘少奇作全国总工会的会务报告。他指出，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已有 290 万，比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增加了 170 万，工人阶级的力量空前强大。大会号召工人阶级要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同盟，全力反对蒋介石叛变，深入开展革命斗争。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

与此相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在接二连三的事变面前惊慌失措，生怕工农运动“惹事”，生怕国民党右派因此借

口造谣、制造事端。为此，在6月28日紧急召开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作出了解散湖北省总工会所属的工人纠察队的决定。中央常委会议既已作了决定，向忠发、刘少奇等只好贯彻，湖北省总工会不得不宣布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中共中央鉴于武汉国共合作有最后分裂的可能，决定把在武汉已公开身分的共产党员分散到各地去。刘少奇被安排到庐山养病。在庐山，他得到聂荣臻关于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①的通知。刘少奇对起义表示完全赞同。10月间，病情不见好转，中共中央决定他转移上海治疗，并继续他在5月底起担任的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1928年2月，中共中央为准备召开六大，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征求对党的策略方针的意见。刘少奇被邀参加座谈。他坦诚地表示，在“八七”会议后，中央对于实行暴动如何才能成功，“很不明了”。他指出，起义的暴动计划，应依照当时群众的力量来制定，并利用一切机会来集聚他们的力量，多给训练，使其在失败时能坚忍不拔。对中央提出的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刘少奇不同意那种仍然一味认为革命形势是高涨的看法，主张要作具体分析。他认为，“依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依城市的看来是低落的趋势”。同时又说，目前乡村中农民的革命虽然是向上涨，还不是农民群众的有意识的行动，因而“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②。总之，刘少奇以其独到的见解，一方面委婉地指出实际上没有什么高涨的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版第62页。

②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

革命潮流存在，一方面因此提请中央要注意在城市和乡村中所发生的这种不平衡的特殊现象。他建议到农村去搞暴动，并指出必须要做艰苦的争取农民群众的思想准备工作，努力使农民的暴动成为有意识的，而不是自发的。6、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召开。刘少奇未能出席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1928年早春，刘少奇接受中共中央交给的新任务，前往白色恐怖的天津，参加全国铁路工会、天津市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决定他参加顺直省委常委；继又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由陈潭秋、刘少奇等主持顺直省委扩大会议，负责处理顺直问题。刘少奇认为，顺直党的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省委缺乏正确政治路线，省委组织不健全，基层支部很少开展工作，党内存在派别纠纷，对机会主义认识不清，发展个人意志和自由，甚至以能骂上级为好汉，不少人闹经济主义，消极责备过去。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他和陈潭秋主持下，改组了顺直省委，成立了由韩连惠等11人组成的新省委。然而，刘少奇等把顺直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一些，在工作方法上也有些欠妥，结果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党内矛盾的发展。如北京东部地区遵化、玉田等四县的党组织，一些人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省委。10月下旬，陈潭秋和刘少奇等共同签发了《征求改造党基的意见》的通告，又未能正确引导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加重了对顺直问题的指责和组织处理手段。对此，刘少奇后来曾作了检讨。

为致力于北方党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领导职工运动的发展，刘少奇在顺直期间，尽管困难重重，还是以坚韧的意

志，精神饱满地写下了不少重要文章，如《论口号的转变》、《职运须知》、《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吗？》、《怎样改造顺直的党》、《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等。刘少奇主张，号召群众的口号必须符合实际，一定要依斗争实际形势的转变来谨慎决定。他坚决反对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的情绪，反对无原则的党内纠纷，认定只要我们自己是进步的，坚决地以无产阶级的意志去战胜党内的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改造落后状况。

1929年4月，刘少奇奉调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他深入工厂、深入群众，直接领导了老怡和纱厂、恒丰纱厂、英商电车公司机务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6月初，中共中央又决定派他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7月中旬，刘少奇抵奉天（沈阳）时，中东路事件爆发。执行亲帝反苏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以苏方宣传“赤化”和垄断路权为由，单方面撕毁1924年关于中苏共管中东路的协定，指使东北地方当局以武力进占中东铁路，驱逐苏方人员，挑起中苏严重争端。中共中央因此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必须集中注意力对付这一事件，阻止国民党军阀妄图使群众走上反苏道路的阴谋，并指示刘少奇去哈尔滨，布置和指导中东路事件的群众性反抗示威。

在赴哈尔滨之前的8月下旬的一天，刘少奇去奉天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事先走漏了风声，他被严加防卫的厂卫队扣押，作为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解往警察局和法院审讯。审讯中，他机智地予以周旋，终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①。

^① 《关于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的证件》第112、75页。

获释后，刘少奇赶到哈尔滨。经过一段深入调查、了解情况，他即向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建议，应该首先扩大正在进行的以三十六棚（中东路哈尔滨总工厂的代称）为中心的工人怠工斗争，来与尚处于低潮的中东路工人的斗争相呼应，作为发动基础。他提出，在这个斗争中，不只限于在政治上加紧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宣传；还要在组织上加紧反对被反动派收买的工业维持会的斗争，积极帮助广大工人组织赤色工会，建立群众的组织；在工作方法上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根据斗争情况及时转变群众的斗争方式和我们的工作方法，避免遭受白色恐怖的摧残；还应把工人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和拥护社会主义苏联、反对军阀进占中东路的政治斗争逐步结合起来。刘少奇按照上述建议给哈尔滨的工作以正确指导，使中东路工人斗争获得了健康的发展。

1929年12月22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在中东路问题上达成协议，签订了伯力草约。之后，中东铁路局苏方人员就下令裁人，规定凡1929年7月10日（中东路事件爆发日）以后吸收的中国工人全部裁撤，而对同时期吸收的大批白俄工人则一个不减。这个不公正的做法，激起了中国工人的强烈不满。

1930年1月，刘少奇再度去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群众为自己谋求生存的斗争。他在同中共哈尔滨市委研究后提出，应领导中东铁路失业工人开展复工运动的斗争，并使这一斗争也得到在业工人甚至其他各行各业工人的支持，而成为全体工人的共同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中东铁路全体工人的总罢工。失业工人因此成立了东铁工人失业团，发表《告全国父老书》、《告全路工友书》、《致信俄局长》等文告，并登报启事，号召失业工友速到“失业团”报名，呼吁各界一起援助失

业团。在业工人也组织起了三十六棚总工厂失业工人后援会，积极援助失业工人。根据急剧发展起来的形势，刘少奇又及时指出，哈尔滨市已经起来的群众斗争，有可能汇合成为一个高潮，党的任务就是要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这种形势向前发展，利用失业团的公开机会去发动全铁路、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斗争，树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旗帜，建立自己的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

工人斗争高潮的掀起，迫使中东铁路当局答应分步骤解决失业工人的要求，失业工人大部复工。工人群众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各厂纷纷建立起工厂委员会。仅三十六棚总工厂委员会中，参加进来的工人就有 800 多人，占全厂工人 2/3 以上。

但是，在中东路失业工人的复工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中共哈尔滨市委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李梅五等人，竟同工业维持会搞交易，贩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工人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刘少奇对其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坚决斗争，提出要建立“护工团”等组织形式，以保护工会，维护工人的利益。但由于李梅五等人的干扰和破坏，使刘少奇的努力未能成功。

3 月中旬，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结报告和一封信，全面总结经验教训，阐述了党在领导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and 理论问题。他在报告和信中说明，在中东路工人斗争中，存在着忽视对于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问题，是全党尤其是满洲党最可宝贵的教训。在他的主持下，中共满洲省委即开展了对机会主义取消派的斗争。

不久，在中共中央的连续函催下，刘少奇离奉去沪。同年夏，他率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会，刘少奇当选为委员。会后，留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赤色职工国际在讨论关于中国职工运动问题时，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据守德国职工运动的一国经验，主张中国赤色工会应派遣力量，在黄色工会里去建立公开的赤色反对派，打出旗帜与黄色工会对抗，并把这一主张形成决议。刘少奇以他多年深切的工运实践经验，对这种不顾各国国情，不作具体分析的“一刀切”的“左”的倾向，深不以为然，并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与德国情况两样，黄色工会力量强大且合法存在，赤色工会力量弱小且不能合法存在，弱的要在强的里边，不合法的要在合法的中间，建立公开的赤色反对派，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赤色工会的会员打入到黄色工会里去，是为了利用其合法存在来进行我们的基础工作，以广交朋友，争取黄色工会的下层群众，待条件成熟，才可能使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如果不顾条件，一律公开搞赤色反对派，只能过早暴露自己力量，使自己孤立。然而，这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中肯的意见，却被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视为大逆不道，刘少奇被指责为“反决议”和“右倾机会主义”^①。刘少奇在1931年回国前，向赤色职工国际写了洋洋万言的报告。他不仅没有承认半点错误，而且在详述最近中国职工运动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后，也对国内“左”倾路线者在对待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和黄色工会问题上所存在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

1931年秋，刘少奇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同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

^①杨尚昆：《怀念少奇同志》，《缅怀刘少奇》第2页。

次回国，又担任了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10月，刘少奇仍然基于白区城市职工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应该采取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根本看法，和在总体上应该是防御的，但在某一时期、某一局部问题上不排除组织工人向资本家和国民党作反攻的和进攻的具体观点，写出《关于工运的意见》，提交不久前刚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他提出了当时工人斗争形势是“防卫的反攻的和进攻的”^①观点，认为应以这一个认识来确定职工运动策略，确定用什么口号与要求去组织工人斗争。刘少奇的这一观点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临时中央领导人一向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城市职工运动仍然处于高潮时期，党应当采取完全是进攻的路线的观点是不相同的。临时中央派人找刘少奇谈话，对他回国后所发表的许多意见，作出总批评。结论是：刘少奇站在工会系统上，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刘少奇不服，写信给临时中央，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具体地指出错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不错误”^②的批评，表示无法接受。信中还申诉他回来后所提出的许多工作上的政治上的意见，都是完全站在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观点上提出来的。至于这些意见是否被认为正确和被采纳，则在组织。

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刘少奇主持沪西大罢工后，仍然坚持实行他对白区斗争策略的主张，很有勇气地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执行者原先实行的那一套只号召工人武装起来与军警冲突，热衷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置罢工工人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于不顾的“左”的脱离群众的做法，首先着手解决近20万工人及其几十万家属的吃住问题，努力争取

①《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52页。

②1931年10月10日刘少奇以仲篪笔名写给中共临时中央的信。

社会同情，运用合法手段广泛开展支援罢工的募捐运动，发动群众包围上海市社会局和地方维持会，逼迫这些部门救济粮食和款项，从而解决了罢工工人的后顾之忧，改变了冷冷清清的罢工局面，沉重地打击了日本资本家，有力地支援了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并加强了中共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于他们在白区斗争中的策略的改变，指责他在米袋子里兜圈子，放弃了武装工人的任务，是搞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和取消罢工的右倾机会主义，终于排斥了刘少奇对沪西大罢工的领导。

在这种动辄得咎的情况下，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3月间，刘少奇还是先后写了《建立辅助组织问题》、《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1931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可贵地显示了他在理论上的坚定性。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

1. 工人阶级除了要建立自己的基本组织如政党和工会外，还必须建立工人合作社、俱乐部及其他文化的、互助的工人团体等辅助组织，以取得公开半公开的机会，进行赤色工会所要做的工作，扩大工人阶级的影响，加强同其他各阶级、各阶层的联系。

2. 领导工人的各种自发斗争，应是赤色工会当前特别重要的任务。赤色工会在目前的反帝运动中，应在群众中提出并广泛宣传自己的独立主张和口号，努力领导群众运动走上更高阶段，建立群众组织，发展民众武装，使城市的群众运动直接帮助苏区红军的斗争，使经济罢工与反帝国主义的政治罢工联

系起来。

3. 觉悟的工人应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去，争取和接近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当革命反对派在整个黄色工会的会员中还是少数的时候，不应该分裂出来，更不应该消极地退出来。那种要从黄色工会的“泥坑”中退出来，以便保留所谓“清白”的做法，实际“是标本式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好听的言词下掩盖右倾的消极”。

4. 在领导罢工之前要做好各种准备，包括要在群众中选出罢工委员会，分析敌人的力量，看清敌人的弱点，估计群众的情绪，组织群众的力量，消灭自己的弱点，选择适当的时机去发布罢工的命令等。在罢工实现之后，要立即召集群众大会，通过罢工纪律，组织所有罢工工人来参加罢工中的工作，最大限度提高罢工工人情绪，号召工人誓死坚持奋斗到底。并准备与敌人的武装作斗争。这样，“我们就真正能够领导罢工”。罢工的要求，应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不要机械地勉强地去加上许多政治口号。把群众目前的迫切要求和宣传鼓动的政治口号混淆到一塌糊涂，“这只有葬送罢工”。

6. 要严重注意已经发生的两种情况：一方面机会主义取消派在罢工困难面前投降了；另一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无视困难，异常轻率地玩弄罢工，使工人斗争遭致严重失败。我们的策略，既要能够调集群众力量，组织群众反抗，击破敌人一切进攻，又要能够在适当时机向敌人举行主动进攻，在罢工中使群众不断地取得精神上战略上的胜利；在不利的情况下，又要善于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适时结束罢工，有组织有计划地退却，以便准备下次斗争。否认白区工人运动中的公开工作和合法斗争，否认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必要性，这是关门主

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面临国民党、资本家、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并采用暴力镇压工人斗争的严峻形势，工人斗争的方法应采取以防御为主，以利用合法为主，党的组织应尽量深入到群众中去，做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工作。

.....

刘少奇的这些正确主张，特别是对职工运动形势的估计，同中共临时中央1932年1月9日作出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因而被临时中央前挂后连，认为是犯了“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是“悲观失望”。3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举行会议，批评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执行中央路线，存在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方式；指责刘少奇对形势估计不足，有合法倾向，向黄色工会投降，充满工团主义等等。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意见，说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①，决定：撤销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解散全总党团。刘少奇被迫检查，不久即到上海市工联会任党团书记，勉为其难地坚持工作。

这场公案直到5年后才得以分清是非，13年后得到完全定评。1945年4月结束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赞扬了刘少奇在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中所坚持的正确路线，肯定他是这方面的“代表”和“模范”。

奋战在中央苏区

1932年冬，刘少奇奉调离沪，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

^①1932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材料。

作。1933年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是全总机关由上海迁瑞金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后的工会领导机关，既领导苏区工运，也领导全国工运。

1933年2月到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重兵，先后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第五次“围剿”。这期间，刘少奇在领导苏区职工运动方面，着重号召全体工人行动起来，加入红军，组建工人师，为保卫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而战。他领导的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全力组织兵工厂、弹药厂，进行各种武器和弹药的生产；组织工人依靠自力更生解决粮食、盐、油、布匹、药材等物资和给养的困难，以粉碎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他还主持筹建了中国农业、店员手艺、苦力运输、国家企业四个产业工会，努力使苏区工会成为“坚强的阶级工会”、“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在中央苏区的党和工会内部，当时也存在着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工人在分田后经济上的要求，一方面不领导工人改善生活，一方面又认为工人落后于农民，有的地方甚至要工人在战争时期忍受资本家的任何压迫、不要反抗。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和资本家的怠工，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生活无着。而苏区的许多工会不仅不对这些情况引起足够重视，而且收了大量的社会保险金却不去做救济工人的事，这就妨碍着广大工人群众起来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是当时“职工运动中危险的右的错误倾向”。与此同时，“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①。这种倾向表

^① 《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9页。

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苏区经济的发展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在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不顾企业的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在年关斗争中到处举行总同盟罢工。这就使许多企业不堪负担而迅速倒闭。毛泽东为此曾指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①

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代表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同志的共同见解。刘少奇当时就曾发表过许多文章，来阐明这种见解，如《与忽视工人日常经济利益的倾向作斗争》、《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论国家工厂的管理》、《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中，边区的工会工作》、《每个工会会员加入赤少队去》等。他强调指出：“目前，在苏维埃革命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工人阶级一切福利的基础，是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是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扩大和在全中国取得胜利。‘一切服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这就要求国有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们，为着战争，为着苏维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版第105页。

埃的胜利，为着工人阶级全体长久的利益，而自觉地努力地工作。”^①正是从这个根本点出发，刘少奇对职工运动中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做法，都进行了坚决的、积极的纠正。他始终关心工人利益，提出维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是苏区工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指导各地工会制订劳动合同，纠正工人中某些过高的要求、狭隘的习惯和行会的偏见，同时反对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右的错误，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增进工人群众的利益。他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改订合同的运动中，更广泛地发挥工人积极性，提高工人觉悟，来参加苏维埃国家和红军的建设，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他要求各级工会，认真领会苏区《劳动法》，注意建立劳动介绍所、社会保险局，救济失业工人；批评那种采用强迫雇主安排失业工人的办法，是挖肉补疮，迫使这些工厂和店铺只好关门。他还指出，在停止强迫介绍就业的办法之后，一方面应从资本家和地主手里筹集救济款，另一方面也可动员失业工人参加合作社、参加革命、参加工人师，为失业工人广找出路。从而正确处理了工人与雇主、工人阶级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关系。他在阐明苏区国有企业、合作社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时，号召这些企业中的工人、职员，要用国家主人的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应在目前革命战争中广泛组织与开展革命竞赛，用最高的劳动热忱迎接苏维埃政府所给予的生产计划；为着提高生产效能必须与旧习惯作斗争，并加强技术训练等。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方法，他首先提出厂长负责制，以“三人团”（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任）和建立工厂委员会的体制实行管理。从而有效

^①《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172页。

地促进了中央苏区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刘少奇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不顾蒋介石纠集重兵正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错误的作战指导而连连失利的严重事实，仍然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会后，“左”倾错误领导者继续实行错误的作战指导，使红军的作战继续失利；4月，更调集红军主力同广昌之敌进行“决战”，结果，红军遭受很大损失，广昌依然失守。对此，刘少奇深为忧虑。同年7月，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新的进攻开始之时，刘少奇被调往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刘少奇从瑞金赶到中共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后形势已相当紧迫。他通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及时召开省委会议，对各项工作作临战布置：精简省级机构，缩编工作人员充实基层，组织军民抗击敌人，广泛动员群众坚持生产、支援前线、踊跃参军。他到兆征县蹲点，和县区委干部一起走家串户，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根据军事上越来越紧迫的严重局势，他主持召开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紧急会议，要求加强独立领导，划小行政区，实行干部地方化，充实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独立营和游击队，建立秘密党组织和工作网，将所有粮食转移后方，继续深入开展肃反等，以便在被敌人分割和占领时，能独立地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和转入地下斗争。在一切工作都部署停当后，9月，刘少奇被召回瑞金。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

长汀、会昌一线，根据地严重缩小，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开始战略转移。

长征中，刘少奇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参加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6月的两河口会议、9月的巴西会议和俄界会议等。在挽救党和红军的生死转折关头，在胜利克服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分裂路线中，在实现北上战略方面，对“左”倾路线的危害有着许多深切的亲身感受和事实对比的刘少奇，都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刘少奇随红一、红三军团胜利到达陕北。在11月下寺湾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决定他分工主管工会工作。会后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他任委员长。当时，他很关注在乡村中组织雇农工会的问题，主张依靠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指示各级工会发动工人赶制棉鞋等，使久经跋涉而又缺衣少鞋的红军能安然度冬。他还派出干部到附近城乡发动群众参军，补充红军在长征中的巨大损失，强调要在扩红的数量中保证1/3工人成分。

12月，北平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标志着全国人民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爱国运动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刘少奇在会上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等问题，作重要发言。会后，接受委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华北，“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在全国范

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①。

开创华北抗日根据地

1936年1月，刘少奇离开陕北瓦窑堡，3月抵达天津。当时华北地区经过多年严重白色恐怖，中共组织绝大部分被破坏，只保存了河北省委、若干基层组织和几十名干部。这些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斗争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领导人民群众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英勇斗争。在他们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6000余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激动人心的口号，从而在全国掀起了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潮。但是华北地区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也很严重，斗争策略上不灵活，不能团结大多数人，不能很好地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运动发生了漩涡，局面相当困难。刘少奇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重返华北白区“虎穴”后，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提出华北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他撰写《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发表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上，强调要顺利地执行这个任务，必须联合华北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才能实现党在策略上的转变。当时，河北地区的中共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45页。

组织处在秘密状态，不能公开活动，刘少奇和北方局主要通过《火线》传达党的指示和声音，指导各级党组织的工作。

在这期《火线》上，刘少奇还发表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具体总结北平学生在“三三一”抬棺游行中，与校方发生严重对抗，并遭受军警突然袭击，许多学生骨干被捕的教训，指出它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足以陷自己于孤立的“左”的偏向，是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影响的结果。他在文章中阐明，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取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组织和阵地的策略，避免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中共北平市委按照这一策略思想进行了许多善后工作，向校方解释、道歉，纠正学生中“左”倾错误，挽救了当时的不利情势，并在知识分子中间，大大地推动抗日救亡的工作。

5月，日本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日军向华北大举增兵。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发动平津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刘少奇向中共天津市委作了具体指示。他指出，利用敌人疯狂侵略已经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高昂抗日情绪，有可能以学生的行动，进一步推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全国实现停止一切内战，抵抗日本侵略的目标，从而扩大党的组织和进步团体，壮大抗日的革命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他估计，这一行动不仅会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甚至还会得到地方军警的同情，有胜利的把握。中共天津市委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通过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在天津发动起万余学生、工人和市民参加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人们高举“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大旗，高喊“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受到各界人民的拥护。一石激起千重浪。天津的示威游行立刻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平津学生的爱国行动，也果然在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中鼓起抗日热情，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作了一番细致研究后，认为他们虽同日本有很深关系，在全国救亡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还是不甘愿卖国当汉奸的，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而及时制止了在运动中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改呼“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①。这些口号的改变，使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广大爱国官兵很快转上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立场，使群众的救亡活动及其所组织的救国团体，取得了进一步的合法性。

围绕组织人民阵线问题，刘少奇于6、7月间发表了化名莫文华的《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和化名吕文的《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等信函、文章，一方面加紧做对党外极有影响的人士的工作，同时极力教育党内“肃清空谈的领导”态度，要求在组织人民阵线时，应该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他指出，要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把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经过刘少奇等的艰苦工作，华北各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相继组织起来，并由华北的一些救国团体发起，在上海召开全国各救国团体代表会，成立以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0页；《缅怀刘少奇》第82页。

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知名人士为理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平津为中心的“民先队”则发展到了全国各大中城市。在华北汇合起的大规模抗日救国浪潮，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后在华北的独立抗战，打下了基础。

为适应和配合抗日救国的形势，正确实行并推动白区工作，刘少奇还曾于4月间撰写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提纲”总结了192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为此，他指出，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共产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更加改善党的秘密工作；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应着眼争取有胜利可能的行动；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广泛联系与组织工人，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工会法、工厂法，参加黄色工会等各项活动，开展群众性的斗争和工作。这个“提纲”，是中共的白区工作在犯了多年“左”倾错误之后开始转变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中央北方局当机立断，采取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作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手续，以争取获释的决定。刘少奇将这一决定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是年秋，在日军进攻华北前夕，组织营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出狱，有效地保护了这批重要干部。他们先后被派往各地领导革命斗争，成功地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不但平津两市委得以很快健全和加强，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也都得

到恢复，还先后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中共山西省委和中共河南工委，并推动了华中、华南等地中共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卓有成效的工作，深为中共中央赞许。中共中央书记处在8月5日给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的信中，高度评价说：“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刘少奇化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加强，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得到纠正；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建立了华北各界的救国联合会，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成绩；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的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①

阎锡山从绥远事变（日伪军于1936年8月开始侵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必定侵犯山西的趋向，决定“守土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建立了地方性抗日群众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8月下旬，阎锡山曾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刘少奇知道后即指出，阎锡山来找，是个好机会。薄一波得到指示，马上去太原了解情况，同阎锡山作初步接触，返回汇报。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同薄一波一起，第一批去太原。临行，刘少奇谆谆嘱咐他们：一，首先争取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怕搞到阎锡山的上层机关去、戴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0页。

“官办团体”帽子。二，踏踏实实做群众工作，不做“清客”，不“抬轿子”，切实争取抗日民族革命领导权。三，注意使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成立直接受北方局领导的、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共山西工委^①。薄一波等到山西，按照刘少奇抓实权、做实际工作、不空谈的正确方针，迅速地与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推动阎锡山抗日，壮大了抗日救亡的力量；还培养了一批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力量，为以后华北完全沦陷后刘少奇和北方局安全转移山西，创造了回旋之地。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加紧做阎锡山、傅作义等各实力派的工作，使之响应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他还及时向北方局下辖党组织和党员解释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条件释放蒋介石，逼蒋抗日的方针，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他曾以尚陶和K·V·名义，于次年1月，连续发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等文章，阐明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不满南京政府坚持内战、对日投降退让政策，接受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以成为全中国大局好转之关键”。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少奇的分析 and 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37年2月开始，国共两党代表就合

^①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缅怀刘少奇》第85页。

作抗日问题举行正式谈判。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开始改变手法，一方面加紧大规模侵略备战，一方面对国民党显示和缓姿态，频送秋波，企图拉拢蒋介石，破坏正在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善于思考和从实际上解决问题的刘少奇，于1937年2、3月间，曾就西安事变后的形势，结合他在华北地区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综合提出了既要防右又要防“左”、特别要注意防“左”的意见。他接连给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洛甫（张闻天）写信，陈述蒋介石在国共合作中一定要竭力加强自己力量和想方设法削弱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因此提出我们不能放松任何戒备。针对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某些形而上学观点，他强调必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指出企图用先进分子的左派组织去代替统一战线的组织，或者将左派组织溶解于统一战线组织，都是错误的。他在详细分析了西安事变后“左”倾情绪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之后，郑重地指出：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仅是原则的转变，现已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关头，哪怕是一点小小疏忽，都要引起深远后果。为了防止“左”倾错误的发生，应在党内广泛宣传解释党的策略路线，加强党的行动纪律和政治纪律，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异常慎重。他还明确提出，“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来的传统要转变”。这种错误传统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他说，“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

刘少奇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促进了中共中央要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讨论白区工作的决心。4月，刘少奇接

到中共中央要他去延安开会的通知，即由北平（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迁到北平）启程。5月2日至14日，他在延安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会上，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就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发了言。他指出，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目前挽救中国、解放中国唯一正确的政策。两年来全党执行这一政策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国内和平的基本实现，国内政治已经相当地向我们党所指示的民主与抗战的方面转变，证明着我党至今还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但是，他又指出，领导权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争取。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是国共合作新阶段中的中心问题，绝不能有忽视的倾向和任何懈怠。

在谈到共产党如何来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时，刘少奇除强调要很好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四项原则^①外，还补充了几点重要意见。他认为，我们的工作必须十分艺术，“应该完全抛弃虚浮、夸大、空谈的作风，不要故意去刺激资产阶级的警觉性。要进行切实的工作，不要企图用吹牛皮来吓退敌人”；应该善于纵横捭阖，“灵活接近各方面而保持

^①见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2页。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是：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第二，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自己的纯洁”；应“在党内和群众中加强国际形势教育”，“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更密切地联合起来”；“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停止以后，政策的、原则的、理论的斗争已经提到了主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在政策上、原则上、理论上加强对于国民党及各派的批评，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①。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从5月17日起，转入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为会议总结过去白区工作经验教训，批判“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阐明党在白区工作中应持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基础。他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目前阶段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今后的主要口号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方面实际地建立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全然依靠于我们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然后，刘少奇又具体地论述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建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应当怎样联系；党应该作出怎样的转变等。中共中央对刘少奇评价很高，认为他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在北方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赞扬他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经验”，“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赞扬他的报告“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②。刘少奇在为会议作结论的讲话中补充说，他在会上的那个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第78—79页。

②1937年6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主义和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最后，会议表决通过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结论。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彻底转变的重大转折。

正当刘少奇根据两个会议的精神计划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时候，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根据时局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在延安开会的干部不再回平津，刘少奇和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一起于7月下旬到达太原，作重新组建北方局的准备。8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新机关成立，刘少奇任书记。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在联合抗日问题上达成协议，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了制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方针和具体政策，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会上还对国共两党关系提出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的问题，认为统一战线正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党同志注意，要求在作战方针和政治的总口号等方面，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根据中共中央方针，刘少奇指示薄一波等说，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战，我们的策略应有改变。“左”倾关门主义还要反对，但主要注意力应放在防右上。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切实掌握我党的领导权^①。他还在太原召集王世英、南汉宸、张友

^①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缅怀刘少奇》第87、88页。

渔、阮慕韩等开会，要求他们抓紧时机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全国各种力量，特别是华北几省的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战。刘少奇还交代了做阎锡山、刘汝明、韩复榘等工作的具体任务。

这时，中共中央也要周恩来立即到太原、大同会晤阎锡山，商讨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各项事宜。经过商谈的成果之一，是阎锡山同意在晋北和绥远、察哈尔沦陷区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八路军派代表参加，以实行战争的充分动员和游击战争的组织工作。9月20日，总委会在太原正式成立。中共方面派了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和程子华参加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战略区内，和地方当局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战地动委会的各级组织普遍建立了起来。

总委会成立的当日，刘少奇同周恩来致电中央，报告情况，提出开展山西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向阎锡山提出彻底工作办法，在任何地区、任何问题上均以统一战线政策打破其分开对立的阴谋，并纠正我们包办一切与不发动群众的倾向；尽量用左派面目出现来团结左派，发展左派，以树立山西及阎锡山的左派力量，便利统一战线的发展；在动员工作中要避名取实，尽可能的发动群众，推动左派、教导团、牺盟会及好的县长、特派员来出头，以便易于改革县政和领导筹款。

接着，9月下旬，刘少奇与周恩来、杨尚昆等，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把华北划分为几个战略区。在这些地区，如因统一战线的政治关系不能以军政委员会名义出现，则可通过战区

动委会来实现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当时，刘少奇还估计到华北有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队会大部退出的可能。认为坚持华北抗战的责任，会全部或主要地落在八路军身上。所以八路军总部一到太原，北方局就向八路军高级干部及地方党的干部，明确提出如下任务：广泛准备游击战争，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的集团军，建立起众多根据地，独立坚持华北抗战。11月中旬，刘少奇为北方局起草了《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

刘少奇还根据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即大举进攻中国内地，全国抗战的形势已基本确定的情况，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作了如下周密部署：

1. 党在平津的组织转入长期秘密工作，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保存与积聚力量，等待和准备将来反攻时期收复平津。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全力援助平津附近乡村中的抗日游击战争。

2. 在几年前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并划为特别区的冀东，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抗战，坚持游击战争。

3. 在华北其他地区的我军后方，动员一切力量抗战支前；同时准备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以战地动委会为群众组织主要形式，它既是动员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

4. 在华北即将失守的城市、矿山、铁路、工业区，动员工人、职员迅速迁散，准备失守后对敌斗争，组织工人游击队，或到乡村同农民一起打游击。

5. 聂荣臻立即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并准备公开军区司令部，可一面向蒋介石和阎锡山提出，力求其同意，然后推广

其他地区，在未得承认前，照样先行办理。

刘少奇坚定地认为，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和最有效的方式。如果能这样地在华北动员起数十万以至数百万的人民武装，它将牵制日军极大兵力于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它将消耗敌人力量，收复失地，最后胜之；它将给华北人民以斗争出路，给汉奸以打击，给投降者的可耻面目和民族失败主义者的错误以暴露，给某些可能的对日妥协企图以极大牵制。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机关转移到临汾帽儿刘村。太原失守后，临汾成为山西抗战的政治中心。这时，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提纲性讲话，要求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和全国反对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努力向结束片面抗战、代之以全面抗战的方向发展，积极争取这个前途。12月上中旬，刘少奇在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提出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大谈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通过蒋介石的谬论。刘少奇在会上多次发言，结合华北工作情况，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同王明的对立意见。由于王明刚从苏联回来，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假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他的话对会议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坚决抵制，加上刘少奇等毫不含糊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才使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成为决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筹委会，刘少奇为成员之一。会议还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面临临汾亦将沦陷的形势，刘少奇于1938年2月下旬又

率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进行转移。3月，在转移过程中奉调回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为适应目前特殊情况及各方面工作，刘少奇暂留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说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提出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指出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号召全党认真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使命。会议期间，刘少奇作了华北党三年来工作的基本总结报告，并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对提交全会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作了具体说明。针对王明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从“左”倾一下跳到右倾，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中与中央不一致，闹摩擦，擅自发表宣言，破坏党的团结和纪律的行为，刘少奇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纪律的重要性，重申了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刘少奇尖锐指出，“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①

^①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缅怀刘少奇》第20页。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与党的工作，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会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原局委员，刘少奇兼中原局书记，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

发展华中新局面

为了执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刘少奇在全会完毕后，即于11月23日出发去华中。途中，他对豫西党的工作做了指示和部署，根据中央指示将中共豫西特委改为中共豫西省委，各中心县委改为地委，宣布刘子久为省委书记。

1939年1月下旬，刘少奇一行到达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四支队自1938年3月东进后，便在这里成立了留守处。中共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以竹沟镇为开展河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着手做发动群众、扩大党的组织、发展武装、训练干部的工作。刘少奇一到竹沟镇，这里便成为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他仔细听取河南、鄂中、鄂西北等地党组织负责人朱理治、陶铸等的汇报后，遵循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领导中共中央中原局作出决定，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等区党委。为避免与国民党军摩擦，他要求豫鄂地区新四军游击大队沿平汉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的区域发展，目标尽量缩小，多组织过渡形式的武装；并准备仿照晋察冀先例，创建豫鄂边区根据地，派李先念率新四军一支游击队去鄂中活

动。后来，李先念即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挺进豫鄂边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并在6月里与陈少敏所率领的信阳挺进队于安陆会合，两支部队统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11月中旬，根据刘少奇指示，将豫南、鄂东、鄂中地区的武装部队又统编为新四军挺进支队，李先念任司令，朱理治任政治委员。1940年1月，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到1940年底，鄂豫边区范围扩大到十多个县，建立了九个县的政权，成立了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武装发展到1.5万余人的游击兵团，约10万人的民兵组织，初步建成鄂豫边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工作稍有头绪后，刘少奇于1939年3月有事返回延安，由朱理治代理主持中原局工作。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毛泽东赞扬它是一篇“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好文章^①。

1939年秋，中共中央鉴于日本侵略军已无继续向国民党作战略进攻的可能，华中又极其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决定刘少奇偕同准备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等40余名干部，再抵竹沟镇。这时，蒋介石在各地制造和加剧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事件迭起，危险升级，竹沟镇已经不很安全。基于国民党顽固派有可能对竹沟地区发动进攻的判断，刘少奇当机立断，对豫鄂边根据地作出紧急布置：朱理治即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武装与教导队，去豫鄂交界地区的四望山，集中注意力开展敌后工作，巩固现有部队，创造根据

^①王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缅怀刘少奇》第23页。

地，筹措给养；竹沟留守处尽量缩小，主要办理后方勤务及交通事宜；调刘子久到竹沟主持河南及鄂西北秘密党的工作；刘少奇自己即率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向皖东转移。果然，没有多久，便发生了国民党顽固派袭击竹沟的惨案。刘少奇的先期行动，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损失。

刘少奇在向皖东转移途中，在豫皖苏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检查、指导豫皖苏边区工作，听取了彭雪枫、吴芝圃等的汇报，提出了“东进，东进，再东进”的战略号召，并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工作报告。他建议在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武装部队统归彭雪枫指挥，集中力量创造永城、夏邑、肖县、宿县等四县根据地，同时建立睢（县）杞（县）太（康）和商（丘）亳（县）鹿（邑）拓（城）两块小根据地，以便将来连成一片；加强部队正规化，巩固与扩大主力，准备在一二个月后，抽一部主力去津浦路东创造苏北根据地。刘少奇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共中央认同。中央要求整个江北的新四军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向东发展，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豫皖苏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编为第六支队。以后，第六支队在八路军南下部队配合下，连续取得反“扫荡”、反摩擦的胜利，进一步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沟通了华北华中的战略联系，使我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形势获得改善。

1939年12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是同年5月初，由新四军军长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精神，亲自去组织和建立起来的，由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

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党的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任书记。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后，与张云逸、徐海东研究了皖东津浦路沿线的情况，了解到韩德勤（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指挥）等部正从东、西、北三面围击根据地，企图把新四军压过江南的严重形势，提出了以包围打被包围，打开东进道路的对策。刘少奇认为，在武汉失守前后，我们已经丧失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时机，如果敌情及全国大局没有大变化，目前在皖东只能求得有限度发展。整个华中，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豫鄂边李先念部活动地区、豫东彭雪枫部活动地区和苏北，而以苏北为最。因而应把苏北作为突击方向，集中最大力量在这里发展，以依靠彭雪枫部、张爱萍部自豫东、皖东北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如果不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就不能打成一片，就不能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①刘少奇在请示中共中央后，即与徐海东联名电示彭雪枫，要求他根据中央关于新四军发展方针，订出具体计划，争取半年内发展豫皖苏边区新四军至2.5万人枪。新四军第六支队还根据刘少奇关于把根据地扩大到路东去的指示和皖东北的斗争情况，增派第一团及百余名党政干部到皖东北，加强了皖东北的斗争力量。

中共中央中原局到皖东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增补张云逸、徐海东、刘子久为中原局委员，把江北前敌委员会改为皖东军政委员会，归中原局领导。1940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的战略方针指示，明确由刘少奇直接指挥完成皖东斗争任务，将皖东全部和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当国民党

^①叶飞：《少奇同志与新四军》，《缅怀刘少奇》第110页。

顽固派在3月开始把反共摩擦的重心转向华中，首先在皖东发动全面进攻时，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坚决给予由南路进犯的李本一部以迎头痛击，继趁颜仁毅进攻大桥，定远县城空虚之机，攻占定远县城。刘少奇指示立即成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委派魏文伯出任县长；并马上设计了在将嘉山、来安等县顽固派武装一起赶出后，都委派县长、区长、乡长，建立进步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蓝图。4月上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移驻津浦路东盱眙县半塔集（今属安徽省来安县），进一步具体作出皖东反顽作战部署，将韩德勤部全部压过淮河北岸，冲开了建立民主根据地的大道。

1940年5月，韩德勤乘安徽省泗县的日伪奔袭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驻地半城集之机，向我苏皖边的金锁镇、界头集进犯，刘少奇指挥陇海南进支队、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一团等部进行反击，使皖东北形势从此大定。皖东北地区的开辟，切断了苏皖顽军的联系，使韩德勤更加孤立，为我东进苏北建立了前进基地。

6月，根据刘少奇建议，中共中央军委派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到达豫皖苏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会合，在取得中央军委同意后，将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彭为司令员，黄为政治委员，并明确统归中共中央中原局直接指挥。7月，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迅速解决苏北问题”的意见。具体的军事部署是：八路军彭明治、朱涤新支队全部到苏北淮河北岸活动；黄克诚部在豫东的两个团归彭雪枫指挥，以应付突然事变；黄克诚部另两个团到皖东北，以随时增援苏北或渡运河解决苏北问题；陈毅部在原地吸引韩德勤、李明扬（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指挥）部队从东北方向来攻，

以逸待劳，独立坚持一段时间，一方面以证明“蚌自彼开”，一方面以待我强大增援部队赶到协同决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破韩、李主力；然后再分区肃清反动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建立苏北根据地。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部署。于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过长江后改称，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东进到泰兴黄桥地区，力逼苏北。按照中原局部署，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于8月初东向苏北，强渡三河，开始开辟淮（安）宝（应）地区的战役。刘少奇还电令彭明治、朱涤新两部速以主力控制高邮以南一线，另派一部策应在淮、宝受大刀会袭击的新四军过河。8月下旬，新四军彻底打垮淮、宝地区反动刀会的围攻，新四军、八路军共同完成了开辟淮、宝的战略任务。

9月上旬，韩德勤为实现其“先南后北”的方针，调集兵力向黄桥地区新四军发动进攻。由于新四军出击稍早，韩军很快后撤，未能诱敌深入，歼韩主力。10月上旬，韩德勤兵分三路，再度进犯黄桥。新四军诱其长驱而入，奋起反击。刘少奇疾示黄克诚全力南下，作一鼓之举，消灭韩军主力，占领水网区作为根据地。在黄桥决战中，新四军将韩军来犯者大部歼灭。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在盐（城）阜（宁）地区胜利会师。至此，津浦路东西直到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打开了在苏皖广大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完成了开辟华中的战略任务。11月间，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移至苏北，与陈毅会合，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与八路军。在叶挺抵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

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连续取得巨大胜利的形势下，刘少奇清醒地估计到，国民党顽固派很可能要在最近向皖东、皖北大举进攻，而这里的新四军兵力薄弱，难于抵挡；华中部队主力在苏北，暂时也不能西援；皖东、皖北只能以游击战争坚持原有阵地。据此，他提出，江南的新四军军部应在目前交通还未断绝的情况下从速北移，以防不测；至于皖南阵地亦用游击战争坚持，不能坚持也可放弃。可惜这一正确建议，没有得到项英的重视。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年10月19日，国民党曾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名义，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声称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抗战，强令要在一个月期限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另电密令汤恩伯（国民党第一战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韩德勤等部30万军队和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准备进犯新四军。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全国形势，决定在皖南作出让步，将新四军皖南部队转移江北，在华中实行坚决自卫，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可是，蒋介石却以中共的大义忍让为可欺，于12月8日又以何、白名义限令江南新四军在年底以前全部开到江北，黄河以南八路军在年底以前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华中新四军在1941年1月底也要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去；同时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密令顾祝同部署进攻皖南新四军部队。在此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急令皖南部队迅速北移，要求华中和山东的党组织和军队紧急动员，做好充分准备，坚持抗日阵地，打破顽固派的狂妄企图。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部随即

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坚持皖东、巩固苏北，贯通苏皖联系、粉碎顽军东进的方针，并指示江北游击纵队和苏皖部队，积极接应皖南部队北移。但是，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影响，对国民党顽固派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行动迟缓；又不按中央指定的路线北移，选了国民党有重兵驻守的方向行动，致使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得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正在转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9000余人中，除1200多人突围外，一部被俘，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害。刘少奇痛定冷静地思索，综观全国的局势，认为国民党尚在继续抗战，还不敢同共产党完全破裂；我华中新四军新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还不巩固，部队也须休整补充；韩德勤又正利用水网，加筑工事，深沟高垒，屯集粮食，乘机骚乱，我还难于作彻底消灭韩部之举，以消祸患。因此，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处置皖南事变问题上，“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①。中共中央接受他的意见，确定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

在这危难之际，刘少奇于1月20日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代军长。4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同时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任军分会书记。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受命领导整个华中的敌后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和陈毅等领导重建新四军军部，将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统编为七个师又一个独立旅，作为华中敌后各战区支柱，在地方党

^①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1941年1月15日）。

组织配合下，大力开展巩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很快使华中敌后形成了以苏北为中心，包括苏南、苏中、淮北、淮南、皖中、鄂豫和浙东等根据地在内的强大的抗战局面。

刘少奇认为，除了加强军队的建设，完成正规化“党军”的任务外，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华中长期抗战的重要关键还在于广泛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首先巩固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队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为此，他对苏中和盐阜区的工作给予极大注意。1941年3、4月间，他连续指示中共苏中区委副书记陈丕显，说：我们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除开军事问题外，民众运动——民众组织与武装及抗日积极性的发扬，就成为我们建立根据地与长期坚持抗战的基础；应切实改善群众生活，减轻人民负担，只有民众积极起来保护其本身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会或才可能以同样的积极性来保护国家和民族；抓紧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就成为目前发动民众抗日积极性与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的中心一环。刘少奇指示，应从目前农民最切身的要求，如借粮、借种子及减租减息开始，发动和领导起群众运动。他特地到阜宁召集阜宁全区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县放开手脚做群众工作，立即组织农救会，举办各种训练班，学习抗战的政策和策略，成立工作队，深入农村去。他出席盐城县、阜宁县的县农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讲话，指出苏北的稳定局面不会持久，艰苦的阶段即将到来，敌伪、顽固派随时都可能来进攻，我们的工作不能慢慢腾腾，要不失时机，先搭架子，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运动，把广大穷苦的农民组织起来，使它成为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政府在农村的最牢靠的依托。他在5月初给黄克诚和金明的信中，还提出了组织群众的具体数字和标准要求。说，要在半年

内（夏收到秋收），在各根据地内至少组织 300 万以上的群众到各种团体及自卫队中去，而且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只是我们叫他们为“有组织的群众”，而是要这 300 万人自己认为自己是加入到了了一定的组织中，有一定的组织观念，一定的组织生活，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等。各地贯彻刘少奇的指示，到 7 月，光盐城的农救会会员就发展到 20 万人。在农救会的影响和推动下，青救会、妇救会、教救会等组织也很快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洪流。

1941 年 7 月开始，日军对盐阜区进行大“扫荡”。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盐城转移阜宁。刘少奇在阜宁的八九个月里，辗转停周庄、周门镇、汪朱镇、停翅港、单家港等地，直接指挥阜宁党政军民，为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战斗。

这期间，刘少奇还兼任华中党校校长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院长。他在党校教育、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倾注了很大的心血。《论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人为什么犯错误》，包括以前的《人的阶级性》、《论党内斗争》等，大多是他在华中党校的报告。为了使盐阜区的知识分子和青少年不致星散流落，在他的督促下，在阜宁县创办了盐阜区第一联立中学。这是盐阜区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所正规中等学校。刘少奇认为，没有民族的、民主的新文化上的建设和发展，在千百万人民中准备民主思想的巩固基础，成为奋斗的理想和实力，民主政治的建设是不可能的。教育工作不发展是不能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可能充分发展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对象，不只应该在上层，在知识分子中，而应以下层、以一

般劳动人民，以农夫农妇及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所以，他要求各地对教育应采取多种方式。他说，学校教育，小学、中学、大学应发展，但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社会教育，举办冬学、民众夜校、识字班，出版报纸杂志，开设书店、图书馆，组织俱乐部、农村剧团、歌咏队，编印群众喜爱的通俗读物等。在他的指导下，苏北敌后的群众教育得到蓬勃开展。仅盐阜区，1941年的首次冬学运动，学员就达7万余人之多。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刘少奇在单家港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2月15日的会上，他作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强调今后任务要“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在3月5日的会上，他又作了大会总结发言，并宣布，中央调他回延安工作，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调 回 党 中 央

刘少奇把华中工作交代安排就绪后，于1942年3月中旬离开苏北去延安，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山东根据地的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帮助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总结四年抗战经验，确定今后斗争方针。他指出，主要任务还是“巩固”两字，巩固山东，巩固部队，巩固根据地。为达到这个目的和做好各项工作，他要求山东分局要作调查研究，埋头苦干，打破主观主义、清谈主义、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到群众中去，到支部中

去，改变一切不良作风。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他特别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端正指导思想，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又联合又斗争的战略方针，全力争取友军共同抗日，坚决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加强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伪军，粉碎日伪“扫荡”。他指出，群众工作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不发动和组织起千百万的群众在我党周围，工作搞不好，地方武装不能发展，主力不能补充，财政经济、粮食生产都要成问题，党也不能发展。要抓紧深入开展群众运动，把减租减息运动作为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在6月的山东分局会议上，他作了《五年来山东工作基本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指导报告。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的抗战反顽斗争日趋主动，实现了工作的胜利转折。

7月下旬，刘少奇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驻地临沭县朱樊村出发，继续西进，9月到达晋东南辽县（1942年改左权县）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10月下旬，到达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源县阎寨村。11月下旬，又从沁源到达平遥、介休。12月上旬，到达晋西北兴县。12月30日，经过九个多月长途跋涉，穿越日军100多道封锁线，风尘仆仆，安抵延安。

迎接1943年的到来，延安喜气洋洋。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元旦盛大团拜，并欢迎刚从华中归来的刘少奇。毛泽东、朱德的讲话，提出了新一年的主要任务是战斗、生产和学习。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并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

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员会等工作部门。刘少奇还参加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为着分工又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刘少奇一肩数职，开始了他头绪纷繁的中央领导工作。

4月，延安的整风审干运动在各机关学校普遍展开。在此之前的1942年11月的一个会上，毛泽东曾说，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从1942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便先后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渗入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以至导致后来反特斗争的扩大化。刘少奇在当时也是这样估计的。他在6月间给陈毅、饶漱石的电文中说，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已经是非常精明、非常广泛使用的政策，是国民党目前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我们要把反特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重要，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都学会反特斗争。但刘少奇却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他在指示华中作反特准备时，强调地提出了中央的指导方针：1. 要由各机关学校首长负责并亲自动手审查；2. 要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方法，切忌粗枝大叶、主观臆断；3. 分清是非轻重，不得随意下结论；4. 争取失足者即争取特务转变为党为革命服务，原则

上不杀一人；5. 教育干部即教育大批忠实干部党员学会 侦察 审讯，学会反特斗争；同时严禁打人骂人及一切变相肉刑（如不许睡觉等），不得指名指事问供，不得轻信口供。

但是，7月15日，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副主任康生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急不可缓，使审干运动离开了审查干部工作的正常轨道，一时间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过火斗争，十多天里搞出大批“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幸亏毛泽东很快出来制止，才避免了更大损失。后来，刘少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延安的防奸运动是有错误的，这就是在坦白运动中简单的要人们坦白特务问题，对于许多坦白“半条心”的问题的人加以穷追，结果有不少的人被“追”成特务，犯了逼供信错误。

在整风运动中，刘少奇全力协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全党对党的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总批判和总清算。1943年3月间，他结合自己从1936年春到1942年春的经历，撰写了《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在党内作讲话，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白区党组织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损害很大，直到中央召集白区党代表会议时，华北的反对者还在党内活动，坚持拥护历史上白区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企图否定当时华北党的正确路线，不认为那种“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防御、退却的必要性”的路线是错误，不认为肃清这一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是必要的。对于华中的经验，刘少奇则在另一方面着重指出，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本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条件，但是由于当时

的华中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政策上实行了一条一味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不敢采取有组织的独立自主的方式去参加抗战，更不敢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去团结一切抗日阶层与抗日势力，建立自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民主根据地与抗日民主政权，因而白白地放过了最好时机。刘少奇还严肃地指出了华中负责同志的组织纪律性问题、党性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指出正是由于他们不执行中央的屡次指示，轻视华北实践已经证明的经验，强调华中特殊性，在行动上坚持自己与中央抵触的错误路线，才造成不美妙的结果。

刘少奇很注意运用毛泽东的建党理论来批评和清除党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他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之机，撰写《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指出党的过去的历史，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个以各机会主义者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在大多数情况下，错误路线被克服了下去，但对其思想体系总是没有彻底加以克服和清算，给以致命的粉碎性打击，所以一有机会便又发展猖獗，危害党。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刘少奇号召，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想，批判一切从书本上的公式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话里，很明显，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正在党内孕育。

10月间，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刘少奇和周恩来、王明、康生、朱德、张闻天、陈云、邓发、博古、王稼

祥、董必武、林伯渠等，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学习小组会。10月下旬，刘少奇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讲话，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抗战以来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指出了这条路线在对抗战形势的估计（中日关系）、统一战线（国共关系）和战略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及其对党的工作带来的危害。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六届七中全会反映了整风运动的胜利成果，使全党达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空前一致，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迎接对日战略大反攻，作了充分准备。

1944年4、5月间，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援救入侵南洋的孤军并摧毁中国华东、华南的美空军基地，首先从河南发动了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进攻，夺取了郑州、许昌等地。5月中旬，中共中央向中共华中局和北方局发出《关于向河南发展方针的指示》，要求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此后，根据形势发展，刘少奇以极大的注意力，转向指导发展河南和发展长江以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6月下旬，他和陈毅联名指示新四军第五师，要确定地准备待机向河南发展，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指示要求五师以一部兵力加强鄂南分区，相机向南推进，向湘北、湘东、赣西北之间宽广的敌后地区发展；强调鄂南的发展，重要性仅较河南为次。7月中旬，他和陈毅又联名指示新

四军第二师、第七师在坚持皖中阵地、应付桂顽突然进攻的准备中，相机发展大别山，走向二、四、五、七这四个师地区（淮南、淮北、鄂豫皖、皖江等地区）联贯一片的前途。7月下旬，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连拟两电，一电致中共北方局，说：已令新四军第四师派两个团西进豫东皖北地区活动，设法与水东（河南睢县、杞县、太康等地区）打通联系，约一个月后可出动，豫东干部将随彭雪枫、吴芝圃前进；韩钧可调豫西工作，延安还准备派一批干部到河南，北方局应将现有干部随部队去豫西，待在豫西建立立足阵地之后，韩钧及延安干部即起身前去。一电致中共华中局，说：北方局要求你们派部分豫东干部回水东地区工作，望尽可能派一些有作用干部去。随着这些调动，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河南和恢复豫皖苏根据地的工作因之迅猛发展。

向湖南进攻的日本侵略军，于6月到8月间占领了长沙、衡阳。向广西进攻的日本侵略军，于11月间占领桂林、柳州、南宁，完成了它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而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在八个月中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造成了广大的敌后地区。为了向敌后跟进，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12月26日，刘少奇和陈毅联名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要他们作这样的战略考虑：华中局及新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则北面夺取陇海路沿线的任务，应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责任；西面争取平汉沿线、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及新四军第五师划为一个新的战略单位来担负，新四军对以上各单位只担负配合之责。为了争取江南苏、湘、皖、闽、赣地区，新四军部队现应开始分批南下。如大反攻揭幕，新四军全军主力除防御

李品仙者外，均南渡长江，保证江南伟大发展。今后一切工作都应照顾大举南进和加强现地的双重任务。电文指出，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还应预有准备，在将来适当时期率队进入江南去主持全局时，在江北现地能成立一个独立的、负责江北工作的大单位。电文还告，中央决定将在延安的百余名华中干部全部派回华中工作，还有东南籍贯的团县以上老干部 400 名左右，东南各地的新知识分子约 400 名同去。电文发出的第二天，粟裕即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和发展浙东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于 1945 年 1 月中旬成立了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不久叶飞被任命为副司令员。

为督促发展河南的确定方针，1945 年 1 月下旬，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文中，指示中共北方局说，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 2000 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实行，各种政策没有完全走上正轨，根据地群众基础还不巩固。北方局应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作风好的干部去，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2 月中旬，中共中央又电告北方局，在北方局去平原帮助工作期间，山东分局、晋察冀分局均归中央直接领导；太行、太岳两区党委仍归北方局就近领导；河南区党委暂归中央领导。

经过充分酝酿，4 月 20 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出详细结论；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的杰出贡献。《决议》肯定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①

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分别作了《论解放区战场》、《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刘少奇在开幕式上讲了话，指出大会的目的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国如果走上这条路，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他呼吁“全党团结起来，在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针之下前进！”他在5月14日至15日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一方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一方面对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全党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也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党获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了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述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是我党组织路线的总结与发挥”。

由于大会正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党的路线，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团结一致，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七大闭幕后，在6月19日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7、931页。

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产生了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洛甫、彭德怀等 13 人为政治局委员。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提出

1945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暮途穷，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争取东北，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出奇制胜的开局妙着。对此刘少奇有特殊贡献。

8 月 28 日至 10 月 10 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主持中共中央全面工作。这个时期，是争取进入东北的最关键时刻，任何决策上的迟疑和行动上的片刻迟缓，都将铸成大错。刘少奇曾严峻地说过，这“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

在国共谈判进行中，蒋介石的军事行动频频而起，向八路军、新四军驻地和解放区中心地带接连发动进攻，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控制华北，继而进占东北，战火却遍及华南、华东和中原等地区。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排除在外，意在独占东北，不让中共染指。情况表明，中共中央于 1944 年夏秋制定的向南发展的战略，已不适应新形势，迫切需要改变。

9 月 14 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办事处暂设沈阳，对外不公开。在征得毛泽东等的同意后，9 月 19 日，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并根据会议决定，

为中共中央起草和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及其部署的指示。所谓“向北发展”，主要是赶在国民党军队前面，夺取先机，向东北全境发展，以全力争取整个东北到手。“向南防御”，就是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加强长江以北防线，坚决打击和集中歼灭来犯之敌，牵制和阻滞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的进军，并从邻近东北的地区急速抽调兵力向东北集结。“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布后，一切行动神速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电，在刘少奇的笔下接连发出，指挥了争取东北战略决策的全面迅速实施。

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双方代表签署“双十协定”。毛泽东返回延安后，由于疲劳过度，不久患病，从11月中旬到第二年2、3月间休养。刘少奇协助毛泽东，肩起重任，运筹帷幄，指挥各方，准备自卫战争。

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方针，但并没有带来真正和平。签字的墨迹未干，毛泽东刚返延安，蒋介石马上颁发“剿匪”密令，围绕其抢占平津、控制华北、进占东北的目标，先后动用100多万军队、50多万伪军，继续军事行动。

双十协定签订后，东北问题怎么办？这是需要立刻回答的。中共中央在10月12日向全党发出的《关于今后我党的任务与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东北问题谈判中未提出，按原计划进行。”为此，刘少奇夜以继日工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大量电文，许多经过毛泽东修改，向各地不断发出努力争取东北的指示和部署。

从9月底开始，蒋介石依靠美军在华北和山东抢占登陆港口，集结大量“精兵”，加紧向东北运送。山海关等地是华北

通往东北的必经要道，势在必争。当时，中共中央也曾力争独占东北的可能性，因而全力组织了山海关等地的战斗，采取扼守进出东北大门的打法。战斗于11月上旬打响。但因敌众我寡，部队长途跋涉，极其疲惫，立足未稳，械弹不足等恶劣条件，难于同国民党的全副美械装备和未受旅途劳顿的骄悍之军进行决战，人民军队先后撤出山海关、锦州等地。

山海关失守后，控制东北、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刘少奇为此给中共中央起草的和以他的名义发出的指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时对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部署所作出的重大转变。11月20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作撤出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大城市的工作布置；要求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基础，加强热河、冀东工作，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期打算。2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给重庆谈判代表团的电文中，把这一部署概括为八个大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2月下旬，他明确指示应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要求东北局总部移到海龙，部队绝大部分离开城市，以延吉、临江、通化为中心建立巩固根据地；希望东北局切实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督促全党在今冬明春发动起如像大革命时南方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那样广大而深刻的群众运动，与10余万主力部队、20万地方部队相结合，这就不独能在东北站住脚，而且能争取对国民党的优势。这些详尽而具体的指示，对统一和深化中共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武装的认识，完善和推进已定的战略决策，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后来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定停战协定，同时成立了国共及美方代表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

行部的协议。从当日起，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次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停战与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13日24时前要完成停战，先城市后乡村。但现在和平还不巩固，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平，这就需要发展民主，争取民主改革，民主愈发展和平愈巩固。斗争的总路线仍然是需要有团结有斗争，放手发动群众，有理有利有节。必须提高警惕，注意和平之下的危险性：第一是美国乘机插进来，第二可能对蒋介石等发生幻想，右倾情绪、贪污腐化倾向发展。会议最后通过重庆谈判协定，决定周恩来参加三人军事小组，叶剑英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停战协定是包括东北在内的。但是国民党迟迟不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作出承认，也没有放弃武力解决东北的方针，并到处制造与中共的摩擦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主张，我在东北所占地区，不能轻易退让，以逼国民党谈判东北问题作为谈判条件。同时应即向国民党方面及全国人民提出解决东北问题，以表愿用和平方式解决、避免东北内战的诚意。力求在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的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

但刘少奇在听取谈判汇报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统称政协决议）后，对形势的看法有一定变化。他在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和向延安部分干部作时局问题报告中指出，政协决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对人民是有利的，民主运动即可能逐步开展，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事实证明，政协决议对蒋介石毫无约束力，刘少奇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

2月上旬，国民党公然破坏停战，下达进攻北宁路两侧中共军队的命令。接着，国民党依靠美国第七舰队，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接运其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等五个军到秦皇岛登陆，转赴东北，使他们在东北的军队猛增到二三十万人。3月上旬起，苏军按照协议从他们驻扎的东北城市和铁路线开始撤军，国民党军随着进驻沈阳等地并扩张控制地区，准备向解放区分路进攻。

面对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于3月中旬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重新敲响了可能出现“内战局面”的警钟。他还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文中，向中共谈判代表团指示，在反对国民党想采用迂回办法首先推倒宪草原则，使国大改组政府纲领、整军决议等成为具文的斗争中，要坚决、强硬而不要怕破裂。在东北问题上也一样，要求停战，并用协商办法解决国共两军驻地及其他一切问题，如其不愿停战，并利用来发动全国内战，亦不应惧怕。

东北的形势日益严重。3月27日，周恩来同张治中和马歇儿的代表吉伦紧急磋商，促使签订东北停战协议，决定立即组成执行小组前往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冲突。但是，蒋介石根本不管这一套，3月31日即破坏了东北停战，国民党军大举向营口、海城、鞍山、本溪、四平等地进犯。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议，说“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面对蒋介石的顽固立场，刘少奇在4月里接连为中央拟电，指示东北我军坚决进行四平保卫战；指示我谈判东北

停战的小组人员在谈判中要坚持无条件停战及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运兵，不要急于求妥协；指示冀热辽军区在东北大战正激烈进行之际配合作战，截断山海关以东北宁路，阻止国民党军运入关，箝制热河方面国民党军不得东调；指示东北局和我军在长春以南再打一二个大胜仗，迅速发动与组织哈尔滨、长春两侧一二百里以内群众，并彻底破坏沈阳、长春间铁路，以建立全国最大的北满战略根据地；指示中共谈判代表团向马歇尔正式提出，为停止东北内战，并使东北内战不致牵动全国内战的重新爆发，要求遵守杜鲁门总统声明所说美国对中国的帮助不影响中国的内争过程，遵守三国外长会议停止中国内战的决定，美国海军及空军立即停止帮助国民党运兵及运军火到东北；还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就国民党方面对我中原第五师6万余人所作出的围歼部署，向美蒋双方正式提出警告，如其发生，则不能不认为全国性的内战再次由国民党方面重新发动。等等。

这期间，为了有效地对付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全面战争，并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刘少奇还主持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起草工作，把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中共中央于5月4日决定向党内发布这个指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五四指示”。

从延安到西柏坡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自恃有了充分准备，狂妄宣称可以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全国内战。但是蒋介石很快受到教训，

国民党军在头三个月中即被歼灭了 25 个旅。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再歼灭它 25 个旅，人民解放军即可达到夺取战略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

11月上旬，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通过时局声明和保卫延安命令，决定保卫延安由彭德怀与中共西北中央局联络，立即在党政军民中公开动员。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保卫陕甘宁边区与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上，刘少奇发表讲话，要求按战争的需要改变全党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严格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坚持艰苦奋斗。接着，他为中共中央拟电，指示各地严重注意财政经济问题，精密计算，正确领导，动员全党全军全体人员克服各种困难，以供应战争的浩大消耗，又保持人民生活水准，以避免因为财政经济的困难和混乱，直接妨害与瓦解我们的战争机构，破坏我们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而使战争归于失败；指示各地必须切实在已被敌占及可能被敌占地区的各级干部和各种组织中，进行坚持游击战争的思想动员与组织准备，提倡英勇奋斗、艰苦工作的牺牲精神，反对退却逃跑、畏难怕死的卑怯心理，提高组织纪律与行动纪律。

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谈判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余人由南京飞返延安，留董必武在南京主持办事处工作。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会议，确定要在半年到一年内停止蒋介石的进攻，开始反攻，在三到五年里打过长江。他们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应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发展国民党区域的游击战争。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贯彻以上精神，作出有关决议。

1947年2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

潮》。根据这一指示，刘少奇在延安的各种会议上进行报告和动员。他在对调来保卫延安的部队的讲话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已消灭国民党 57 个旅，蒋介石一共才 218 个旅，再打一年半，蒋介石就会倒。形势正处在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要求他们作好准备，配合全国性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个旅一个旅地歼灭和最后搞垮进犯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的部队。他在向即将由延安出发到外面去工作的干部作形势报告时，强调全党都要出去工作，现在已不是保存力量的时候，要把过去保存的力量统统拿出来，去打倒蒋介石。他在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赴边区各地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员作动员报告时说，解决土地问题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需要，实际做的就是打倒蒋介石的工作。要求他们执行中央决定，迅速、放手解决边区土地问题。他指出，在照顾地主生活、不损害中农利益、不过火打击富农、满足雇佃贫农要求的几个基本原则下，土地问题解决得越彻底越好。

2 月底，国共谈判完全破裂。3 月 13 日，蒋介石调集 34 个旅 23 万人，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3 月 19 日前，中共中央分批主动撤离延安。3 月下旬，中央领导同志在清涧县枣林沟会合后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旋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4 月下旬抵达河北省阜平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随即转至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工委就设在这里。

根据 1947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给朱德和刘少奇的信，可以了解到，“中央委托的工作”在半年内主要是三件事：将晋察

冀军事问题解决好；将全国土地会议开好；将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①。

在去晋察冀途中，刘少奇即十分注意了解如何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情况，对晋绥、晋察冀边区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指导。4月下旬，他在中共晋绥中央分局六地委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解决土地问题要依靠一个一定的组织机构，组织工作团，依靠贫农小组和农会，走基本的群众路线，放手发扬民主。一切权力归农会，是一个时期的必要过渡。他又把沿途调查了解的情况，写信给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认为晋绥地区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但群众运动非常零碎，不系统，因此土地改革是不彻底的。没有一个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刘少奇在这封信中所指出的问题，是一切解放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有代表性的问题，因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毛泽东曾把此信批转各地。5月初，刘少奇在薄一波送给他的一份关于晋冀鲁豫土改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必须迅速纠正党的领导机关在最近土改运动中的右倾错误，应根据90%以上的群众意见处理地主问题，照顾中小地主及干部家属地主、抗日地主必须群众自愿，对多占斗争果实及有其他不好行为的干部可让群众批评、揭发及至撤换他们的现任职务，应让农民大会暂时统治一切，通过他们来改造政府和党的组织与领导机构。他在与朱德联名写给中共冀东区委员会的指示电中指出，以前主张留给地主多于中农一倍、两倍土地的意见是不妥的，中央曾要冀东区对地主采取拉的政策亦过早。这些意见明显表明，关于彻底解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页。

决土地的问题，刘少奇已经不止于对下面的检查，而且已对中央过去规定的某些政策作出反省。这就为全国土地会议的举行作了重要准备。

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西柏坡开幕。9月13日，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它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这就不仅肯定了“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对此，刘少奇在作会议的结论中强调，现在党与群众的思想准备已成熟，形势已成熟，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不迟也不早。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对于如何实行土地法大纲，如何进行整党，以及土地改革的发动、步骤、方法和口号等等问题，刘少奇继续给予精心指导，向各地提出许多具体的意见、要求和措施，一刻也没有掉以轻心。正是在他和他主持的中共中央工委的坚定有力的促进下，解放区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彻底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和从1.5亿解放区人民中获得战胜蒋介石的伟力为目的，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地深入发展起来，取得历史性巨大成功。

对于晋察冀的工作，刘少奇一到阜平，就在4月底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上开门见山提出要求：晋察冀解放区要在一切为着前方军事胜利的方针下，用一切力量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以此为中心结合各种工作，把它搞好，使党更巩固；根据地更巩固；还一定要切实节省人力物力的消耗，减轻负担，爱惜民力，保护民力，去掉没有群众观点的单纯财政观点。在这

里，刘少奇很明确地把晋察冀前方的军事问题放在了前提条件上。

为了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好，朱德和刘少奇在5月底向中共中央建议，任杨得志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这时，刘少奇因过度辛劳，胃病严重发作，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就在他准备休养前，抱病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晋察冀野战军的情况，指出野战军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带着联合作战形式，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尚未建立。为使首先组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建议在青沧战役后允许休整一个月，责成杨得志、罗瑞卿在朱德、聂荣臻帮助下完成一切必要改组。

7月初，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刘少奇、聂荣臻，并要求将电文即转杨、罗，就打通华北与东北的军事部署作出指示，命令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在雨季来临之前即移至高阳、雄县以东休息，争取在7月20日或7月25日以前在永定河北（平津间）进行一个战役，完成后再回至石门以东休整一个月，于9月进行石门战役，然后移至平绥、平汉两路之间对该两路之敌作战，计时约在10月半以后，准备以三四个月时间将其充分削弱，明春与东北部队配合夺取整个平绥段。朱德、刘少奇、聂荣臻等相机坚决地执行了军委的这一指示。7月11日，朱德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曾对刘少奇作如下评价：“此间军事工作，经少奇同志两月指导，方向是拨正了”。

方向问题解决了，然而“督促进行尚非易事”。以后，朱德和刘少奇更加紧了对晋察冀野战军的督促，指示他们“应寻求运动中消灭敌人”，部队在运动中要坚决采取和长期灵活运用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办法大量消灭敌人，为此要巧于机动处

置，行军宿营都要紧缩、灵敏，并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和地形熟悉条件；攻击坚固地堡，一定要待技术训练与材料准备妥当后进行。在朱德、刘少奇这样具体的督促之下，晋察冀野战军更自觉地运用起大踏步进退、在运动中捕捉战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原则，士气大为高涨，每战必胜，屡打不疲。10月11日至22日，晋察冀野战军又出色地完成了清风店战役，全歼了蒋介石的嫡系第三军主力，俘虏了军长罗历戎。

清风店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经中央军委和朱德、刘少奇同意，于11月6日至12日解放了国民党的华北军事重镇石家庄，全歼守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阵地攻坚战和夺取大城市创造了第一个范例，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12月中旬，刘少奇以中央工委名义去电中共中央，十分高兴地汇报这里的情况，说：晋察冀中央局的威信已大增；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一切无原则纠纷都停止了；党内空前团结，干部信心大大提高，群众已开始活跃；只要以后不发生错误，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晋察冀的工作可以走上正轨并加以巩固。

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还讨论了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和纠正的办法，认为土地会议批评了右倾错误，使农村反封建斗争彻底开展起来，主流是好的，但在主流东去时也卷起了三个浪花，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一些地方还发生了打人、杀人现象。

根据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从1948年伊始，刘少奇的主

要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纠正土改中的各种“左”的错误倾向。他抓宣传教育，慎重地提出一些宣传口号，纠正一些流行的错误口号；在各种会议上讲具体的正面政策和各种系统的区别对待的方针；对各区主要领导人随时进行批评指导，积极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各种“左”倾错误现象并提出纠正意见。

这期间，刘少奇及时地指出了在土改运动中，一些地方有“左”倾过分的情况，如没有必要和没有分别地打击和逮捕地主富农；想要人家东西而随意提高阶级成分，致使侵犯相当数量中农利益；贫农团和新农会中存在严重关门主义，对旧党员、旧干部采取一律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把干部当家与群众当家相对立；在领导方式上主要表现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尾巴主义。

刘少奇认为东北在土地斗争中打击面过宽，地主富农的比例占农村人口25%实在太太大。他批评华中一般清算没收地主富农工商业的政策是错误的，指明对地主富农经营工商业仍应采取鼓励办法，只应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即使对没收者亦应维持经营而不应分散或停闭。为了真正保护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他针对不少地方为挖底财和浮财乱打所谓化形地主的问题，还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建议，应把化形地主分为两类，对真正转化以工商业收入为全部或一部生活资料者应鼓励与保护，对以隐蔽目标、保护封建财产而实际并不经营工商业的，才必须加以反对和没收。他还建议，为了缩小打击面，除应区别地主的大中小及富农的恶霸非恶霸外，还必须区别新旧富农，区别新富农中由劳动及善于经营致富的和由贪污霸占、侵吞果实、逃避勤务等方法致富的，区别富农的大中小。他还指出，将农村中组织贫农团斗争地主

的一套搬到机关、学校中去是错误的，并认为在整党中提贫雇农路线很不妥当，应一般地来提无产阶级的思想与路线。他又说，在平分土地中要反对干部及农民中的一种机械的绝对平均主义，为平分而平分，不是为了消灭封建与发展生产而平分。

对于全国土地会议后在各地所发生的“左”倾错误，刘少奇也毫不含糊地承担了责任。他曾在中共中央工委会议上明确总结说，这一时期“左”的错误的产生，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主要是领导上缺乏对政策的正面规定和系统说明。后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于这一段受中共中央委托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的工作，又郑重作了检讨。他深沉地说：

“有一个经验，就是要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这方面也要防止那一方面，这就是两面都要分析。这是在以后工作方法上要学习的，土地会议的缺点错误我要负责的。”^①

关于在华北建立财经办事处的问题，原是在1947年3月至5月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根据华北各解放区代表的要求决定下来的，董必武被任命为主任，因此这项工作主要由董必武来抓。但刘少奇也没有放松过对解决各解放区财政供给问题的思考和领导。在全国土地会议和晋察冀的军事问题基本解决后，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到了财经工作上。他认为，为有利于统一财政、货币等经济工作，也为有利于抽出大批干部南调，从而有利于支援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应该先从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着手。他觉得，这两个区的划分，因受国民党军的分割，在过去是对的，现在已经打通，还这样划分就极不合理，变成完全是自己人为的分割了。因而，1948

^①刘少奇在1948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年2月中旬，他在中央工委召开的财经座谈会上提出了这个想法，并向两个中央局的领导人和中共中央正式建议说，这两大解放区完全合并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几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是不可限量的，因而也就可以逐渐和缓与减弱对这些区域交界线的对抗，3月间将要召开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也就可能获得重要结果。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赞成。刘少奇在3月初即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等开会商讨，一致同意将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刘少奇指出：两区的合并和一切统一，一直统一到村，将为中央的全部统一打下基础。成立中共华北中央局的意见上报后，中共中央回示即以中央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个中央局为华北局，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待党务及财政在统一后有了头绪，和待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华北人民民主政府之后再合并，但现在即须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中央工委对中共中央意见再次讨论后，刘少奇为中央工委起草回电，认为合并两区党务、财经机构而不合并两区军政机构“势不可能”，建议两个司令部、政治部亦一道合并，暂由朱德主持，两区政府亦合并办公，但仍各保持独立领导，指定党团负责人，由董必武主持。关于华北金融贸易问题，第一步，拟以冀南银行为基础，合并晋察冀银行，成立华北银行，发行华北银行新钞，统一两区货币；第二步即以华北银行新钞，统一西北货币，规定华北银行新钞与农民银行货币固定比值；第三步即以华北银行统一渤海与山东的货币，以使天津、胶东、渤海等海口与华北、西北内地联系，统一组织对外贸易，货畅其流，否则无法与国民党作

经济斗争，而自己内部的经济斗争则无穷无尽。中央工委这一党、政、军、财一律统一的方针，也立即被中共中央所批准。这些都是在3月上旬中迅速定下来的事。这样一来，已经不完全是如何抓好华北财经办事处和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问题了，相反随着两区的合并，华北财经办事处将完成使命，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形式已不再适应。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1948年3月间，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驻到局面已经大定的华北，前往西柏坡与中工委会合。4月下旬，周恩来、任弼时等首先率领中共机关到达西柏坡村安扎。5月初，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齐集，并有中原、晋冀鲁豫、晋察冀三大战略区负责人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参加，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如何在已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发出通知，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8月改为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董必武任行政委员会主席，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

5月26日，毛泽东也来到了西柏坡。西柏坡便成为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建国前夕的筹划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驻下后，刘少奇一方面尽力协助毛泽东

进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一方面积极准备迎接全国胜利的各种必要建设。他在1948年5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过去的情况是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是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中央的工作主要是华北局工作，华北工作带全国性意义，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建设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效法。他要求大家要有全国眼光，要实干，务须团结一致，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无政府状态。他开始着眼逐步建立正规法治，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财产，使人民乐于建设。他主张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即发给土地证，全力进行生产；在一切基本地区，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订土地税则，稳定发展生产所必须的各种秩序。他具体地指导了华北临时代表大会的召开；指导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土地农业税暂行税则、华北人民政府施政纲领、县村市政权组织条例和选举条例的制订。

1948年8月中旬，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结婚。

为加速夺取全国胜利，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的主席由刘少奇担任，毛泽东提出了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歼敌正规军500个旅，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任务。围绕这一主题，刘少奇在13日的发言中指出，根据过去两年经验，估计再用三年达到歼敌500个旅，打倒国民党，这是最稳健的估计。他说，也要估计到最好的可能，国民党还要早垮。这两三年内可能有突然事变，如同西安事变之类，这就是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起义，因而加速其灭亡。计划不订在这个基础上，但可以力争。他还指出，我们的部队要准备打大会战，即一次消灭其两三个兵团，这个问

题还没有过关，要过关。

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如果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会像安泰一样被扼死，那种认为老百姓算什么，有点官僚主义算什么的思想，比100万美国军队更可怕。我们的报纸和新闻工作更要负起桥梁作用，促进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关于妇女工作，刘少奇在10月5日召开的妇女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要把它放到更重要的地位，更高的阶段，更广大的范围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如果不动员和组织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参加斗争，就不能成功。7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的通知，刘少奇任马列学院院长。12月中旬，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讲话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定，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中国共产党有300万党员，面临更复杂艰难的情况，没有高深理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开办马列学院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方法之一，将来还要以马列学院为中心，在全党学习中起指导作用，使全党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关于进城以后的干部住房问题，刘少奇要求成立公共房产管理委员会，接收一切公共房产为国家财产，一切机关都实行集体办公，工作人员都住集体宿舍，任何负责的党员都不得在公房中设立私人公馆。以防止对城市公房的占领、争夺、毁坏和引起一些干部生活腐化。

如何解决城市干部少、接收任务重的问题，刘少奇提出可放手从城市的职员、工人中，特别是产业工人中，抽调大批比较进步的人员，进行短期政治训练，以解决这一严重任务。12月21日，他专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大量提拔城市干部的指示，指出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业、大运输业、大商业和银

行、对外贸易等部门，均已或将要归人民政府所掌握，根据沈阳、郑州等城市工作经验，新提拔的产业工人、职员干部，懂得工商业技术的干部，对接管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而农村工作干部对此就有很多困难。为此必须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立即训练培养和提拔大批干部，以便能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去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及大的工商业，并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

刘少奇研究和考虑了现在及将来在全国胜利后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他在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个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将包含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等多种形式。12月下旬，他先后在军工会议和华北财经委员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在革命和打仗方面是老资格，但是管理大工厂、大企业等，人家是老资格。我们要做学生，要学习。不怕不懂经济工作，可怕的是不懂得自己不懂经济工作。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阶段中，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好采取不流血的、逐渐削弱它的手段。他认为，按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包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可能的。应允许他们在一定程度内赚一些钱，这就是无产阶级拿出一部分胜利品来购买资产阶级。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但过早地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要犯“左”倾错误。刘少奇特别提醒说，由农业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这叫做自杀政策。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可以采用的。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制度。商业上，以至对

外国人在中国开的矿山、银行、工厂，都可考虑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通过颁布法律使之接受监督。刘少奇还提出了合作社问题，指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他说，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合作社有三大历史作用，是消灭投机商业、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前进的最重要的工具，是经济上进行和平竞争、证明新民主主义制度优于旧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工具，是组织小生产以提高生产力、将来改造小生产成为大生产的最重要工具。

1949年1月，天津和北平相继获得解放。刘少奇对平津的工作进行了更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分别给两市的指示中，综合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些要求：对旧有各种税收，原则上暂时一律征收，以保证市政府经费，安定人心和恢复秩序；除少数苛捐杂税急需停止或改革外，一般须待调查研究清楚后再实行改革；不要提出或暗示分配房屋或减低房租的口号，相反应表示房客要照旧交纳房租；为了救济失业工人及贫民，可经过商会或在某税收内附加征收救济捐；也不要匆忙改革学校制度，所有各大、中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均须从平津各校原有人员中选择调整，由适当机关加以任命；限制私立中学学费及由政府接办私立学校的意见是错误的，对私立中学除要求它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取消一些该取消的课程外，不要干涉；对外商银行，可通知他们在人民政府法律范围内继续营业，并令向政府报告他们的资产及经营业务、帐目与国籍等，以凭核办，目前不要表示任何不成熟意见；华北人民政府应立即在天津设立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一切对外贸易事宜；国家尚不能经营的某些贸易，应在国家管制下允

许私人经营；为了进行对外贸易，应允许愿意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外商机关派遣代表或指定代理人来接洽；在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局可向外国派遣商务代表和设立商务机关。所有这些，都是很实事求是的、稳定社会秩序所必要的暂时措施。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会议讨论了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规定了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12日，刘少奇发言，围绕城市工作提请注意三点：1. 要有城乡一体观点，改变乡村工作原来“单打一”的做法；2. 在城市的接管中要解决好私人企业的复工问题和接管企业的迅速安排正常生产的问题；3. 要依靠工人发展生产，要依靠工人就要做工作，主要办法应尽可能保障工人生活水平，通过办训练班、上大课、夜校等对工人做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通过工会、工人代表会等组织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会议期间，他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北平市委的关于如何处理机关旧职人员的指示。指出，必须首先区别国民党的企业机关与政治机关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办法。对于国民党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的旧职员，除少数市政公用机关、卫生机关等等外，一般地不依靠他们来进行工作，更不依靠他们原来机构，而要加以打乱。除少数必须留用者外，原则上应一般集中训练、重新分配，对反动分子、劣迹昭著者及其他无能不可用的人员则开除之。对旧职员原则上只能和所有工作人员同等对待，实行供给制，不能原职原薪。

3月下旬，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后，刘少奇即对中

共北平市委的工作作面示，强调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北平，肃清封建残余，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说，只要生产有了进步，各方面就都会进步。北平的文化建设事业也应有发展生产的观点，要能够在五年十年之后为提高生产而服务。为了生产，就要组织工人农民，必须把大部力量放在组织工会、组织农民工作上去，这就是全体人员的中心工作。机关生产也应立即进行。他在北平市党员干部会上号召，为进一步安定和建立秩序，要继续做好以下几件事：使老师和学生感到不安的学校存废问题要赶快解决；应想法使资本家进一步安心生产，宣布几条肯定政策，保障资本家合法利润；对私人房产权要明确宣布政府是保障的；对最易使人不安的物价问题，要尽最大努力使它对大家有利，搞好商业渠道，掌握物价规律，减少物价波动，不妨碍生产。

随着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相继解放，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些人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向海外逃跑，许多工厂陷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工人大量失业。许多干部怕涉嫌立场不稳，不敢同资本家打交道，少数干部甚至用类似在乡村中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有些工厂的工人提出一些过高要求，资本家出于无奈，只好准备关厂。在这种情况下，4月中旬至5月上旬，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去天津指导工作，召开各种座谈会、报告会，阐述中共对城市管理的基本政策，解除民族资本家的各种顾虑，鼓励他们大胆开办工厂，积极从事经济建设。他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强调指出，同资产阶级有斗争，但重点在团结，如当作斗争对象就犯了路线错误。必须确切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这是战略任务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问题放在历史条件下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国外矛盾即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现在还是主要的，应引导人民注意国外矛盾，不要太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太强调了，帝国主义就会插进来，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的后备军。除开国外矛盾，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确是基本的矛盾，但现在尚不能互相脱离，可以拖十来年，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搞社会主义了。

刘少奇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大会上向工人讲话指出，共产党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只依靠自己，不找朋友，不找同盟军，就不能战胜敌人，使革命胜利。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一起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应是这个广大的革命队伍的指挥官。为实现领导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懂得这些道理。他强调指出，新中国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必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才能避免剥削。在目前情况下，被剥削比失业好。工人应该同资本家合作。

从天津视察回到北平，刘少奇以他的调查研究，确确实实地感觉到党内实际上存在着“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他明白这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倾向。5月19日，他在对北平干部的讲话中，以天津的考察讲了城市的管理问题、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问题等。但是讲得最有分量的地方恐怕是他对“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的批评。他说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

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私人资本主义现在不只是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扩大。5月31日，刘少奇还因此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电。电文举出他在天津考察所发现的这方面的“左”倾情况后说，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要求东北局立即对“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加以检讨并纠正。同日，中共中央又把这一指示批转各地，要求“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这一批转电文为毛泽东所起草，说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是共同的。

6月间，刘少奇写下了一份党内的报告提纲——《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他在这份提纲中进一步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由这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部，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他认为，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的一个时期内，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一般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7、8月间，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访苏

期间，刘少奇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了解了苏联的国家机构、苏联的经济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和教育、苏联的党组织及群众团体等情况，参观了工厂、学校等，全面地调查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状况，疏通了中苏之间的许多关系，获得很大成功。8月下旬，刘少奇偕同来华的苏联专家一行，先抵沈阳，再回北平。他相继在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上和北平高干会上作中苏关系的报告。在分析国际形势时，他提出世界两大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说法，实际上是对毛泽东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关于“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和我们“必须一边倒”观点的引伸。在谈到国内建设时，他说，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全党现在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搞经济建设，需要苏联的帮助，请他们派专家来。中国同志要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等当选副主席。21日，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作《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讲话。他指出，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

具体方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就是表示这种新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及其在组织上的最后形成。他表示，中国共产党要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当刘少奇在讲话结束前高呼“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中南海怀仁堂会场上，山鸣谷应，掌声雷动。

为了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

1949年10月1日，几十万军民欢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刘少奇作为新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出席了隆重的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这时，刘少奇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10月19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刘少奇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建国伊始，百乱待治，百废俱兴。担任着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刘少奇，工作十分繁忙。在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国家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留下了他参与制订的记录。

新中国诞生之初，在国际上立足未稳。因此，迫切需要继

续取得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社会主义邻国苏联的支持。开国后仅五天，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由刘少奇出任总会会长，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组建了全国性的机构，开展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为建立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于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去莫斯科，同苏联政府会谈。刘少奇在国内主持全面工作。其间，他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进行多次讨论，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的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

1949年11月至12月，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先后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性会议。刘少奇具体指导了这两个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并且向亚、澳工会代表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开始由武装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提高干部的文化、理论水平和培养大批管理、技术人才成为迫切问题。刘少奇对这一工作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就着手主持创办一所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向都不同于旧学校的新型大学，即中国人民大学，几次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报告筹建情况。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在解决了设置、人员、招生等一系列问题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在1950年10月3日开学。刘少奇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

由刘少奇兼任院长的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也坚持按期招生，培训干部。1950年9月10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开学典礼上说：“现在，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这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不可能一下做好，大约

要化十年的功夫才能前进一步。”1950年5月16日，他在全军参谋会议上讲话，号召军队的干部战士下决心抽出时间学习，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将来参加管理国家的各方面工作。

正当人民大众欢庆解放、建设国家的时候，敌视新中国的反革命分子却不甘心它们的失败。当时，大陆上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势力还相当大。这些反革命分子继续与人民为敌，从事各种破坏和捣乱，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1950年3月18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安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徒，必须给予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地的反革命分子以为形势对他们有利，更加猖狂地向人民进攻，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无法顺利进行。7月和10月，政务院和中共中央分别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初，刘少奇主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草案作了多次讨论修改。2月20日，这个条例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通过，并于次日公布。条例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5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这次会议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刘少奇到会讲话，总结了运动开始以来的成绩，同时针对一些地区发生的工作草率和“左”的倾向，提出镇反工作现在要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精力处理

积案。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2年底基本结束。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中南、西南之后，大陆战事基本结束。恢复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当时，全国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有3亿多人口，其中农业人口2亿多。这是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最大任务。1950年初，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确定了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步骤和政策。6月上旬，召开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刘少奇向全会报告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关于富农土地、债务、人民法庭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全会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6月中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①刘少奇还就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的起草修改情况向全会作了说明。会议讨论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和《土地改革法》（草案）。7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制订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2页。

的决定》，8月经政务院通过后颁布施行。这个文件为土地改革中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从1950年冬天起，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陆续进行。到1952年冬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工作在全国基本完成。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和任务的这种根本性变化，给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课题。1951年3月至4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3月28日，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指出党的队伍中存在着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现象，要求进行普遍整顿，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并根据党章和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著名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在会议闭幕的那天，刘少奇又作了题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论述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许多根本问题。这两个文件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文献。

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整党工作在全国逐步展开，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

1951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报告，论述了党的宣传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的任务。这次会议开拓了全党宣传工作的新局面。根据会议的精神，各级党组织健全了宣传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宣传工作，使党对人民群众的理论教育、文化教育等宣传工作逐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曾多次指出，全党要努力钻研经济工作。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①对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刘少奇带头身体力行。

刘少奇首先开始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步骤。继1949年6月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后，约半年时间，他又写了《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提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步骤应该是：先使遭到破坏的经济恢复，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再次发展重工业，然后用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加强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械化。

这以后，刘少奇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于1951年7月写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一文，进一步阐发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骤、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应该采取的方针，指出“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时间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文中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述了他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步骤的设想：“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然后依靠已经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刘少奇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有其独到的思路。1950年1月23日，他在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谈话时提出，应该鼓励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允许农民包括党

^①《毛泽东选集》第1418页。

员农民单干、雇工，允许剥削，要防止在过渡问题上犯急性病。1951年7月3日，他读到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后，对报告中流露出来的急于过渡的倾向再次作了尖锐批评。他批示道：“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主张在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大力发展供销合作社，使农民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相结合，同时广泛组织劳动互助组，把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要使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走向集体化，靠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必须找到一种能为广大农民接受的形式。刘少奇认为发展合作社经济，特别是在农村大力组织供销合作社，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他从1948年指导解放区合作社时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又作了深入研究。他曾经说：列宁给我们留下了《论合作制》，我国合作社的经验已经不少了，应当加以总结，指导工作。1950年7月，在刘少奇指导下，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草案），选举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理事会、监事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总结了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办合作社的经验，提出当前主要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城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合作社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经营方针、管理制度。他强调说：合作化问题对于今后农民的趋向和我们国家的前途是一个具有

决定意义的问题。会后，他亲自为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调配干部，过问机构组建工作，并且经常听取汇报，批改这方面的文件。经他阅处和起草的有关合作社的文件、材料前后达300余件。1951年夏秋间，刘少奇为推动合作社运动能有更加迅速的、正确的和巩固的发展，对合作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指导工作，写下了《论合作社问题》、《为组织广大的合作社经济而斗争》等多篇论文手稿。这些论文论述了合作社制度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以便通过商品流通环节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的思想。这些文章是研究中国合作社发展史的重要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工人问题变得突出了。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国营工厂中和工人中还有没有矛盾？是什么性质？应该怎样对待这种矛盾？这些问题在当时是新问题，中共党内的看法也很不一致。这种情况引起了刘少奇从理论上进行思考。1951年年中，刘少奇集中研究工厂管理、工会工作问题。他把反映党内不同意见的文章找来，并专门从东北等地调来一批文件资料，详加研读。随后，他写了《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的笔记》，论述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文中首次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理论概念，主张必须分清敌对的和非敌对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工人阶级内部、人民内部的矛盾。文章还指出：“工会工作必须从普通工人的要求出发，力求实现他们一切合理的能够实现的要求，然后逐步地提高工人人们的觉悟，来实现我们党的要求和目的。”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刘少奇十分重视工人的切身利益。1951年7月上旬，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批转了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关于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他在批示中指出：“工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犹如土地问题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如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而如果不正确地处理工资问题，我们就不能建立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就不能取得工人阶级对于我们党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在刘少奇指导下进行的对全国职工工资的调整，为新中国的工资体系确定了基本框架。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到1952年底，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长60%至120%，工人生活得到了初步的保障和改善。

1951年11月底，刘少奇经中央安排去南方视察和休养。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他走了八九个省市，亲身感受了全国解放后人民群众的情绪和生产恢复情况。每到一地，他都同当地的负责同志谈话，了解各方面情况，参观有代表性的工厂、军事单位等。在上海、南京等地，他专程看望了在那里居住和休息的宋庆龄、刘伯承、陈毅、张云逸、李达等老同志。这次外出停留时间最长的是在杭州。刘少奇在那里把事先从北京带来的一套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

在刘少奇外出期间，中共中央于1952年初决定在全国展开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刘少奇于1月下旬回到北京后，即开始参与对“三反”、“五反”运动的领导工作。3月15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说：“你批发的上海市委综合报告，已阅，很好。嗣后，关于三反五反各地来报请你多看，需要批转各地参考的，请你负责批转。”此后，刘少奇先后代

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市、华北局等许多单位和地区的报告，指导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这个运动于本年10月底结束。

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推进，在过去战争条件下建立的领导机构变得不适应起来。1952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着手主持制订关于加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的实施方案。他先后找杨尚昆、安子文、高岗、邓子恢、习仲勋等座谈研究，并要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了解联共中央机构的组成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指导有关同志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提出了调整、增设中共中央办事机构的具体方案和人选，决定将外地各中央局书记和另外一些重要干部调到中央工作。8月4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呈报的报告批示：“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此后，根据这个方案调整和组建了中共中央各部门，规定了一些议事的章法，从而定下了建国后中央机构的基本格局。

9月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参加10月5日至14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了中共中央的祝词。

会后，刘少奇在苏联起草致斯大林的一封信，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以及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等问题。信中提出：“互助合作运动是今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我们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

内，在基本上实现农业经济集体化。”“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10月下旬，刘少奇两次率陈毅、饶漱石、王稼祥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会谈，就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和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的路线问题交换意见。之后又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并去苏联南部休养，于1953年1月上旬回国。

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中

经过建国后三年的艰苦努力，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全面完成，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斗争，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1952年底，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在全国逐渐掀起。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建设，也在成功地向前推进。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刘少奇在建国前夕就曾几次讲过对私营工商业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并提出要实行和平改造。1953年7

月，他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主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①9月，毛泽东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代表谈话之后，这项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

1955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进一步座谈了这个问题。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阐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到1956年1月，全国主要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紧接着进行了清产核资、定股定息、人事安排、企业改革和经济改组等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1953年起，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以逐步合作化的方式开展起来。刘少奇参与了运动的领导工作。

1953年12月，刘少奇听取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主任程子华的汇报，对即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开法作了指示，并就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实现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任务、组织形式、资金、发展计划等九个问题谈了意见。这次会议后，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社员增加到121万人，合作社组织发展到4.1万多个。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19页。

农业合作化运动总的说是成功的。这个运动的后期发展过快，以致出现了一些偏差和缺点，也使刘少奇原先的一些独到设想没有完全实现。1955年4月，刘少奇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前夕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今后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要适当收缩，从巩固中求发展。后来他的这些主张遭到了不公正的批评。

正当中国共产党把全部精力投入紧张的经济工作的时候，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夏秋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四处活动，挑拨离间，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并向党伸手要权。同年12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外出休息一个时期，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请刘少奇向全会作报告。2月6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强调高级干部应当以身作则，增强团结，向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为作斗争。

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以后，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决定成立中央选举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席。此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陆续展开，刘少奇具体领导了这项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选举产生了地方各级国家机构，同时选举产生了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226名。

在全民普选的同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等32人为委员。从1954年1月起，毛泽东在杭州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起草宪法草案，刘少奇则在北京主持对宪法草案的初稿进行讨论，提修改意见。从3月到6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了七次会议，讨论修改草案初稿，同时还组织社会各方面代表人物展开讨论。6月11日，刘少奇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全部条文作最后审查后通过了这个草案，并决定在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之后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在此期间，刘少奇还主持起草了准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报告回顾和总结了我国100多年来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并从我们国家的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说明了宪法的基本内容。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的制定和颁布，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为了制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高级干部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布置了八大的准备工作。刘少奇提出要全

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把八大的准备工作和各部门各地方的工作结合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的分工，刘少奇负责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为了在切实了解党和国家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向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路线，刘少奇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先后约请国务院30多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汇报和座谈，对中国的国情作了一次宏观的、全面的调查。这次工作座谈涉及轻重工业、交通运输、财政贸易、邮电、文教卫生、政法等部门，时间长达四个月。在这几个月中，刘少奇除了接见外宾和出席重要会议，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这项工作。汇报会经常从白天一直开到凌晨。在座谈中，他详细听取和询问了我国财政、基建、生产水平、技术设备、产品流通的现状，以及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情况，亲笔做了几万字的笔记。

在座谈中，刘少奇对各部门的工作方向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针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并且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发展中几种关系的问题。他讲到：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因为沿海地区现有企业投资少，能力大、见效快；应当利用中国手工业发达的特点发展中国的工业，把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结合起来；工业生产要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生产，商品供应也要根据消费者的需要供应；企业内部要高度重视经营管理，学习和尽量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要允许企业间地区间的竞争，造成“落后就不能生存”的气氛；企业中的工人不能全招正式工，要采用合同制。

刘少奇逐个召集国家各职能部门座谈的做法，毛泽东听说后很为赞赏，立即要有关同志也为他组织这样的汇报座谈。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用了40多天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4个

部门的汇报。刘少奇也多次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在这些座谈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事情并不一帆风顺。由于对经济建设缺乏经验和当时反右倾保守的影响，1956年上半年的经济工作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1956年6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在会上发表的意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经过刘少奇、周恩来修改审定，于6月20日发表。其中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有些事情做得过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这次会议和这篇社论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过热现象和急躁倾向敲了警钟，也为不久后召开的中共八大能正确地提出“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报告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讨论和批准了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阐述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政治生活、国际关系、党的领导等方面的基本经验和指导方针。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正式宣告：“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中共八大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就在中国人民认真贯彻中共八大的路线，掀起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热潮之时，1956年10月爆发了震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很重视这一事件。10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专程赴莫斯科，就波兰、匈牙利局势问题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回国后，他在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报告了访问苏联和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向全会介绍了波匈事件的经过，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从中获取的教训。刘少奇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他强调要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此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

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

波匈事件后，中国国内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暴露出来了。一部分工人失业，学生升学和就业不能完全解决，各部分人之间待遇不公，物价上涨，住房紧缺等等。一些地区发生工人、学生闹事。1956年冬至1957年春，全国参加罢工、罢课的工人和学生约有2万人。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分析了这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提出：我们在建设时期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应该很好地研究。刘少奇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非常重视。会议结束后，他立即约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单位的一些同志组成调查组，在他亲自带领下，到一些省市就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刘少奇的这次调查，从2月中旬开始，到4月中旬结束。在两个月时间中，他深入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工矿、农村、机关、学校，采取访问、开座谈会、实地考察等方式，认真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刘少奇在外地获悉后，随即在沿途各地的谈话中宣传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并且直接处理了许多带普遍性的人民内部矛盾。

针对当时矛盾比较尖锐和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刘少奇一方面利用各种场合反复向群众讲清道理，一方面要各地领导同志想方设法帮助群众解决问题。3月22日，刘少奇在长沙市召开中学生座谈会，耐心地向学生们谈了为什么现在国家还不

能使所有毕业生都升学、升不了学怎么办等等问题。后来，这次谈话被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于4月8日发表。根据刘少奇另外几次谈话整理成的《中国青年报》社论《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也于5月15日发表。这两篇社论在全国影响很大，对解决学生在升学、就业、学习经费等方面同社会的矛盾，起了很好的作用。

4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他对这次五省调查的总结。刘少奇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上，并且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刘少奇在讲话中还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改革设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既有计划性又有多多样性和灵活性，要利用自由市场，应该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力，要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

由于认真执行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年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但是，在这一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在9、10月间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从而不恰当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这一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周恩来等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成为以后“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和随后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先导。

曲折的“大跃进”时期

我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使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变得不谨慎起来。1958年1月在南宁、3月在成都召开的两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方针性错误。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

由于在反冒进问题上一再受到批评，刘少奇在成都会议上检查自己“所设想的与主席设想的是有距离”，“觉得快点慢点都可以，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问题。”同时，他也错误地提出，要注意纠正慢性病，慢性病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右倾的危险现在还是主要的。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阐述了毛泽东在这几年间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性意见。这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理论。会议不切实际地号召，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同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等高指标，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

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是，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这场运动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

北戴河会议后两个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许多混乱现象有所察觉，着手纠正这些错误。1958年11月初，刘少奇在浙江视察时同当地负责人谈话说：对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不要滥用，马克思、列宁说的共产主义指的是高标准；现在对许多地方报的产量都要打折扣，报纸登的也不符合实际；要反对说假话，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实一点。

从1958年冬开始，中共中央相继召开了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采取措施纠正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刘少奇参加了这几次会议，并且主持了其中的一些会议。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9月17日，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宣布对确已弃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释放。10月1日前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分主持了盛大的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

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后，中共中央继续致力于纠正“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1959年7月，为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初期的小组讨论会上，刘少奇发言说：1958年出了些乱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碰到钉子知道转弯是真正的聪明人；全党全民都

得了经验，也碰了钉子，全党全民变得更聪明了，这是了不起的收获。在另一次发言中又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什么叫做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趋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速度的大跃进。7月16日，刘少奇在他召集的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

“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讲够，缺点说透。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1956年陈云同志提出三个平衡（财政、物资、信贷），先市场、后基建，略有节余（多数年是这样），略有赤字（少数年是这样），这些都需要。”7月19日，他在小组讨论中提出了三个启发性的问题：一、目前党内思想状况的主要倾向是“左”还是右？二、有人说，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只是在三个月中出了些乱子，这三个月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三、现在把钢产量压缩到1300万吨，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他说：如果确有缺点错误，不加以检查，不纠正，不总结经验教训，下一次还要碰这样的钉子，这是危险的。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意见。19日、21日，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先后发言，赞同彭德怀的意见。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责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在以后几天中又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指责，从而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把庐山会议前期的反“左”变成反右。由于毛泽

东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以及种种原因，会议形成了一边倒的意见。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6日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17日，刘少奇也在会上作了关于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讲话，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庐山会议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

为研究解决经济建设中发生的问题，毛泽东曾于1958年11月9日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后来在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和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初，毛泽东又一再号召读书，并具体要求大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1959年秋天，刘少奇肩周炎复发，中央要他到海南岛休息治疗一段时间。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读一点书。11月初，他带上一套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了海南岛。为便于讨论研究，还从北京请了薛暮桥、王学文两位经济学家去伴同学习。参加读书的除薛暮桥、王学文、王光美外，还有广东省委的陶铸、林李明等同志。他们采取各人自读和集体座谈相结合的学习方法，一般是上午读书，下午逐章讨论。在一个月的读书生活中，前后共开了十几次讨论会。刘少奇结合马列著作，把苏联经验和中国经验加以比较，在讨论会上谈了许多重要意见。

当年12月和次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也分别在上海、广东等地组织类似的读书小组，阅读《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薛暮桥还将刘少奇在读书讨论中发表的意见归纳成18个问题,应邀向周恩来、李富春的读书小组作了传达。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起发生困难。到1960年,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极为紧张,一些地方出现非正常死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采取各种应急措施。

1960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集有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经济问题。刘少奇主持了这次座谈会。他在会上说:最近半年来发生的现象比较严重,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计划完成情况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中央的计划偏大,要求过急,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这些问题如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就会慢慢扩大,变成两个指头、三个指头。

紧接着,从7月上旬到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分析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会议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确定了一些具体措施。会议最后一天,刘少奇主持总结了与会同志的正确意见,强调要压缩基本建设,加强农业第一线。他说: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到第一,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有必要,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除开尖端以外,其他的工业尽量地要为农业服务。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把农业放在首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但是,由于中共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对形势的看法很不

一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并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12月，中共中央还发了一个保钢的紧急指示，强调把生产1860万吨钢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196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成为1958年以来最高的一年。

1960年11月5日，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祝典礼和在苏联参观访问。随后，又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刘少奇、邓小平等于12月9日回到北京。

国民经济调整的卓越领导者

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中国进入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由于经济困难首先突出反映在农业方面，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工作从农业开始。

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农村政策，讨论和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毛泽东提出要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刘少奇在会上尖锐地指出了农业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反复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他说：“有多少商品粮，搞多少工业和文教事业。……这个规律，我们最近才摸到。过去中央、各省在这方面都犯了

错误。”

为了认真了解农业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检查 1958 年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带头实行，在广州会议结束后，就立即带领调查组扎到了湖南农村。到湖南后，他对省委负责同志交待说：这次去乡下，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行，以普通劳动者身分出现。

刘少奇从 4 月 1 日到 5 月 15 日，先后去长沙县福临公社、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等地作了 44 天的调查，其中有 32 天住在乡下。他和他带领的调查组，就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房屋、山林、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农村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同基层干部和农民座谈讨论，并且亲临田间地头 and 农民家里察看，广泛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其间，他还专程去长沙，同当时在那里的毛泽东交流了情况和看法。5 月 11 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通报了调查情况和对一些问题的意见。

在这次调查中，刘少奇发现了农村存在的大量问题，进一步摸清了情况。对一些当地急待解决的问题，如解散公共食堂、退赔社员的房屋家具、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以维护社会秩序等，他当时就指示县委就地予以解决。对那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如对农村形势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等，他也在调查中形成了初步看法，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准备。例如关于经济困难的原因，他当时在社员座谈会上就开诚布公地说：“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

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做得不好。”“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①

为进一步研究经济调整，中共中央于1961年5、6月间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时，党内的思想仍然相当混乱，集中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一部分同志指导思想继续存在“左”的偏向，把困难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也有的因为受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影响，不敢讲真话。刘少奇根据他在调查中掌握的确实材料，一再指出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引用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深沉地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②

他还果敢地推倒了过去“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公式，说：“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关于克服困难的措施，刘少奇总结说：“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会议最后决定，当年就要下放1000万城镇人口，钢产量也要进一步压缩^③。

在这次会议方针的指引下，1961年的调整工作有所进展。钢、煤产量和基本建设都有较大压缩，关、停、并、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达2.5万个，回笼了几十亿元货币。由于下放了

①②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28、329、338、341页。

1000多万城镇人口，使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调整。

1961年，中共中央陆续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其中有些是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这些条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

7月中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赴东北，就森林资源情况和林业工作作专题考察。他曾经说：林区工作很重要，但是历来很少有中央领导同志去那里深入了解情况。原先他安排在1961年上半年去，后来因为广州会议和湖南调查，拖了下来。正好7月份在哈尔滨召开全国林业工作会议，黑龙江省的负责同志也一再希望刘少奇前去视察，所以他在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和处理完一些紧迫工作之后，匆匆赶到了东北。

在林区的20多天中，刘少奇先后到黑龙江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小兴安岭、张广才岭、大兴安岭，现场察看了许多林场、伐木工地和原始森林、人工林，多次和当地的干部、林业工人座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沿途发表了多次讲话，就保护森林资源和林业工作中的体制、价格、采伐与更新方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砍了多少树应该很快地栽起来，砍了栽上是我们的根本方针，而且栽起来的要比原有的多。我国森林资源很少，要使已有的资源充分利用，并且永远保持下去。”“总之，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

1961年总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步子不快。主要原因还是思想不统一。党内外对“大跃进”以来四

年工作的评价褒贬各异，甚至相互埋怨。相当一部分干部看不到调整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因而执行不得力。这种状况拖了贯彻八字方针的后腿。

针对这种情形，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以利于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会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参加的有中共中央、中央局和省、地、县、重要厂矿企业党委以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共八大以后的一次历史性重要会议。

“七千人大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刘少奇在主持起草这个长达5万多字的报告时就明确提出：报告的主旨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总结工作、分析形势、提出克服困难的方针政策，都要实事求是。他为起草这个报告倾注了很多心血，对工作人员写的草稿进行过多次修改。1月下旬，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

“七千人大会”开幕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面报告的第一稿发给大会全体同志讨论，提修改意见。与此同时，由刘少奇主持，组织了一个21人的起草委员会，按照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对书面报告进行修改。由于这个报告要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工作中经验教训、当前经济困

难的程度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评价和说明，要批评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倾向，要论述党的作风和党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而出席会议的7000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各自的经历和看法差异很大，这就使报告的起草、修改工作更加复杂，统一思想的难度相当大。在众说纷纭面前，刘少奇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鲜明而又雄辩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1月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修改出来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印发到会同志再讨论。1月27日，他向大会作讲话，对书面报告的要点和起草修改情况作了说明，同时对许多内容作了很重要的阐发和补充。他明确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个是成绩与错误“三七开”，另一个是困难原因“三七开”，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还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对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经过再次修改的书面报告和刘少奇1月27日的口头讲话，于2月26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对统一全党思想、推进调整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随着调整工作的全面铺开，一些潜在的经济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其中突出的是发现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将有几十亿元的赤字。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开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于是，2月21日至23日，由他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为开会的地点在中南海西楼，后来通常被称为西楼会议。

西楼会议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刘少奇在会上批评财贸办公室的报告没有揭露矛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求重写。他对陈云在会上所作的《目前财政

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表示完全赞成，并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由陈云去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国务院各部门的同志都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政策。

2月26日，陈云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同样内容的讲话。会后，刘少奇又提议用中共中央名义把陈云的讲话和会上其他同志的讲话批转全党，并对转发批语的写法作了具体指示，在签发时又作了多处重要修改。这个批语按照西楼会议精神，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通货膨胀和财政、市场、物价全面紧张的情况，提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西楼会议后，由于调整工作的深入进行，需要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来主持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议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并提议陈云任组长。当时，陈云因身体不好一再推让，刘少奇还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出来统管财政经济工作。

3月14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西楼会议以及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的另外一些决策。经毛泽东同意后，西楼会议精神和相应的措施，先后形成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党。

调整工作进展迅速。4月下旬，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7日至11日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这个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讲了话。5月11日，刘少奇作总

结讲话。他针对一部分同志只讲“大好形势”而对困难的严重性和调整的艰巨性估计不足的情况，又一次强调了经济形势的严峻，说：“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①他要求：“为了调整和改组我们的国民经济，政府和党的各工作部门，都必须紧张地工作。”^②

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5月26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党。

然而，这期间毛泽东的思路却有了变化。1962年8、9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刘少奇很担心强调阶级斗争会打乱当前的经济调整。8月2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讨论时说：阶级斗争“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9月16日，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提出：对会上讨论的党内斗争、国际反修等问题，“用少数人对付就够了，全党不要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们干扰，妨碍工作。”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4、447页。

就使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刘少奇毕生勤学好思，善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新见解，是党内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曾多次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的著作选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他再次提出此事。1960年冬，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专门作出了编辑刘少奇选集的决定，并成立了编辑小组。1961年，编辑小组几次将有关文稿报请刘少奇本人审定。他反复表示：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中于研究当前情况和解决当前问题，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这样，定稿和出版工作就延宕了下来。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批评了党的生活中的不正确作风，提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传统作风的任务。根据大会期间许多同志的要求，当年8月在报刊上重新发表了刘少奇再次作过修改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配合了“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贯彻。

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实践中，刘少奇对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建设规律作了进一步的思索。正如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的：“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基于这种出发点，他针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先后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改革设想。

刘少奇认为我国长期实行的由行政部门无偿调拨生产资料的做法，是落后的管理办法。他提出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管理生产资料的物资部门应该像商业部门那样，把生产资料当成商

品来经营。1960年他在河北省调查时，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后又指派身边工作人员到石家庄和无锡专门调查，他每个月听取一次汇报。从1962年到1965年，他先后对物资工作作了八次讲话，一再指出物资部门实际上就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门，物资工作就是经营生产资料的市场，并且就如何改进现行的生产资料管理办法提出了一系列意见。

试办托拉斯，是刘少奇为改革我国工业管理体制而提出的倡议。他在1960年的一次会议上说：按行业为主可以组织托拉斯、综合性公司或联合性企业，这是生产关系上的一种改革，这个问题解决好，就会促进技术革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后他又几次强调这件事。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国家经委于1964年组织办托拉斯，在全国试办了烟草、铝业、橡胶、长江航运等12个分别代表几种类型的专业公司，各地方也相继成立了一批公司和总厂。这一措施将原来用行政方式指挥企业的老办法，改而采用经济手段管理生产，实行以后的效益很好。1965年1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听取托拉斯试办工作的汇报时，又谈了许多重要意见。刘少奇强调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①，主张托拉斯要搞得活泼多样，要有利于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方便人民。60年代试办托拉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重要尝试和成功实践。

为了克服我国长期存在的教育制度同劳动制度相脱节的问题，刘少奇大力倡导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就是说，教育方面同时实行全日制的学校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73页。

劳动方面同时实行 8 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和 4 小时工作（即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这一设想的主要精神，就是要通过教育、劳动这两种制度的紧密结合来改革传统教育，从制度上改变教育只为升学服务的习惯做法，使各级各类学校担负起为社会各行业特别是工农业培养后备军的任务。刘少奇早在 1958 年就提出了这个设想，由于三年经济困难而中断。在 1964 年 5 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提出此事并得到会议的肯定。会后，刘少奇先后到河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视察，一路上大讲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并且在有关会议、会见外宾等场合多次倡导。他认为，半工半读这种新型的制度应该培养出一种新型的人才，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既能当干部、技术员，也能当普通工人、农民，能上能下。

1964 年 11 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1965 年 3 月和 10 月，在刘少奇指导下，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半工半读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由于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倡导，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 1964 年 5 月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 1965 年，农村耕读小学学生有 1300 多万，农业中学学生有 110 多万；城市办起了 4000 多所半工半读中等学校，学生 80 余万；全国半工半读的高等学校发展到 109 所，177 所全日制高等院校也开办了半工半读专业，在校学生达 4.4 万。这种制度的实行，为发展我国多种形式的国民教育，特别是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里普及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提出对传统的“铁饭碗”式的劳动用

工制度进行改革。他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多，而许多工业生产又是以劳务为主和季节性生产的特点，大力倡导多用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转换工，主张推行劳动合同制，使一部分农民实行亦工亦农。这样，既可以使城镇企业根据需要灵活地招收人员，也为农村多余劳动力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从长远来说，还可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当然，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有失误。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抓阶级斗争，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对修正主义，并且在会后把这种“左”的指导思想付诸实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也用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修防修斗争。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严重、尖锐，要求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0月至11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后十条》。《后十条》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

1964年5、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国内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全国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也认为，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会后，刘少奇先后到全国许多省市视察，宣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一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参加运动。在此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一

年来若干试点单位的经验，刘少奇主持修订了《后十条》，经毛泽东批改后提交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成为《后十条》的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政策，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并提出要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过去土地改革中的工作方法。这个文件执行的结果，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1964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观点，指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二十三条》虽对前一段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刘少奇在会上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不同看法，结果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到1966年春，全国约有1/3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所以使“左”的错误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64年底至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月3日，刘少奇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此前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分，于1963年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和朝鲜，于1966年春访问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发展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的抗争

1966年，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曲折的多事之年。

由于几年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错误渐趋严重，使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左”的一套日益泛滥。1965年11月，在毛泽东支持下，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并迅速演变成群众性的政治批判运动，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序幕。

混淆敌我、无限上纲的所谓批判，首先在文艺学术领域横行开来。为了限制一下当时批判运动中的过火倾向，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初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其中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2月上旬，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五人小组汇报，对《二月提纲》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在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报告后，在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于2月中旬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

3月下旬至4月中旬，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其间有两次到新疆、云南作短暂休息，但未回北京。在刘

少奇外出的近一个月中，国内局势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故：毛泽东对彭真及其主持制订的《二月提纲》提出严厉批评，并号召各地多出一些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向中央进攻；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几次审改后发到全党，其中提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彻底搞掉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和清洗“修正主义分子”的号令。根据《通知》中关于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革命小组”的规定，“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后来原封不动成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4月下旬，刘少奇回到北京。由于毛泽东仍留在杭州，根据多年惯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这使他不得不处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而这时，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意向实际上很不了解。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落实对彭真等人的组织处理，5月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未回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并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关于人事处理等决议，实际上在会前已定案，会上只不过补办通过手续。提交会议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时一字未改。

《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

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借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观点。

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发言表明他对《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不甚了了。他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等问题，并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在有些问题上同毛泽东不够一致等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在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进入6月，毛泽东没有通过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下令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鼓吹犯上作乱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陈伯达掌握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火药味很浓的社论。随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造反浪潮很快遍及全国，“文化大革命”一哄而起。

刘少奇立即陷于应付混乱局面的繁忙之中。6月3日，他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新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运动情况的汇报。刘少奇提出，应该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学生很快的组织起来，使运动走上轨道。会上拟定了对运动的《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从6月3日起，刘少奇经常在怀仁堂后厅或他的住所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研究对策。当时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在造反浪潮的冲击下瘫痪，局势动荡，秩序混乱，刘少奇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考虑沿用过去运动中常用的派工作组的办法。特别是5月底经毛泽东同意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之后，群众中要求派工作组的呼声非常强烈；主持中央各部门工作的负责同志也都主张派工作组，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保持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开会研究后，决定参照对北京大学的做法，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要中央有关部门和军队抽调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北京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北京的做法，相继向当地一些学校派了工作组。

在工作组陆陆续续进驻学校的过程中，陈伯达曾提出不要工作组，当即遭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反对，刘少奇也就没有理睬。

然而，局势还在一天天恶化。挨批挨斗的人日益增多，自杀和打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在狂热情绪的驱使下，背着工作组，野蛮地揪斗了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和学生。刘少奇认为对运动中的这种过火行为和混乱现象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加以约束和引导。6月20日，他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他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关于制止乱打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6月21日，刘少奇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运动的整个过

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坏，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

这以后，刘少奇还几次接见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要求他们引导学生讲究政策，“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7月13日，他在听取共青团中央汇报运动规划时提出：“不能对所有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都批判，只是批判极少数代表人物，大多数人从中受到教育”；“不要把党团组织放在一边，要在运动中观察党团组织，看它能不能领导，同时也锻炼党团组织。”

令人忧虑的是，这场骤然掀起的运动已经对生产构成威胁。“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就受到影响，钢、钢材、煤的产量和外贸都在下降，质量下降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本建设任务原定上半年完成40%至45%，实际只能完成35%。显然，如果再让造反浪潮冲进这些部门，生产将更大幅度下降。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起召集有关会议研究后，决定向毛泽东提出在工业交通等生产系统变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建议。6月底，刘少奇、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说：“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两天以后，毛泽东复信同意。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于7月2日发出，指示这些单位的运动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按照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并明确规定要“由

上级派出工作队领导进行。”

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所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尽管代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意见，在有的具体问题上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但实际上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

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向毛泽东谎报情况，给工作组加了种种罪名。刘少奇获悉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对工作组不能一概否定。7月1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多数是好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

毛泽东在听取了有关工作组的几次汇报之后，对刘少奇、邓小平指导运动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7月24、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搞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从而否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意见。刘少奇当时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但仍提出，马上把全部工作组撤出会引起混乱。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于7月28日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上万人参加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了这项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在会上讲话，都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刘少奇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关于工作组，他除代表中共中央承担责任外，还说：

“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会完全一样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各工作组组员的工作，更不会完全一样。”刘少奇还特别提出“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他说：“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

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的第一天，刘少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分，向大会报告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工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派工作组的做法承担了责任。他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由我在家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8月4日，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主要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此后，十一中全会开始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于8月12日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共中央副主席，但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地位，虽然名义上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但已经不参与领导工作。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根本不再提起，实际上未经法定手续被免掉了。与此同时，林彪、江青一伙开始了陷害、攻击刘少奇的阴谋活动。8月14日，林彪就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诬陷刘少奇的材料。9月16日，康生向毛泽东写信，利用早已定论的“六十一人出狱”问题攻击刘少奇。江青、张春桥等人也纷纷向刘少奇施放明枪暗箭。

10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林彪、陈伯达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被迫在会上检讨，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会后，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下发各地。随即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从12月开始，在“中央文革小组”指使下，北京和全国许多地方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发展，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为有助于早日结束这场给党和国家带

来惨重损失的动乱，刘少奇决意提出辞职。1967年1月，他利用毛泽东召见的机会，提出了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的请求。8月8日，刘少奇又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再次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

但是，愈演愈烈的狂暴局面发展到了连毛泽东也无法控制的地步。对刘少奇的攻讦不断加码升级。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操纵下，刘少奇在他的住所多次遭到围攻、批斗。刘少奇对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极为气愤，尽一切可能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奋力抗争。他利用写信、批斗会答辩等各种方式，据理驳斥强加给他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1967年4月，他在一份书面材料中，逐一回答了“造反派”提出的种种责问，澄清事实真相。他在回答“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时说：“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8月，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中也严正指出：“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申诉被置之不理。1967年3月，“刘少奇专案组”正式成立。9月，刘少奇被单独关押。“刘少奇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采取刑讯逼供、

弄虚作假等手段炮制伪证，于1968年9月写出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0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这个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当时就引起不少正直的共产党员和群众的不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很多干部群众为刘少奇鸣不平，用各种方式抵制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刘少奇的恶劣行径，有的为此献出了生命。

从1968年初起，刘少奇在关押中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逐渐失去生活自主能力。1969年10月17日，身患重病的刘少奇被强行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省开封市继续关押，11月12日因病情恶化含冤逝世，终年71岁。

历史总是公正的。随着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先后覆灭，“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当时专案组提出的《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这一决议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

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随后，遵照刘少奇生前遗言，他的骨灰撒在了滔滔不息的大海里。

谭 政

乔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谭政大将，自 1927 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60 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他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

谭政原名谭世名，号举安。1906 年 6 月 14 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楠竹山村一个绅商家庭。祖父是个绅士兼商人。父亲谭润区长期教书，也做过生意，管过房族的事。母亲文氏掌管家务。谭政是长子，有一弟六妹。谭政 6 岁时，被送入蒙馆读私塾，第二年改读楠竹山村谭氏宗祠创办的初级小学。小学毕业后，因父亲不放心其远离家门到县城读书，遂在家攻读老书五年。直到谭政 16 岁时，才考入东山学堂念书。对这段往事，谭政在自传里写道：“我之所以迟迟才入高小有两个原因，一因父亲守旧，不相信洋学堂，直到以后邻里的人外出读书的增多，才不得已趋趋潮流。另一原因是家境不甚宽裕，读一年高小需花费五六十元之多，这个问题到族祠里成立决议，奖励族中子弟入学，规定入高小入中学者各津贴义谷若干担之后，经

费才得到解决。”

谭政在“东山学堂”读了三年书，谭政说：“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头一个时期喜读古文，埋头于吟诗作句，后来受外来影响，倾向于科学知识。在高小三年因所得知灌输，因参加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如五卅惨案，六一惨案，反北洋军阀段祺瑞等进行的示威游行，查禁仇货及办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我的思想就有很大改变，对中国社会开始不满。”谭政说：“这些，对我思想上的进步，为我后来参加革命，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谭政在东山学堂毕业这年，与陈赓的四妹妹秋蔡结婚（不久病故）。

（二）

谭政在“东山学堂”毕业前后，很想继续升学读书，因家境日绌，加之父亲不赞成，未能如愿。依照父亲的想法，谭政高小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族立初级小学当了一名教师。1927年初，谭政任职教师第二年，开学不到两个月，他毅然离开学校，随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部姓邹的招募副官来到汉口参军。当时，陈赓担任营长，谭政便在陈赓特务营第二连任上士文书，后成立营指导员办公所，谭政任准尉文书。

陈赓特务营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下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力量，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这支部队中进步力量占居优势。谭政在特务营看了一些《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ABC》等杂志书籍，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开始倾向共产党的主张及理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赓被撤销特务营营

长职务，连排干部大部撤换；营指导员办公所被解散，谭政也被视为共产党嫌疑，被撤销文书职务。谭政随陈赓一起离开特务营，来到武昌叶挺部队后方——二十四师司令部留守处，谭政被分配到武昌警卫团九连担任文书。该部在乘船去九江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得知九江被张发奎控制，南昌起义部队业已转移，遂在黄石登陆，辗转到达修水。这时谭政任该团二营营部书记。在修水，部队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改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谭政任师司令部少尉书记。这期间，谭政结识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罗荣桓。秋收起义前，暂一师部队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谭政任一团团部书记，随部队一起参加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谭政又回师部担任文书。谭政回忆说：秋收起义部队自长寿街战斗失利以后，湖南的敌人，拚命地追赶，部队总是从天明就出发，一直走到黄昏以后才宿营。经过平江、浏阳、铜鼓、萍乡到达莲花东南永新境内的三湾。三湾在这山区算得上大村子了。就在三湾枫树坪集合队伍，进行整编。原来的一个师，编为一个团的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罗荣桓任党代表）、一个卫生队。编余干部成立一个军官队，谭政被编入军官队。

（三）

1927年10月3日，经过改编后的红军部队从三湾出发，经宁冈、茅坪，10月底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部队到达井冈山后，谭政在军官队接受了比较正规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在军官队受训期间，经宛希先和廖春芳介绍，谭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谭政被调任工农革命军政治机关宣传员，后任分队长。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成立工农运动委员会，谭政调工农运动委员会工作，在草林、左安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2月，谭政调任前敌委员会秘书，协助前委书记毛泽东起草整理文稿。谭政回忆说：毛泽东1928年10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立题为《井冈山的斗争》），就是他誊正的。抄写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很密。一共写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报告是由中央派来一名叫袁德生的交通把文件卷在伞把子里面带走的。

1928年4月中旬，朱、毛两支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谭政调红四军三十一团任团党委秘书。1929年1月中旬，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谭政随主力部队转战闽西、赣南边界。

1929年3月中旬，红四军进行整编。原第二十八团改编为第一纵队，军部直属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团一部改编为第二纵队，原第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谭政继任第三纵队队委秘书。

这时，蒋桂战争爆发，红四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回师赣南，扩大发展赣南根据地。谭政调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后任红四军政治部训练部长。

1929年12月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的古田召开。谭政出席了这次在红军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并作纪录。谭政后来回忆说：“在此以前，在党内、在红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例如：流寇主义、

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等，而这次会议上，在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议》中，才明确指出这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危害的严重性。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并使在我军已经形成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以及军队中的民主制度，等等，都已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①

1930年6月，红军扩编，以红四军第三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十二军，谭政任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政治委员。部队参战再次攻打长汀，谭政指挥教导队参加了长汀战役。1931年春，红十二军部队改编，老十二军留江西，谭政随军部及红十二军一部入闽，又成立新十二军，谭政仍任政治部主任。漳州战役后，谭政与军领导率红十二军主力返回江西，参加南雄、水口战役，又北上攻宜黄、乐安、南丰。之后，红十二军与红二十二军合并，谭政任红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

他在红军行军打仗极为紧张艰苦的情况下，写出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情况报告。及时总结部队政治工作，特别是战时政治工作，保证部队完成作战任务的经验。

（四）

1933年1月，红二十二军与红一军团合编，取消军的建制，改为直辖师。谭政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

^①谭政在留守兵团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

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当时，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普遍文化低，有许多人是文盲。谭政针对部队少文化的状况，动员和号召全师干部战士学习文化。战斗间隙，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都要求他们参加识字班活动。部队行军时，“识字条”贴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跟在后面的战士，边行进边识字。途中休息，战士们互相提问，有的用木棒在地上练写字。部队短期休整时，各团都举行识字测验，评比成绩，表彰先进。谭政总结上报部队识字运动情况时写道：“一团结长杨得志，以前一个字不识，现在能写简单报告了。还有些干部从前一个字都不认识，现在认识二十字以上了。战斗员中还有二十分之一不识字的，识五十字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五。”

每逢作战之前，为了防止部队胜利时的矜骄，消除行军的疲劳，提高作战勇气，谭政组织政工人员和宣传员，沿途布置宣传鼓动棚，运用化装表演、讲话、呼口号、唱歌子等方式宣传鼓动。同时，派得力干部，发动沿途群众欢迎、慰劳红军。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战斗情绪。

为保证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谭政要求各团战前务必召开党团员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组织党团员和政治战士，开展群众性的思想互助。对思想比较后进的战士，进行重点帮助。在警戒和战备中，把胆小一点的战士放在靠后面一点进行锻炼，对动摇分子，则派优秀的党团员监督，以保证警戒严密和杜绝投敌现象。

谭政重视瓦解敌军工作，在他领导下全师普遍组织了战场对敌喊话宣传队。每到夜晚，喊话队就向白军进行喊话宣传，并散发宣传品。有时还把群众给红军的慰劳品，也分送给白

军，以动摇其军心。

谭政坚持定期报告制度。即使在部队行军作战，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也坚持写情况报告。除了重大战斗有专门的报告，每个月都写有《月终政治工作报告》。把一个月内部队的活动，行军状况，打了几次仗，战斗间隙搞了哪些政治教育？发展了多少党团员？部队中发生了多少事故？有几起逃亡及其原因，克服的措施，等等，详报红一军团聂（荣臻）政委。

谭政对红军部队纪律要求是很严格的，原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说：在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红军没有后方，没有经费，大家饿着肚子行军打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老百姓地里挖蕃薯吃，还有用了群众的米面食物的，或者损坏东西也没钱赔偿，等等。违犯群众纪律现象时有发生。这类事，我们总是分工给谭政去处理。谭政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教育部队，并指示，用了群众的东西，没有钱给的话，也要给群众“打收条”。以后，“打收条”的制度，就在红一师部队中兴起来了。

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谭政由红一师政治部主任接任红一师政治委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红一师在完成黄坡洞阻击敌人南下任务后，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找到红一师李聚奎、谭政等，向他们讲了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这是谭政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内容。

红军长征部队到达乌江，红一师一部担任先遣队，冒着狂风暴雨，从手扒岩乘竹筏渡到乌江南岸。击溃敌人的江防部队，

掩护红军主力过江。然后，又以一个团的部队伪装主力东进，佯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而大部队则分数路南下，直逼贵阳。随后，迅速北上，进入彝民区。红军进入彝民区以后，遇到许多困难。虽然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达成红军通过彝民区的协议，而红一师的一团作为先遣队通过彝民区的时候，仍然有许多部落的彝民手拿刀枪梭镖挡道。由于谭政派出了工作队，向彝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又对部队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做到与当地民族友好相处，才顺利通过彝族区。

（五）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谭政听取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两个决议的传达，聆听了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认为在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新时期，红军的政治工作，有重新检讨和加以转变的必要。1936年3月26日，谭政撰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一文，上报党中央。文章指出：鉴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使红军的政治工作在某些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其基本变化：第一，现在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

应当适应于民族矛盾。第二，从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第三，红军在政治工作中，要利用许多旧的形式，要充实新的内容。宣传和贯彻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精神，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教育。这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谭政在文章中写到：贯彻统一战线政治路线宣传教育的原则是：第一，着重于党的策略的解释，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民族问题的教育，以保持红军的阶级本质和应有的特色。第二，利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传统、历史人物和英雄事迹、经验教训，作为政治课内的引证，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第三，注意国际问题的教育。解释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等等。第四，适当采用和选择三民主义中革命的部分内容进行教育，并且着重于干部和党员的教育，把干部和党员从政治上、理论水平上提高一步，坚决反对在复杂环境中思想上的堕落蜕化的倾向。

谭政进一步强调指出：不管红军在新的形势下怎样改变组织形式，必须保证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一切破坏或分裂党的组织和领导的意图，均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同时，加强红军的管理教育，严格纪律，绝不能因为形势的变化，使管理教育松懈和破坏纪律。

谭政还就政治工作与军事技术战术的关系提出新的见解。他指出：基于今后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使红军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迅速、秘密、灵活机动、善于速决，还要善于持久战，善于攻击，善于防御，善于山地

战，善于平原作战和村落战、巷战，以及河川战斗等。在军事训练中，应着重于干部战术素养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精于指导战争规律的研究。

随着新时期政治工作任务的转变，谭政在文章的最后，对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不仅要求他们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要培养他们具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敢于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整个政治机关的工作，必须要求真正地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使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从组织上来推动，能够指挥如意地去领导部队的工作。随着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和军队所担负任务的改变，要求政治工作有高度的集中与严格的政治纪律，反对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保持红军政治工作优良的作风，求得创立政治工作统一的意志，整齐的步调，协同一致地为着工作的目标去努力奋斗。

谭政《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党中央加按语转发。按语指出：除政治委员制度需要慎重考虑。我们希望红军中政治工作同志，对于目前新阶段上的政治工作多多提出自己的意见……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

1936年5月，谭政离开部队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受训。同年10月毕业调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任组织部长。1937年6月，升任后方政治部主任。10月，成立总指挥部，任总政

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谭政对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坚持敌后抗战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建设，做出重大贡献。1937年11月12日，总政治部兼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政下达的一项命令中，指出：“……目前抗战已走上新的阶段，为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巩固党在红军中的影响，争取抗战的胜利，特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训处改为政治处（部），恢复原来名义。”

国共两党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命令将留在南方各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坚持武装斗争和创建、发展、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最艰苦的历史阶段，谭政撰写了不少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论文，其中有：《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华北已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敌军工作的目的与方针》、《敌军工作的当前任务》、《关于八路军的干部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等等。所有这些论著，有力地指导了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开展，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华北，华北军民敌后抗战坚持了一年半之后，谭政正确地分析研究了敌人的对华政策和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为什么能顽强地坚持下来的原因。他指出：除了军事上以游击战给敌人以应有的打击，我们有一套对付敌人的政治上的策略。第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敌后军民进

一步与政府军队合作，尤其是八路军与政府军之间，密切地配合作战，互相援助，互相牵制敌人，保证战略上有统一的行动，不为敌人各个击破。第二，根据敌人政策的变化，我们政治上的基本方针，不能只是消极的招架，而应该是积极的主动的攻击敌人。只有从主动积极的地位出发，才能迫使敌人从进攻变为防守，从防守降至退却。第三，采取正确的政策，分化敌人所依靠的汉奸力量，缩小伪政权组织的统治能力，使之不能起到统治民众的作用。这些就是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战能够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坚持了三年的时候，谭政撰写的《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争的政治工作作了初步的总结。首先，对军队性质加以肯定。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人民的武装，是中国革命军队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前进的部分。为着巩固内部、团结人民，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起见，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应有其独立性。而这个独立性是从无产阶级立场与中国共产党现时的策略任务出发的。

谭政还就抗日战争这一民族解放战争的特点，总结了八路军、新四军三年来政治工作的经验。他指出：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除一般的抗战任务之外，还有着自己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最积极地站在国防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模范。抗战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是以全民族的战争规模而出现的。因此，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首先根据抗日和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各抗日阶层、党派、友军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对敌，反对互相诋毁、倾轧和中途妥协投降。八路军、新四军的宣传教育工作，要依据马列

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现时策略，把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统一起来。而统一战线的策略教育，又是阶级教育的重要部分。

在抗日战争时期，谭政对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他认为，在干部政策上，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方针，一贯是明确的。第一，不存私见。无论提拔干部和使用干部，都是从党的原则出发，不是从私人路线出发的。第二，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应一视同仁，党与非党干部之间只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义务。第三，既不姑息干部也不糟塌干部，在干部中高度发展自我批评，依靠自我批评去团结干部、锻炼干部和提高干部。第四，奖励前进，反对后退，拿前进的标准作鉴定和依赖干部的主要尺度。八路军、新四军正是依靠这样的干部政策，团结了干部，培养了成千成万忠实于中国人民事业的好干部。后来，谭政又撰写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一文，针对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强调：无论对待干部、团结干部、培养干部和提拔干部，一律不允许有任何私人路线与狭隘的宗派思想。

在谈到对于知识分子干部的政策时，谭政指出：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八路军、新四军干部中新的血液，应当大量吸收，适时提拔，切实教育和不断考验，使之成为大众化的知识干部。仇视知识分子，忌刻知识分子是错误的。

谭政还论述了党对农民出身干部的政策。他指出：由于八路军、新四军长期处于农村环境，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一定时期的将来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所以，农民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成分，同时也是干部的主要源泉。但农民有其两面性——革命的方面和保守的方面。因此，对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

政策，应当是发挥其革命性，培养教育应侧重在提高其文化，克服其保守性，大胆提拔重用。

谭政还就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问题写了文章和起草过专门的指示。谭政说：应当指出，由于战争环境的原因，政治工作必须是朝气蓬勃、雷厉风行的，工作中要有求实精神，求质量，而不去求那些表面形式。1939年9月30日，谭政代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训令》中指出：目前在军队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中，有其阴暗面和坏的作风，时常追求工作的表面和数目字上，而对工作的内容与质量则缺乏注意；遇事求简单，求单纯，而把本来复杂问题的解决简单化；各种工作惯于采取同样的公式，而不善于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环境，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方法；干部惯于集中工作，而不善于分散时的领导；善于鼓动工作，善于突击的方法，而不善于仔细的、经常的工作。因此，使我们的政治工作，在某些地方形成停滞、狭隘、呆板和保守的状态。这些都是政治工作进步的障碍。为此，要求所有政治工作人员，时刻谨守自己的岗位，每逢困难的时候和危险场所，应该显示出自己坚定的节操与刚毅气概，为部队作出表率。

1937年，谭政和四川籍的红军女战士王长德结婚。

(七)

1942年冬，谭政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4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泽东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主持和指导下，起草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红军和八

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阐明了对待政治工作传统应持的正确态度。

谭政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又一重要历史文献。194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指出：“谭政同志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通知》还强调指出：“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们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了指导和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为使这个《报告》精神在全军得以深入地贯彻，同年10月1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指出：“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给了各地总结与改造自己的工作以很大帮助。全军各部队应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在检查与改进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曾经发现哪些问题，有些什么经验教训，盼多作些调查研究，并将典型向总政

治部作出详细报告。”后来，总政治部又将各部队执行结果，从政治工作领域的十多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并且编印《连队工作》、《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实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与领导作风》等专辑，向全军推广。这就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在结束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45年，谭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出席了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八)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蒋介石加紧了发动内战的准备。9月19日，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蒋介石依靠美国的支援进行大规模内战的企图，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1946年1月谭政奉调东北工作，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后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创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到1946年底，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武装力量发展到27万人，为加强部队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谭政于同年10月22日，主持召开了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谭政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东北的斗争已经一年。一年中，各军区发展建立武装有很大成绩。现在，除调入东北的主力外，有三分之二的地方部队，是我们进入东北以后建立起来的。这些新组建起来的地方部队，比起主力部队来，党的领导，政治的、思想

的、组织的基础还弱，骨干也少，实际上，我们党对这些部队还不能掌握得住，党的许多政策，还不能通过这些部队来贯彻。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政治工作，注意发展党员，重视干部的教育与培养，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军政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

1947年，东北野战军先后举行了三次大的战役，这三次战役共攻占城市75座，歼灭敌军30余万。在这三次攻势作战中，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从而保证了作战任务的完成。首先，战前谭政与罗荣桓合作，着力抓了部队阶级诉苦教育，立功运动，战评活动（评战术指挥、评技术、评勇敢、评伤亡等）和建立党委制等工作。指战员以新华社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为学习文件，提高了思想认识。同时，结合诉苦运动，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策纪律观念。冬季攻势后，东北我军展开了以普遍提高部队政治觉悟为目的的政治整训和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

政治整训，仍然以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东北我军中的诉苦运动，早在1946年就出现过，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曾向各级政治机关发出并推广驻北满海伦警备二旅开展坦白运动与诉苦运动的经验，《自卫报》还发表了《从诉苦运动谈到部队政治教育的改革》的社论。在这次政治整训中，谭政总结了辽东军区三纵队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的经验。谭政把这一经验向罗荣桓做了详细汇报，罗荣桓指示：“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

方向。”

根据罗荣桓的指示，谭政主持起草以政治部名义发出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东北日报》上同时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经过普遍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很快地开展起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修改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进行诉苦运动的经验，从而推动了全军各部队先后开展起来的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1月30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

1948年6月4日，经党中央批准，调整了东北局，谭政仍为东北局委员；成立军委会东北分会，谭政为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8月14日，又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谭政仍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在东北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经过两年的英勇作战，已经处于全面优势。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达到105万人，其中野战军12个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独立师共有7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适时决定实施辽沈战役计划。同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谭政主持召开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各纵队、师的政治委员或主任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会上，谭政作了关于开展“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成分）的整军整党运动的报告。要求通过这次运动，着重解决部队成分不纯、

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

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经过充分准备，各部队从3月中旬开始，以40天左右的时间，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政治觉悟得到极大提高，战斗情绪空前高涨，为以后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了加强作战行动前的政治动员，谭政主持起草、经罗荣桓审定，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于8月29日发出了《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

《动员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发挥高度的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小的挫折和忍受异常困难的精神，争取全歼东北敌军，解放全东北。

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后，谭政和他领导的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深入前线各部队，大力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及时提出，各部队要主动团结友军，不争功，不争胜利品，相互配合，密切协同作战。对担负攻坚任务的部队，他们又响亮地提出“立战功、当英雄、孤胆歼敌、多抓俘虏”的口号，并对部队普遍进行了孤胆作战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而保证了整个战役顺利进行，取得了歼敌47.2万余人、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

（九）

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主力本需休整一段时间，方能投入新的作战。但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8日电令东北野战军：

“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

日全军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

当时，谭政正在沈阳主持召开有各纵队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部队休整问题和入关作战各项准备工作。突然接到18日中央军委提早入关作战命令后，随之把正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内容，转为入关举行平津战役的紧急动员大会。罗荣桓作了指示后，谭政讲话说：来不及发书面指示了，各纵队首长返部后，立即进行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的紧急动员。告诉大家，我们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刚刚胜利结束，即行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和华北野战军一起，共同战斗，担负最后解放全华北的战略任务，是非常光荣的。部队的行动口号是：“打到关里去，解放全华北，解放全中国！”

“到北平、天津过新年！”鉴于东北野战军即将同华北各野战兵团并肩作战，谭政要求东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在平津战役中，要虚心向友军学习，自觉地照顾友邻兵团。

1948年11月22日，东北野战军十一个纵队（不包括先行入关的先遣兵团）及特种兵全部，共80万人，放弃辽沈战役后的休整，以疾风骤雨之势，先后分路由喜峰口、冷口等处越过长城，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进军。部队向关内大进军中，野战军政治部工作组随部队行动。谭政及时指示各部队，利用一切空隙，开展政治动员，反复进行入关作战、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极其有力地保证了进军任务的完成。

12月中旬，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先后抵达平津地区，完成了对平津地区敌人的分割和战略包围。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先期于12月7日抵达蓟县，谭政主持连夜起草《目前作战的政

工动员》指示，经罗政委审定，以林、罗、刘、谭名义于12月11日下发部队。

《指示》要求各部队到达集结位置后，即进行作战动员，把当前形势告诉指战员，鼓舞士气，振奋全军，号召指战员不骄不傲，为消灭华北全部敌人而战；要求全军各部队“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成为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

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各野战兵团对天津、塘沽之敌形成合围之后，谭政又起草了《关于平津作战政治鼓动的指示》，于12月12日，以林、罗、谭名义发各纵（转师）及兵团政治部。

《指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需以全力到下面去鼓动作战。”

“为了鼓励士气，克服逃亡，在动员问题上，应广为利用冀东群众对我军的热情慰问与鼓动，鼓动全体指战员，准备全歼华北敌人，攻下北平、天津、塘沽，为解放全华北而战；部队亦可派出代表讲话，表示决心，决不辜负群众的热望，等等。”

《指示》说：“此项办法，在沿途行军中，已屡次见效，望各部注意采用。”

东北野战军疾速入关作战，对平津、塘沽之敌形成分割包围之后，中央军委曾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及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和作战地域的地方部队。1949年1月10日，党中央决定：“为着统一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成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平津战役前期、中期，林、罗、聂为代表与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谈判，而部队的攻打天津的作战指挥，主要由刘亚楼负责，谭政掌管

部队的政治工作。

天津是敌人现代化设防的大城市，又是华北的商埠。在攻打天津前进行攻坚战的各项准备时，谭政积极指导参战部队作好政治动员工作。他号召部队“打响进关第一炮”，争创打好仗、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战斗连队。他还深入参战部队，调查了解指战员的思想情绪，针对现实问题，面对面指导，就地帮助解决。他在参战部队提倡大力发扬军事民主，把政治工作做到各项战备工作中去，大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攻城战斗开始之前，谭政还抓紧对部队深入地进行了城市政策、纪律的教育，宣布了“约法八章”，提出争取“军政双胜”、“秋毫无犯、原封不动”的口号。这些行动口号和措施，保证了攻打天津的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和纪律。

攻克天津之后，谭政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他随攻城部队入城，检查了部队在天津执行城市政策纪律的情况，并于1月19日，向中央军委写了《关于攻津部队作战勇敢纪律良好及战后情况》的报告。

天津解放之后，北平20万守军陷于绝境，经过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争取，傅作义将军率所部接受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在北平的15万军队撤出城外。在改编傅作义部队的过程中，谭政做了大量工作。他坚决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努力完成了改编这支国民党军队的艰巨任务。

(十)

194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统一序列，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谭政任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准备向国民党控制的华中华南地区进军。从1949年2月10日起，在平津地区以战备姿态转入以政治为主的整训运动，对部队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教育。3月27日至4月5日，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进行贯彻《反无组织无纪律》的教育。部署了进军华中华南和接管城市、开辟新区中的方针政策等。通过一系列政治教育，为部队大进军和完成各项任务奠定了基础。

4月11日起，第四野战军主力近80万人，陆续由平津地区出发，向华中华南进军。这时，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因病未随军南下，部队的政治工作全盘落到了谭政的肩上。进军途中，各部队开展了以团结互助、爱兵尊干为中心的政治工作活动，要求部队做到打仗好、走路好、团结好、纪律好。在“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很快突破长江防线，5月17日占领武汉，10月14日解放广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年12月，谭政出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

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

此时，国民党军白崇禧残部，勾结云、贵、川、黔残匪，依托山脉连亘、河流纵横等复杂地势条件，在中南地区继续与人民为敌。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部队立即投入剿灭国民党军残部、大股土匪和实施民主改革的艰苦斗争。谭政针对广西少数民族头人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相勾结的实际情况，及时指导部队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方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新区政策和群众纪律，以争取民心，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由于政策得当而又及时，中南地区胜利完成了肃清国民党军残部、土匪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任务。

全国解放后，部队大规模的、频繁的作战情况已经改变，在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环境中，部队的斗志有些涣散。谭政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抓了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理。1953年6月1日，谭政在中南军区召开的支部工作会议上，就“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作了总结报告。他指出：“支部工作需要整理，不整理即不能增强基层堡垒作用。”“加强支部工作，是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所需要。”“办法是：在上级机关派人帮助和指导下，实行逐个的、分期的和实现一定要求的整理。”

谭政总结报告的中心，就是强调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群的团结。谭政说：因为这是支部工作中的两个重要环子，抓住了这两个环子，解决了问题，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成为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和在执行任务中的保证者的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1953年，部队转入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谭政认为，

这是我军建设的又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长期以来处于战争环境，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普遍没有进行过系统地教育训练，部队的文化程度很低，文盲很多。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实现我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是很难做到的。1953年春，谭政组织力量在中南军区部队摸底，搞试点。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努力，取得成效。遂向军委、总政治部提出在全军普及文化教育的建议。

（十一）

1954年10月，谭政调到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9月，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这期间，谭政领导和指导了军队系统的政治运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严格掌握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在部队肃反运动中，谭政始终遵循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谭政坚决认为，我们无论进行什么工作，都要从革命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某省军区政治部向他汇报该部下属有一政工科长，1947年伪造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和一封党员介绍信，借分配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并且说这个人的问题已全部调查核实完毕，本人也如实作了交待。现在，他们准备将此人定为混进党里来的政治骗子，作清除出党处理。

谭政问：“他入伍后表现如何？”

“一贯表现较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工作上有一定

成绩。”

谭政又问：“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你看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可以说基本具备。”

问明情况后，谭政表示：我看这个同志既不能定为混入党内的政治骗子，也不能清除出党。他当时采取那种手段混到党里来，做法上当然是错误的。但事实证明，他到党里来不是别有用心的，想干坏事，和政治骗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年他不那样做，根据他在部队工作八九年的表现，也可能早就入党了。我看还是为他补办一个入党手续，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会继续为党努力工作……谭政的指示，挽救了一名干部，也反映了谭政同志的思想政策水平。

1956年，谭政出席了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谭政就《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作了发言。他说：现在的新阶段，我军建军史上的这样一个大转变，是我们多年来奋斗的结果。但是，部队工作的转变中发生了几个偏向。这些偏向大略表现为：忽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忽视思想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在学校教育与部队训练中，存在着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地方党政的关系，较前疏远。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谭政提出了新的历史阶段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谭政在中共八大的发言，被中央军委作为建军的重要文件印发全军。

在中共八大会上，谭政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谭政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同年12月，谭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委。这期间，他还担任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谭政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着重抓了部队文化教育和理论学习。他提出通过离职和在职等形式，普及文化教育，使军队中所有工农出身干部的文化程度，达到高中以上，一部分达到大专以上的水平。在他的主持下，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文化的新高潮。对领导干部，他要求不仅要学文化，还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在若干年内，读完12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毛泽东有关著作。他以身作则，除了抓紧时间阅读马列著作，还和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在南京举办的读书班一起学习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谭政学习这篇讲话后，带领干部到福建沿海部队进行考察。4月间，他执笔写成了《关于当前部队官兵矛盾和军民矛盾的考察报告》，并提出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的十二条措施和处理军民关系的八条办法，受到中央和军委的好评。

谭政在总政治部工作的十年多的时间里，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具体领导军队逐步实施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后来又给战争时期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实行“四项制度”，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重大改革，谭政为组织实施，作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

谭政始终保持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期间，尽管身兼多职，工作繁忙，但每年他

都抽出几个月的时间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为了把政治工作渗透到军事训练中去，保证部队训练任务的完成，除了训练时间给以充分保证，谭政要求总政治部工作人员首先自己参加军事训练，到部队去摸爬滚打，直接感受，变为内行。他也亲自深入东南沿海部队，检查部队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1956年12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曾就部队军事训练中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总政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精神撰写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执行群众路线的初步总结》，论述了在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可以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取得成绩大，创造多，难点较易克服，教学方法也能得到改进等好处。并指出，发扬军事民主，改善官兵关系，乃是在训练中实行群众路线的先决条件。在军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谭政宣读了这个总结。彭德怀看了这个总结，认为很好，建议刊登在《八一杂志》和《解放军报》上。后又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对推动军事训练和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谭政对于部队正在开展的军事训练，提出“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口号。1959年，他领导制定了《院校教育方针》和《海岛工作纲要》。他还主持制定了《干部理论学习计划》，要求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系统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史等课程。他亲自组织编写了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后又主持制定《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在全军迅速掀起了进一步学习包括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化学在内的文化科学知识的热潮。

谭政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他坚持党性原则，坚持真理，有话敢于直言，从不谄媚奉承。1960年春，他竟将一篇以

“天才”、“统帅”、“跟着林总走”等词句吹捧个人的《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的文章“枪毙”，未能刊登出来。他严以律己，宽厚待人。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艰苦朴素，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他任职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十年多，没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他原来的住房设施简陋，常年失修，但他从没有提出过修理或更新。

(十二)

1959年庐山会议和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等，并且免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1960年1月，军委又在广州召开高干会议，继续揭发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谭政的发言只是汇报部队文化教育和整风情况，没有违心地去批彭、黄，这就遭到了林彪的忌恨。林彪扬言，谭政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彭、黄下台后，9月，组成新的军委，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一上台，便急于掌握总政治部这块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全军政治工作的思想阵地。本来，林彪与谭政共事多年，但谭政与罗荣桓关系密切，而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与罗荣桓在军队思想建设方面有一些分歧意见。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征求罗荣桓的意见，罗荣桓直言敢谏，认为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他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为宜。林彪又耿耿于怀。林彪把罗、谭联在一起，对谭政主管总政治部很不放心。

谭政对于林彪大搞反彭、黄、反右倾，大讲政治统帅，提倡个人崇拜，片面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等等“左”的一套，是有保留、有抵制的。而林彪却把谭政这种求实作风看成是他在军内推行他那一套“左”的货色的障碍。于是，林彪迫不及待又在1961年9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工作问题”。林彪鼓吹什么：“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这实际上就是针对谭政的。9月12日下午的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林彪突然抛出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四个第一”，先行作了所谓“政治工作领域中四个关系问题”的报告，大讲“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指责谭政主持的总政治部不传达军委指示，而去搞那些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还指责谭政主持制定的部队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即十年大计，400个小时高等教育计划和干部政治理论教育提纲“脱离实际”，不强调读毛主席的书，活学活用。给谭政扣上“方向偏”的帽子。这样一来，林彪就为扩大会议定下基调，成为批谭纠偏的会议。

会议一开始，谭政就受到围攻，大会批，小会斗，“连续作战”，揭发批判谭政的“错误”。林彪指示：“谭政要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

谭政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要我检讨什么呢？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就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说我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政治上一贯右倾，历次政治运动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些意见，我回想了一下，都不符合事实嘛！

谭政解释说：“事实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过毛主席审定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以及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毛主席还作了批示，这些，怎么倒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所提意见，都是片面的。我怎么能照着人云亦云去作检讨？”

会议当中，有人批评说：你谭政 1944 年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的几次修改形成的，应该算作毛主席的著作，用你谭政的名义发表，捞取了政治资本。这个“尖锐”的批评，谭政更是难以接受的，他当场反驳说：“不错，这个报告是由我起草、毛主席改过的，但在大会上由我宣读，以后用我的名义发表，是中央讨论决定的，不是我个人所能随心所欲呀！”

1961年 10 月 20 日，在林彪主持下，不顾谭政的申辩和解释，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一项《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后闭幕。

军委扩大会议后，总政治部召开以“整风”为主要内容的党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发动群众会内会外对谭政的“错误”进行深入地揭发批判，同时对所谓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提出处分意见。总政治部党委《整风工作报告》写道：

“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

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

总政治部党委的《整风工作报告》中还写道：谭政“为了执行彭、黄路线”，“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总政党委的《整风工作报告》。谭政被撤销了总政治部主任，降职为副主任。刘其人、姜思毅由部长降职为副部长，白文华、欧阳文调离总政治部。以后，又经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准，撤销了谭政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撤销了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着，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撤销谭政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军队改革薪金制度的时候，又给谭政行政降两级的处分。

（十三）

总政治部领导改组以后，罗荣桓复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被降职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分工总参、总政直属单位政治工作和总后的政治工作，还分管公安部队和民兵政治工作。但是，谭政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思想不通，去找罗主任申述意见。罗荣桓认为谭政不存在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他只能劝慰谭政服从中央的决定，建议他下去搞调查研究。

谭政尊重罗的建议，先后在总参、总政、总后系统和公安部队所属单位以及边疆哨所蹲点、考察，调查研究，每次调查完毕，他都要写出书面报告，向中央军委和总政党委汇报。1964年，谭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到九江总后的一个军工

厂蹲点，他化名唐一夫，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掌握第一手材料，帮助整顿工厂约半年时间，向毛泽东写了蹲点调查的专题报告。谭政从九江蹲点回北京不久，接到中央的通知，决定谭政到福建担任副省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反党集团的邱会作等人唆使福州军区卫生学校“革字派”学生20多人，窜入谭政住处抓走谭政，又押送北京交给林彪反党集团监禁起来。随之，在全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各院校，把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著名将帅一个个押上批判斗争大会，轮番批斗，坐“喷气式”，拳打脚踢，开口侮辱。谭政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连同随谭政深入基层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包括谭政的秘书，统统在被关押审查之列。不久，谭政被关进监牢，一关就是八年多，他的身心受到极其凶残的伤害。

1975年春节，谭政才被放出监牢，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长时间生活上没人过问。8月，在邓小平、叶剑英的关怀下，报毛泽东同意，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80年，中共中央对他受到的政治诬陷给予平反。

谭政重新工作后，不顾因受尽打防海岛，看望广大指战员，体察部

1978年，谭政被选为第五
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

深入边

程克绳

詹华如 潘长德

(一)

程克绳，原名兴武，又名祖武、绳武、克纯，化名常明、锦西等。1894年1月，出生在湖北省枣阳县西乡程坡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在世时，家有数十亩田地，日子尚能自给自足。其父程有乐，与邻村唐氏婚后，生下两男，取名兴文、兴武，意望后代成龙，文武双备，振兴家业。兄弟俩从小跟大人一起下田劳作。1903年春，程克绳入本村私塾学习。不久，转入枣阳县立高等小学；1914年春，考入武昌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次年，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兴起，程克绳受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影响

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革旧图新处萌生。

毕业后，回到家乡。枣阳县政界、他，但他立志“教育救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五四运动后，程克绳决定赴法勤工俭学，并有幸破例获得程氏宗祠祠产的资助。临行时，他的父亲为刚生下的孙儿取名“名洋”，以此助兴，记念程家世代第一个留洋学生。

(二)

1919年10月31日，程克绳和李维汉、张昆弟等150人，作为第五批赴法勤工俭学生（程编在第12团），从上海乘坐宝勒茄号轮船，踏上了赴法的征途，经过三万多里的海上航行，于12月9日抵达法国^①。

那时，工读生活是相当清苦的。一个勤工俭学生一天的劳动所得，一般为十法郎，食宿支付后，所剩无几。为了购买学习用品和书籍，还需加班做零工挣钱。程克绳和同学们每日做工八小时，读书五小时，睡眠七小时^②。他们在劳动中，增强了同工人阶级的接触，认识到“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镇压”，证实了“就是在以民主著称的国家，工人并无民主自由”^③。这些，都促使程克绳倾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

程克绳还参加了湖北青年在法国成立的湖北同乡会、湖北勤工俭学学生会等组织，探讨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经验，共

①《勤工俭学状况》，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辑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2）上，第154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②王若飞：《圣夏门勤工日记》，《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2）上，第226页。

③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同切磋技艺，交融思想感情。

勤工俭学的道路坎坷不平。1920年秋后，法国战后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大约有500名勤工俭学生，因工厂倒闭而失业。疾病、失踪、死亡，时有发生。1921年2月28日，为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学生集体请愿、示威，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断绝对勤工俭学生的资助，要求法国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同年6至8月间，在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和周恩来负责的中国共产党巴黎小组的领导下，掀起了“拒款”斗争，强烈谴责北洋政府以向法借款为名、行出卖国家主权之实的罪行。程克绳一方面积极投入政治斗争，一方面和湖北籍学生张皓、滕功成、宋法明等54人，联名致书湖北省政府及各界父老：“自念束发受书，即知爱国。昔人尚不食嗟来之食，学生岂受卖国之财？”^①信中切实陈述饥寒凄苦境况，呼吁给予定额津贴，以补求学生生活之必需。

1922年秋，中共旅欧党组织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了《少年报》（后易名《赤光》），组织勤工俭学生研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程克绳是《少年报》的热心读者。他这时还读到蔡和森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一些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文章，思想进步很快。这年冬，经周恩来等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①《湖北旅法勤工俭学生之血泪》，1922年7月24日天津《益世报》。

②关于周恩来介绍程克绳入党的根据有：《黄镜给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12月2日；沈沛霖给枣阳市党史办公室的信，1987年9月17日；《李实同志谈话记录》，1981年6月29日。

(三)

1924年冬，程克绳辗转赴苏联，亲眼看到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各种制度，了解到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从中领会到革命的真谛和方法。随后，他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到了一别五年的祖国。

1925年春，程克绳受中共武昌地委的派遣，带着青年知识分子吴雅晖（广东人），奔赴故乡鄂北枣阳开辟工作。“程祖武同学由法回国后，即在该处作发展民校及农运工作”^①。

程克绳回家时，除几箱书籍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村里亲友纷纷赶来看望，屋里、院子都挤满了人。一个名叫香娃的姑娘，一颠一跛地也来瞧稀奇。程克绳望着她，疼爱地说：“女孩不比男娃少一只眼睛、半个耳朵嘛，都一样聪明能干，可一包脚，就不如男的了。我看，以后女孩子不要包脚了，反封建就从这儿开始吧！”他还自信地对穷哥儿们讲：“以后我们不必为缺田少地犯愁了，大家有的是地种。暂时无地的，我劝你们不要买，免得瞎花钱。这次回来，我不走啦，只要我们齐心，往后的日子，要翻个过儿的！”^②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程克绳首先走村串户，发动先进的知识分子。他常去十里碑村找私塾先生申天德叙谈时势，还有王庄的王大中、马小庄的马益、雷垵的王洪泽、钱小庄的钱家槐、黄庄的黄道南、勾庄的勾和金等，都成了他的主要依靠对

①《吴卫致曾延信》1926年1月21日。

②访问程发明记录，1987年5月28日。

象。他走到哪里，就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打倒军阀、打倒列强、铲除封建势力等道理，宣传到哪里^①。

同年秋，程克绳在枣西程坡创办了第一所农民夜校，首批学员40多人，编为知识青年班、农民班和少儿班三个教学班。他每次从县城回来，总要为夜校带一些《农民画报》、《农民月刊》等学习材料，分送给各处学员阅览。他还派人把一些宣传画贴上墙头，给这偏僻的乡村带来新鲜活泼的气氛。

1926年，程克绳又陆续在古城、马岗、徐窝、郑岗一带，办起十多所农民夜校。他携雨伞，带教材，轮流到各校讲话、授课，“先教识字，再以字为媒介，引导学员认识生活贫苦之根源及社会黑暗，导出革命道理，促进阶级觉悟”^②，为农民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办夜校的同时，程克绳着手建党工作。1925年6月15日晚，在程家三房庙首次举行秘密入党宣誓，新发展的中共党员有王大中、勾和金、程正恒、程正堂、程正春。连同程克绳、吴雅晖，建立了党小组，程克绳任组长。这是枣阳及鄂北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③。接着，翟家古城、蔡阳铺、马岗、隆兴寺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党小组。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扩大，为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准备了领导力量。

其时，鄂北旱情严重，“且勒指苛税甚大，人民苦之。”程克绳审视实际情况后，着手改造、利用枣西已有的群众自卫组织“硬社”，发动农民开展斗争；还组织农民成立了联庄会，使枣阳成为湖北农民运动较早的地区之一。翌年，共青团

①访问申天德、黄家举的谈话记录，1985年11月。

②访问程厚波、程正春谈话记录，1961年7月15日。

③张铁汉谈话，1969年12月25日。

武汉地委致团中央的报告说，经克绳等到各村宣传后，农民知道有团结抵抗之必要。乃联合 36 村组织一联庄会，共数千农民，曾集会三次：第一次，在去年 8 月间；第二次，在去年 10 月 4 日；第三次，在去年 11 月 7 日。第一次集会有 800 多人，第二次集会有 1000 多人，第三次有 2000 多人，都是壮年和青年农民。“他们集会的口号是：1. 反抗麦捐；2. 反抗地亩捐；3. 赈灾；4. 防匪。36 村因有联庄之组织和几次大的集会运动，所以各项捐款都免除了。”^①实可见程克绳“对团体甚忠实，工作甚努力”^②。

1925 年 9 月，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成立国民党枣阳县党部，程克绳任常委。10 月，全县计发展国民党员 110 人。1926 年 2 月，国民党湖北省二大召开，程克绳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③。

1925 年 12 月，程克绳将联庄会改为农民协会。不久，“建立农民自卫团一个，团员 160 人”^④。农民协会组织与活动逐渐公开化。

1926 年 6 月 5 日，枣西隆兴寺举行选举议员大会，拟选两名出席省的议员。这时的枣西，仍是军阀势力和封建势力把持的地方。他们四处奔走，请客拉票。为了揭穿假民主的阴谋，中共组织决定推举程克绳、徐化龙为代表，参加竞选斗争。这天，农会会员扛梭镖、举刀矛，计 5000 余人，云集于隆

① 《团武汉地委致团中央信》，1926 年 1 月 21 日。

② 《团武汉地委关于湖北各地团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1926 年 3 月 26 日。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日报》第 1 期。

④ 《湖北农民运动概况》，1926 年。

兴寺区署，提出“不选恶霸，不选坏人”的口号，迅速控制了会场。恶霸田尧平遭到与会选民的反对，农会得到了胜利，显示了黄泥巴腿子向封建势力造反的了不起的力量^①。

1926年8月，中共枣阳地方委员会成立，程克绳任书记。

1927年1月，程克绳出席了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在这次大会上，枣阳代表呈报了《关于惩办反动分子高锐生、张镜溪、杜进德、熊兴斋和反动县长廖溥的提案》，并得到大会通过^②。

大会之后，程克绳返回枣阳，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推行了一系列革命措施。首先，县党部发出了《关于革除县署积弊宣言》，揭露旧政府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五条积弊及其存在原因，提出了革除积弊的措施。其次，改组旧县署，撤除反动县长廖溥的职务，还配合新政府，取缔十区区公所和九区自治联合会等反动机关和组织，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整顿改革学校教育，撤换了一批反动校长。再次，领导县农协作出了14个提案：1. 组织农民自卫军；2. 民团经费及枪支，均归农协办理自卫军之用；3. 设立平民学校、成年妇女补习学校，应确定经费；4. 严办土豪劣绅；5. 惩办团董刘华根、邱老老、杜进德；6. 地方团防局从前抄没农民之财产，应如数赔偿；7. 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禁止团防收地亩捐；8. 取消苛捐杂税；9. 严惩烟赌；10. 各地庙产，应收归农协所有；11. 允许各地乡农协自买枪支；12. 取消盐斤加价；13. 肃清土匪；14.

①《枣阳农运之发展》，1927年1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访问王惠兰谈话记录，1982年3月22日。

严办贪官廖溥^①。此外，县上还逮捕了全县最大的土豪劣绅高锐生、张镜溪、熊兴斋，抄了琚湾团防局和团董饶海平的家。一扫反动势力的昔日威风，使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成立区农协12个，乡农协79个，会员达3700多人，5月，“有组织的农民约14000余人”^②。

1927年春节，枣阳县城东沙河岸边，四乡农民聚会，欢庆北伐胜利。程克绳登台扮演反映农民命运的时装戏《农夫李二之死》中的土老虎。这出戏连续公演，颇受农民群众欢迎。当全剧演到对李二执行枪决时，全场群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

（四）

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4月16日，枣阳县境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九师独立团团团长杜进德叛变，下令“闭城搜索省候补执行委员程祖武”，并将县党部、县农协抄掠一空，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团体负责人^③。程克绳在党员和群众掩护下，越墙涉河而走。

4月下旬，程克绳带一批同志急赴汉口避难，以便另想良策。5月，他以国民党枣阳县党部名义，在《汉口民国日报》公开发表了《告全省民众书》，揭露杜进德叛变革命的罪行，获得省市各界的注视和支持。6月初，在省农协军事部协助

① 《枣阳代表报告》，1927年3月8日。

② 《积极武装之枣阳农民》，1927年5月4日。

③ 《枣阳县党部反对不法军官》，1927年5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

下，程克绳买到汉阳造二八盒子枪 14 枝，步枪 1 枝，子弹 10 余箱，并很快运回枣阳。恰巧，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樊仲秀之建国军进剿鄂北叛匪。获得武器的枣东南乡农民，奋起配合，于 6 月 13 日克复枣阳。

为了筹措经费，多购枪支，程克绳通过吴汉城等人周旋，疏通了省民政厅的关系，在汉口江汉关没收了运往杜进德坐庄花行的三船棉花，变卖后购买了 96 枝德国式手枪和 11 箱子弹。程克绳又派人秘密撕下驻守枣阳的建国军第一师师长李山林颁发的布告，巧刻“官方”（即印模），顺利解决了运送武器的通行证。在从随州到枣阳的路上，他化装成国民党高级军官，乘轿闯过一路关卡，于 1927 年 7 月 29 日，将这批枪支弹药安全运至枣东乌金店天佛庙，供农民武装训练班使用。随即，在县城毓秀女子小学召开会议，将全县划分为十个战斗区，任命并武装了各区领导人，书记发一枝手枪，武装委员发一枝盒子枪。

两次运枪成功，加快了农村革命武器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开展，为鄂北及枣阳秋收暴动作了准备。

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8 月中旬，中共中央陆续派李富春、陆沉、王一飞等，前往鄂北组建“中特委”，部署了枣阳、襄阳和随县的秋暴工作^①。8 月下旬，成立枣阳县秋收暴动总指挥部——军事委员会，程克绳为军委书记，惠亚东、杨秀阡、王承祜、张抱朴为委员。军委分工，南乡归惠亚东指挥，西乡由程克绳暂代，北乡归张抱朴指挥，城内由杨秀阡指挥^②。随即，组织枣西农

①《廖划平关于鄂北工作报告》，1929 年 7 月 23 日。

②赵贤惠：鄂北农呈《枣阳报告》，1927 年 9 月。

民武装，并联合襄东农民，计1万多人，打响了鄂北秋收暴动第一枪，一举拿下隆兴寺区署和团防局。接着，据群众报信，又夜围尹家老湾，活捉区长兼团总邱植卿，将其拴在祝岗村的一棵枣树上，进行审判。其时，有人递来一封求情信。程克绳展阅毕，将信一扔，气愤地说：“各位父老兄弟姊妹们，对这个杀人刽子手，这个曾撕碎我们旗帜的人，大家说怎么办？”台下异口同声回答：“杀！”程克绳执行群众的意志，当即处决了邱植卿。

接着，农民武装又镇压大劣绅沈正丰、申全生及建国军连长马某，获短枪十余枝。几天后，农民武装攻打了沈家大房，捣毁了据湾团防局，把枣阳西乡民愤很大的劣绅都几乎镇压了①。

10月，程克绳率领红枪会，发动了随枣边暴动，先后攻克了随县重镇潭潭及枣南的边镇唐城等地，并把枣西枪支集中起来，成立了枣阳县农民赤卫队，由张履中（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任队长，不久发展到200多人枪②。与此同时，枣南400余农民两攻梁家集，枣东千余农民驱赶建国军，枣北万余农民攻打封建堡垒——邱家前湾，秋收暴动的烽火愈烧愈旺。

11月，中共鄂北特委成立了襄、枣、随三县总指挥部，部署以枣阳为中心，发动数万农民攻打枣阳县城。程克绳考虑到农民武装枪弹少，训练差，攻城容易守城难，遂劝阻特委章成收回成命。特委“发信各地停止动作”③，围城农民遵令撤

①赵贤惠：鄂北农呈《枣阳报告》，1927年9月。

②访问李实谈话记录，1981年6月。

③《关于枣阳暴动及几个同志受处分向白德及顺泰报告》，1927年11月。

回，途中与建国军接火，取得一些胜利。程克绳建议改变攻城计划，保护了城内地下党和交通站，保存了军事实力，但却因此受到撤销县委书记职务的处分。

这年12月，县赤卫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程克绳任总队长，余世颂任党代表，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手枪队。总队部设在翟家古城，直属中共鄂北特委领导。鄂北总队经常活动于枣西平岗和襄、枣、宜交界的山峦地带，有时与各地以大刀、长矛、土铳为武装的农民赤卫军配合作战^①，取得了不少胜利。

（五）

1928年4月27日，国民党建国军两个团和枣南高仲宣民团，分两路包抄赤区中心翟家古城。古城位于滚河北岸，三面环水，河的南边冈峦起伏，对我可攻可退，有回旋余地，而敌人侵入则难以逃遁。程克绳经过分析后，作了精心部署：以农民武装万余人隐蔽在古城周围村庄，留下一条路，让敌人钻入包围圈；工农革命军以小部阻击西路民团，以主力主动迎战东路敌军。战斗打响后，敌来势凶猛，工农革命军且战且退，将敌诱至古城时，城头铁炮齐鸣，军民四面跃出，杀声震天，不到两小时，击败了建国军，并将其驱赶十多公里以外，缴获枪支300余。“建国军既败，退回城内，乡村完全为农民割据”。此役，“鄂北豫南，大为震动”^②。

^①徐化龙谈话记录，1961年8月；张显宗谈话记录，1982年11月。

^②傅良知：《枣阳工作报告》，1928年12月。

6月初，湖北省“清乡督办”指使鄂北清乡司令李纪才，率一旅进驻枣阳，曾一度打破枣阳农民武装割据的局面。7月后，程克绳利用桂岳战争的缝隙，率领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再起，先后击败各地民团，镇压地主豪绅，号召农民起来免租分粮，割据局面遂又形成^①。敌惊呼：枣阳为湖北“共祸最烈的第一县”^②。

其时，全国总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强我弱，程克绳不同意与敌正面作战，率军在襄（阳）花（园）公路沿线打游击，多次截获敌人军车、货车，以及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然而，执行“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共鄂北特委，对程克绳的作法不满意，又撤去其总队长职务。

9月，桂岳合流，入枣“会剿”，杀人放火，血洗苏区，使革命力量受到惨重损失。程克绳以革命利益为重，向特委建议，应插枪隐蔽，余部各自潜散，待机再起，被特委采纳。此后，程克绳装扮成农民，携妻带子，潜往豫南唐县、邓县一带暂避。

1930年春，形势好转，程克绳重返鄂北。

5月4日，酝酿中的光化暴动，因无充分准备而夭折。程克绳坦诚地写下了《我对鄂北党的批评和意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指出，光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鄂北党组织受了盲动主义的影响，党的第六次大会一切指示还没有达到下层干部，党的主张也未传到各地群众。“所以，每每行动都是看见几支快枪与党员在那里，而每次行动并没有参加群众利益的斗

①傅良知：《枣阳工作报告》，1928年12月。

②《廖划平关于鄂北工作报告》，1929年7月23日。

争，因此得不到广大无产阶级热烈的拥护。”他强调应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认为：1. 我们的党基要建立在雇、贫、佃农身上，只有这样，一切斗争才能领导起来；2. 要在斗争中发展党组织，使之能经受各种斗争的考验；3. 要健全支部，培养支部干部人才，使支部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为着斗争的需要，他还提议建立军事指挥机关，将“军委速急建立起来，以便指挥各县兵运，推动兵运工作（民团、土匪），使广大士兵群众到游击队中，以扩大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促成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些正确的批评意见，为鄂北革命重振旗鼓，描绘了一幅胜利的蓝图，对于巩固苏区、发展壮大党和红军的力量，提高领导机关的指挥艺术，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1930年7月10日，在程克绳指挥下，农民自卫团一举攻下隆兴寺、七方两团防局，四个团防头目有三个被击毙，一个被活捉。

10月上旬，鄂北、豫南两特委在河南邓县白落堰召开联席会议，合建鄂豫边特委，程克绳为执委。会上，还建立了政权组织和军事组织，程克绳任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17日，在枣阳蔡阳铺召集万人大会，欢庆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程克绳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发表就职演说，讲人民当家作主，讲扩大红军。在讲到土地分配时，他兴奋地说：“自从参加革命，我家的一切不再只属于我个人的。家里多出的耕地，由无地或少地的乡亲分种，就从我开头吧！”台下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

10月下旬，鉴于红军初创，成分复杂，又长期在外流动战斗，程克绳下令，调回红九军二十六师到古城整训，进行一月

的思想、军事和纪律教育。此间，挑选部分党员，去南阳杨虎城部教导队学习军事，为红军培养了一批中下层干部。

11月下旬，鄂豫边军委决定调遣红九军二十六师北征，辅以农民武装千余人，攻打唐河、桐柏、泌阳，欲开辟豫南苏区。程克绳召集红二十六师师、团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北上的进军路线和里应外合的部署。12月1日黎明，红军破城而入，活捉国民党唐河县长，缴枪300余枝，子弹无数，获战马70多匹。随即，唐河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①。

1931年春，国民党军队纠合各地民团，由洪湖向鄂北苏区“围剿”过来。3月，红二十六师在枣南山区彭冲与敌遭遇，师长赵莘仁牺牲。程克绳代理师长率队作战，经调整部署，战至天黑，终于冲上山头，击退敌人。

红军在向刘猴集（今属宜城）行进时，突遇国民党五十一师截击。双方战至深夜，红军才趁夜色转回苏区。但在途经枣西官庄集时，又遭敌四十八、五十一师重兵包围，红军遂被冲散。程克绳令余部潜散隐蔽，以保存有生力量^②。

4月，红三军北征鄂西北，敌主力急忙由苏区西调，以防堵红三军，从而减轻了对鄂豫边苏区的压力。程克绳等乘机活动，召集700余人，在襄阳陶山庙集中整编，红二十六师得以恢复发展。

①刘占彪：《回忆我参加红九军二十六师的战斗历程》，《襄樊党史通讯》1985年第2期；张显宗谈话记录，1982年11月，存枣阳市委党史办公室。

②徐光恩：《土地革命时期鄂北的武装斗争》，载于《鄂北星火》，1984年5月。

(六)

1931年9月，中共鄂豫边特委程克绳、陈雪怀赴上海找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完成任务后，程克绳于同年10月领着中央派遣的沈宗源、谭中余等六人，回到中共鄂豫边特委所在地南阳，并将从中央带回的两卷“白布”密件，转交给特委书记郝久亭。

沈宗源来后，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提出要“反对目前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要“改造鄂豫边区党的全盘工作”^①，从而全盘否定了程克绳等前段的工作。

11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央湘鄂西分局的复信中答复：“鄂豫边特委以后直接归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要求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开展内部肃反运动。从此，“左”倾错误在鄂豫边步步升级。

1932年2月，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改为临时省苏维埃政府，程克绳任委员。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之下，红军连连失利，临时省委书记沈宗源恐惧起来，转回中央。4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巡视员尉士筠到鄂豫边苏区直接领导肃反，声称要坚决“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在军事上，主张硬拚，不知迂回，固守苏区不离一步。6月，红军力量大量消耗，遂即溃败。

在这危难之际，程克绳挺身而出，召集失散红军100多人，撤至大洪山区，与钟祥一支游击队会合，扩充到300余人

^①《鄂豫边临时省委报告》，1932年3月18日。

枪，在张岗整编为鄂北游击队，程克绳任总指挥。不久，这支武装发展到500余人，骑兵五六十人。

8月底，程克绳率鄂北游击队至钟祥高集一带，恰遇“铲共团”团长汤天山带队向正在举行的中共钟祥县委扩大会议开会地点围攻。程克绳率队堵截，毙敌数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六枝，追敌十余里，使参加会议的全体干部得以安全转移。

9月7日，国民党十三师师长万耀武率三十七旅向钟祥长滩埠一带“进剿”。中共钟祥县委在商讨对策时，县委书记陈国华与程克绳意见相悖。程克绳主张流动游击，陈国华坚持要死打硬拚。傍晚，敌千余人袭来，程克绳再次提出转移，陈国华不予理会。次日凌晨，敌发起猛攻，游击队英勇抗击，伤亡很大。程克绳当机立断，下令边打边撤，退至客店坡附近的赵泉河，方摆脱险境^①。

9月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三军被迫撤离洪湖，转至襄北大洪山区。这时，程克绳调任中国工农红军襄北独立团参谋长。

此时，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又开始进行第二次“肃反”，大批斗争经验丰富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被加上“莫须有”罪名惨遭杀害。程克绳也未能幸免。他被戴上“反国际路线”、“一贯右倾逃跑”、“改组派”的帽子，于1932年秋末被杀害于大洪山区京(山)钟(祥)边境，时年39岁。

^①谢威谈话记录，1981年7月6日。

陈 明

陈仙海 赵 良

邱林忠 张兆声

(一)

陈明，学名若星，字少微，1902年3月生于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龙聚村。父亲陈庭佐，是位憨厚勤朴的农民，母亲郑连地，是个劳动妇女。陈明先后在本村私塾和白土桐岗小学读书，1917年考入龙岩城的省立第九中学。1921年毕业，执教于桐岗小学。在此期间，他与邓子恢、林仙亭、章独奇等30余人发起组织了“奇山书社”。1923年9月，又在“奇山书社”的基础上发起创办了以“改造旧社会，宣传新文化”为宗旨的《岩声》月刊，从1923年至1926年底，共出版了40多期，每期印数约1000余份，除在福建、江西、广东、台湾等12个省的35个县市发行外，还远销到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①。是一份有较大影响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进步刊物。陈明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曾在该刊发表过《催夫的一幕》、《狗世界》、《故乡》、《为党军入闽告吾岩父老兄弟》等文章，政治观点鲜明而富有文彩。

^① 《岩声报之过去与将来》，《岩声》月刊第12期。

1923年冬，陈明离开桐岗小学，到厦门《江声报》工作（后代理该报总编辑），为《岩声》月刊的编印发行提供了有利条件。翌年秋，应友人刘益士之邀，到南安斗南中学教书，向该校师生介绍新思潮，宣传新文化，同时兼任《岩声》、《江声报》记者，经常报道闽西南等地人民向旧势力作斗争，开展新文化运动的情况。

1925年6月间，共青团两广区委派蓝裕业到厦门，成立共青团厦门支部。其时，陈明已到厦门中山中学任教。他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与该校教务主任阮山等一起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26年1月初，陈明为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到上海大学社会系半工半读，并兼任厦门《江声报》驻沪特约专电通讯员^①。同年10月，由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张耘和李思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②。

1926年冬，陈明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广州，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任组织科长^③。他的《为党军入闽告吾岩父老兄弟》一文就是在东路军向福建进军途中写的。文章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支援北伐军。东路军占领福州后，他把一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推荐到各专区任政治监察署专员。

1927年1月底，陈明出任《福建评论》社社长兼情报股股长。他将该刊办成宣传革命理论，反击国民党右派言论，维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重要理论阵地^④。与此同时，他还积

①陈素民：《回忆陈明》；陈铁明1955年写的材料。

②陈明1936年在延安填的干部履历表。

③罗明：《关于福建早期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

④刘贯康：《中共福建省委的成立及组织演变情况》，福建《党史资料与研究》1982年第12期。

极协助中共福州市委书记徐琛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和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1927年4月3日和9日，福州、厦门的国民党右派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两地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陈明亦遭通缉。他化装成教员，辗转来到武汉，向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福建的情况。

(二)

1927年8月初，陈明和谢汉秋（又名谢景德）受命为中共中央福建省党务特派员，秘密回到厦门。陈明通过黄绿萍在鼓浪屿升祺山脚下租了栋房子，设立秘密联络站；然后与谢汉秋、邱泮林、曾宗乾（又名王德）等人分头寻找潜伏下来的同志，恢复各地党组织。同月中旬，他在南靖主持召开原闽南特委部分委员和南靖、漳州、平和等县负责人会议，决定重新成立中共闽南临时特委（辖闽南和闽西各县），陈明被选为书记^①。会议还决定在农村建立农民武装，开展减租减息和反抗烟苗捐的斗争，并准备举行武装暴动。会后，陈明从报上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消息，便在厦门秘密组织“福建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各地党组织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宣传“八一”起义的重要意义，广泛发动群众，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迎接起义部队来闽，并派罗明日夜兼程赶赴闽西，接应起义部队。

9月间，中共闽南临时特委接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决议和《告全体党员书》，陈明立即主持特委会议讨论贯彻。特委

^① 《中共闽南特委明祥报告》（1927年10月10日）。

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组织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认为目前举行暴动，“在闽南的客观条件，尚未具备。”^①在闽南应是：“1. 整理原有之支部；2. 扩大支部之组织，特别是工农群众方面；3. 加强训练宣传，检阅党的自身力量；4. 积极组织农协及武装（最近几用全力于农运）；5. 左派民校运动秘密组织国民党，扩大我们的活动；6. A. 收编散军民团，造成自身力量；B. 联合会匪散军、民军，使之成为我们的同盟者，联合民军使对贺叶军事取中立。”^②

中共闽南临时特委在陈明主持下，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龙岩、永定、上杭、平和、漳浦、同安、海澄等县农会会员发展到10万余人，并普遍开展了减租、反抗烟苗捐、反抗国民党军队拉夫派款等斗争，形成了土地革命时期福建省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浪潮。

10月初，陈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党中央认为福建已基本上具备成立临时省委条件，命令他回闽负责召集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明回闽后，根据中共中央10月15日来信精神，于11月21日在厦门召集中共闽南、闽北临时特委联席会议，决定于12月初召开各地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成立临时省委的问题。12月4日，中共闽南、闽北临时特委联席会议，由陈明主持在漳州召开。陈明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政治任务》的报告。会议作出《目前政治决议案》，通过《福建政治现状及目前工作大纲》，确定了福建当前的斗争任务与策略，提出了“在农村应由抗捐抗税，进而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

①②《中共闽南特委明祥报告》（1927年10月10日）。

的斗争方针。会议决定，为统一全省党的领导，宣布取消闽南、闽北临时特委，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选举陈明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

临时省委成立后，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进展很快，到12月底，全省恢复和建立了福州、厦门两个市委，龙岩、永定、平和、建瓯、漳州五个县委，武平、南靖、仙游、德化四个特支，并积极筹建崇安、上杭、永春、莆田、惠安、同安、海澄、漳浦等八个县委，全省党员达400余人^①。同时还成立了共青团福建省委，在11个县市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团员由30余人发展到200余人^②。

1928年1月10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厦门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在陈明主持下，会议分析了各地的革命斗争形势，确定了当前主要斗争任务是：“健全和扩大党组织；领导农民由减租抗捐斗争发展为武装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加强领导城市工人斗争，由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直至暴动夺取政权。”^③21日，陈明又主持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决定：

“各地党组织毫无迟疑地领导群众举行武装暴动，以革命的战争消灭国民党的军阀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④

会议结束后，临时省委接到中央1月28日关于不同意目前在闽南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信。2月10日，临时省委又召

①② 《陈少微关于福建组织情况的口头报告》（1927年12月）。

③ 《福建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一）——目前政治环境及临委紧急会议经过》（1928年1月28日）。

④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对福建时局宣言》（1928年1月28日）。

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中央指示，通过了《福建目前政治状况及党的工作方针》的决定，停止执行武装暴动的计划，确定今后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闽南，全省工作的中心是福、厦、漳、泉等重要城市，并改选临时省委，陈明被免去省委书记的职务。但是，一些农民运动发展迅速的地区，自1927年秋冬以来，阶级斗争激化，敌我双方形成剑拔弩张，农民运动逐渐由小规模武装冲突酿成一触即发的武装暴动的形势。从1928年3月初开始，龙岩、平和、上杭、永定等地农民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爆发了一系列武装暴动，从而把福建省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中央和新临时省委立即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及时领导了这场威震八闽的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实践证明陈明的意见是对的，但是陈明党性很强，他虽蒙受委屈，但始终没有任何怨言，仍服从新省委的领导，积极工作。

(三)

1928年4月间，陈明奉命在漳州进行革命活动时，不幸被捕。驻漳州的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采取各种办法，企图引诱陈明叛变革命，均遭陈明坚决拒绝。张贞又利用叛徒张余生与陈明是同乡旧友的关系去劝降。陈明将计就计，以身体不适，要张设法找一个僻静地方。张余生误以为陈明已有所悔悟，便把他转押到一所较安静的平房里。9月22日晚，陈明趁守卫人员熟睡时，用棉花蘸火酒将屋顶的角板烧毁，然后扒开瓦片逃出，在漳州黄时甫律师（龙岩人）家躲了两天后，又到厦门一位朋友家里藏着。后经石码联络站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经省委和中共中央审查后，决定派他去苏联东方大学学

习^①。

1929年1月，陈明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政治理论，1931年冬回国，经上海至厦门。1932年春夏间，中共厦门市委得知毛泽东将率领红军东路军一、五军团东征漳州，便派陈明到漳州协助工作。6月下旬，陈明随红军到闽西，任福建省军区政治处宣传部部长^②。

1933年冬，陈明调任中央苏区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③。中共中央决定在红军大学中增设一个高级班，请一些政治军事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去讲课。陈明和邓小平（总政治部秘书长）都被请去当教官^④。为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他到江西的于都、会昌、兴国及福建的长汀、上杭等地作社会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充实教学内容，对学员的帮助很大。

1934年5月，陈明任独立师政委，带领部队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同年10月，陈明随中央红军长征，在中央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即中央纵队干部团）负责政治理论和文化教育课，以后担任训练科长。在长征途中，陈明利用战斗间隙，向同志们宣传十月革命经验和苏联红军英勇战斗的事迹，以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得到同志们的好评^⑤。陈明还在艰难的行军路上，坚持教同志们学文化。他在战士们的背布包上写着“红军”、“苏维埃”等字，边行军，边讲课。

①1928年9月上海《申报》，访问马宁谈话记录；《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2月25日）。

②③陈明1936年在延安填的干部履历表。

④访问老红军王培臣谈话记录（1985年6月）。

⑤莫文骅致陈明传组编写同志的信（1986年6月16日）。

(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1月，陈明到瓦窑堡中央党校任教。1936年6月，红军大学开办，陈明又被调到红军大学高级科担任军事、政治教学工作，后任校教导师训练部长。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明任总部随营学校政委。1938年10月，又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长。1939年春，陈明随一一五师挺进山东，仍任政治处宣传部长。这年下半年，陈明调任苏鲁豫皖运南支队政治委员。

1939年冬，陈明由硝烟弥漫的鲁南战场来到沂蒙山区，担任中共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副校长。

1940年春夏之际，陈明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府工作部长，省宪政促进会常务委员。3月4日，陈明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宪政运动与群众运动》一文，阐明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来参加管理国家大事的道理。接着，陈明着手领导起草《县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草案》，规定县参议会成员，必须由抗日民主党派、工农青妇各人民团体、知名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民族代表所组成。4月1日，沂水县参议会在陈明的具体指导之下正式成立，选出群众信赖的能真正领导抗日的江海涛为县长的县政委员会，为全省树立了榜样。接着，各地政权便迅速地建立起来。据6月底统计，冀鲁边、鲁西、鲁南、鲁西南等地，已建立9个专区59县的民主政权。

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人民代表首届联合会在沂南隆重举行，成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陈明当选为省战工

会副组长兼秘书长。9月13日至11月13日；山东省战工委召开山东省第一次行政会议，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作政治报告，陈明作政府工作报告。陈明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肃清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他说，假如各地政权工作同志，不能将现有政权工作中严重存在与滋长着的官僚作风废弃肃清，创造新的抗日民主政权的作风，那么一切工作的转变和发展，是无从谈起的。我们要创造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就应下决心，把几千年来旧的腐朽的官僚主义作风完全抛弃，而创造新民主主义的抗日、民主、廉洁奉公的新作风。他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深入民众，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并规定县长每月至少要深入检查一个区的工作。

经过会议精神的贯彻，山东各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发展。据1940年底的统计，山东省已建立了6个战略区，90多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兴起了紧张工作，刻苦学习，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

1941年3月23日，山东省参议会召开第八次会议，通过加强省战工会工作的决议，并选出黎玉、陈明等为省战工会常务委员，黎玉为主任，陈明为副主任兼秘书长。同年7月7日，陈明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响应中共山东分局的号召，猛烈开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十项建设运动》一文，系统总结了一年来的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成绩、弱点，提出了新的任务。是年冬，陈明主持研究编写《山东省公安局暂行条例》、《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公平负担暂行办法》等，为山东的抗日政权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三八”妇女节，陈明与山东纵队姐妹剧团团长辛锐在沂南县青驼寺结婚。

1941年冬，日伪军集结5万余兵力，由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指挥，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实行拉网大“扫荡”，合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委等领导机关。罗荣桓、朱瑞、黎玉、陈明等决定指挥各机关，运用“翻边战术”，分路突围。陈明负责指挥山东省战工委及抗大一分校等单位突围。当机关由沂南县和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向外转移到大谷台时，遭到日伪军合击。时值拂晓，日军已发现我军是机关和后方辎重。当时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刚从胶东运来一批北海币、金条、金砖，财经部门动员机关干部随身携带转移。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陈明下令一律往望海楼方向撤出，他自己率领部分人员掩护机关撤退，激战竟日。当陈明突围时，四个随身人员不幸牺牲了三个，剩下一个十几岁的警卫员吴开玉。当陈明突围到东蒙山和西蒙山之间的大沙河沟崖上，被日军的重机枪交叉火力击中双腿，沟有一米之深，上不去，下不来。小吴要背他走，他却命令道：“你快跑开，活一个算一个，反正我不能跑了。”这时，抗大一分校得到省机关遇险的消息，派出几个学生梯队前来抢救陈明，第一批牺牲了，第二批又冲上去，但还没接近陈明隐蔽的沟里，日伪军已逼近陈明，负重伤的陈明眼看有被俘的可能，便当机立断地用仅存的四发子弹，打死了三个鬼子，然后留下一发子弹，枪口对着自己，为国捐躯，年仅39岁。

辛锐在大青山战斗中也不幸身负重伤，被抬到费北火红峪山洞养伤。此时她还不知陈明已壮烈牺牲，正惦念着自己的亲人，当同志们要用担架抬她转移时，日军已搜索到山洞跟前。她勇敢地从袋子里摸出几个手榴弹，用嘴咬开手榴弹拉线，炸死了几个鬼子，而她也血染沂蒙，壮烈牺牲，年仅24

岁。

1985年冬，陈明、辛锐两烈士的遗骨，由沂南县革命烈士公墓移葬至临沂地区革命烈士陵园。国务委员谷牧题写了墓碑；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为烈士墓题词：“学习陈明同志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1936年7月陈明在延安填的干部履历表。
2. 《岩声》月刊（1923—1926）、《大众日报》（1939—1941）。
3.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4. 邓子恢：《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5. 访问罗明、王德、莫文骅、黎玉、郭化若、林海云、曹菊如、陈仁祺、张格心、欧阳平、辛颖、黄绿萍、王培臣、宋诚德、徐兴沛、苏静、陈庆隆、罗秋天、周仁、郑日晖、张华南、马宁、廖昌泰、张龙地、陈清江、陈铁城、连洛珊、林江秋、陈素民、陈荣华等的记录。

吴 德 峰

中共保康县委党史办公室 柳希荣执笔

寻求真理 为了救国救民

吴德峰，又名士崇，曾用吴铁铮、戚元道化名，湖北省保康县百峰乡石磐岭人。1896年6月21日出生在一户官宦之家。1909年随父去武昌，在湖北官立两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参加过学生军。1914年，他考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冬，吴德峰被录用为湖北省长公署第一科机要股科员。这一期间，经朋友介绍，他常去利群书社阅读《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并购回《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提供他人阅读。他这种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的积极性，受到董必武、陈潭秋的赏识，于1921年推荐他担任了中共组织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1922年，他兼任湖北第一师范附小校监，并当选为湖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兼义务教育股主任。1924年2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在中共武汉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并任湖北师范学会会长。按照中共组织的决定，他负责女师的学生运动工作，曾多次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到教育厅请愿。

1925年,吴德峰的继母龚老夫人变卖首饰,为他筹措了700多串钱的经费,支持他在武昌黄土坡(现首义路)鄂园对面一栋楼房(吴家产业)开办崇实中学^①。他自任校长,并聘请蔡以忱任训育主任,费侃如任教务主任。教员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或其他比较进步的人士。陈潭秋在该校讲授过《资本主义入门》课。当时武汉地区所有革命力量都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而崇实中学成了这种团结的重要场合。

1925年,武汉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加薪改现运动,吴德峰被推选为请愿代表团代表。他面对省督军肖耀南,陈述教职员工痛苦生活和要求,并质问肖耀南为什么要准备逮捕他本人,使肖耀南无言对答,不得不接受请愿团的要求。

吴德峰在崇实中学主持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每周开会一次,参加最多的是湖北省女子师范的学生。很多学生受读书会影响,走上革命道路。他和夫人戚元德就是这期间由陈潭秋夫妇介绍相识建立恋爱关系的。

1925年夏,根据中共的决定,吴德峰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先后兼任工人部部长、军事部部长、商民部部长等职。9月7日,武汉三镇召开声讨英兵屠杀武汉工人罪行大会,他是汉口会场的负责人,组织和领导了26万群众的游行,有力地扩大了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广泛影响。

1926年北伐时,吴德峰在崇实中学办了一个北伐宣传训练班,并派学员南下,深入城乡基层,宣传发动工农群众支持

^①何诰、农永青,《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楚晖》第3期。

北伐战争。北伐军光复武汉后，中国共产党为培养干部，开办一所由钱亦石任校长的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吴德峰除去这所党校任教员外，还主办一处农民自卫军干部养成所，从事党的干部培训工作。

1926年冬，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吴德峰当选为省委委员兼军委常委。后经邓演达推荐，又担任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局长^①。为了广泛地团结国民党左派，实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他经常到武昌青石桥3号与董必武、陈潭秋、钱亦石商讨工作。

1927年，英帝国主义在汉口制造了“一·三”惨案，吴德峰代表省党部冒雨到汉口济生三马路参加30万人的反英示威大会，并在会上揭露英帝国主义制造惨案的真相及其一系列敌视中国人民的罪行。大会通过了对英交涉的八项条件和其它坚持斗争的各项要求。会后举行了反英游行示威，驱逐英巡捕并占领了英租界^②。

为了反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武汉市党、政、军及革命群众在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吴德峰积极参加了这些集会^③。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底在武昌都府堤召开时，他利用公安局局长的身分，对这次大会的保卫工作进行了精心安排和周密布置。与此同时，他还转移和营救了不在武汉活动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④。

①吴德峰填写的《干部履历表》（1963年）。

②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

③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武汉市工人运动史》。

④黄火青：《吴德峰同志营救我们脱险》，《春秋》1988年第3期。

“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吴德峰被视为国民党左派而置于剪除之列，只是因他手中还掌握一支武装，才不敢立即下手。直到“清党”事起，才对他设下“明日提拔，实则除掉”的圈套。他识破这一阴谋，决定要走的大方，走的光明。他利用新旧局长交接之际，曾发动组织了一次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会上，他重申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等政治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罪恶阴谋，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等口号，然后在一片锣鼓喧天和“欢送吴局长荣升”的气氛中，先回到家里，再在戚元德的协助接应下，安全转入王惠文、胡文裕夫妇的家，后来又用戚元道化名隐居戚家。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任命吴德峰担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中共鄂南地区特委书记，组织领导鄂南暴动。他深入发动群众，很快组织了近10万人的农民军和自卫队，以咸宁、蒲圻为中心，活动于崇阳、通山、嘉鱼等县。自卫军声势浩大，有檀木土炮数十门，步枪二三百支。但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的干扰，农军被迫分散转移，最后导致暴动失败，使革命转入低潮。这时，他回到武汉，为了救国救民，继续踏上艰苦的革命征程。

秘密交通 甘当无名英雄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吴德峰被调任中共赣西南和赣北特委书记。1928年春末，由于中共江西省委事故波及赣北，他果断地将特委有关人员转移后，同夫人戚元德住进江边一家小客店里，并向武汉继母发出“儿病危盼母速来”的电报。龚老夫人知他遇到困难，马上筹集一笔费用赶至九

江，随同儿子、媳妇一道前往上海。几经周折，才在上海“大世界”见到了聂荣臻，与党接上了关系。

1928年夏，中共河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恢复组织，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于8月派吴德峰去河南任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协助省委书记张景增（外号张和尚）重建党的组织^①。他接到命令后，急如星火，立即和戚元德带着未满月的孩子一起去开封。到河南后，他利用当时在河南国民党军队任职的堂弟吴士特的关系为掩护，先站住了脚，以后即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河南、山东同志，组织特科“打狗队”，专门惩办那帮为虎作伥杀害革命同志的叛徒、特务。经过四个月的努力，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河南中共组织基本恢复，工作又走上了正轨。不久，他从吴士特那里得知，原在武汉他手下任职的侯某被国民党派来开封。侯的到来对他的工作很不利，为此，党组织立即决定要他返回上海，由戚元德带着孩子留守机关，处理好善后工作。然后戚也于1929年初平安返回上海^②。

1929年1月，吴德峰受命组建中央交通局，并担任局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这时，他们夫妇以闲居上海的面貌出现，其实是掌握着一条通向全国以至国外的秘密交通总干线。每一位同志来上海和中共中央联系，每一件情报和机密文件的传递，每一项重要物品的输送，都要经过他具体组织和部署，甚至亲自执行，以确保工作的安全。他根据多年的秘密工作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当时情况的秘密工作纪律、原则和方法，为完成一项又一项的艰巨任务，为掩

①②郭述申：《我同吴德峰同志的几次接触》。

护输送国内外革命同志进出国统区，为安置与接待党的干部，做出了不少贡献。如黄火青、伍修权等从苏联回来，都是在上海通过他接上关系，并由他派人护送到苏区的①。

1930年前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经费比较困难，在苏区打土豪没收来的黄金又运不出来。为此，党组织决定由吴德峰亲自去鄂东苏区取一批数额较大的黄金，并商讨有关工作。在特委书记胡梓的协助下，他将金条卡进特制的“子弹袋”里，全部安全带到上海。后来周恩来称赞他是“胆大心细，对党忠诚，是党可信赖的好同志。”②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苏区中央局，将白区干部输送到苏区工作。1931年3—4月间，王首道、周恩来、黄火青等先后分三批由上海坐船去武汉，预定通过设在汉口一码头背后摆小摊的秘密交通转往湖南株洲，进入革命根据地。就在周恩来、王首道已经从上海出发，黄火青坐的船正要开航时，吴德峰得知武汉出了叛徒，汉口一码头交通点遭到敌人的破坏。他当机立断，精确计算了三人行船的时间，立即派戚元德、肖桂昌和贺步青，分别到九江、南京和汉口码头上接回了王首道、周恩来、黄火青，及时消除了这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事故③。特别是4月2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具体工作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重大事故发生后，吴德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应付工作，保护了中共上海组织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安全。正由于他的努力，在当时白色恐怖异常严

①伍修权：《与吴德峰同志的交往》。

②黄火青：《吴德峰同志营救我们脱险》。

重的上海，秘密情报交通工作从未出现过问题，而且能一次又一次地完成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同志们称他为无名英雄，应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

满怀豪情 参加万里长征

吴德峰为人耿直，坚持党性原则，曾多次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斗争。1931年，他遭到王明等人的打击排斥，于同年秋离开上海进入江西苏区，先后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分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为了纠正原保卫局在肃反中搞过扩大化的错误，他首先抓机关的整顿工作，亲自挑选人员，培训保卫干部，很快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并亲自起草颁发了一系列制止刑讯逼供、乱抓、乱杀人的通告训令，为保卫工作，特别是为部队的政治保卫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①，为党培养出一批勇敢、忠诚的政治保卫干部。

1934年8月，吴德峰偕戚元德随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先遣部队突围西征。在湖南桂东地区，他不幸从山上跌下山谷，摔断了肋骨。但他仍坚持工作，并用自己的医学知识，采用草药、土方为战士治病。1934年12月，他任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保卫局局长，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肃反委员会主席^②。

吴德峰做肃反工作，不仅善于坚持党的政策，而且能教育

①王震、肖克、黄火星、郭述申、袁任远：《怀念无名英雄吴德峰同志》。

②吴德峰填写的《干部履历表》（1963年）。

团结一切同情革命的非敌对分子，使之为革命做些贡献。如1935年6月中旬，红军在湖南中堡地区战斗中，俘获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不久，又拘禁了两名外国“牧师”，都交给保卫局处置时，他亲自找他们交谈，宣传共产党的政治观点，并派吴志坚、贺传志等在生活上对他们给予照顾，消除他们的顾虑，使他们开始由害怕、不服气到以后对共产党表示相信和佩服。张振汉在长征途中还当上了红军学校的教官，积极参加抗日，外国牧师还为红军笔译法文地图，承认中国工农红军是有信仰、有宗旨的军队，并称吴德峰夫人戚元德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了第二次长征，依战略方针退至湘中，向湘黔边迅速转移。1936年7月3日，吴德峰调到西北中央局白区工作部工作。在这里，他曾教育好被俘的国民党电台人员王教言，为红军截获不少国民党军事机要电报，给红军提供了可靠情报。这期间，又因他曾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而受到打击。过岷山不久，张国焘企图借刀杀人，要他去收编土匪队伍，组织什么“抗日救国军”。当时，那一带土匪很多，经常骚扰红军驻地。红军一打，他们便投降，红军一走，他们就哗变，没有任何政治基础。他和戚元德带着几个随从人员来到土匪部队开展工作。有次，土匪摆下“鸿门宴”，想夺枪哗变，但看到他早有准备，不好下手，只好拖着队伍跑了。可他回到西北局后，张国焘竟以“丢失部队”罪名要处罚他，甚至扬言要杀他。在朱德、任弼时的坚决阻止下，张的阴谋才未得逞^①。

^① 《王震同志谈吴德峰、戚元德》、罗青长：《深切怀念吴德峰同志》，（《襄樊党史通讯》1987年第4期、1988第1期。）

吴德峰在长征途中一直坚持写日记。他的《第二次长征日记》，从1935年11月19日开始，到1936年12月1日截止，写了233天的事情，记载的大小地名有357处。现摘录几节日记如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王家湾出发，经张家湾时，三架国民党飞机轮番轰炸，周玉朱同志在浮桥牺牲，是日行程二十五里，夜一时在八都坪宿营。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朱总同四方面军负责人到普玉龙检阅部队。尔后是保卫局准备的饭。张国焘、陈昌浩等同志回□，朱总、伯承等同志留下，晚上在保卫局楼上谈一、四方面□□问题。我听了之后，恨张的反党……

七月一日，陈□□谈行军途程和装备，涉及一、四方面（军）问题的争论。王震起来制（止），子意和我支持王。

八月十二日，继续前进，经石门万险时，均是在两岸绝崖上所架的天桥上通过，三座天桥以第二桥为绝险，一、二桥均已腐朽，人马过时异常战战兢兢。日行程六十里，夜宿莫茅寺。

十一月二日，从赶口出发，张国焘挑起了四方面

军干部斗一方面军干部，我认为一方面军的行动没有错，周□□要打我，陈□□制止。

三日，到同心城与任、贺、关见面，谈及张的罪恶。

十七日，由洪德城出发，夜宿黄窑湾，是日早到省委，与李富春等会见，畅谈甚欢。

这几节日记虽然简单，但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党的坚贞，对张国焘分裂党的痛恨，以及他对革命充满必胜信心。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肖克、张子意、廖承志、袁任远等结成的战斗友谊。

运筹帷幄 建立卓著功绩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决定派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吴德峰率领一批干部深入虎穴，守卫陕甘宁边区的门户——西安。

吴德峰到西安后化名吴铁铮，以《工商日报》记者的身分住进兴隆巷内的四合院，开始从事秘密工作。他的夫人戚元德的公开身分是竞存中学教员。他常给一起去西安的同志讲城市生活的经验和秘密工作的方法，向他们介绍社会各阶层情况，教他们如何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应付各种事态的变化。有次，有位刚从苏联回国的机要员到“鬼市”买来一双价钱便宜

的皮鞋，结果穿了两三天鞋底就掉了，原来是用高丽纸做的。他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这位机要员：“你穿长袍戴礼帽跑到‘鬼市’买皮鞋，人家一看就知道你不懂行，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今后办什么事要慎重，可不能莽撞！”一天，他叫这位机要员把密码藏起让他找，连续四次都被找了出来。机要员有点不服气，要求再来一次。机要员经过大半夜的精心设计，将密码放在门边的一块方砖下，又用干灰将砖缝扫平。第二天，吴德峰虽经过一番仔细观察才找出来，但他高兴地肯定了机要员会动脑筋的作法。后来军警每次检查，都没能把这个密码本搜走^①。

1938年底，由于国民党的公开反共，西安成了国民党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基地和特务基地，顽我斗争最为尖锐。为了做好地下工作，吴德峰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的紧密配合下，一面依靠党的忠诚分子，一面团结革命同情者，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开展对敌斗争，及时准确地向中央提供各种情报。

吴德峰为了接触西安各阶层人物，他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和国民党军、政、党、特的一切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因此，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沉着冷静头脑，善于应付。比如，他将情报机关设在曹家巷12号，与隔壁13号住的国民党十一战区政治部主任搭邻。有的同志很紧张，但他处之坦然，并对大家讲“灯下黑”的道理，因为利用敌特作保护伞，倒显得更加安全可靠。又有一次，他在大白天被军统特务盯上，而且已经走进曹家巷胡同口。他灵机一动，径直朝隔壁13号走

^①于忠友：《卓绝的胆略，难忘的教诲》，《襄樊党史通讯》1988年第1期。

去，门铃响后，还热情地同开门的人对话。特务一看，以为他是自己人，就放心走开了。还有一次，他带着一个机要员外出，手提箱内有一份秘密文件，忽然发现在前面路口设有“抄把子”的关卡。他走进一家书店，打开箱子取钱，顺手将文件夹在新买来的书中。然后走近“卡子”，若无其事地将手中的书举过头顶，伸开两臂让宪兵检查，结果一无所得，宪兵只好放行。

在对敌斗争中，吴德峰还有许多分化瓦解的办法。有次，他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时，发现经常有一个操着东北口音，伪装成黄包车夫的特务等着盯梢。于是想出了一个“点子”，叫办事处的人抬出两个装有大石头的木制箱子，喊这个特务装在车上，并派人押车围着西安“游行”，累得特务汗流浹背，在一个小胡同里，特务说了实话，并表示以后再不找先生的麻烦。西安办事处门口还经常有个摆香烟摊的特务，他就叫办事处的人拿着没装胶卷的照相机，对着这个卖香烟的特务咔咔拍照，三照两照，就把他给“照”跑了。

吴德峰先后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三十三军高级参议等身分活动在西安。他将社会调查到的详细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真实可靠地反映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工作人员的状况，并将这个材料送报毛泽东。毛泽东还找他进行了详谈，深表赞许，为以后中共中央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依据。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对他在西安地区的秘密情报工作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以后要发勋章，首先该发给他们^①。

^①王震、肖克、黄火青、郭述申、袁任远：《怀念无名英雄——吴德峰同志》。

立党为公 不计个人得失

1940年，吴德峰继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1945年4月在延安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在重庆订立停战协定，后由中国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三方在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吴德峰受命任执行部秘书、武汉军事调处执行小组顾问。同年3月和5月，他两次去武汉调处，曾多次截获国民党破坏和谈，向解放军进攻等重要情报，揭穿国民党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从武汉返回张家口后，他调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部长。1947年秋，吴德峰到阜平县领导土改工作，兼任中共阜平县委书记。1948年11月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

1949年5月16日，武汉三镇被人民解放军占领。5月24日，吴德峰被任命武汉市第一任市长。当时，武汉工厂、作坊几乎全部停产，交通严重破坏，城乡隔绝，市场萧条，物价飞涨。敌特扬言不出二三个月，就要把共产党从武汉赶出去，并阴谋在新生花园集会时暗杀吴德峰（未得逞）。面对上述情况，他在就职当天，就到青年剧院（今市政府礼堂）召集旧市政府及其所属各局科长以上旧职人员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解除了他们的悲观情绪，鼓起了他们重新工作的勇气。6月9日下午，他在军管会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指出，建设新武汉已经成为武汉市各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各界人士的中心任务。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允许私人的资本存在与发展，保护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雇佣。这样以来，调

动了工商界的积极性，很快使武汉的经济得到了恢复，物价得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

吴德峰还经常深入基层，找群众谈心，听取工人代表的意见和建议。9月5日，在武汉各界代表大会上，他提出全市工作千头万绪，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现有工业，发展商业，解决好劳资、税收等有关问题。他希望到会代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定要把武汉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江城。为了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他和市政府其他同志商量，在市政府设立一个“市长信箱”，以此与全市广大群众取得经常性的联系。在物价问题上，他首先抓了粮食问题，通过中央从根据地运进大批粮食，同时通过税收、贷款等经济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奸商猖獗活动，一下子将物价稳定住。在市政建设问题上，他首先考虑的是抢修武汉市内长江两岸的堤防。他说：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新的革命政权，必须认真做好防汛工作。他曾亲自率领防汛军民上堤，抢修张公堤以及武泰闸、金银潭、堤角和易家墩一带的堤防，防止了水患，确保了江城的安全。

武汉解放不久，汉口重划区（即黄陂街）发生了大火灾，毁房2900栋，烧死17人，受灾居民达3300多户，1万多人。吴德峰及时成立火灾善后处理委员会，带领各机关团体代表赶到灾区慰问，发动武汉全市人民捐款捐物支援灾区，拨发救济米2万多斤解决灾民生活问题，拿出款项给受灾群众重建家园。同时，责成公安局组织力量，调查起火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此后，他经常到重划区看望受灾的居民，关心他们的生活。重划区一位受灾老大娘拉着他的手说：“我活了70岁，没见过像你这样好的市长，你是我们的贴心人呐。”他对激动得两眼闪着泪花的老人亲切地说：“老人家，莫夸我，应该感谢共产

党，感谢毛主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吴德峰组织全市人民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活动，派出医疗队、运输队、慰问团到朝鲜去，亲自动员儿子和外甥卅生、中生、汉堡、瑞士四人参加志愿军和军事干校。1951年1月21日，在欢送青年参加军事干校的会上，他欣然挥笔题词：“青年工人参加人民解放军各种军事干部学校，这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学习与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知识和技术也具有优越的条件，练好本领，在战斗中英勇杀敌！”

吴德峰立党为公，不徇私情。任武汉市长不久，他继母的一个侄子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他对前来求情的亲戚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如果你们为人民做过好事，人民就会感谢你们，你儿子是你儿子问题，相信党会给你们出路的。”他的胞弟吴士悉在解放初曾为地方政府做了瓦解土匪的工作。1949年秋，吴士悉带着地方及（襄阳军分区）张廷发司令员亲笔信来到武汉找他，由组织部门安排到财贸干校学习（审查）。镇反时，当地反映吴士悉有罪恶，派人将其抓回保康县镇压。他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从不过问，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2年4月，吴德峰因“纪凯夫事件”而错误地受到处分。尽管这件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未和他本人谈话，也未经基层支部和党委讨论。在会上宣布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两级的处分决定，并要他上台表态时，他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共产党的威信，当时没有作任何申辩，很冷静地说：“我受党的教育多年，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接受组织对我的处分。”本来鸦雀无声的会场，顿时出现一片抽泣声，甚至有些同志忍

不住哭出声来。会议结束后，他当即辞去了警卫员和小汽车，在他从市政府步行回家的路上，沿路一些同志和三轮车跟在他的后面，坚持要送他回家，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但我受处分应该像个受处分的样子。请你们放心，我会正确对待这件事情，你们跟着我，影响也不好。”事后，他的秘书要找领导申述。他也严肃地批评这位秘书：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要无条件服从党，服从党的利益。现在党需要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即便是党对我的处分有委屈的地方，我需要申诉也等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是清理党组文件，准备移交给李先念同志。

吴德峰被撤职的消息，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但他不因此而感到气馁，产生不满情绪，相反继续努力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当组织上提出要他到“三反”、“五反”办公室临时帮助工作时，他毅然服从。每天由六合路步行到德明饭店去上班，工作仍是一如既往的认真负责，充分显示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经中共中央审查，后来取消了对吴德峰这一错误处分，但对取消处分一事却悄然无闻，不少老同志为此鸣不平。有的同志说：“吴老！你受这么大的委屈怎么一点反应就没有，要是我非闹他个天翻地覆不可，在什么范围内公布处分，就应当在什么范围内公布撤销……”而他却说：那有什么好处，只要对党有利，我个人的得失算得了什么。抛开个人利益来看当时这件事在国内外的影响，使人感到欣慰，它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廉洁，使党在人民的心目中威望更高，即使我个人受了委屈，也不能让母亲给自己的儿子作检讨啊！

自1952年到1954年9月，吴德峰担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

政法委秘书长、副主任，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职务高与低，他从不计较，时时、事事以大局为重，以革命事业为重，坚贞不渝地为党工作。

清廉刚正 保持革命晚节

1954年10月，吴德峰调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会长。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1960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这时，他的年事已高，仍埋头钻研政法，孜孜不倦地博览古今中外法律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时，他主持编写了《宪法讲话》。他廉洁奉公，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以谋私。他过去的一位勤务员说：“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在他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都遭到他的拒绝，并深情地对这些同志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要严格的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把党的原则当儿戏！”

吴德峰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特殊规定，要他们自己洗衣服，搞卫生，严禁孩子坐他的小汽车。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说：“你们的一切应该由党来安排，党的需要就是你们的第一志愿，你们应该到基层锻炼。”他的大儿子武汉大学毕业后，本来可以照顾爱人关系，留在内地大城市工作，而他们夫妇却

鼓励孩子到新疆支边。二儿子航空学院毕业后，他们夫妇又劝孩子到工厂去做实际工作，不要留在北京。大女儿岷生大学毕业后，为了不影响岷生爱人的工作，还是让她去了山西临汾。最小的女儿持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1969年，他们夫妇又积极支持女儿参加三线建设，直到他们夫妇病危住院，家中无人照顾，在组织的关怀下才调回北京。

吴德峰严守党和国家机密。“文化大革命”中，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有人追逼他交待过去工作的机密时，他一口回绝说：“我不记得了，根据组织原则，我离开原工作岗位的那一天就全部忘掉了。”任人再打、再骂、罚跪、污辱，他都始终缄默不语。

当周恩来从王震、罗青长等报告中得知吴德峰在病危的情况下仍遭受残酷折磨时，立即打电话通知医院全力抢救。1969年5月1日，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他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立即指示：“吴德峰是一个好同志，一定要‘解放’。”^①他刚解放不久，在一次天安门大型集会上，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要交好革命班，把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②

吴德峰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要相信党的政策，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革命立场。当他得知一些老同志被抓、被害，其子女受牵连，生活无着落，有时甚至流落街头时，更是坐卧不安，总怕这些孩子受冻挨饿或被坏人引上歧途，派人为他们送钱、送粮票，并将这些孩子找回自己家中，语重心长的叮嘱他们要相信

^{①②}《王震同志谈吴德峰、戚元德》，《襄樊党史通讯》1987年第4期。

党，相信自己的父母不是坏人，在逆境中不能自暴自弃。不能感情用事，不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同时，他还冒着风险为错定为“叛徒”、“特务”的同志作证，证明他们是为党工作的无名英雄和革命同志。他始终坚信任何黑暗到头来必将为光明所代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宽广胸怀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一直同“四人帮”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

由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吴德峰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于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医院逝世。

朱理治

陈 牧 张文杰

朱理治是知识分子出身并受过长期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也是精通财经工作的党内专家。他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及宣传、组织、军事政治、外事、金融、物资、交通、经济计划等多方面的工作。历任党、团、军队和政府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直到1978年4月9日因病去世。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朱理治原名朱铭勋（参加革命后改名为理治），还用过王志、大朱、远祖、玉苔、王刚、黄岗、李迅、朱煌岗等化名，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7月25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余西镇。其曾祖、祖父、父亲三代行医。父亲朱作舟，是当地著名的中医。全家主要靠行医维持生活。朱理治自小天资聪颖，故得私塾老师竭力推荐，由有钱的族叔供他上学。在通州师范第一附小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使好学多思的朱理治受到了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洗礼。

1922年，朱理治考入江苏省立第七中学。他发奋求知，天

天亮就起床温习功课，夜自习后，仍伏案灯下，勤奋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中学时期8个学期的考试，分数都是全班第一。为此，他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和校方的奖励。1925年爆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南通引起了很大震动。朱理治和班上的进步同学一起走向街头，走向农村，高呼反帝口号，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向人民群众宣传爱国道理。为了表明他的一片爱国热忱，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慕飞，决心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激励自己在爱国斗争中奋勇向前。

1926年，朱理治读完高二即以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当时，清华大学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在李大钊、陈毅的指导关怀下，已有很大发展。这一年年底，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清华支部，党员30多人。在这个环境里，朱理治思想上产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为了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他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费边主义，国家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曾国藩的文集、家书……几乎翻遍了古今中外各派学说，但是越看越茫无头绪。这时，与他同住一室的同班同学、共产党员余冠英，向他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蔡和森写的《社会进化史》，以及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ABC》等书。他如饥似渴，一看就入了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使朱理治确信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是真理，并表示只要是真理，他就愿意为之奋斗到底，贡献自己的一生。1927年4月，经余冠英介绍，朱理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挫折，都没有丝毫改变过这一信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北

方。奉系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屠杀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刚刚入党的朱理治，坚定勇敢地迎接了这场斗争，不久被选为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八七”会议后，蔡和森来北京，在燕京大学宿舍楼的楼顶上，召集北京的党员积极分子，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朱理治参加了这次会议，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其任务的艰巨性。1927年10月，朱理治调任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领导清华、燕大、农大、海淀等几个支部的党员，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他经常深入城郊农村和清华、燕京、农大等高等院校之间，揭露反动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组织各支部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利用“名人讲座”、“时事座谈”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在他的领导下，西郊区党委的力量逐步壮大，党员发展到近400名，党的组织经受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1928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在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下，组织以四大铁路工人为主的全市性大暴动。结果中共北京市委和城区的几个区委都遭到敌人的破坏，唯有朱理治领导的西郊区党委没有暴露。市委和几个区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找到朱理治，决定成立中共北京市委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朱理治为书记。不久，中共顺直省委派人到北京成立了新市委，朱理治被选为市委委员。

一天，朱理治代表市委去海淀参加西郊区委会会议，会后在回清华大学的路上被特务截堵，威逼他带路到燕京大学平民学校——中共一个秘密联络点。朱理治急中生智，摆出掏枪决斗的架势。当特务从惊吓中清醒过来时，他已乘机跳上田埂。由于他平时注意体育锻炼，曾取得过全校长跑第一名，因而很快甩开特务，跑回清华园。没过几天，新市委和西郊区党委遭到敌

人的破坏，敌人放出风声要抓朱理治。当时清华园仍有“治外法权”，反动军阀当局不能随便派兵入内，但为了防备便衣特务的搜捕，他在清华园内经常变换宿留地点，有一次和余冠英还在朱自清教授家里过了一夜。后来，根据清华大学党支部的意见，在清华同学、共产党员冯冲云等的掩护下，朱理治离开北平，到上海寻找党的关系。

(二)

1928年5月朱理治到上海后，因原来要找的人和党的组织断了联系，便回到南通老家余西镇。离沪前，他在书店买到一本日本人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论土地问题的书，决心学习彭湃同志，搞农民运动。他先在余西镇公立小学谋到一个教师职务，并在教员中发展了五名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然后他一面寻找中共南通县委，争取上级党的领导；一面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主张。他还领导群众，向侵犯农民利益的族叔进行了斗争。

同年7月，由于同乡同学中的国民党右派告密，朱理治被国民党南通县党部逮捕。但他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家里又筹钱多方营救，加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于对学生的爱护，来电证明“该生在校安心读书，毫不鹜外，望即释放”，告密人也不愿出庭作证，县党部便电北平国民党市党部要具体证据。两个月后，国民党北平市特别党部来电，称他为“北方共党有力分子”，因而被押往南京，交国民党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讯。审讯中，朱理治发现敌人并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便对所加罪名逐一予以辩驳。但国民党的法庭不由分说，判了他4年

徒刑，先后被关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和苏州最高法院看守所。在狱中，朱理治联络同狱的共产党员坚定分子袁锡林、韩铁心、江阴臣、王滋九等，组成了中共临时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他以狱中支部为核心，团结大多数难友，组织“同难会”，担任会长；还与同难中的律师和一些有文化的人成立法律研究会，帮助贫苦难友写状子，开展合法斗争；同时组织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改善生活待遇。后来，一些受“左”倾盲动错误影响较深的党员被捕入狱，要在狱中搞暴动。朱理治坚决反对，为此被排挤出支部领导班子。结果暴动失败，朱理治等一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均被加刑。以后由于敌人始终拿不出给朱理治“定罪”的确实证据，只好于1930年4月将他释放。

1930年7月，朱理治到上海，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先后以闸北区安徽中学英文教员和沪西区正风中学教员的公开身分作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在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协助下，发起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并代表中共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出任会长兼中共党团书记。在朱理治的领导下，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上海各大学中发展了400多名会员，在社会科学界广泛宣传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还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在国民党上海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台建立了一个共青团支部，发展了陈国栋、阿陆等37名团员，并向中央苏区输送了两名报务员，积极支援了前方的通讯联络工作。

1931年7月，朱理治调共青团中央工作，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共党团书记由曹荻秋接任。当时，团中央书记是何凯丰，朱理治除任宣传部秘书兼团中央训练班教员外，还代表团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中共党团会

议。“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青年和各界人士奋起抗议日本侵略罪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将士，朱理治代表共青团中央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1932年2月和4、5月间，朱理治作为中央巡视员，两次去厦门和福州，巡视党和团的工作，并协助选送一批干部去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7月，朱理治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底，因团省委书记和秘书长先后被捕，他又担任了团省委书记。不久，团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代理宣传部长袁炳辉等被捕叛变。由于事先得到情报，共青团江苏省委未遭破坏。直到1934年2月，朱理治离开团江苏省委之前，江苏省共青团的组织不仅未受到大的破坏，而且有了发展。

1934年3月，中共中央调朱理治到中共河北省委工作。这时朱理治27岁，离开清华大学到南方已经做了六年革命工作。经过地下斗争和铁窗生活的锻炼，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同时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到天津后，他见到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孟用潜，被委任为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孟用潜调到冀南工作，朱理治又代理省委书记。

根据中共中央局的决定，朱理治很快从组织上恢复了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他刚到北方时，天津市只有几名共产党员，中共河北省委和各地的中共组织，也处于分割状态。后来，天津市恢复到9个党员，和冀南、冀中、保定、津南、京东等地区的党组织，也逐渐接上了关系。1934年10月，上海中共中央局派高文华到天津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朱理治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直到朱理治离开中共河北省委前，河北省的党员已恢复和发展到4000多人。这与朱理治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的。

(三)

1935年3月，孔原通知朱理治，要他到陕北工作。朱理治5月初动身，7月初到达陕北延川县的永坪镇。不久，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来信，要他以北方局代表的名义工作。以后上海中共中央局派聂鸿钧到陕北，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团，朱理治又以代表团书记的名义活动。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陕甘晋省委。9月21日，省委在永坪镇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省委领导班子由朱理治、郭洪涛、徐海东、程子华、聂鸿钧、刘志丹、高岗、马明方等9人组成，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省委副书记，聂鸿钧任军委主席。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后，接着在永坪镇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了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这两次会议，对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展陕北革命形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个战役，是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中共陕甘晋省委和十五军团召开了联席会议，在朱理治的主持下讨论了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与会同志对先打高桂滋、井岳秀的部队，还是先打东北军，发生了争论。朱理治采纳了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郭述申等的正确意见，并提出了围甘泉，打援兵的建议。结果，在劳山打了一场漂亮的埋伏

战，消灭敌一一〇师大约 3000 余人，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取得了第三次“围剿”的初步胜利。部队从这次战役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电报，说“有一小股朱毛匪军，已到会宁（静宁？）有窜陕北模样。”朱理治同郭洪涛、程子华等商量，决定出兵南下，攻打榆林桥，调敌北移，牵制敌人，以保卫苏区和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打下榆林桥后，仍没有中央红军的消息，朱理治又给前方写了一封信，要前方“派出一支武装交通队去找中央”。终于在吴起镇找到中央红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吴起镇东移后，中共陕甘晋省委即派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鸿钧前往迎接，在甘泉县下寺湾向中共中央常委汇报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随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消灭了东北军董英斌的一个师。至此，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朱理治自 1935 年 7 月到达陕北至同年 11 月与中央红军会合的 4 个月中，在扩大红军，推动陕北的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建党建政等方面，都作了很多工作，为发展陕北的革命形势，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朱理治组织地方党政力量，努力扩大红军，增强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当时，有些人借口陕甘边特殊，地广人稀，反对发动群众搞“土改”。陕甘边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公然在群众大会上骂群众是土匪，助长了地主、富农对农民的猖狂进攻，使陕甘边的土地改革运动一度停止。朱理治对此提出了批评，指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绝对不能动摇；并专门派人到陕甘边，取消了对坚持土地改革的同志的错误处理，同时逮捕了李西萍，打击了反动地主、富农的猖狂气焰。

1935 年 9、10 月间，陕北发生了错误的肃反，错捕了刘志

丹等同志和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错杀了200多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次错误肃反，从根本上说，“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①。“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②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③。但他“在后方始终没有杀过人”^④，而且当他察觉肃反搞错了时，立即表示：“宁愿放了刘、高挨骂，也不能昧着良心作事。”^⑤遂派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到前方，“制止捕人、杀人”，并要郭洪涛转告前方负责同志：“后方没有掌握刘志丹、高岗反革命的证据，如果前方也无证据，准备将他们释放。”^⑥后因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由中央直接处理了这一事件。

朱理治对他在陕北期间的这一错误，一直表示非常沉痛。1935年11月他赶到下寺湾，就向周恩来、罗迈、博古、洛甫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承认：“这次肃反有错误，刘、高不是反革命。”以后，他又作过多次深刻、诚恳的检查。但是，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干会上高岗的报告和根据他的报告发出的中央决定中，却说陕北错误肃反逮捕刘、高是出于朱理治“个人的阴谋陷害”，并说朱理治“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对此，中

①②③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84年2月24日）。

④⑤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59年11月23日）。

央曾做过多次认真严肃的审查,并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的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委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纠正了上述1942年“两个不合事实的说法”。1983年4月,中共中央指定中央组织部对朱理治这两个历史问题再一次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进一步纠正了过去结论中对他所作的不实之词,明确指出了陕北错误肃反“不是出于”朱理治“个人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阴谋陷害”,朱理治也“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①。结论肯定他对陕北错误肃反“一直表示沉痛,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并指出:“他自1927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党”;强调“今后对西北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应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来统一认识”^②。至此,他的这段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四)

1935年11月,朱理治参加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在直罗镇召开的会议。会议听取并通过了毛泽东作的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夺占甘泉、延安。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朱理治和李富春、蔡畅、肖劲光等组成中共陕甘边

^{①②}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84年2月24日)。

省委，由朱理治任省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首先派干部建立和健全了各县党的组织，接着进行土地改革。朱理治亲自带领工作队到王家坪蹲点，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广大农民分到土地以后，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中共陕甘边省委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红二十九军。并由肖劲光、朱理治分别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次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和红军负责人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随后，主力红军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东渡黄河，奔赴抗日第一线。红二十九军也随红军主力东征。东征前，毛泽东亲自把朱理治找去汇报工作。听了他的汇报后，毛泽东表示满意和放心。这时，陕甘边只留下两个连的红军，省委所辖地区，只有6万人口，而包围陕北苏区的东北军却有6万之众。朱理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集中力量作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共陕甘边省委面临的是东北军的一〇七师，师参谋长姓朱。朱理治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绝不能同室操戈，再让外族来灭亡中国。后来，省委又做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组织工作队替东北军购买给养，举行联欢。一〇七师在与省委白区工作部刘培植等人的多次接触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改变了敌对态度，成为东北军中与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个师。他们不仅不向红军主动进攻，而且对于出入苏区和白区的中共和红军人员给以方便。毛泽东在东征期间看到朱理治在党刊上介绍对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经验的

文章，还特意写信给他，表示鼓励。

1936年5月，中央主力红军胜利返回陕北。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朱理治对东北军及陕甘工作的汇报。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我们要在东北军造成抗日反蒋的空气。会议决定，今后不再对东北军进行军事打击，并且可以给以一定的让步，争取在东北军内开展公开的工作^①。为了加强共产党对争取东北军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初建时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柯庆施负责，书记刘澜波，组织部部长苗渤然，宣传部部长宋黎；后由特别设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主任周恩来，副主任叶剑英李克农、伍修权、朱理治、彭德怀、肖劲光、欧阳钦、边章五等为委员，朱理治任秘书长。中央“东工委”的成立，把东北军中原有的中共组织和中共党员统一领导起来，形成了东北军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核心。1936年8月末，朱理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刘向三、王林等六七人，经延安到东北军司令部的驻地西安。朱理治在西安与叶剑英、彭雪枫一起，被张学良安置在其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家里。叶剑英、彭雪枫做张学良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具体负责领导西安“东工委”的工作。在西安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朱理治首先向刘澜波、苗渤然、宋黎等“东工委”领导人员传达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组织领导他们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正确领会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精神，使他

^①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

们通过学习，思想认识和政策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确认识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①然后，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集中抓了扩大援助绥远抗战的运动。如通过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会”）发起募捐；派代表到绥远慰问；动员数千学生、市民两次到西安附近军队驻地宣传；成立由20多个团体组成的西安绥战后援会等。为了对付南京政府对西安抗日力量的压迫，他领导“东工委”制定了充分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团、政训处的矛盾；促使“东救会”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人士谈判，做他们的工作；在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地方上层争取中共抗日主张的赞同者，扩大统一战线的阵容；尽力纠正抗日进步力量内部在宣传和行动上的一些“左”的倾向等策略，收到了显著成效。在此期间，朱理治还到主要由北平抗日进步青年学生组成的东北军学兵队，向学员们讲授社会发展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朱理治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学兵队编写教材。经过中共东北军地下组织的抗日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大批学兵队员后来分散到东北军各军、师、团取代国民党的政训人员做抗日宣传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在整个东北军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愈益高涨。

1936年10月，蒋介石拒绝了张学良的抗日请求，调集嫡系部队30个师，云集潼关一带，逼张进攻红军。朱理治及时报告中共中央，认为如不发生重大事变，要蒋介石停止内战已

^①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属不可能。与此同时，朱理治与“东工委”委员宋黎每天碰头，布置隔天的工作，积极组织发动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以期运用社会力量，敦促张学良“逼蒋抗日”。宋黎原为张学良兼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学生。他当时住在张学良的公馆，与西安的学生界有密切的联系。张学良有一个教导队，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动员来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朱理治和宋黎除通过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发动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还通过教导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发动教导队的人到张公馆向张学良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被他们的抗日热情感动，发誓说：“我如不抗日，你们可以枪毙我。”1936年12月9日，大队请愿学生向蒋介石的行辕临潼进发，张学良赶来劝阻，答应一个星期内答复大家的抗日要求。隔了三天，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来到西安的第三天，在孙铭九家里接见了朱理治，详细听取了朱理治的工作汇报，向朱理治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方针，要他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领导“东工委”，动员东北军的中共地下党员，广泛深入宣传这一方针，变内战为外战，宣传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伟大意义。周恩来还要他与“东工委”同时在西安城里设立机关。朱理治在机关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周恩来的指示，与“东工委”一起全力以赴地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军官，先是反对释放蒋介石，以后得知蒋扣压了张学良，又力主与蒋决一胜负。中共代表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决定避免内战、促进和谈成功后，他们认为是东北军王以哲等高级将领作梗，于1937年2月2日枪杀了王以哲。此时，朱理治正因患肺炎住在医院，不久转至三原红军

总部休养。当听到部分参与“二·二”事件的少壮派军官又策划反对东北军移防时，他立即通过“东工委”对他们进行说服、劝阻，保证了东北军顺利移防和中共中央意图的实现。

1937年4月初，朱理治在西安召集刘澜波、苗渤然、宋黎等开会，总结“东工委”的工作。会议肯定了“东工委”在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依靠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团结东北军，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的道路，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工作中的教训，并根据东北军移防等新的情况，对“东工委”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东工委”，在当时政治形势日趋险恶紧张的条件下，为保存党的组织和发展抗日力量，继续作了大量的工作。1937年4月中旬，朱理治在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东工委”的改组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朱理治在西安领导中共东北军地下组织的半年多时间，正值西安事变前后。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信函和报告中，及时汇报了西安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及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分析了西北抗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促蒋抗日的条件，就帮助东北军、推动西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扩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他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反对部分同志和左派力量中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①。4月底，朱理治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白区代表会议。

^①刘培植：《知识分子的楷模，忠诚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

(五)

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1937年5月，党的白区代表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中共河南省委，并指定朱理治任书记。恰在这时，中共鄂豫边省委组织部部长周骏鸣到延安汇报工作，报告有人为了有利国共合作，主张解散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朱理治研究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情况，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促进合作抗日，他确定从争取和消灭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大游击队武装，并和当地开明绅士与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地位，作为将来的抗日武装。这个方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后，由周骏鸣带回执行，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部队很快由6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1938年初，经过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将独立团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开赴安徽敌后抗日，以后发展为新四军第二师，为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第八团队在确山竹沟设立了留守处，为以后竹沟发展成为中原地区支援与组织抗日力量的后方，创造了条件。

1937年7月中旬，朱理治离开延安，到达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八路军总部。在朱理治离开陕北的前夕，毛泽东与他作了一次谈话，对他说：“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①

^①朱理治：《有关河南省委、中原局及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大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朱理治。后来他又学习了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更加坚定了他到河南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在豫鄂边地区工作期间的指导思想。

朱理治到云阳镇后，在八路军总部的帮助下，开办了共产党员训练班，分别把河南的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召来汇报情况，学习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8月，他与抗大学员苏菲结为夫妻，并于9月初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河南洛阳，会见了中共豫西工委负责人吴芝圃、郭晓棠等人，传达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精神，听取了豫西情况汇报后即赴开封，与中共河南工委负责人刘子久、沈东平等会合，正式成立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组织部部长林凯，宣传部部长刘子久，妇女部部长吴平，委员吴芝圃、沈东平、刘敏、郭子化等。1938年初，彭雪枫、危拱之、陈少敏、谢邦治先后加入省委。7月初，组成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成员是朱理治、彭雪枫、陈少敏。

省委成立后，朱理治带领省委一班人，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打开了河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37年11月，朱理治在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风雨》周刊上发表了《回乡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组织民众团体和民众自卫队，参加和支援抗战。1938年1月，以中共河南省委的名义，发表《保卫河南宣言》，号召“全河南民众总武装”，誓死保卫河南、保卫家乡。同年2月以后，他又以李迅的笔名，连续发表了《普遍组织全河南的农会》、《论保卫河南的武装民众工作》等文章，指导各地发动、组织群众的抗日工作，对河南各界人士产

生了重大影响。在省委领导下，许多进步人士和大批青年学生组织抗敌后援会、农村服务团、战时教育工作团、光明话剧团、孩子剧团等，分赴全省各地宣传抗日；组织民先队、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群众组织，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徐州失守后，又动员大批铁路工人和青年学生下乡，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还动员一些共产党员、学生和工人，到华北、华中敌后，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推动了省内外的抗日工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朱理治在主持中共河南省委工作时，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领导省委广泛开展友党友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派人到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及所属的党、政、军、民等组织，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卫立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河南省主席商震、刘茂恩，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地方实力派和地方绅士别廷芳、王友梅等进行了联系和广泛接触，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结交了许多抗日的友党友军。据朱理治在1940年4月《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一文中介绍，当时在河南及苏鲁边，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的有5个专员，18个县长，5个地方实力派及3个国民党县党部。朱理治派沈东平、王其梅、张漫萍等与西华县地方实力派胡晓初、西华县县长楚博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举办抗日训练班，组织抗日武装，使西华的3000名武装取得合法地位，各级政权能与中共合作。他又派刘子厚、危拱之带着孩子剧团到信阳，与具有抗日思想的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建立了良好关系。在中共的建议和帮助下，这个县组织了有2000多名队员的武装自卫队，有效地

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豫南地方武装的发展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朱理治特别重视恢复和重建河南各级共产党的组织。十年内战时期，河南中共地方组织多次遭受破坏，老党员数量很少，许多县、区没有党组织。中共河南省委成立后，先后派刘子厚、彭雪枫、林凯等到豫南，将中共鄂豫边省委改组为中共豫南特委，并对中共许昌中心县委和中共苏鲁边、皖西北特委进行了整顿，新建立了中共豫东、豫东南、豫西南、豫北特委和开封市委。1937年11月，省委作出了关于克服关门主义、纠正自由主义的决定，及时指导了党的建设工作，在一年时间里就恢复和新建了9个地市中心县委，在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全省共产党员由100多名发展到8000多名。到1939年11月，河南（不含豫北）的中共党员达到16000名。各地中共组织的迅速恢复和重建，使河南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朱理治与省委其他领导人，又及时抓了新党员的教育工作，在豫南的竹沟，豫东的西华，豫西的渑池等地，开办了党员训练班，轮训了大批党员干部。省委还在竹沟创办了《小消息》报，宣传群众，教育党员，指导工作，提高了党员素质，加强了党的战斗力。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周恩来、叶剑英在武汉召见了朱理治和彭雪枫，向他们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共河南省委广泛动员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中心城市的学生、工人到乡村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河南省委提出了“为发展10万武装而斗争”的口号，并立即决定由吴芝圃、刘子久、彭雪枫等分别在豫东、豫

西、豫南准备，朱理治亲自沿平汉线做了布置。6月初，朱理治与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到达确山竹沟，以竹沟为中心，以开办党校、教导队、青训班等各种形式，吸引和招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为中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3000余名干部，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被誉为“小延安”。7月，朱理治撰写了《论河南游击战争形势及当前任务》一文，发表在8月7日《新华日报》上。文章详尽论述了发展中原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中原游击战争的特殊有利条件和游击战争开展的现状，提出了怎样开展江淮河汉之间游击战争的意见。中共河南省委的决定、措施以及包括上文在内的这一时期朱理治所撰写的文章，如《论目前豫鄂边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等，对中原游击战争的准备、发动与开展，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在一个短时期内，河南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了起来。沈东平与西华县县长楚博合作，组织了数千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吴芝圃在睢县、杞县、太康三县组织了近2000人的豫东游击第三支队。同时，在豫西、豫南也掌握了部分武装。为加强豫东的武装力量，省委派肖望东于7月从竹沟率领百人的抗日先遣大队，开赴睢（县）、杞（县）、太（康）地区，与吴芝圃领导的三支队配合作战。9月，根据毛泽东关于“先行开展豫东游击战争”的电令，省委在竹沟组织了300余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的率领下誓师东进，与吴、肖二部在西华杜岗会师，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其后，又在司令员彭雪枫率领下，转战于豫皖苏边区，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0月，豫南沦陷，省委派危拱之、刘子厚等到信阳南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四望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至11月，朱理治去延安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朱理治为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2月，朱理治回到河南，向干部党员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宣布撤销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中共豫南省委（亦称中共豫鄂边区委）和中共豫西省委；朱理治兼任中共豫南省委书记。他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协助刘少奇规划指导豫鄂边地区党的工作，部署新四军游击武装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为这个地区武装的汇合，实现党和革命武装的统一领导，为新四军豫鄂边主力部队的创建，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9年3月至9月，刘少奇回延安，朱理治代理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此时，以他为书记的中共豫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曾先后派省委军事部部长李先念和组织部部长陈少敏，从竹沟率领近千名干部和战士，到豫鄂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豫鄂边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6月，李先念、陈少敏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会议，传达中原局关于整编抗日武装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陈少敏。从此，豫鄂边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主力军。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办法后，豫鄂边地区的顽固派从制造摩擦发展到公开袭击、围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1939年3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取消了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的文化工作委员会；4月又勒令解散统战机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并下令信阳县进步县长李德纯离职交印；5月，国民党

鄂中专员石毓灵下令扣押了在鄂中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陶铸和应城县进步县长孙耀华；9月，发生了鄂东国民党顽固派进攻中共领导的独立第五游击大队的“夏家山事件”。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人，朱理治预见到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必将更加嚣张，反共高潮即将来临。在鄂豫边地区抗战发展的紧要关头，他认为要在敌顽夹击的局面中扩大武装，创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建立统一的武装指挥，是豫鄂地区迫在眉睫的任务。于是，他一面部署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一面电报请示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提出“为应付目前顽固派进攻及建立豫鄂边根据地起见，鄂中、鄂东、豫南的武装有建立统一指挥的必要。”^①

9月，刘少奇由延安回到竹沟，根据国民党加紧反共摩擦的斗争形势，为应付突然事变，决定撤销中共豫西、豫南省委，恢复中共河南省委，由刘子久任书记；并决定：“由理治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及武器、教导队去信（阳）、应（山）、随（县）、桐（柏）交界地之四望山，集中注意力建立敌后地区工作”，“竹沟留守处缩小，主要办理后方勤务及交通”；还决定“撤销中共鄂中区委，将其所辖地区连同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鄂东地委并入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将平汉路两边之游击队及豫南竹沟之武装合编为挺进纵队，成立统一指挥机关。”^②10月9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离竹沟东进到新四军淮北根据地。10月18日，朱理治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在竹沟的机关、部队的大部分约600余人南下四望山，进入豫鄂边敌后和李先念等会合。11月11日，国民党确山、泌

① 《朱理治致胡服并书记处电》（1939年9月5日）。

② 《刘少奇致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0月12日）。

阳、信阳三县常备队突然袭击竹沟，制造了竹沟惨案。由于刘少奇与朱理治有预见的工作布置，大大减轻了抗日力量的损失。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等在四望山开会，根据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研究部署了实现豫鄂边地区党和武装的统一领导，决定统一豫南、鄂东、鄂中、鄂西北的中共组织，成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整编这些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设立统一的指挥机构，深入武汉外围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由于朱理治、李先念平时同党领导的这些部队及地方组织有一定的联系，在他们之中有较高威信，所以，上述合并和整顿工作很快得以实现。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的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为司令员，朱理治为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刘少卿为参谋长，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豫鄂边创建的一支最大的抗日武装。它的成立，大大加强了中共在豫鄂边区敌后的抗战力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新四军第五师的直接前身，它高举抗日大旗，活跃在豫鄂边区广大敌后抗日战场上，为抗击日军和遏制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做出了贡献。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它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并指出：“一切敌后地区，不论华中和华南，我党均可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并且可以存在和发展。但先决条件是地方党应有组织武装的坚决决心与工作部署，有不怕与顽固派摩擦的勇气和意志”^①。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理治和李先念等进一步分析了鄂豫边敌后根据地的形势，认为由于日军与国民党军在华中地区处于对峙状态，

^① 《中央书记处致刘少奇新四军先念电》（1940年2月5日）。

敌后根据地虽处武汉外围，仍然可以大大发展；但是也要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因顽固派投降，或因日军失败而使日军与国民党军对抗消失的变化。为此，朱理治特意写了《怎样做》一文，印成小册子发往部队。

1940年3月，朱理治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奉调回延安。在离开豫鄂边区之前，他与纵队和区党委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了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对豫鄂边区的部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这些安排对豫鄂边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朱理治在河南及豫鄂边区领导党和人民的抗日战争，将近三年时间。这三年中，他面对强敌，不畏艰险，坚决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组织了千千万万的抗日大军，为准备与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壮大人民力量，创建豫皖苏、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竭忠尽智，做出了卓越贡献。

(六)

1940年和1941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在此情况下，朱理治从竹沟回到延安，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贺龙为办事处主任，朱理治为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他首先在银行干部中组织学习经济问题，对陕甘宁及晋西北的工作，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放大量贷款给边

区各部队、机关、学校，作为生产自给的资金，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减轻财政压力；（二）建立货币兑换所，通过货币交易，扩大边币市场，缩小法币市场，并控制边币发行，使边币和法币维持一定比例，保证边币的相对稳定；（三）采用有奖储蓄，积累资金；（四）对边区的工农业生产进行调查，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进行贷款扶植。

朱理治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为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取缔法币的投机买卖，摆脱边币通货膨胀，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从1942年7月到1943年3月朱理治离开西北财经办事处和陕甘宁边区银行之前，边币和法币的比例，维持在1.8:1的比例之上达8个月之久，边币威信得到了提高，流通得到了扩大，从而促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任边区银行行长期间，朱理治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边区金融工作的报告，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些价值”。他还写了不少论述金融问题的文章，如《边区新的金融政策之意义与目的》、《边币的根本问题》等，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1942年冬，朱理治到西北计划委员会工作。他集中精力调查研究，写出了边区1943年的全年经济计划，供中共中央参考。正在此时，他奉命参加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对朱理治在1935年9、10月间陕北肃反中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朱理治虚心接受了这次审查和批判，并沉痛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但这次批判中，对朱理治有许多不实之词，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纠正。1943年3月，朱理治调中央党校学习。

(七)

1945年4月，朱理治以正式代表的身分，参加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同年10月，奉命进入东北解放区，先后担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中共北满分局秘书长等职。年底，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为沟通南满与北满、关内与关外的联系，中共中央东北局确定了争取以朝鲜北部为后方，支援南满作战的方针，并指派朱理治和肖劲光于1946年7月赶赴朝鲜，在朝鲜平壤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9月，肖劲光奉调回国，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的全权代表，领导办事处工作。

办事处地址在平壤大同江西岸钗贯里一〇四番地，对外公开称平壤利民公司。为适应当时工作的需要，在朝鲜境内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港口城镇南浦、新义州、满浦和罗津设了分办事处。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第一，做好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工作；第二，借道朝鲜沟通南北满，以及大连和其它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第三，在朝鲜寻求援助和采购作战物资；第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经济贸易往来；第五，协同朝鲜劳动党作好华侨工作。

办事处的建立，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在历时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办事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南满对敌斗争，坚决有效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取得解放全东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完成了伤病员的安置和战略物资的转移。自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从安东、通化撤退，到1947年6月安东、通化收复，先后曾有1.8万余名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85%的战略物资（2万余吨）转移到鸭绿江以东。这些物资后来几乎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

其次，完成了物资转运和过境人员的输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到1948年的19个月内，通过朝鲜北部这条运输通道转移和交流的物资如粮食、煤炭、食盐、布匹和其它工业品达52万余吨，过境人员2万余人。国民党一八四师海城起义后的官兵，就是通过朝鲜去北满整顿的。不少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如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也都是取道香港经朝鲜转哈尔滨到北平的。至于因事途经朝鲜的中共领导人如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蔡畅、李立三、伍修权、滕代远等就更多了。这条走廊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与国际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1947年陈家康去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也是由大连经朝鲜的南浦到哈尔滨取道莫斯科到布拉格的。

第三，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朝鲜是日军侵华的跳板和军火库，日军投降后在那里留下不少战略物资。办事处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先后从朝鲜接运了2000多车皮的作战物资，接着又组织生产新的甘油炸药、雷管、导火线、发射药和弹头等。在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就是朱理治向金日成要的12个车皮，以后刘亚楼、朱瑞等也都要了许多车

皮的作战物资。朱理治还根据金日成的建议，向苏军要了一批“礼品”。

第四，建立和发展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两年来双方本着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对于鸭绿江共同航行、中国使用水丰电厂电力，以及两国通邮、通电等合作互助项目，都获得了圆满解决，先后签订了20几个协定。按照协定，双方在物资上互通有无和互相支援，如中方供朝方以粮食、烟煤和民用必需品，朝方供应中方以硫酸和硝酸、甘油炸药等军用品和水产品、民用品等。

第五，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好华侨工作。朱理治与朝方经过商量，朝方决定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道党委设立侨务委员会，朝鲜方面派人任主任，中国方面派人任秘书长；并决定在平壤成立华侨联合总会，在道和郡成立分会，以取代国民党的旧中华商会。当时朝鲜北部有华侨2万多人，以种菜和开饭馆居多。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和旧中国的影响，少数上层人物思想很复杂，对朝鲜人民有很深的民族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有戒心。华侨联合会通过举办华侨报纸和华语广播，创办华侨中小学教师训练班、积极分子训练班，组织华侨到中国东北参观、慰问等活动，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深入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和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这样，广大华侨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与朝鲜人民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增进了中朝人民的友谊，不少华侨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有的回国参加了祖国建设。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北部成为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后方，是与朱理治的工作分不开的。办事处是中共在特定历史条

件下，完成特定历史任务而派驻国外的临时代表机构，所执行的任务广泛、复杂，实际上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外交事务，这在中共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经验。当时，在朝鲜工作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思想认识很不一致，朱理治一开始就着重抓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明确提出：“对朝鲜外交的总方针应当根据中央总的原则，力求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合作、互助，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由于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东北局确定的总原则，边工作，边总结经验，使办事处的工作不仅起到了支援南满作战的作用，而且巩固和发展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与合作，胜利完成了党交付的这一特殊使命。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办事处撤销。朱理治奉命带领部分人员回国，留驻朝鲜的部分人员在原办事处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朱理治回国后，由于东北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又奉命在哈尔滨组建了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由李富春任部长，朱理治任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以后，他又先后担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兼总会计局局长等职。在这一阶段的工作中，他任劳任怨，一切从大局出发，认真负责，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如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时，既要支援南下部队的供给，又要领导后方的生产，还要负责接收新解放的城市，虽工作千头万绪，但他抓得紧，事事办得有条不紊。接收沈阳时，他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处里人手很紧，他不顾困难和疲劳，从早到晚不休息地一个个解

^①朱理治：《两年来对朝外交总结及今后任务》（1947年8月24日）。

决问题。上级批了 800 万炮兵装备款，他亲自审查预算，只用了 200 万就解决了问题。他主持东北银行时建立的划拨清算制度，直到今天仍在行使。他的工作为东北解放后计划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八)

1951 年 6 月，朱理治离开东北，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担任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李富春对全国各个系统，各条战线清产核资，进行了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提供了资料，作好了准备。1952 年 1 月，他奉中央财经委员会之命，主持物资分配局的工作，直到 1953 年 8 月。在此期间，他领导物资分配局编制了 1952 年及 1953 年全国物资分配年度计划，基本上保证了生产、基建及国防生产资料的供应；初步建立了根据物资平衡表决定进口计划和国家储备计划的制度，解决了物资生产供应和进口储备方面的混乱现象。同时，他还领导了当时中财委计划局、私营企业局和物资分配局三个局的“三反”运动，代表中财委去满洲里解决物资错发错运问题，主持编制了 1953 年全国工农运输业的生产基建控制数字和全国统一的调拨价格，同时负责全国清产核资的结束工作。所有这些，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4 年 4 月，朱理治调任交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1957 年 4 月，调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60 年 8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后任

书记)兼华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在这些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尽心尽职,注意探索和掌握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告和文章,为我国的物资工作,海陆交通建设和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海河流域的治理付出了大量心血。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朱理治因患肝炎住院,造反派还是横加罪名,把他揪出批斗,反复抄家,并封了他的卧室让他住“牛棚”、当苦工、进“干校”。但他身处逆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仅没有动摇,相反更加坚定。一次挤公共汽车,他被人撞倒。有位老熟人看他几十年为革命操劳,不计较个人得失,却屡遭打击,为他鸣不平。他却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个人受点委屈没有什么,重要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应多加关心。”他还教育自己的孩子说,要求入党,就要端正入党动机,否则不要急于入党。

1975年初,朱理治被安置在河北省工作,未安排任何职务。一些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处处给他难堪。面对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朱理治从不计较。过去的一位老同事半开玩笑说:“在其位,谋其政,没给你个头衔,怎么抓工作?”他说:“我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也要工作。”“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当官的。”他怀着一腔革命激情,拚着老命干,不安排工作,就自己找工作干,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深入城乡,搞调查研究。他说:“老了骑快马,还要紧加鞭,趁腿脚还利索,多跑跑,多干点事。”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直到1977年5月,朱理治才被任命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凭着自己的党性,更加积极地到处奔波。据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从朱理治1975年初到河北,至1978年因病离开河北的三年中,共下乡370多天,听取了近60个地、市、县委的汇报,参观考察

了二百五六十个工矿、企业和四五十个生产队，察看了十多个水库、洼淀，走遍了河北的所有地区和大部分县。全省几十处大型矿山他几乎都看了一遍，还下到井下看望工人，进行调查。为了发展河北省的冶金工业，他从勘探设计到建矿、开采、粉碎、洗选、冶炼、轧材等全过程，进行认真的考察，与国内外的先进技术、效益水平等进行对比，并向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提出许多宝贵建议。这年的年底，朱理治已患癌症，体力明显下降，但他还是不顾长途奔波，去济南参加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到烟台、潍坊、泰安等地参观学习。后来在住院期间，还关心河北省的农业机械化工作。河北省的干部说：朱理治为河北的冶金工业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操尽了心，出尽了力。今天河北省的经济繁荣，有他的一份心血。

朱理治在河北工作的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年，也是他为党为人民勤恳工作的三年。这三年，使人们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他旗帜鲜明，不回避矛盾，不隐讳观点，更不阿谀奉承，随声附和。对同志、对下属，他从政治到生活，热情关怀，对自己和子女则是严格要求，不搞特殊。他平日住在办公室，有时散会晚了，食堂关了门，他就吃饼干。孩子们从老远的地方来探望他，他让孩子和大家一起到机关食堂排队买饭吃，走时坐公共汽车走。北京家里冬天暖气的问题解决不了，他就生炉子。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清正廉洁和坦荡无私的情怀。

1978年3月，朱理治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但这时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在他病危期间，陈云、王震、余秋里、程子华、季方、陈慕华等同志都赶到医院看望。1978年4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忠

实儿子，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朱理治的一颗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朱理治逝世后，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康克清等送了花圈，李先念、王震、谷牧、粟裕、胡耀邦、程子华、胡乔木等生前友好和朱理治生前工作过的单位代表近千人参加了追悼会，沉痛悼念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和高尚品格。

朱理治是通过先学习、研究、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尽管一生历尽坎坷，却义无反顾，始终不渝，一直保持共产党人思想上的坚定性和纯洁性。正如悼词中指出的：“朱理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他努力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群众，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致力于东北的经济工作和政权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卓著。”“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廉洁奉公，埋头苦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在朱理治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2. 朱理治填写的干部履历表。
3. 《朱理治自传》。
4. 曹玉麟：《回忆朱理治同志的青年时代》，朱尔勤：《忆叔父二三事》，均载《南通史话》第7辑。
5. 朱理治：《大革命前后的清华支部》。
6.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朱理治同志在清华》。

7. 朱理治：《陕北工作经过》。
8. 李景林：《关于洛河川土改的材料》。
9. 徐海东致朱理治信；惠碧海致朱理治信；阎子祥致苏菲信。
10. 朱理治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期间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1. 王兴科：《朱理治在豫鄂边区》。
12. 张群良：《朱理治在河南》。
13. 刘之久、任质斌、刘子厚、方正平、栗在山、刘放：《回忆朱理治同志在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业绩》。
14. 抗战初期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风雨周刊》。
15.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
16. 东北局驻朝办事处给东北局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
17. 倪振、齐光：《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隐蔽后方》。
18. 朱理治给李富春并转东北局《北朝鲜一年工作报告》。
19. 东北局驻朝办事处：《两年来对朝外交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
20. 周建新、张景存：《深切怀念理治同志》。
21. 访问苏菲、孔原、刘子久、余冠英、齐光、郭述申、倪振、陈国栋、李更新等人的谈话记录。

郭 影 秋

王 俊 义

(一)

郭影秋，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省铜山县棠张乡马兰村人。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10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如同他在自传中所说：“曾祖以来，累世为佃户”^①。家中一无房，二无地，不得不住地主家的房，种地主家的地，除缴纳苛重的租税外，还要无偿为地主家服各种劳役。他后来曾在一首小诗中说：“我家本是田舍郎，祖孙三代住人房”。他十三四岁时，父亲把地主家的几间草房买下来，又多租种了些土地，生活才逐渐有所好转。

他7岁进私塾念书，学习十分用功，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昼夜攻读。几年私塾期间，便熟读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诗》、《书》、《易》、《礼》、《春秋》等经书，又练习写古体诗，打下坚实的文史功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将历史推向新的阶段。此时的郭影秋已不满足于整天关在私塾里读四书五经，便跑到距家往返近百里的大彭（今徐州市），先

^①郭影秋：《我的自传》（1955年）。

读了几个月法文补习学校，后又转读于大彭市立一小。他住宿在学校，却交不起伙食费，只好每周往返一次，从家中背些干粮。郭影秋曾写诗回忆当时的生活情景说：“忆昔远读书，干粮百里送。饼霉难入唇，饭稀如照镜。”^①

1926年，国民革命军围攻徐州城时，郭影秋曾与同学少年商议，如何开城迎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郭影秋目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其中有些还是他平素尊敬的老师，深深引起了对共产党人的同情。1929年初，郭影秋就读于江苏铜山师范，并任膳食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为安插党羽掌握学校领导权，策划了驱逐原铜师校长的学潮，并竭力拉拢郭影秋支持他们的活动。他义正辞严的予以拒绝，为此被国民党排挤出铜师。这年秋天，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无锡国专。但由于经济困窘，学费无着，在无锡国专学习不到一个学期，又被迫中途辍学。

1930年秋，郭影秋又转学考取了公费的江苏教育学院。这时，他开始考虑社会实际问题，探索人生应走的道路，阅读了许多新兴社会科学书籍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还秘密阅读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开始有所了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京、津、沪、杭等地的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日，江苏教育学院的学生，也有二三百人到南京参加请愿活动，郭影秋是这支请愿队伍的领队。蒋介石曾接见了包括郭影秋在内的各地学生代表，并拍着胸脯说：“我蒋中正，我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日的，明天就出师北上，矢志抗日”。但第二天一早，各地学生齐集南京中央体育场，

^① 《郭影秋诗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准备为蒋介石的出征队伍送行时，却始终不见队伍出来，直等到夜间，大批手持刀枪的军警突然从四面八方将请愿学生层层包围起来，强行把各地学生遣押车站。江苏教育学院为此事召开了全院大会，胁迫郭影秋当众悔过，否则就要开除学籍。郭影秋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表示绝不屈服。后来，在进步爱国教授声援保护下，他才免受处分。

这次爱国请愿活动，使郭影秋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有了进一步认识 and 了解，斗争实践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走爱国革命的道路。

(二)

1932 年秋，郭影秋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徐州民众教育馆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薛暮桥、陈向平、李可染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交谈思想，还经常为《徐报》的副刊《新生》写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新诗和短文。1933 年，他经薛暮桥介绍，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参加了由钱俊瑞、姜君辰等组织的“新知书店股东会”。由于陈向平与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有联系，他们经常收到从上海寄来的进步书刊，甚至有《红旗》等共产党党内刊物。郭影秋在《纪念向平诞辰七十一周年》的诗中提到“日日盼红旗”，便反映了他们当时盼望读到党刊的心情。这时，郭影秋在行动上也迫切地在寻找共产党组织。但由于徐州地区共产党组织于 1929、1932 年两度遭到敌人的破坏，陷于瘫痪状态，所以他当时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

1934 年夏，郭影秋到江苏沛县中学任教导主任。他对沛

中大力进行改造和整顿，使学校面目焕然一新。在教学方面，他把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公民》课，改教时事政治；国文课主要选讲进步诗文，如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女神》等，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①。课外开展体育活动，还成立了话剧团、京剧社等文艺组织。郭影秋常自编、自导、自演。一次，他们在沛县县政府礼堂演出左联的剧本《牺牲》，宣传抗日，郭既是导演，又饰演剧中主要人物。他饰演的东北义勇军排长遭日寇枪杀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当时，在台下看剧的国民党县政府官员，竟气急败坏地叫嚷：“这是共产党宣传！”还唆使一些特务跑到后台，强令停止演出，郭影秋据理力争说：“为什么宣传抗日就是共产党宣传，难道全东北的人民群众都是共产党吗？！”

郭影秋在沛县中学的活动，一方面遭到国民党某些顽固派的嫉恨，另一方面却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这时，苏鲁豫特委负责人郭子化、张光中到沛县恢复建立党组织，并指定苗宗藩、王义在沛县开展党的活动。苗宗藩与郭影秋经过多次接触后，于1935年10月的一个深夜，庄重地对郭影秋说：“经过党组织的认真考察，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的事情要保密，除你我二人外，不许和任何人发生组织联系。”他多年来到处寻找党，渴望入党，终于夙愿以偿。后来，在1940年整党时，由于苗宗藩的历史问题，对郭影秋的入党问题曾经有过议论，经过严肃审查和研究，结论仍然是1935年10月为

^①张世珠：《我们的母校——沛县中学》，《徐州史料》第2辑。

预备党员，1936年2月转为正式党员^①。

郭影秋入党后，按照党的指示，先后在校内组织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培养积极分子，动员和组织青年学生到社会上进行抗日宣传，逐步在沛中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微山湖武工队，在沛县湖东的夏镇处决了叛徒、特务姜友吉，为此，国民党徐州市党部策划了对共产党的大破坏、大搜捕。他们于6月11日夜，在徐州附近各县统一行动，凡认为是共产党员或嫌疑分子乃至有左倾思想的“危险分子”，统统被抓起来，郭影秋也未能幸免，被捕入狱。

郭影秋在狱中多次受审，不管审问者如何威胁、利诱，他就是“我不是”、“不知道！”这两句话。敌人恼羞成怒，把他吊起来，用皮鞭狠命地抽打，再猛然松开绳子，将他从高处摔到地上，直至郭影秋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国民党特务还利用叛徒到狱里来劝诱。郭影秋坦然地说：“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如果要枪毙就不用说了，如不枪毙，我就准备把牢底坐穿！”^②他在《狱中作》、《徐州狱中有寄》等诗中写道：“试把铁椎敲劲骨，铮铮犹自有金声”，“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③真实地反映了他狱中斗争的思想和情操。

郭影秋被关押了三个多月，敌人没有抓到他是共产党的任何证据，也没有查出他和姜友吉案的任何联系。加上他的老师俞庆棠教授等在狱外积极营救，终于在1936年9月下旬被释出狱。

①郭影秋：《往事漫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42页。

②郭影秋：《往事漫忆》第56页。

③《郭影秋诗选》第5页。

(三)

郭影秋出狱后，未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前，一度在徐州民众教育馆开办的农民生活学校任教。卢沟桥事变后，中共河南省委派刘文为特派员，来徐州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37年8月中旬，原苏鲁豫特委书记张光中陪同刘文到农民生活学校来找郭影秋，向他布置了党的重建工作，随即成立了铜山工委，并任命郭影秋为工委书记，万众一为组织委员，杨涵之为宣传委员，党的活动逐步得以恢复。1937年11月初，郭子化来到徐州，正式建立了苏鲁豫特委，郭子化任书记，张光中负责组织，冯彬如负责宣传，刘文以特派员身分参加特委领导，郭影秋任特委秘书^①。特委在徐州附近各县都指定了联络员，郭影秋以特委秘书的名义，联系各县的联络员，传达特委指示，指导工作，发展党员，整顿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整顿，至1938年5月徐州沦陷前，各县的党组织都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党的工作已能正常开展。在此期间，郭影秋还根据特委的指示，组织开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该班第一期学员就有300多人，曾请了匡亚明等任教员。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又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团员。这些学员毕业后，被安排在附近各县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方面的工作。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他们大多数成为苏鲁豫皖四省边界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1937年10月，李宗仁将军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

^①郭影秋：《苏鲁豫特委和湖西地区党的斗争历史回顾》，载《济宁地区党史资料》第2辑

长官。第五战区名义上管辖江苏、安徽、山东地区，实际上其直接管辖范围，仅只是苏、鲁、豫、皖交界的20多个县，也正是中共徐州特委的活动范围。李宗仁到徐州后，提出要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中共徐州特委决定利用李宗仁的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总动员委员会是半官方、半群众性的组织，李宗仁亲任主任，下设组织、宣传、战勤三个部，各部部长分别由李宗仁的秘书或地方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担任，如组织部长便是李的机要秘书夏次叔，副部长是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郭影秋利用在民众教育馆工作的关系，特意找了赵光涛，表明愿意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协助他们工作。赵光涛随即向李宗仁推荐了郭影秋任组织部总干事。而总动员委员会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多是挂名的，实际工作主要由总干事去做。郭影秋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在组织部下面设立了青年干事和职工干事，均由共产党员担任。这样总动员委员会的组织部实际上便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不久，郭影秋又被选为总动员委员会的12名常委之一，这样和第五战区的上层人士如李宗仁、李明扬的接触就更为频繁。同时，中共徐州特委又任命郭影秋为总动员委员会的中共党团书记^①。这段时间内，他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处理了不少重大问题。

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在徐州地区，并未建立起抗日武装。为了发展革命武装，郭影秋与郭子化等费尽心思，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取得国民党徐州专员兼任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

^①郭影秋：《抗战初期党在徐州地区的统战工作》，《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总指挥、总动员委员会战勤部部长李明扬的同意，给共产党一个公开活动的游击队番号——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委任了张光中为队长，还配发了枪支弹药。张光中利用这个番号，在沛县、滕县交界处创立了四个大队的革命武装，每队一二百人。这是中共在徐海地区公开建立的第一支武装部队，以后统称为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①。

这期间，国内许多知名人士如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梁漱溟等，都来过徐州。各地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艺术团体和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如金山、张瑞芳、王莹、冼星海等，也都到过徐州。他们到徐州后，一般都与总动员委员会联系，郭影秋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他们要求见李宗仁，请求抗日，多半都是通过郭影秋打通关系，或由他直接陪同会见。

郭影秋在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同时，又通过总动员委员会广泛宣传抗日政策，发动群众组织了一些全区性的抗日群众团体，如1937年12月成立的徐州职工抗日联合会，1938年2月召开的青年代表会及其建立的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以及先后成立的全战区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儿童团、姊妹团等。通过这些抗日群众团体，把各阶层群众普遍发动团结起来，为进行全面抗战而奋斗。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爆发，总动员委员会举办了“保卫大徐州宣传周”，宣传提纲就是由郭影秋亲自起草修订的。他还通过总动员委员会，组织号召各县的民众动员工作团，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奔赴台儿庄前线，为取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做了重要贡献。

1938年3、4月间，总动员委员会组织了第五战区宣慰

^①郭影秋：《抗战初期党在徐州地区的统战工作》。

团，郭影秋任团长，到战区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和慰问工作。为庆祝台儿庄会战大捷，他还曾率团到台儿庄前线进行慰问和巡视。这时，他听到国民党要放弃徐州的消息，决定迅即返回徐州，但去徐州的铁路已不通。待他连夜步行赶回徐州后，中共徐州特委已经撤离。

郭影秋赴台儿庄慰师之前，中共徐州特委曾开会做过研究，议定一旦徐州沦陷，党的工作重点便转移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关于郭影秋本人的工作，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他留在敌后打游击，另一种主张他仍然留在李宗仁那里，继续争取合法的地位和工作环境。但当他返回徐州时，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和共产党的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已全部撤离。5月17日黎明，日军的炮弹已打到徐州车站。在这种形势下，郭影秋冒着从头顶呼啸而过的炮弹，孤身向徐州东南寻找党的组织。

（四）

郭影秋随着从徐州撤出的人流，向徐州东南跑了70多里，到了有党的联络点的殷阳庄，向这里的支部书记讲了当时的形势及开展游击战争的设想。当晚在殷阳庄召开了党支部会议，组织起有十余人参加的游击分队。但刚刚组织起来，日寇便打进村里。郭影秋带着这十几个人一边抵抗，一边向南退却。不久，这十几个人的队伍被打散。徐州沦陷后的第二、三天，郭影秋在肖县找到该县党的负责人李砥平（解放后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他这里有20多名党员，十几枝步枪，经过研究，他们决定以这些人和枪为基础，拉起队伍打游击。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到七八十人、五六十枝枪。参加队伍的有老党员，也有青

年知识分子，还有贫苦的农民，甚至有当过土匪的游民。

1938年6月，郭影秋到陇海铁路以北，本想到山东向省委汇报工作，请求省委派些军事干部，以领导和发展刚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并请示省委确定他今后的工作。在陇海路以北，他遇到原中共徐州特委秘书王文彬。王向他介绍当地已有了正式的人民抗日武装，称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总队长李贞乾，政委王文彬。王希望郭影秋能留下来担任总部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由王文彬派交通员到山东向省委请示安排郭影秋的工作。不久，中共山东省委指示，郭影秋留湖西地方工作，不要再追随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从此，他便同王文彬等在丰县、沛县、铜山等湖西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直到1948年初，调离湖西去冀鲁豫区为止。他在这里整整工作战斗了10年。

1938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湖西地区的两个党组织徐西北区委与鲁南工委合并建立湖西特委，陇海路以南的肖、宿、永一带也归湖西特委领导。辖区包括金乡、鱼台、嘉祥、济宁、邹西、滕西、沛滕边、巨野、菏泽，东明、定陶、曹阳、成武、单县、丰县、沛县、肖北、铜北、砀北、郑城、鄆城、考城等苏鲁豫边界的20多个县，所以也叫苏鲁豫边区。党的组织也称苏鲁豫特委。辖区武装，由特委统一领导，统称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省委还指示，特委由五人组成，特委书记与部队政委两个职务“非王（文彬）即郭（影秋）”，因而湖西特委最初的组成是王文彬任特委书记，郭影秋任部队政委兼特委委员，白子明任组织委员，张如任军事委员，孙衷文任宣传委员^①。这样，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机构

^①郭影秋：《苏鲁豫特委和湖西地区党的斗争历史的回顾》。

与武装组织的领导就正式确立了。

中共湖西特委的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抗日斗争。为此，特委对湖西地区所属各县义勇队的组织编排与领导干部进行了统一调整，使部队的建制尽快健全。尔后，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筹粮、筹款、筹集枪支弹药，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地区的抗日武装得到迅速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部队的衣食供给没有保障。当时，驻在丰县的汉奸武装——王献臣（外号王歪鼻子）的部队，还不断对我驻区进行侵扰，以致卡断我们的给养。因此，特委组织了一次攻打王献臣的战斗。但打得非常艰苦，打了20多天，仍僵持不下。1938年底，由彭明治和吴文玉（即吴法宪）领导的八路军正规部队——苏鲁豫支队（简称苏支），开进湖西，一举全歼王献臣部。在正规部队强有力的配合下，湖西地区的抗日形势迅速好转，各个县先后建立起抗日政权，逐步形成了抗日根据地。不久，根据山东省委指示，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郭影秋仍任政委。但是，就在打王献臣战役的过程中，郭影秋得到特委已改组的通知，改组后的特委书记是白子明，原特委书记王文彬改任组织委员，郭影秋仍任特委委员与部队政委。作为特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郭影秋，在其未参与研究的情况下，特委组织班子竟突然改组，他对此很不理解。事实上，特委的这次改组，却为此后的湖西“肃托”事件埋下了祸根。

王献臣的汉奸武装被打垮后，还有一股反动势力就是盘踞在铜山北部的籍星科部队。籍部原是一股土匪武装，国民党要剿灭它，它便接受了日军的番号，叫做苏北反共救国军。籍星

科是司令，他曾与王献臣配合，对湖西根据地进行了两面夹击。王献臣被打垮后，如何解决籍星科这股反动武装呢？是武力歼灭还是争取改造？经过认真分析研究，特委决定对它进行争取改造，并决定由郭影秋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郭是铜山人，又长期在该地活动，既熟悉情况，又在该地有较大影响，还曾在总动员委员会工作过，有进行和平斗争的丰富经验，善于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郭影秋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决心身入虎穴，尽力争取籍星科反正。

郭影秋在赴籍部之前，认真调查研究了籍星科其人及其部队的情况，对面临的任務进行了冷静分析，认为客观上存在着争取籍反正的有利条件：一则是有声威大震的苏鲁豫支队和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作武力后盾；二则籍星科与国民党势力有矛盾，虽接受日军番号，并不想死心塌地的为日本效劳。特别是王献臣被歼灭后，他失去了同盟和依托，内心恐惧，深怕步王献臣的后尘，被八路军消灭；三是籍星科队伍中的一些班、排长和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当地人，与八路军、义勇队中的干部、战士有各种联系，另外，共产党在此之前也曾在他的部队中做过一些策反工作，他的第三团团长何玉祥积极主张抗日，而该团又是籍部的主力。郭影秋分析上述有利条件后，胸有成竹地认为只要对籍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争取其反正完全有可能。

1939年春节之前，经与籍星科、何玉祥沟通后，郭影秋仅带了两名警卫，前往籍部所在地。他到籍部后，籍星科故作威风 and 镇静，当郭影秋进入该司令部院落时，从大门口沿院内夹道直到籍的司令办公室，站满荷枪实弹的卫队。当下面通报：“八路军郭政委到！”籍仍躺在床上抽鸦片，连头都不

抬，他旁边还坐着国民党沛县的参谋长（籍的私交密友），及籍部团以上骨干。郭影秋见此情景，镇定自若的主动坐下，也一语不发，看他们如何举动。那位国民党沛县参谋长开口说：“郭先生你是来作说客的吧！”郭影秋毫不示弱地回答：“我是应籍司令之约，来共商抗日大计，不知参谋长阁下到此有何公干？”这时，籍星科才开腔说：“话不能这么说，他也是我请来的客人。”郭影秋则不以为然地说：“籍司令你有言在先，只是你我商谈，并未说有第三者参加，若走漏风声，对司令未必有利！”籍星科连忙解释说：“不妨，不妨事，他是我个人的老友也是自己人。”经过上述简短交锋后，籍星科才从床上坐起来，他先以怀疑的口气发问：“你们共产党有力量打日本吗？”郭影秋立即觉察籍星科的内心矛盾，他一怕共产党没有力量消灭日军；二怕失去日军支持再受国民党夹击，自己被消灭。根据他这种心理状态，郭影秋有针对性的向他介绍了整个抗日形势的发展，以及湖西地区八路军的实力，着重向籍指出，在中国的土地上，日寇最终必然被消灭，中国共产党有抗日到底的决心，并说，凡是有民族心的中国人，都应置身抗日行列，投靠日本是没有出路的。籍星科的思想逐渐有所触动，才摆出想要谈判的架势，询问联合后八路军有何具体打算。郭影秋当即说：“大目标是一致抗日，只要共同抗日，一切具体问题都好商量。”就这样，翻来覆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最后终于说服了籍星科，以接受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为条件，保持其队伍的相对独立性，编为独立大队，仍由籍任队长，把他的武力纳入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久，籍星科部除少数人不愿反正外，计有2000余人，正式宣布起义。接着，组织上又委派郭影秋担任反正后的独立大队的政委。经过大量艰

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将这支土匪武装，改造成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样，驻在湖西地区的大股敌对势力，或被歼灭，或争取反正，整个湖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939年5月，湖西特委升格为湖西区党委，山东省委也改为山东分局。湖西区党委的组成是书记白子明，组织部长郝中士，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政府工作部长陈筹，青年部长孙衷文，社会部长赵万庆，委员李毅。郭影秋因转入苏鲁豫支队，未参加区党委工作。

1939年上半年，郭影秋一直带着部队，与彭明治、吴文玉等，离开湖西区中心地带，在陇海路以南活动。不久，骇人听闻的湖西“肃托”事件发生了！

(五)

1939年秋冬，正当湖西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时候，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湖西“肃托”事件，而且在这桩罕见的冤假错案中，郭影秋也被诬指为托派，险遭枪杀。正值千钧一发之际，罗荣桓星夜赶赴湖西，制止了事态发展，挽救了郭影秋等大批革命干部。

这次所谓的“肃托”事件，始发于1939年7、8月间。当时，中共湖西区党委所属的湖边地委干校，有些学员在议论毕业后的工作去向时，有不愿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情绪，并且在文艺节目中公开流露出来。湖边地委发现后，认为问题严重，甚至主观地认为背后有阶级敌人煽动，指定由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此事。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隐藏在党内的“暗害”分子^①。他在处理此事时，采取诱供、逼供的方式，迫使主持干

^①《中共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1941年2月）。

校工作的魏定远承认自己是“托派”，并编造出湖边地区有“托派组织”的供词。尔后，王须仁又将逼供所得材料向湖边地委及湖西区党委领导做了汇报。当时的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不仅未审核王须仁提供材料的来源，还赞赏其“能干”，正式指定他为湖边地委“肃托”的负责人。王须仁因此更加有恃无恐，胆大妄为。他依据魏定远的所谓交待材料，又逮捕了一些干部，采取更残酷的肉刑逼供，勒逼出的“托派”越来越多，一直牵扯到湖西区党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王须仁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要想放手大干，必须有军队方面力量的支持。恰逢当时苏鲁豫支队的主要领导彭明治等正在远离湖西地区的外线作战。在湖西区中心地带活动的只有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队长王宏鸣等人。王宏鸣是个极端的个人野心家，他与王须仁一拍即合，未经向苏鲁豫支队及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请示，便主观肯定湖边地委的“肃托”完全正确，还擅自决定“肃托”工作由他统一指挥，从而使事态进一步恶化。“二王”狼狈为奸，随意逮捕审讯，甚至以“托派”罪名，成批的杀害革命干部，不仅将湖边地委书记打成“托派”，使湖边地委陷于瓦解，还将矛头指向湖西区党委。区党委的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组织部长郝中士、军事部长张如，均被诬指为“托派”。整个湖西区党委领导，只剩下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一个“光杆司令”。“二王”一伙不顾马霄鹏、王文彬等人的忠言抗争，将这些开创湖西根据地并在当地有很高声望的老党员，相继迫害致死。在“二王”的操纵及白子明的参与下，“肃托”像瘟疫一样，迅即蔓延，继瓦解区党委之后，又逮捕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负责人李贞乾，及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梁兴初，接着又逮捕了当时任独立大队政委的

郭影秋^①。

郭影秋被捕的第二天，王须仁即对他进行审讯。他对王须仁的审问根本不屑理睬。王不得不把区委书记白子明搬出来。郭影秋万万没有料到，白子明竟亲自对他用刑，一边动刑，一边逼他交待“托派”问题。审讯持续了六七个小时，郭影秋始终实事求是，坚强不屈，曾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当郭影秋处于昏迷状态时，白子明又拿来一张电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说：“这里有真凭实据，是山东分局的电报。”接着又说：“电报讲了一直领导你工作的郭子化也是‘托派’，他在分局已主动交待，而且供出你也是托派，你还能抵赖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郭影秋有些惶惑，他对这些人的阴谋诡计毕竟估计不足，加之长时间审讯动刑，他的头脑早已昏沉麻木，便说：“我一直在郭子化领导下工作，他本人既然是‘托派’，又发展了我，我还能讲什么呢？”这样就算郭影秋承认了自己是“托派”。但郭影秋被押回牢房后，至夜深人静时，头脑逐渐清醒，他突然省悟到自己可能中了圈套。他彻夜不眠，写信向苏鲁豫支队队长彭明治申诉。声明昨晚自己的口供有错误，他过去在郭子化领导下做的是革命工作，郭子化从未向他讲过“托派”的事情，自己参加的是共产党，即令郭子化是“托派”，也与自己无关。而他于昏迷中根据白子明拿的“电报”，承认自己是“托派”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应予推翻。但这封信又落到白子明等人手中。随即，他们又将郭影秋提出来审讯，还在他面前把一个推翻“托派”口供的干部活活打死，并含沙射影地说：“郭影秋你是不是想翻案，下午再审讯你，如再翻案，就是这

^①孔令闻：《湖西“肃托”事件初探》，《济宁史料》第2辑。

样的下场！”

就在那天下午，郭影秋果然又被拉了出来，他怀着悲怆的心情，准备最后被处决。当他被带到一座四合院时，看到坐在桌旁要审讯自己的并不是“二王”与白子明，他有些莫名其妙。坐在桌旁为首的那个人问了他前段“肃托”的有关情况后，突然针对所谓“山东分局来电”说：“这完全是造谣捏造！”而后又说：“告诉你郭影秋同志，郭子化并没有自首，山东分局也根本没有拍来那样的电报。这件事是错了，你是被冤枉了！”接着他又自我介绍说：“我是罗荣桓，这位是郭洪涛，他是张经武。我们不是来审讯你的，而是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湖西问题的。”还说“郭子化也来了，你一会儿会见到他”。这时，郭影秋才顿时舒了口长气，犹如看到久别的亲人，激动得泪如雨下，甚至放声大哭起来。罗荣桓又亲切地安慰他说：“郭影秋你是个好同志，八路军正规部队到来之前，你就在湖西打游击。我们是了解你的，你好好休息养伤，准备继续为党工作。”郭影秋和一大批正被关押审讯的同志得救了，湖西地区连续几个月来的腥风血雨终于被驱散了。

原来，湖西地区“肃托”的有关情况，已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一一五师和中共山东分局。当时，罗荣桓是一一五师师长，郭洪涛是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张经武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郭子化是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他们闻悉湖西“肃托”事态后，决定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日夜兼程，飞奔而至。罗荣桓等到湖西后，斥责了“二王”一伙乱捕乱杀的非法行径，明确宣布释放一切被冤枉的同志，恢复他们的工作；改组苏鲁豫党委，鉴于各种原因，白子明仍暂任书记，郭影秋与郝中士任常委；撤销王宏鸣现职，调回一一五师师部；将王

须仁押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审查。王须仁自知罪孽深重，在押解途中畏罪自杀。王宏鸣后来也原形毕露，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郝鹏举的团长^①。

罗荣桓在湖西处于危机关头，采取果断措施，从根本上扭转了该区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当时公务繁重，不可能在湖西停留较长时间，曾指定专人负责处理“肃托”的善后问题，但有关人员却未能完成重托，致使湖西“肃托”事件中的遗留问题，长期未能妥善解决。

对于湖西“肃托”的善后处理问题，郭影秋曾以坚强的党性，多次向中共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反映自己的意见。直到解放后，还曾两次书面报告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此，中央下达文件重申：中央对湖西“肃托”这件事，已多次做过决定和指示，在政治上早已解决了。所有在这次“肃托”中被冤枉的同志，他们本身都没有错误，以后运动中不要再查这件事了。不料“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把湖西“肃托”的事端了出来，把问题搅得很复杂。这种情况迫使郭影秋再一次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他认为湖西“肃托”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根本错了。因此，他于“文革”后期，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组织了一些同志，调查和研究了有关材料，然后写报告给中共山东省委并转中共中央。1983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山东省委的报告，明确指出：湖西“肃托”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不是扩大化错误，应予彻底平反；湖西“肃托”中定的“托派”，是毫无根据、完全错误的，应予平反昭雪；对

^① 《中共湖西地委关于锄奸事件善后再次的检讨和处理》（1945年12月）。

湖西“肃托”中被错杀，及错误处理和受到株连的人，凡未彻底平反者，一律予以彻底纠正，他们的档案中有关“肃托”的材料，统统由组织部门清理、销毁^①。

湖西“肃托”事件的彻底平反，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反映了郭影秋坚持真理的思想品德。

(六)

湖西“肃托”后，从1940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这时，日伪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冀鲁豫地区又连续几年发生旱灾。郭影秋不计较在“肃托”中遭受的冤枉，依然置身湖西地区，忘我地工作。1940年，他被选为湖西地区参议长。1942年，在反击日寇的“万人大扫荡”中，湖西地区专员李贞乾牺牲，郭影秋又被任命为湖西专员。在湖西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他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不搞任何特殊。当时，物质生活极为清苦，吃的是谷糠、树皮和野菜。战士每天只能供给四两带皮的谷子和三钱油、二钱盐。郭影秋在专署机关与一般干部一起吃食堂。在行军转移或到基层工作，都与军民同吃同住。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冬天发一件皮衣，他从来不领不穿。由于夜间办公，领导干部每晚可分给两斤干柴烤火，他从来不领不烧。行军时，他可以骑马，也从来不骑，都是把马让给病号，或驮载公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郭影秋深深体会到，作为共产党

^①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的一名领导干部，一定要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有这样才能密切联系群众。他认为，这不仅是思想作风、生活作风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观的反映。反之，如果一个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自视特殊，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甚至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被人民唾弃。在湖西三年困难时期，他一直这样鞭策自己，始终以身作则。他在与军民同甘共苦的同时，又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上级组织的指示，坚持抗日战争，开展坑道战、地道战，进行生产自救，多次粉碎日伪的“扫荡”。为了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进行爱国抗日宣传，他还利用夜晚和业余时间，编写了历史剧《陈胜吴广》、《岳飞之死》、《黄天荡》等剧本。在湖西根据地广为演出。经过一系列工作，终于克服了连续几年的困难，使湖西根据地的形势好转。随着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从1944年开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了局部反攻，到1945年形势完全扭转过来了。不久，日本侵略者终于宣布投降。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迫切要求和平，坚决反对内战。国民党当局，却执意要发动内战，他们一方面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遭到解放军反击的情况下，又由美国出面进行所谓军事调停。除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停执行部外，各地都成立了军事调处小组。郭影秋作为冀鲁豫区的组长，参加了在徐州地区的军事调停谈判。所谓调停谈判，在美国与国民党方面，不过是以谈判为名，拖延时间。因此，双方坐在一起，常常是争吵一番了事。丝毫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郭影秋指派一名参谋接替谈判，他则回到湖西地区。这时，原中共湖西地委书记潘复生调冀鲁豫区，由郝中士接任地委书记，郭影秋任副书记，同

时任军分区司令兼政委。1946年6月，郭影秋调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

不久，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并于1946年9月15日，遣派两个团的兵力，配合飞机大炮，向济宁进犯。郭影秋率全城军民进行了艰苦的济宁保卫战。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傍晚，因寡不敌众，撤出济宁城。

济宁失守前后，整个湖西地区也全部被国民党侵占。1946年12月初，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与政委张玺找郭影秋谈话，希望他带兵重返湖西。不久，郭影秋被任命为中共湖西区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当时，国民党在湖西驻扎了27个整编旅，所有城乡都驻有国民党部队，冀图通过几次大仗把国民党打出湖西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群众，取得立足点，然后采取游击战的形式，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解放区的地盘。郭影秋率领军队、地委机关和各县机关的干部和民兵，一边打，一边往敌占区插入，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逐步占领了一些阵地。为了在湖西站稳脚跟，他们又及时提出：县不离县，分区不离分区，千方百计克服困准，站住立足点。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他们又按照中央的指示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分得土地的农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军，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很快又收复了湖西，并站稳了脚跟。

1947年6、7月以后，全国的解放战争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6月底强渡黄河，随即又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时陈士榘、唐亮带着三四个纵队近10万人，来到湖西地区及鲁西南一带牵制敌人，配合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这十来万人在湖西地区活动，得到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郭影秋领导的中

共湖西地委，组织了庞大的后勤班子，筹粮筹饷，积极支援野战部队，与陈士榘、唐亮及其部队，相互配合，十分默契。

1948年初，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整风与土改工作会议后，中共冀鲁豫区党委重新进行了改组，郭影秋由湖西地委调区党委任敌工部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发展迅猛，至9月底冀鲁豫区全境已基本解放。1949年2月，晋冀鲁豫中央局来电：“郭影秋的工作由刘邓首长安排。”旋即又接到正式通知，郭影秋被调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十八军军长是张国华，政委是谭冠三，从此他又离开地方转入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

郭影秋到十八军后，随即南下。1949年3月至阜阳，4月初又抵桐城。当时二野政委邓小平与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等领导人都在桐城，在这里召开了二野团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报告了渡江的意义，部署了渡江作战命令。4月20日子夜，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进军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十八军也于4月22日，从中路的枞阳仅40分钟即突破了长江天险。

渡江之后，郭影秋随军转战于苏、浙、赣、湘、黔各地。1949年秋，二、四野战军会师于湘黔边界的藏江。在这里，十八军接到上级指示，要准备接管川南。1949年11月，国民党第四十兵团一部分约一个军的兵力在兵团副司令郭汝怀率领下起义。郭影秋奉命带人前往川南宜宾，研究了起义的具体安排，准备迎接我军大部队的到来。不久，李大章、彭涛、张国华等也带领川南行署和党委的大批干部和军队到了川南。

(七)

全国解放后，党的战略方针由武装夺取政权转入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郭影秋也由野战军转入地方党政部门工作。当时，四川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区。几个区的主要负责人分别是胡耀邦、李井泉、谢富治和李大章。李大章在川南地区任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彭涛是第二书记，郭影秋任行署副主任，主管行署的日常工作。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了川南、川东、川西、川北四个行署，成立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原来四个区党委和行署的干部进行了调整，郭影秋被调到了云南。

1952年秋，郭影秋到云南担任省政府副主席，半年之后，又被选为省长及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调离云南之前，一直担任此职^①。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之一，全省有彝、白、傣、哈尼、壮、佤、回、纳西、景颇、瑶、藏、布朗、蒙古、独龙、崩龙、基诺等数十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几乎占全省人口的1/3。郭影秋在云南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建设方面。向西到过红河哈尼族、彝族聚集区，东南到过文山壮族、苗族聚居区，东北到过昭通高寒地带，往南到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南到过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他具体抓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建立工作，排解了这两个民族间的历史纠纷；在西双版纳，郭

^①郭影秋：《我的自传》。

影秋取得中央卫生部的支持，从北京请来医疗工作队，防治瘴气——恶性疟疾，效果很好。滇东北昭通一带是高寒地区，那里村落孤单，交通阻塞，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都很低。郭影秋到该地调查后，向省委建议：对高寒地区要少征粮食；多给这些地区以补助；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价格要合理，应提高虎皮、豹皮、穿山甲等山货的收购价格。省委基本上采纳了这些意见，大大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山区的开发和建设。另外，他在云南工作期间，领导修建了靖平公路和昆缅公路。他于1954年4月参加昆缅公路通车典礼时，曾写了如下诗句：“微月喜看天下先，云南驿上走年年。晓风入鬓欺华发，宿雨漫山发杜鹃”^①。

1956年8月，郭影秋到北京参加党的八大。会后到中央党校学习。由于郭影秋参加革命前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很有感情，在党校学习期间，他曾向中央请求到教育部门工作。1957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他谈话，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决定调他到南京大学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1957年8月，他告别了滇池和云南各族父老兄弟，转入了教育战线。

(八)

1957年秋季，郭影秋到南京大学任职。当时，周总理曾对云南籍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说：“你们贵省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告奋勇到大学去。”这诙谐的话语，反映了周总

^①《郭影秋诗选》第35页。

理对郭影秋主动到教育部门工作的赞许。郭影秋到南京大学后的工作实践证明，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党政领导干部，同时也是一位懂教育、会办学的教育家。

郭影秋初到南大时，反右派斗争正处于高潮，“大跃进”的浪潮即将来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得不花相当的精力去抓政治运动。但在可能范围内，他尽可能设法少影响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广泛接触教师，或登门拜访，或开座谈会，并深入课堂宿舍，向学生了解对教学工作的反映和要求。当“大跃进”进入高潮时，政治活动多，生产劳动多，上下左右各部门动辄都要叫学校停课。郭影秋认为学校总还得上课，为了保证教学，在他主持下，学校规定了教学、科研、生产劳动各占多少时间，不得互相侵占。这样，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1961年初，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郭影秋根据当时高校的实际，及时在南大提出“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逐步使南大师生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转向认真教学和读书的轨道，使教学和科研成为学校的中心工作。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对学校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每学期都要进行教学检查；加强教学薄弱环节；提倡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抓好学生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三基”训练等等。这对稳定教师情绪，克服“左”的倾向，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郭影秋十分重视学校的科研工作。他把教学和科研作为办好学校的两个中心环节来抓，利用南大师资力量基础雄厚，学科齐全的特点，采取多学科合作，狠抓尖端，保证重点，大力攻关。郭影秋还拟定了南大贯彻“双百”方针的“十二条意

见”，进一步明确了全校各学科科研方向，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发展和提高，使南大的科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他还把每年的校庆日——5月20日，规定为学校的学术活动节。作为一校之长，郭影秋不仅号召教师刻苦钻研业务，著书立说，而且自己身体力行。他虽身兼数职，仍孜孜读书，从事教学和研究，给全校师生讲政治理论课，为历史系学生指导论文，还广泛搜集资料，完成了史学专著——《李定国纪年》。这些做法都激励了广大教师更加努力地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

郭影秋在南大任职期间，学校的规模有较快、较大的发展，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他来时全校学生有4000多人，离校时已达6000多人。学科建设也有相当发展，陆续建立了一批新的专业，至1961年全校已有33个专业。教师队伍不断扩大，人才迅速成长，逐步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综合大学。郭影秋也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中成为一位深孚重望的大学校长^①。

1963年初，周恩来总理拟调郭影秋到国务院做副秘书长。恰在此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急请周总理给他派一位得力助手，以改变学校当时的工作局面。中央经慎重研究后，决定改派郭影秋到人民大学，协助吴玉章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当年5月，郭影秋只身来到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老解放区革命大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直接创办的一所新型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建校后在培养政治理论师资和经济管理干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一段

^①参见潘忠哲、鲍仁娟：《郭影秋校长在南京大学》，《往事漫忆》第195—208页。

时期内，学校的领导工作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特别是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0年的“反修教学检查”，使学校的校系领导与教学骨干受批判的有近百人之多，一些同志还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干部教师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学校的工作处于停滞状态，郭影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人民大学的。

郭影秋坚持党的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广泛地同教职员工交谈。在掌握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后，他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办好人民大学，首要的是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以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他主持召开的全校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调整了学校机构和领导班子，为人民大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郭影秋十分清楚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他在开学典礼上，明确指出：“学校的中心工作是继续贯彻党和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把一切工作都转移到以教学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他亲自兼任教务主任，制订了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措施，要求各系各专业都根据学校的发展方向，制订和修改教学计划。他尊重和爱护老、中、青知识分子，关怀学生的全面发展，重视政工、后勤工作，充分调动学校各部门的积极性。从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短短的三年内，便使人民大学改变了面貌，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全校师生员工交口称赞：“影秋同志是德才兼备的好校长”，“不愧是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①。

^①参见张增连、黄达强等《郭影秋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往事漫忆》第209—223页。

(九)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郭影秋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6月13日，他代表华北局去上海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期间，康生竭力拉拢郭影秋，郭当面予以拒绝。从此，康生便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伺机进行打击陷害。7月27日深夜，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信口雌黄地诬称“郭影秋知道‘二月兵变’”。在康生的煽动下，第二天人民大学的部分师生，到北京市委要求揪斗郭影秋。郭影秋星夜被揪回学校，押上批斗台，戴上高帽子，低头弯腰四个多小时。

7月29日，郭影秋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职务被宣布撤销。

由于人民大学历史形成的原因，“文革”中郭影秋成为学校内部争论的焦点人物之一。邓小平、陶铸曾分别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保护性”的讲话。邓小平说：“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到人民大学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不很了解。但是，大家可以和他的前任领导比较一下，是否有进步有变化呢？”这些讲话不仅未能改变郭影秋的危难处境，反而加重了他的“罪行”而横遭迫害。吴玉章校长对郭影秋十分关怀和爱护，虽年事高迈，身体不好，仍拄着拐杖到校告诫师生：“影秋同志不是反革命，是党的好干部。”吴老还到医院慰问被批斗后患病住院治疗的郭影秋，当郭向吴老汇报了他到人民大学后几年来的工作情况时，老人家边听边落泪，最后语重心长

地说：“你用心很苦呀！”吴老这句肺腑之言，成了他同影秋的最后诀别之词。1966年末，敬爱的吴老不幸病逝，被打成“黑帮”的郭影秋竟被剥夺了向吴老遗体告别的资格。

郭影秋自从被揪回学校后，关押、批斗、毒打、审讯，受尽种种野蛮的残害，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特别是1967年3月3日，戚本禹到人民大学宣布郭影秋是人民大学的第二号“敌人”。从此郭影秋的处境更加悲惨。严密关押，轮番批斗，随意侮辱殴打，一日三餐不得温饱，有病不能及时治疗。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使他本来很健康的身躯垮了下来。终于小病酿成大灾，不得不截去左下肢，造成终生残疾。即便是在这样的处境中，郭影秋对党、对未来仍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坚信笼罩大地的乌云终归会被驱散，如同其诗句所说：“风狂天地暗，早晚见阳光”^①。在整个十年动乱中，他是那样沉着坚定，不赶风头，不讲假话，严于律己，实事求是，再一次经受了特殊环境中严峻的考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传来，郭影秋万分喜悦，他多次向中央请求恢复人民大学。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下，1978年4月，党中央责成成仿吾、郭影秋负责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筹备工作。7月7日中央批转下达了国务院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文件，从而使停办八年之久的人民大学正式恢复。在百废待举，困难重重的情况下，郭影秋为重建人民大学而日夜操劳，协助成仿吾，以残病之躯，架扶双拐，处理复校后的各种工作。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应在有限的时间内，再拚命为党多做点工作。1978年7月26

^①《郭影秋诗选》第103页。

日，在复校大会上，他勉励全校师生员工：“时间是宝贵的，我们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时间大约是七亿秒，七亿秒是一个很长的天文数字。如果我们能一秒一秒地思考问题，一秒一秒地处理工作，一秒一秒地培养青年，一秒一秒地锻炼身体，就是说争分夺秒地大干快上，我们会在一年、三年、八年、十二年之内，飞跃前进，大出成果，大出人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顾体弱多病，主持各种会议，架着双拐到课堂听课，到伙房调查，即使在病情加重、卧病在床时，依然关怀和指导学校的工作。直到他病情危重，脱离学校的领导工作后，当人们探视他的病情时，他依然仔细地询问和倾听学校各单位的情况，鼓励大家在新校长领导下，群策群力，努力工作，把中国人民大学办得更好。

1985年10月29日，郭影秋与世长辞。他生前曾两次嘱咐：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遗体交医院作科学研究用，《郭影秋诗选》的稿费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上交。

郭影秋的一位学生和战友，在献给他的一幅挽联中写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马列灵前应无憾；三寸丹心，百磨筋骨，众人眼底自成碑。”这幅挽联的确是郭影秋一生革命业绩和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

李 范 五

赵 俊 清

李范五，原名李福德，化名张松。1912年5月3日生于黑龙江省穆棱县。193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曾任林业部副部长、黑龙江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1986年5月病故。

(一)

李范五祖籍辽宁省辽阳县，1911年，李范五的祖父为了维持生计，携家人来到“北大荒”穆棱县八面通落脚。当时，正值官府“放荒”，便在穆棱河畔的狍子沟廉价买下数十垧荒地。靠一家人辛勤劳动，逐年有了积累。继而又雇工开荒，收租放贷，七八年后，李家发展成拥有土地百余垧、房产20余间，车马俱全的地主大户了。李范五的父亲是当地地主武装自卫队队长。一次，与土匪武装交战中，死于非命。1922年，李家由狍子沟搬到八面通。“由于土匪的勒索、土豪的敲诈，和自己不直接种地等原因，这个地主家庭就开始走下坡路，由兴旺而衰落。”^①“九一八”事变后，李家靠出卖土地、房产维持生活，到1945年东北光复时，土地仅剩20余垧。

^①李范五：《自传》（1962年5月17日），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李范五兄妹四人，排行居首，10岁时(1922年)入私塾读书。后到宁安县读高级小学。在小学时，曾因聪明勤勉、学业优良跳级升班。小学毕业后，祖父令其回家帮助料理家业，学习治家、发家的本领，但求知欲望强烈的李范五坚持继续读书。祖父见他只愿上学，不顾家业，十分生气，但也毫无办法。1928年，李范五来到哈尔滨，考入了东省特别区第一中学(现哈尔滨第一中学前身)。

东省特别区第一中学是哈尔滨一所著名学校。学校师生的思想十分活跃，一些进步学生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论国内外时事。这对刚由农村来到城市的李范五触动很大。他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对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产生忧虑。

1928年10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斗争(简称“抗路”斗争)发生，李范五和其他同学一道投入到这场火热的爱国斗争洪流中。

早在1927年10月，东北军阀张作霖为扩张势力，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与之秘密商妥了《满蒙新五路协约》^①。翌年6月，张作霖身死后，日本政府急于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不断向东北当局施加压力。同年10月，日本政府由南满株式会社和吉林省议会正式酝酿签订《中日民商合筑五路条约》。这消息一传出，立即激起东北各界群

①所谓“满蒙新五路”是指东北当局答应日本修筑的吉会(吉林至朝鲜会宁)、长大(长春至大赆)、吉五(吉林至五常)、延海(延吉至海林)、洮索(洮南至索伦)等五条深入东北腹地的新铁路。这些铁路修通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可以通过最短的路程把东北的物资资源从吉林经过朝鲜运往日本，而且，一旦爆发战争，也可用最短的时间，把兵员、武器运到东北内地。

众的极大愤慨。11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和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对时局宣言》，一时，抗路斗争如火如荼地在东北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11月4日，哈尔滨大、中学校代表在第一中学礼堂召开大会。当夜，李范五和同学们积极赶制小旗，书写标语。11月5日，哈市一中、二中及其他学校上千名学生冲破学校当局阻拦，在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日本驻哈市领事馆门前示威游行。示威游行中，李范五带头振臂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修五路”的口号，并散发传单。11月9日，哈尔滨市大中学生约五六千人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路”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至道外区正阳街口时遭到荷枪实弹的警察们的阻拦。李范五和同学们趁围观群众聚集之时，不断地向人群抛撒传单。他还按照传单上的内容向群众演讲。就在这时，手无寸铁的学生与持枪的警察发生冲突。200余名学生被警察打伤，酿成“一一九”惨案。李范五虽未受伤，但他的衣襟、袖口已被警察撕破。面对残暴的警察，爱国学生并没有被吓倒，“抗路”示威游行队伍终于通过正阳街，包围了滨江县公署和警察厅。学生的爱国斗争受到各界同胞的广泛支持。最后，东北当局在群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处罚了警察厅的肇事人员，并表示拒绝日帝筑路要求。抗路斗争取得胜利。

(二)

1930年春，李范五考入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预科，一年后转入本科外交领事系。

李范五在北平大学法政学院读书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

爆发。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许冲突”的不抵抗政策，仅旬日之间，日军即占领了沈阳、长春、吉林等战略要地，东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深渊中。面对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现实，李范五意识到个人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促使他产生了为光复故土河山，解救家乡父老于水火的强烈愿望。

1931年11月，李范五参加北平爱国学生“南下请愿团”，到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但是这一爱国行动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阻拦，在北平前门车站，为反对铁路当局不予出车，他积极参加了卧轨斗争。“南征兵横驿站前，血染单衫卧轨寒”^①，经过四天三夜的斗争，终于迫使北平国民党政府允许挂车南下。11月下旬，请愿团到达南京，与南京各界群众及各地到南京请愿学生汇合一起，在国民政府门前举行了示威，蒋介石被迫出面会见学生，但他支吾其词，避而不谈出兵抗日。

南下请愿的斗争深深地教育了李范五，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没落和无能，深感自己在外交领事系学习，“给国民党当外交官，简直是莫大耻辱，与自己的初衷相悖。”^②

在此期间，李范五在同学王述禹、李荫永（均为共产党员）的帮助下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如《唯物史观》、《中国往哪里去》、《北方红旗》等，开始潜心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觉得只有革命才有出路。”^③他开始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认识，感到要抗日救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能靠中国共产党。

①引自李范五诗选《壮怀集》。

②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

③李范五：《自传》。

1932年，北平“五一”反日游行示威后，李范五由李荫永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从此，他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各种反日活动。在参加“五一”示威前，他留下家书，把自己的衣物委托同学代管，以备不测。斗争中，他与同学和警察厮打，高呼“抗日爱国无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一直坚持到斗争结束。1932年8月，组织决定他担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总交通，专门负责北平市各区文件发行工作。他胆大心细，多次机智地摆脱敌人盯梢，使秘密工作从未受过损失。

1932年9月中旬，李范五由王述禹等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1933年初，李范五、孙绍堂受党的派遣，化装成小商贩由北平来到东北吉东地区，先后在穆棱县下城子、虎林县半截河找到两支义勇军。但这两支义勇军在敌人进攻面前都决定撤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两人决定先各自返回家乡宁安和穆棱，开辟地下工作，在工作中寻找地方党组织。

李范五与孙绍堂道别后，回到家乡穆棱县八面通。八面通依山傍水，土质肥沃，旱涝保收。它曾吸引过四方八面的人前来安家落户。但在此时，这个拥有200多户人家的小镇，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践踏，已变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霜后桑梓草木凋，怅望河山血泪飘”^①。家乡满目疮痍萧条冷落的

^①引自李范五诗选《壮怀集》。

景象，使李范五悲愤填膺，一股强烈仇恨日寇，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激愤之情，猛烈撞击着他的心扉。

李范五通过自己小学老师——县教育局的督学白润之的介绍，在八面通当上了穆棱县第二小学教员。从此，李范五便以教员职业为掩护，开始从事秘密的抗日工作。首先，他效仿北平法政学院的作法，在第二小学建立起“反帝大同盟”。接着，李范五又利用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在校外发展盟员。经过三个月时间，以八面通的二小为中心，在兴源镇、下城子、八面通火车站、狍子沟、白石砬子等地建立起五六个反帝大同盟分部。

1933年5月，李范五通过小学教员李增岱（反帝大同盟盟员）找到了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中共吉东局委员，团吉东局书记关书范在下城子党的秘密联络点会见了李范五。李范五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自己从北平回到东北的经过及自己在家乡秘密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情况。关听后，对李范五的工作予以肯定，同时，向他传达了党中央于1933年1月26日写给东北党组织的指示信（即“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

他根据党组织的建议，把“反帝大同盟”改成了“反日会”，并在原“反帝大同盟”盟员中发展了数名党员、团员。

1933年7月，中共吉东局又派人前来八面通，实地检查了狍子沟、白石砬子，兴源镇等地党团和反日会的工作，决定成立穆棱县委，让他任书记。同年9月中共吉东局决定调李范五到宁安工作。

（四）

1933年9月，李范五按中共吉东局指示，辞退教员职务，

离开穆棱，到达宁安，住在孙绍堂家开的客栈内。

10月初，中共吉东局同志前来与李范五接关系，决定让李范五担任中共宁安县委书记。

李范五接任宁安县委书记工作后，把县委工作重心放在开展敌占区地下工作和组织、支援抗日游击战争上。他在原县委工作基础上，以上马河、卧牛河一带为中心，通过爱国的小学教员、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深入开展反日斗争，在宁安二区、三区、东京城一带，反日宣传工作以及反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的组建工作又有新的开展。同时，还在汉族、朝鲜族农民、工人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到1933年冬，党的组织扩大一倍，有党员62人，团员66人^①。县委在积极地做基本群众工作过程中，还争取利用一些上层人物，在伪自卫团和伪保甲长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如在上马河伪自卫团建立了反日会组织，并发展了数名党团员，这支队伍基本为我党所掌握。在东京城附近一些基层伪政权中，其保长、甲长、牌长多数是“内红外白”式人物。这些人表面与日伪当局点头哈腰，应付局面，暗地里与我党联络，递送情报，配合反日会为游击队筹款送粮，协助抗日部队做工作。

由于县委的积极努力，尤其是李范五在工作中能够认真依靠党团员，依靠基本群众，并善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游击区及附近的农村，地方工作开展得很好。有的地方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是反日会员。据1934年6月统计，全县有反日会员700名左右，并成立了11个反日会分会（地方7个，部队

^①《中共吉东局给省委的报告》（1933年12月）。

4个) ①。

然而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他的工作没有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在吉东局给省委的一篇报告中这样写道：“在党的县委和同志间，尤其是宁安，有许多极端不正确的右倾的富农和地主观念，认为在乡间，地主没有了，剩下的都是穷人，因此，无法进行斗争，或者说，现在穷的富的一样不得过，顶要紧还是反对日本。”②不久，吉东局巡视员来上马河检查工作，指出李范五在当地依靠私塾先生、小知识分子发展反日会员的作法是搞“上层勾结”，并要求尚未暴露政治面目的私塾先生于洪源全家到游击队去，如不去就开除其党籍。为此，李范五与巡视员发生争执。李范五坚信自己依靠农村中有威望的人发展抗日会员，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及争取保甲长的工作是符合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中关于造成“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精神的。他说：“不然，地方上不尽量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县委就是一个光杆县委。因此，只要是对反日有好处的作法，就不要怕别人说搞‘上层勾结’”。就这样，李范五在宁安继续坚持组织开展抗日斗争。

当时，宁安县是吉东地区抗日武装集中活动的地区之一。这里有党直接领导的李荆璞组织的农民抗日武装“平南洋总队”，周保中率领的救国军辽吉边区军一、三连。此外，在西北山、东南山、南湖头一带还有许多其他反日义勇军、山林队约千余人。为了团结扩大这些反日武装，李范五在积极开展地方工作的同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与队伍建立关系和解决队

①《中共宁安县委报告》（1934年6月8日）。

②中共吉东局：《关于绥宁饶河的工作给省委报告》（1933年12月）。

伍问题上。”^①由于李范五和周保中、李荆璞等人的积极努力，1934年2月16日，以周保中、李荆璞领导的部队为骨干，联合原救国军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等部共500余人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并在队内建立了军党委会。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联合宁安境内其他抗日武装力量，收缴地方反动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取得一系列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在此期间，李范五还亲自领导了组建宁安游击队工作。1934年4月6日，李范五以县委名义任命卧龙屯支部党员白殿贞为队长。这支游击队成立不久，在去唐头沟途中被敌人包围，队伍遭到失败。8月6日，县委又建起一支由61人组成的游击队。该队有党员6名，团员13名。下分4个小队，每个小队建一个反日会和一个识字班。^②李范五十分重视游击根据地建设。1933年末，他就曾请示中共吉东局，建议在有一定群众基础，地理条件好的八道河子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吉东局同意后，县委从汪清、小牡丹屯迁入部分群众，在八道河子建立了党支部、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

1934年4月，中共吉东局遭到敌人破坏，宁安县委直接由中共满洲省委领导。这时，中共满洲省委仍在继续开展反右倾。7月10日，省委写信批评宁安县委没有认真执行2月省委关于反右倾指示，“对省委2月间的指示信完全执行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抵抗。”^③宁安县委接到省委这一指示信后，李范

①《满洲(省委巡视员)文巡视吉东党团给党团省委的报告》(1934年5月6日)。

②《中共宁安县委报告》(1934年8月15日)。

③《中共满洲省委给宁安县委的信》(1934年7月10日)。

五感到，在原救国军、山林队中争取改造部队只有从上层入手，先敲开上层大门，然后在上层允许和支持下再进行下层工作，才能把上下之间的工作都做好。反之，如抛开上层领导人物，而直接派人到士兵中去工作，被人家发觉了，说你是挖他墙脚，引起上层的反感，反而会把事情弄糟。他认为所谓反对“上层勾结”，不是根据下边实际工作情况提出来的，而是从脑子里的“左”倾主观主义出发想出来的。

同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以省委巡视员身分由苏联来到东北吉东地区进行巡视考察^①。在宁安，李范五向吴平汇报了关于执行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党团组织及反日会等工作情况，听取了吴平关于中共中央在东北贯彻反日统一战线的意见。吴平对宁安县委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并指出不足。李范五听后，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对于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自我担任宁安县委书记以来，第一次听到上级领导如此明确地阐述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对形势透彻精辟地分析，……真是久旱逢甘雨，心里顿时感到十分亮堂。”12月10日，为了在宁安贯彻、执行吴平传达的各项指示，李范五主持召开了宁安县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问题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成为宁安党团组织在1935年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

^①据1934年12月8日《吴平给陈亚的信》载，吴平来吉东地区的任务是：（1）在政治上纠正吉东局领导下党组织之错误。（2）在组织上重新建立吉东特委，改造各地的领导机关。（3）建立与春山兄（海参崴太平洋赤色职工会工作人员）的交通联系，等等。

性文件。

1935年2月，吴平第二次到吉东地区巡视并受命组织成立中共吉东特委（吴平任书记），以接替被破坏的满洲省委吉东局对吉东地区的领导。同年5月，李范五被调到吉东特委（机关住址在牡丹江市）任组织部长。9月，吴平奉调离开特委，李范五任特委代理书记，负责全盘工作。当时，特委上级有两条线，一条是中共满洲省委；一条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设在海参崴的联络站。特委工作分布在宁安、穆棱、勃利、密山、饶河、宝清、东宁等地，领导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和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中的党组织。李范五在吉东特委工作期间，以面包铺老板身分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作，他主要抓了“八一宣言”的贯彻、执行，努力扩大统一战线，纠正各地工作中的一些“左”的作法。对所属密山、穆棱县委机关进行了整顿，随着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贯彻，吉东地区抗日武装斗争进一步发展。不久，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五军。抗日游击区也由原来的宁安、密山、饶河、虎林四县，扩展到额穆、汪清、穆棱、勃利、依兰、方正、宝清、富锦等十几县。

1936年2月初，前来吉东特委汇报工作的抗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罗英在牡丹江被捕叛变。李范五得知这一消息后，果断地决定特委机关及工作人员转移，及时切断了各县委与特委的联系。之后，他离开牡丹江，经密山去海参崴中共代表团联络站。在那里，他向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的吴平汇报了吉东地区工作情况和特委被破坏的经过。以后，李范五遵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知，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

（五）

东方大学八分校，坐落在莫斯科近郊，环境优雅静美，是潜心学习的好地方。当时，这所学校学员约有70多人。学员按文化程度和在国内所担负的工作编为五个班，李范五所在的第四班是个高级班，与他同班的有刘仁、韩光、钟子云、林一等十六七个同志。

在校期间，李范五特别感兴趣的是陈潭秋主讲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党的建设，吴玉章主讲的中国古代、近代史及苏联同志讲的联共（布）党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李范五在校学习两年，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通过学习，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

1938年6月，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前夕，八分校学员陆续接到回国通知。李范五早就想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此刻，回国参加斗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心里十分高兴，在其所作《满江红·莫斯科遥望》一词中写道：

望断乡关，
霜风劲，征尘漫天。
长相忆，持戈盘马，
截虎平川。
多少英雄流碧血，
几许战骨葬湖边。
镜泊湖，至今水红流，
心似煎。

冲怒冠，难入眠，
归期盼，梦征鞍。
饮马松江水，
斩尽倭顽。
擒寇驱敌豪气在，
补天填海枕戈眠。
血化雨，一洗北尘昏，
鏊在弦。

8月中旬，李范五与韩光、钟子云等第四班同学由莫斯科启程回国。经新疆、甘肃，奔赴陕北延安。

李范五到延安后，开始时在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务科任干事，研究员，在科长刘锡五领导下，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对那里的各种事物都感到新鲜可爱，曾写下了“重尝小米倍芳香，粗布衣帽增容光”、“开荒种地打新窑，纺线织布忘疲劳”、“青年跋涉来四方，眷爱延安胜故乡”等诗句。

193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同时在抗日军政大学建立东北干部训练队。1939年2月，李范五由中组部调到东北干部训练队，任政治指导员。1940年2月，又被调到东北工作委员会担任秘书。在东北干部训练队工作时，他经常与学员谈心，鼓励学员努力学习，积极参加训练，为将来收复东北作好准备，并根据当时局势，引导学员贯彻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在东北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李范五认真总结、研究东北抗日斗争经验、教训。在吴平等主持

下，他积极参与了资料《东北抗日斗争经验教训的点滴》（约20万字）的编写工作。1941年9月他调任中央党务研究室敌后组任组员。1944年2月，他又被调到中央情报部任总务处长。在延安的八年间，李范五多次调动工作，有时担当一定负责职务，有时为一般工作人员，有时做研究工作，有时做事务工作，但他都认真地服从组织分配，听从组织调动，从不讲价钱，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在1945年中央情报部部务会上通过的一份关于他的鉴定上说：“工作努力有成绩，能埋头苦干，解决了机关的经济困难，建立了机关的家务，培养了一批干部。五年以来的工作完全证明了张松同志政治上是坚定的，可靠的，可以信赖的，是东北干部中好的干部之一。”^①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李范五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决定向东北派遣2万干部10万军队。李范五等奉命由延安日夜兼程奔赴东北合江省，11月17日到达省会佳木斯。李范五任合江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省政府副主席，不久又兼任合江人民自治军政治委员。

11月20日，李范五主持召开省工委干部大会。会上，他根据东北局指示精神决定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基干部队，对土匪实行收编政策。同时确定接收建立政权、发动群

^①张松同志鉴定（1945年8月23日），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众进行反奸清算、没收敌伪财产、恢复发展生产、培训干部等各项工作任务。会后，省工委即向所属各县派出干部，组建县委，县武装和县政权。并组织70余人的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在建立政权工作中，李范五根据当时我党干部少的情况，决定先在中心地区各县派去三十几名干部接收政权，把县长、公安局长、秘书、财粮科长的太权拿过来。他强调，在各县要把有罪恶和民愤的敌伪职员解雇清洗出去，对于一般的职员要继续任用，并派进由于校训练出来的青年干部，然后再调整机构，从人事、机构、制度、作风等方面进行改造。实践证明，这些做法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在短短的3个月间，便接收整顿好通河、方正、依兰、汤原等16个县及其佳木斯市政权。在广大农村，将敌产土地（开拓地）无代价的分发给农民，深得农民拥护。1946年2月下旬，合江省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李范五向大会作了报告，总结了省工委成立3个月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这次会议使全省军民深受鼓舞，对以后深入开展剿匪斗争、安定民生、政权建设和恢复生产、繁荣经济等工作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1945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从山海关推进到沈阳，曾被我们三江人民自治军收编的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政治土匪武装相继举起叛旗，严重威胁我根据地开辟建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李范五于1946年1月主持召开了一次省工委会议，决定与土匪进行谈判，给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匪首划一定的“驻防区”^①。这一决定受到了合江人

^①《省委对土匪政策给前方的信》（1946年1月16日）存黑龙江省档案馆。

民自治军司令员方强等的抵制。不久，中共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在哈尔滨高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下达，澄清了党内模糊思想，统一了步伐。合江省工委把剿匪斗争列为一切工作之首，确定了军事上坚决打击、歼灭，政治上分化、瓦解的剿匪方针。经一年多时间，200余次战斗，将在合江地区嚣张一时的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张雨新等十余股政治土匪（约一万人）消灭。以后，李范五谈到这一问题时，曾作自我批评说：“当我军未进入合江前，有过近三个月的和平时期，这对我的思想起了一定的麻痹作用。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东北土匪的阶级性质、政治背景及其反动性，一时没有认识清楚，因此，对剿匪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①

1946年5月11日，张闻天由牡丹江到达佳木斯。中共合江省工委改组为中共合江省委，张闻天任书记，李范五任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中共合江省委组成后，李范五分工抓政府和经济工作。当时面临的经济状况是极端困难的，可谓“商店无货、工厂无料、汽车无油、医院无药、部队无衣、财政无票（钱款）”。为了在较短时间内改变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合江省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全省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并决定由李范五任清理敌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清理出大批敌伪物资和银行现金，没收、接管了原敌伪经营的火磨、油坊、烧锅和粮米加工厂，兴办了木材加工、皮革等工厂。为了进一步加强省委、省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李范五多次主持召开省政府工作会议，讨论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增

^② 《佳木斯党史资料》第1辑。

加收入、克服经济困难等问题，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发展生产、保护城市工商业等政策。为要抓好粮食，成立了粮食局，李范五亲自兼任局长。同时成立工业厅、农业厅、财政局、林业局，并派出得力干部担任领导，结果，粮食、煤炭、木材、黄金生产和运输、财政等各方面工作逐渐打开了局面。较好地完成了支援前线的任务。因合江地区的发展和巩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一些后方机关相继从哈尔滨市迁到合江。东北大学（其前身为延安大学）、东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画报社、东北书店、东北电影制片厂等单位都迁至佳木斯，一大批从延安来到东北的学者、作家、诗人、音乐家、艺术家也云集于此。佳木斯市曾被誉为“东北的延安”，合江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大后方的作用。

1949年4月，合江省与松江省合并，成立新的松江省。同年7月，李范五从佳木斯来到哈尔滨，任松江省政府副主席。10月，他又被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副部长。

（七）

林垦部（1951年11月改为林业部）是新中国诞生后新设立的一个部。这是周恩来采纳我国著名的林学家、教育家梁希先生的提议设立的。1949年11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梁希为林垦部部长，李范五和李相符为副部长。旧中国林业基础薄弱，人民政府对林业工作又无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为了筹备召开全国第一次林业会议，李范五亲自参加了华北五省林业状况的调查。在河北正定、新乐调查时，他看到了那里由于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十几万亩良田因受风沙侵

袭，已变成沙地。当地群众听说共产党要领导群众植树造林，治理沙害，就说：“你们要能刹住这沙荒，我们就给共产党修座庙。”这次考察，李范五看到了森林生态遭到破坏后，大自然对人类报复的恶果，这使他对林业专家梁希部长所说的“没有林业，农业就不复存在，森林是农业的根本”，“发展林业不仅可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时还能减轻自然灾害，保证农业丰收”，有了进一步的体会，进而使他增加了领导林业工作的责任感。

1950年2月，全国第一次林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李范五认真听取了各地代表所谈的本省林业情况。这次会议确定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合理利用”的我国林业建设的总方针。会后，以普遍护林、大力造林、合理采伐、利用森林为中心的林业工作，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为了搞清全国森林资源，更好地适应国内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对木材的需要，李范五主持组建林业部森林调查大队工作。从1954年开始，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对全国森林做全面调查。调查人员深入林区，经过几年艰苦工作，第一次系统地掌握了全部森林资源的各种数据，为以后的森林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项工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表扬。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林业工作，全国没有一所专门的林业院校，只是一些农业院校设有森林或林业专修科。李范五认为，要把林业搞上去，没有大批林业技术干部是不行的，他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林业大学，就像工业有工业大学，农业有农业大学一样。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他提出创办林业大学的建议被采纳。1952年，全国农业院校在院系调整时，合并了一些农学院的森林科系，根据全国各大林区的分布

和师资力量实际情况，成立了北京、南京、东北三所林学院。

三所林学院成立伊始，李范五对各校设置什么专业十分关心。他强调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森林植被不同，林业生产方式各一，在各院校专业设置上，除专业基础课外，要根据不同情况设置不同的重点专业。如东北森林面积大，采运木材量多，就在东北林学院设立了采运专业。南方林产工业较发达，师资力量也较强，就在南京林学院设立了林产化工等专业。1953年，李范五到南方林区检查工作，当他看到苏杭二州的园林艺术时深受启发。他想，新中国已成立了，要使中国古代的园林建筑技艺为人民所用。于是他提出在北京林学院设立园林系的意见。不久，北京林学院设立了园林系。这个系毕业的学生在我国大中城市园林建设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6年，是我国林业建设蓬勃发展的一年。这年春，毛泽东为发展林业向全国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3月18日，李范五与雍文涛（林业部副部长）来到中南海，向党中央汇报林业工作。当时听取汇报的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毛泽东在听到李范五汇报我国森林面积只占国土的5%左右，按人口平均是世界最少的国家之一时说，“大事不好啊！”当汇报到林业每年给国家上缴利润五六亿元时，毛泽东说：“林业真是一个大事业，每年给国家创造这么多财富，你们可得好好办。”最后，毛泽东对李范五、雍文涛说：“林业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你们回去后，要继续把工作抓好。”^①

^①李范五：《我对林业建设的回忆》。

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范五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翌年，李范五率中国林业考察团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学习这两个国家的林业经营、管理经验。回国后，他组织出国考察的专家写出40万字的考察报告。这次考察对我国林业建设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八)

1958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调李范五到黑龙江省任省长。当时“大跃进”的战鼓在全国正敲得震天响，李范五也受到“大跃进”浪潮的冲击。他为在林业战线上创造奇迹，在省委办公会议上提议依靠黑龙江自己的力量开发大兴安岭林区。这次开发在各种困难和自然灾害打击下，失败了。但他认真总结失败教训，又多次向国务院建议由国家组织力量开发。以后，大兴安岭林区开发终于获得成功。这与李范五的积极倡导和促成是分不开的。

1960年10月，李范五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同年12月5日，在省委二届二次全委会议上，李范五详细地总结了几年来农村工作的情况，批评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共产风”问题。会后他亲自抓清算“一平二调”，落实兑现退赔工作。他针对有些干部对退赔有抵触情绪，反复讲明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要求，不能剥夺农民这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重申，凡无偿占用、不等价侵占农村公社各级所有和社员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属于平调，都必须坚决退赔，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对退赔工作的领导。到1961年6月末，

全省退赔折款 22500 万元，占所计算平调总值 33600 万元的 67%^①。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在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李范五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他根据黑龙江省几年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失调的实际情况，提出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前提下，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按比例调整重工业，加强轻工业。因“大跃进”中，“钢铁元帅”升帐，全省轻工业投资逐年减少。1959 年轻工业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 4.9%，1960 年占 2.6%，1961 年占 1.7%。结果，轻工业产品严重不足，满足不了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李范五提出缩减钢铁、木材及非重点非急需的机械工业的生产，适当发展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的机械工业，加强煤炭、石油等薄弱环节，积极安排和发展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生产，特别是编织品、木制品、陶瓷品、玻璃用品、日用五金及麻毛丝化等轻工业品的生产。他还提出要恢复手工业的三种所有制，恢复一批手工业合作社，恢复一些适于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家庭手工业。

在 60 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克服三年困难，李范五顾全大局，服从整体。他和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一道经常教育干部要认清形势，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为党和国家分担困难。工作中，他敢于正视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1961 年 9 月 25 日，李范五在省直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中认真地分析了省委、省政府在工作中的

^①李范五：《在全省二届三次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提纲》（1961 年 8 月 4 日）。

错误：对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认识掌握不够，在调整所有制时，对现有生产力水平估计过高，在一个时期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够等。并承认，由于有了这些缺点、错误，再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就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他批评了一些人只报喜不报忧的错误作风。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他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说：“现在一张口就是三、六、九（即三面红旗、六亿人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简直成了老套子，总是爱听赞歌。”当时尽管李范五和许多领导人一样对大跃进在总体上予以肯定，但他能够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认真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扎扎实实加以纠正，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他和省委、省政府及广大群众的努力下，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全省困难局面逐步得到克服，农业、工业、财贸、交通运输等各条战线的工作，得到较快地恢复和发展，整个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起来。

在全省国民经济出现转机的基础上，为争取农业全面丰收，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李范五在1963年2月召开的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坚决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强调要认真贯彻提高单产和扩大耕地并举的方针，大力推行农业技术改革，在坚决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种好管好现有全部农田，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扩大耕地面积，力争多种多收，同时，要发展多种经营，把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生产搞上去，以便更好地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经过一年奋斗，黑龙江省农业生产获得全面增长，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1963年比1962年粮食增产21亿斤，主要经济作物增产了50%，林业、

畜牧业、副业、渔业生产也有一定的发展。1964年、1965年全省经济仍稳步上升，农业连续获得丰收，工业生产重新走上健康发展轨道。1965年农业总产值为21.33亿元，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工业总产值为75.92亿元，比1962年增长了67.6%。主要产品产量有大幅度增长，质量也有很大提高。随着工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商品货源显著增加，市场供应状况进一步改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这使黑龙江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昔日“北大荒”落后状况，而且具备了相当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成为国家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和商品粮生产基地。

李范五在主持省政府工作中，十分注意强调政府机关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健全工作制度，克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等不良习气。对各级干部，他要求应以无限的忠心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的工作。李范五坚持把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别人意见作为重要工作方法。他常常深入工矿、农村、林场、大专院校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倾听群众呼声，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1965年，李范五去海伦、绥化两县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蹲点调查中，他发现这个主要产粮区农民给国家做出很大贡献，但一些社队农民生活还十分贫穷。他认为这是经济管理体制有毛病，要求农民主要搞粮食生产，经济结构单一造成的。如要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改变单打一的产业结构、把副业、林业都搞上去。于是他便在领导“社教”的同时，着手研究农村单一经济结构问题，以尽快改变农村贫困面貌。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李范五与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被打成黑龙江省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

省级领导干部中，他最先在全国被点名批判。在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李范五蒙受许多不白之冤。1961年7月，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黑龙江林业工作，当时省委决定由李范五陪同，这被诬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搞反革命勾结，说李范五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李范五和欧阳钦又被戴上“里通苏修反党叛国集团大头目”的帽子。运动中，他不断地遭到审讯、批斗。随着批斗的升级，李范五的黑龙江最大走资派的头衔，又加上了“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副词。1967年9月，李范五被关押。1975年8月又被送到绥棱农场劳动改造，接受“专政”。在长达八年的狱中生活，三年劳动改造中，他受尽了凌辱、折磨和迫害，其身心遭到严重摧残，患有冠心病、胸膜炎、反应性精神病。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后，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李范五冤案于1979年得到平反，经党中央批准，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恢复了名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范五衷心拥护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表示在有生之年要继续为党的事业作点有益之事。他曾写下“动乱余痛何足念，残烛未烬自奋燃”的诗句，表达了他的这一愿望。1985年，李范五离休后，不顾年老体衰，在有关同志协助下，坚持撰写革命回忆录，整理诗作，参与《当代中国》丛书林业卷的编纂工作。他在病重住进医院后，仍不顾病痛，争分夺秒阅改书稿，直至弥留之际。李范五著有：《我对林业建设的回忆》（15万字）、《燕山黑水风云录》（23万字）、《壮怀集》（收录多年所作诗词65首），这些著述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86年5月7日，李范五因久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北京解

放军总医院。终年 74 岁。

附 主要参考资料:

1. 李范五自传（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2. 中共宁安县委报告（1934 年 6 月 8 日、6 月 22 日、8 月 15 日、8 月 24 日、8 月 28 日、12 月 25 日）。
3. 中共满洲省委给宁安县委的指示信（1934 年 7 月 10 日、9 月 12 日）。
4. 中共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决议案（1934 年 12 月 20 日）。
5. 中共吉东特委报告：关于政治军事及组织问题（1935 年 8 月 3 日）。
6. 李范五：《燕山黑水风云录》（未刊本）。
7. 《牡丹江党史资料》第 1 辑。
8. 李范五：在合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46 年）。
9. 《省委对土匪政策给前方的信》（1946 年 1 月）。
10. 《佳木斯党史资料》第 1 辑。
11. 李范五：《我对林业建设的回忆》。
12.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史料选编》。
13. 中共黑龙江省委文件（1960—1964）。
14.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为“以欧阳钦、李范五为首的里通苏修反党叛国集团”假案平反的决定（1979 年 3 月 1 日）。
15.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撤销李范五同志审查报告中有关不实之词的报告（1980 年 10 月 18 日）。
16. 钟子云、赵毅敏、韩光、黎侠等同志回忆录、访问录（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存）。

曹 靖 华

冷 柯

曹靖华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鲁迅和瞿秋白的挚友，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五四”以来我国翻译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的开拓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年高德劭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曾任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苏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理事兼北京市分会副会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世界文学》主编等。曹靖华在晚年年高多病，还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鲁迅博物馆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顾问、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

(一)

1897年8月11日，曹靖华生于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路沟口村。其父曹植甫，晚清秀才，一生从事小学教育，在教学中极重德育，要求学以致用。曹靖华五六岁时，跟一位伯父读书，这位伯父只教读、背，从不讲解。当时，他父亲在河南陕

州直隶州分州书院——即朱阳关义学执教，得知这一情况，便把他带在身边，常用自己撰写的《劝学篇》、《实话篇》等文章，循循善诱，启发他努力做到品学兼优。曹靖华在作文中写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善虽小，以善名，恶虽小，以恶名”，曹老先生看了高兴地说：“这才是是非分明，明白事理的人。”同时谆谆教导儿子善事要一点一点去做，恶事一点也不能做，做人要做一个方方正正的人。曹家素以耕读传家。农忙时，曹靖华随父务农，利用田间地头听父亲讲课，以树枝草茎作笔，画地练字。在学习内容方面，除教四书、五经外，还学习中国和世界历史、地理，拓展视野，开阔胸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毅然剪去辫子。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每遇假期，仍夜以继日地跟随父亲学习。

对于曹植甫的精神、人品和教学，鲁迅于1934年曾撰写了《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文中写道他“品节卓异……秉性宽厚，立行贞明，……专心一志，启迪后进，……循循诱之，长久不渝……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曹靖华自幼受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少年时代便养成了勤劳、顽强、好学、忠厚、朴实；一丝不苟、洁身自好的品德，打下了坚实的汉语文学基础。他说：“父亲牵着我的手，在新的道路上前进了……”①。

(二)

1916年，是世界风云剧变的年代，曹靖华怀着一颗追求自

① 《曹靖华散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页。

由，向往光明的心，背着行李，走出深山，步行四天到洛阳，又乘火车到开封，考入河南省立第二中学。此时，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五洲，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他被《新青年》杂志发起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启蒙运动所吸引，积极拥护《新青年》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他写的一篇宣传新思想的白话文，引起了一场风波。当时的国文老师把文章摔在地上，当众训斥：“把秤钩钩（问号）都写到文章里，这还了得！……”他当场反驳：“世界是进化的，别人有的，我们没有，并且又需要，就应该学，应该借来用。白话文是时代潮流所趋，像长江大河一样，一泻千里，谁也阻挡不住，谁阻挡就要被它冲走！”^①课后又写文章，为新文体辩护。那位老师竟为此辞职。接着，他从《每周评论》、《新潮》、《湘江评论》、《晨报副刊》、《曙光》等传播新思潮的报刊中，吸取大量的精神养料，提高了思想认识。1917年，他在《暑假讫，赴汴入校途中记》一文中写道：“遥瞩木拔禾偃，一片汪洋，余前过此（指中牟县境），尚属赤地千里，今则尽成泽国矣。旱涝不均，民之生活艰难可知也。任政界之责者，何故及此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当政者的斥责。此后他接触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如《易卜生集》、《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他贪婪地读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世界文学大师的著作。开拓了眼界，也开拓了从事文学的道路。

伟大的五四运动传到开封，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同学们的正义斗争，曹靖华是河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①访问曹靖华录音（1982年11月至12月）。

一。为了声援北京同学的正义斗争，抗议河南督军赵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恶行径，河南学联决定省会15所中等以上学校于5月30日总罢课，集会游行。赵倜闻讯，29日晚派大批武装警察，围守各校校门，不许学生出入，致使原定计划未能实现。但在学联的领导下，学生们终于冲破反动当局的阻挠，于31日实现了总罢课。曹靖华和同学们一起走出课堂，围坐督军府请愿，向军阀示威，到商店检查封闭日货。他们还高举“还我青岛”、“抵制日货”、“传播新思想”、“介绍新文化”的旗帜，到校外进行宣传。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帝国主义者滚出去；打倒束缚中国人民的封建势力，提倡新文化运动，言论自由，妇女解放等，以激励民众反帝爱国和反封建的思想情绪。

五四运动后，曹靖华发起组织了开封第二中学“青年学会”，并与安徽芜湖五中的蒋侠僧（蒋光慈）和北京“少年学会”的赵世炎取得联系，同省女一师的“女子同志会”携手前进。

他还同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自筹经费，创办《青年》半月刊，作为探索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园地。《青年》于1920年元旦创刊。创刊宣言的头一句话就是：“‘五四’运动这个惊天动地的大运动起来以后，今天的中国，不像以前的中国了，今天的青年，也不像那以前的青年了。”他们以“研究真实的学问，以养成青年的真精神”为宗旨，把“奋斗、诚实、宏毅、勤俭！”做为信条。《青年》共出版七期，由北京铅印，每期印数四五千份，在省内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曹靖华是《青年》的主编，也是重要的撰稿人。他在《青年》上发表有短论、杂文、随感、新诗十数篇，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他写道：“我梦已醒，我

志已决，我愿整顿红旗做健男”，“我愿本我冲杀奋斗的精神，和那黑暗恶魔宣战！”“我愿做一个离经叛道的狂人”，“做一个彻底觉悟的新青年！”肩负起“社会的根本改造，根本建设”的责任。他写道：“中国的社会，如同在十八层地狱里边了……层层黑幕，层层压迫，简直不是人类的社会……是禽兽的生活，强盗的生活，牛马的生活……”，他在文章中喊出了“破除阶级的制度！强权的组织！废除那不是人道的信条规约及吃人的礼教，去讲真正的人道主义”。并提出“组织劳工、同盟会，倘若那吃人肉的官僚与那喝人血的资本家虐待我们，我们全体罢工，与他作最后的血战。”他的文章还写道：“与那贵族官僚奋斗！破除不平等阶级！作公产社会先锋队！为20世纪的世界史上开个实行公产的新纪元！”这一切反映出他创建新社会的强烈愿望。

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时代和认识的局限，他还不能提出根本改革社会的正确方法和道路。在回忆这段情景时，他说：“当年只知反帝反封建，幼稚之极。曾用唯心主义观点看问题，完全不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①“后来学习了李大钊同志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现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思想振动很大，才有了新的认识。”②

1920年春天，曹靖华和屠亚超二人被推选为河南省学生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国第一届学生联合会。在会上认识了留日学生李达和另一代表张静庐，在思想上受到了更大的启发。

①曹靖华书信三封（1979年致林浣芬）。

②访问曹靖华录音（1985年5月）。

(三)

1920年夏天，曹靖华无钱继续升学，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上海泰东图书局当校对。这时，正值上海共产党小组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举办外国语学社（设在上海渔阳里六号）。经人介绍，他进入该学社学习，与安徽籍的蒋光慈、韦素园编在一个小组。共同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刘少奇、罗亦农等。教师是杨明斋，主要讲《共产党宣言》。在这里，他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选派的第一批前往苏俄留学的学员。

1921年，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苏俄，他亲眼看到了列宁所领导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看到了刚刚结束国内战争的苏俄人民在极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顽强精神，感到苏俄人民所走的解放道路正是中国人民要走的道路，在那里他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和希望。

在苏俄，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瞿秋白。当年瞿秋白是《晨报》社派往莫斯科的记者，精通俄语。曹靖华俄语基础差，也没有字典可查，老师是俄罗斯人，不懂汉语。由于语言不通，学习很困难，他感到读俄文版的著作像没有牙齿的人啃钢条一样，啃不动。于是他就和韦素园常常求教瞿秋白。瞿秋白热情地关怀和帮助他们，常常不顾严重的肺病（吐血，右肺的一叶已经开始烂了）耐心教他们怎样用中文恰当地表达俄语的原意，并且还向他们谈了许多政治理论和文学问题。瞿说：“苏俄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革命宝山，要拚着生命，把革命的宝贝尽

量运到祖国来……”^①曹靖华亲眼见瞿抱病写了《共产主义的
人间化》、《莫斯科的赤潮》等通讯，把苏俄的真实情况介绍
给追求光明的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瞿秋白的崇高革命精
神深深感动了曹靖华，并引导着他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

东大不以教授语言为主，曹靖华在那里学习了一年多时间
返回国内。但他感到还没有把“翻译”这个工具真正拿到手。
要想把十月革命的精神和思想武器引进中国，自己必须精通俄
语。经李大钊介绍，曹靖华到北京大学当了俄语系的旁听生，
继续学习俄语，同时兼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课程。强
烈的使命感，使他急切地感到应该把俄罗斯的进步文学和苏联
文学及早地介绍给中国人民，于是，便一面学习，一面实践，
开始了文学翻译。20年代初期，他跃登中国文坛，成为最早介
绍俄罗斯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的作家之一。在此期间，他创作
了三幕短剧《恐怖之夜》，1923年6月4日至13日的《晨报
副刊》连续予以刊载。该剧生动的描写了苏联国内战争刚刚结
束，远东滨海一带红、白两军进行着白刃战的实况，真实地反
映了中国留学生向往革命圣地，追求真理的革命豪情。剧中第
一次塑造了中国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形象。

1923年初，瞿秋白由苏回国，主编《新青年》季刊。曹靖
华前往请教，带去第一篇翻译剧本《狗熊》（即《蠢货》契诃
夫著），瞿秋白勉励说：“中国文艺田园太贫瘠了，希望你多学
习，多介绍，作一个引水运肥的‘农夫’。”^②使他倍受鼓
舞。他目睹瞿秋白译《国际歌》的动人情景，深为敬佩。曹靖华

①访问曹靖华录音（1982年11月至12月）。

②《曹靖华散文选》第37页。

耳濡目染，在思想水平和翻译水平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他翻译了契诃夫的《三姊妹》等短篇小说。《三姊妹》是契诃夫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预感到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对未来生活充满乐观态度的一个剧本。

《三姊妹》喊出了“一场强有力的、扫除一切的暴风雨，已经降临了，它要把我们社会里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和腐朽的苦闷一扫而光”的呼声，并展望未来的生活“一定是无限美好的，十分惊人的”。剧本所反映的主题正是列宁在这个时期非常关心的问题。《三姊妹》译好后，由瞿秋白推荐给郑振铎，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这时，曹靖华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翻译的剧本，多次再版并在全国各地进步剧团上演，影响深远。

(四)

1924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在北京第一次接触。不久，胡率军南下，任河南督办，促使河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胡要求李大钊加派军事顾问团和共产党的干部来帮助工作。1925年，曹靖华奉李大钊之命来到开封，在国民军二军顾问团工作。工作中，曹靖华向苏联翻译瓦西里耶夫热情宣传中国新文化，曹靖华对瓦西里耶夫说，你不了解中国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文化，就没法工作，你应该通过介绍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来了解当前中国的革命。他推荐瓦西里耶夫翻译鲁迅的《阿Q正传》。为了解决翻译中的疑难问题，曹靖华多次写信向鲁迅请教。鲁迅为此给曹靖华回信四封，从此也开始了曹靖华与鲁迅的书信交往。《阿Q正

传》是最早的俄译本，是我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先声，它改变了外国人只了解中国旧文化的局面，也使鲁迅开始获得了国际声誉。

同年，在鲁迅的支持下，河南开封创办了具有进步倾向的日报——《豫报》，并发行了一个综合性文艺副刊《豫报副刊》。曹靖华曾为《豫报副刊》评论栏撰稿。如《呜呼“狗子”，可以休矣》、《告敢死队》、《答新宇君》等文，颇有影响。

1926年1月，直奉战争中，国民军二军失败，退出河南。曹靖华也在兵荒马乱中绕道徐州、上海，回到北京。李大钊对他说，广州正动员各方面力量准备北伐战争，很需要人。于是他奉派到广州国民革命第一军总司令部，任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4、5月间，曹靖华到广州，7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当年广州的火车只通到韶关，往北便没有铁路了，他只得骑马翻过大庾岭，到了湘江上游的乐昌，又改坐木船到长沙。接着由长沙到汉口、汉阳。攻打武昌时，政治部的翻译纪德甫阵亡，曹靖华立即接替他的工作，出生入死，完成了任务。随后又从长沙经萍乡到南昌。这时，孙传芳驻南浔铁路的军队被国民革命军消灭，曹靖华在南昌度过了春节。春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南京被反革命势力占领，曹靖华经九江折回汉口，随军继续北伐，攻打武胜关、郑州。7月，武汉政府背叛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曹靖华离开武汉，转道上海，乘海轮前往苏联。

（五）

1927年秋，曹靖华到达苏联。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执教，

次年，到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及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任教，积极地向苏联青年学生介绍鲁迅及其著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等，改变了过去那里只讲《聊斋》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局面，使苏联青年吸收了中国新文化，开阔了眼界。这一改革的积极成果为苏联培养了一批有名的汉学家。他们在后来的中苏文化交流中做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国民党对革命力量发动了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他身居异国，心系中华。瞿秋白让他把介绍苏联革命文学当作庄严的政治任务，鲁迅也约请他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给中国人民输送精神食粮。于是，他便牺牲寒暑假及一切休息时间，翻译了大量俄罗斯进步文学作品和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革命文学作品。他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将《铁流》译好，寄给鲁迅。但由于“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而鲁迅对这些译本却胜于爱护自己的儿子，亲自校订并作后记。瞿秋白在百忙中亲手补译了第一篇极有价值的《铁流》长序。鲁迅还节衣缩食，自己拿出千元大洋，“在岩石似的重压之下”，假托“三闲书屋”予以出版，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①。《铁流》出版后虽遭敌人层层查禁，但各地重版的不计其数。“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激励着成千上万的读者，成了革命者争取生存自由和光明幸福的火炬。由于曹靖华翻译的这些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思想威力，所以曹靖华的许多译作遭到查禁。例如他为了揭露中国反动派的伪装“仁者”的丑恶嘴脸，特意翻译的高尔基的《一月九日》——指1905年

^① 《鲁迅全集》第7卷，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805页。

1月9日，沙皇在彼得堡冬宫广场的大屠杀事件，仅寄到国内的唯一的一本，连同鲁迅为它写的“小引”，都遭到了扼杀。在这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严峻时期，鲁迅成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伟人，曹靖华成了介绍苏联革命文学的“中坚”（鲁迅语），他们两人在共同介绍苏联文学中结下了情逾骨肉的友谊。在风雨如磐的漫漫黑夜里，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第一线，同舟共济，携手开拓“运输精神食粮的航道”，“为起义了的奴隶偷运军火”。

在苏联期间，曹靖华还为发展我国的现代革命木刻运动作了巨大的努力。他受鲁迅之托，搜集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其中有《死魂灵》、《浮士德》、《聪明误》、《城与年》、《俄罗斯民间故事》的插画……等等。鲁迅对此极为珍视，曾把其中11位苏联木刻家的100多幅手拓品编选成《引玉集》画册并作后记，亲自设计封面、题字，送到国外精印出版。这本画册不仅为国内艺术家所称誉，在国外也负有盛名。这些版画在腥风血雨中给中国革命者带来希望，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现代革命美术运动的发展。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血洗之后，有些在苏联本土上，甚至连美术家本人也丧失的作品，在我们这里却还保存着。正像鲁迅在《引玉集》后记中所预见的：“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在1933年7月30日离开列宁格勒的前夕，他又亲自搜集了五位木刻家的手拓品寄给鲁迅。他还约请德·密特罗辛、谢·莫察罗夫等五位苏联美术家各自写了小传，从此沟通了鲁迅同苏联木刻家的文字交往。

曹靖华在从列宁格勒发回的家信中写道：“身在异国，而心无时无刻不在故乡徘徊着。”他更关怀故乡人民的觉醒，所

译苏联文学，每次出版，都遥寄父亲，以便父亲从中吸取新的思想文化，并且通过这位山村老教师，把列宁的故事，鲁迅的书，十月革命的火种播送到中原山区人民的心中。

(六)

1933年8月，曹靖华为了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和鲁迅一起战斗，决定从苏联回国。归途中，谢绝了海参崴远东边疆国际师范大学副校长兼中国部主任张锡俦关于到该校中国部任教的邀请，毅然返回白色恐怖下的北平参加斗争。他化名张敬斋，隐蔽在小汤山。敌人对曹靖华的名字怕得要死，而革命者得知他回国的信息，纷纷慕名前往求教。当时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范文澜，刚上任不久，便亲自登门聘请。东北大学学生们联名要求学校给曹靖华发聘书。于是他应邀到北平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中法大学五校执教，分别教授俄语、中苏文学史、文艺理论等。据关山复、王振乾、岳欣等回忆，曹靖华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给学生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讲授苏联革命文学，积极主张抗战。1934年中国国内时局紧张，白色恐怖严重，学生们很苦闷，曹靖华给学生们讲时事，启迪青年向往革命，追求真理。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牺牲的消息传来，曹靖华在课堂上泣不成声，他对同学们说：瞿秋白是民族的精华，他的牺牲是国家民族的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爱国运动，成为全国抗日运动新高潮的起点。在“一二·九”运动中，曹靖华积极支持并参加北平学生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

行，冒险留爱国学生在家里食宿，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他当年写的文章《十二月的风》，翔实地记述了这幕雄壮的历史，抒发了他对“一二·九”运动的满腔热情和深刻感受。他写道：

“我好似一粒铁屑，被这由万众组成的一条巨大的磁石吸去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打倒汉奸！”、“打倒伪组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2月的狂风，卷着万众的怒吼。“呵！在北平，十二月的风是多么狂暴啊！它卷起了为民族争自由的怒吼，滚过了故都，滚过了全中华，滚过了全世界！”、“民族解放的号音——十二月的风啊，在这抗战的烽火里，你更猛烈地吹起来吧！”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20日，噩耗传到北平。曹靖华悲恸失声，课堂变成了追悼会。他向同学们讲述了鲁迅的革命精神……回家收到鲁迅17日下午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人去信来，又不禁泫然泪下。

鲁迅的逝世，使曹靖华无限悲痛，同时也激起了他对反动派极大的愤慨。他化悲痛为力量，撰写《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鲁迅》、《生命中的第一声巨雷》等文章，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教育部停止了东北大学的经费，曹靖华宁肯不要工资，也坚持教课，以造就更多的革命战士。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他上完最后一课，被迫由北平辗转天津，经烟台、济南、徐州一路，于同年秋冬到达西安，在西北联合大学执教。当年他撰写的《故都在烽烟里》，满腔悲愤地记述了目睹北平沦陷的经过，激励人民去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他写道：“故都呵，在你的周围，又响起了漫天的争自由的烽烟！”

(七)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时期，西北联大从西安迁到汉中。一天，曹靖华收到文艺界抗敌协会电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3月27日在汉口成立，推荐周恩来为名誉主席，曹靖华等45人为理事），要曹靖华立即赶赴武汉。曹靖华到了武汉，周恩来对他说：“国共又合作了……现在需要翻译人员，你是北伐时期的老翻译人员，大家都同意你来，你就到武汉来吧。”他答应回汉中安排一下就来。当他回联大不久，国民党就下令解聘了西北联大包括曹靖华在内的12位进步教授。曹靖华代表被解聘的教授同反动势力进行说理斗争，最后气愤地拂袖而去^①。1939年春天，曹靖华带着一家四口离开西北联大。他们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艰难地到达重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对他说：“中苏文化协会改组了。你是改组后的该会的理事，我们提名的，你就到那里去吧。你会俄语，这个工具正用得着，在那里公开介绍反映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的文艺作品吧，这对中国读者，对中国革命有用……”^②。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曹靖华把介绍苏联革命文学当做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特殊战场，日以继夜地战斗着。

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期间，曹靖华担任了《中苏文化》月刊的常务编委。《中苏文化》月刊是当年大后方比较重要的一个刊物，曾赫然刊出过毛泽东的专稿《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

①访问韩幽桐记录（1983年10月）。

②《曹靖华散文选》第3—4页。

一致》，引起了人们的特别重视。1940年前后是世界范围内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就在这种形势下，曹靖华向周恩来表示要求参加共产党，并希望去延安工作。周恩来认为他留在党外，留在国统区更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曹靖华虽然留在党外，但他以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为“家”，事事听从党的安排，坚持斗争。

在重庆期间，曹靖华生活很艰苦，他爱人尚佩秋，宁愿帮人家洗衣被、织毛衣糊口，也不向国民党低头。在郊区沙坪坝，他们自己开荒种菜，过着清贫的生活。艰难困苦中，他八年不渝，翻译了数百万字的苏联革命文学和反法西斯文学：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保卫察里津》、《油船德宾特号》、《虹》、《侵略》、《征主梦》、《党证》、《望穿秋水》、《死敌》等，这些译著，是鼓舞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精神武器，也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武器。他说：“我那时翻译这些作品，就是借以为镜，照中国法西斯头子的嘴脸，鼓舞人民进行正义斗争的。”^①强烈的革命感，还使他翻译了大量反法西斯的战地报告，诸如《经过战斗的人们》、《正义》、《人类同我们在一起》等。这一时期，他还译了一些政治的、文艺的理论文章。如《斯大林论列宁》、高尔基的《文学史导言》。给少年儿童们译了《七色花》、《远方》等。在学术研究文章方面，他撰写了《鲁迅先生的翻译》、《从翻译工作看鲁迅先生》、《论卡达耶夫》、《抗战三年来的苏联文学介绍》等，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健康

^①访问曹靖华录音（1985年5月）。

发展。

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期间，9月上旬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桂园又一次接见曹靖华、巴金、葛一虹。毛泽东得知曹靖华是河南卢氏县人，接着就问：“鲁迅写过一篇卢氏曹先生的教泽碑文，那位曹先生你可知道？”曹靖华回答说：“就是我的父亲。”——毛主席笑着说：“哦，哦，你是一位老教育家的儿子……”这次谈话，使曹靖华感奋不已。

1946年5月，曹靖华随中苏文化协会到了南京。7月，高尔基逝世十周年，他撰文《人民的春天要开始了》，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比沙皇时代的西伯利亚酷寒还要凛冽”。解放战争时期，曹靖华以“梅园”为“家”，常常到“梅园”聆听周恩来、董必武等的指导。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撕下“民主”假面具，肆意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禁止一切民主活动，曹靖华上了敌人搜捕的黑名单。他不断收到恐吓信，接到恐吓电话，但他不顾敌人恫吓，一直热心地支持民主解放运动的斗争。他曾多次写信、寄书给北京大学子民图书室^①。在6月8日的信中，他写到：“望继续努力，发扬子民先生教学自由精神，突击黑暗，争取光明……”不久，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顷见一张名单，上面不但有先生的名字，而且名列前茅。本来，当局早就准备大举捕人，……现决定要下手了。我受良心的驱使和对先生的仰慕，特函奉告，希迅即远走，免遭毒手……”^②组织上安排他只身北上，到清华大学执教。此时，平津战役展开，北平西郊海淀区正是战斗

^①蔡元培号子民，该图书室在爱国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

^②见《曹靖华散文选》第352、353页。

最激烈的地段，使他又经历了一场战火的洗礼。

每当曹靖华回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段路程时，常常激动不已。他说：“这段路完全是党牵着我走过来的。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对我的关怀、爱护远比父母比自己想得都周到，没有党，不要说这段工作啦，全家的性命也早已不存，党给我引路，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哪。”^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曹靖华翻译的数百万字的俄罗斯进步文学和各个时期的苏联文学，在我国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它们滋养了优秀的中国青年，促进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这些文学译著远远超过了文学的意义，成了中国广大读者的“生活的教科书”、“共产主义的教科书”。这些文学译著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民主革命时期，不管反动派的扼杀多么严酷，它们却不计其数地一版再版。它们还跨越历史时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八）

1949年春天，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了多年的曹靖华，出席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曹靖华半个世纪以来所追求的并日夜为之奋斗的新社会开始了。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亲自筹建并主持了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工作，还担负了繁重的社会工作。他的教育思想一向重在育人。他在讲授苏联文学史及文学选读课时，十分注

^①访问曹靖华录音（1982年11月）。

重选择培养学生学好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的教材。他选讲了关于列宁的故事，保尔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高尔基的《海燕》、《一月九日》以及《铁流》、《虹》等。他教授外语以“外为中用”为原则，要求学生要正确对待中外语言的关系，把外语专业学生最容易忽视的中文修养提高到专业学习的地位，他强调掌握汉语是根本，不首先弄懂汉语是做不好翻译工作的。对于学生的培养，他主张打好基础，知识面要宽。搞文学的人，也应该具备自然科学的起码知识。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他亲手编写了“苏联介绍”讲义。他强调翻译要多实践，博览各种译本，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精益求精，以优秀的译文为镜，以比较的眼光深入钻研，博采众家之长，力求翻译达到神韵相通，水乳交融的境界。

五六十年代，他还继续潜心地研究苏联文学，撰写不少研究文章，集中地探索了苏联文学的特征、发展道路、意义和影响，追踪了苏联文学在中国传播的轨迹，阐述了苏联文学与中国新文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文章联系实际，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五六十年代，他多次出访苏联，在国内接待国外友人，为中外文学交流作了巨大努力。同时抒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他的散文大约2/5的篇章都与鲁迅有关，多侧面地再现了鲁迅的硬骨头精神、韧性战斗精神和鲁迅对建设新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的《忆梅园》等文，记述了周恩来、董必武对文化战线的关怀、爱护和领导，再现了共产党人在艰苦岁月里的伟大形象。他的文章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火花，洋溢着凛然正气和动人深情，以《花》为书名出版的散文集，称誉文坛。有的篇章被选入教科书，不少篇章由电台配乐播放。《花》出版后，

董必武特题绝句赠曹靖华。其中一首是：

愿花长好月长圆，幻景于今现眼前。

洁比水仙幽比菊，梅香暗动骨弥坚。

董必武所题绝句，既是对曹靖华的文风的评价，又是对他高尚人品的赞语。曹靖华文如其人，他的散文和人品都具有水仙的高洁，菊花的幽雅，梅花的风骨。

1956年3月，由冯雪峰、邹鲁风介绍，曹靖华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他将历尽磨难保存下来的鲁迅手迹细心地整理，托许广平转赠国家，为鲁迅手迹宝库增添了无价之宝。

（九）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曹靖华横遭迫害。几十年来他与苏联作家交往的信件、照片、笔记等珍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随人大代表团赴各地视察时的资料、笔记，都丧失殆尽。面对劫难，曹靖华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概，他坚持实事求是，对强加给他的诬陷之词据理反驳，所谓“揭发材料”他一字不写。他对党无限忠诚，即使在每月只发十几元生活费的情况下，仍按以前的规定交纳党费。

1972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恢复了曹靖华的党组织生活，境遇稍得改善。周总理主持召开的全国出版会议决定重印《铁流》和《一月九日》。1973年，曹靖华的第二本散文集《春城飞花》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妄图对该书在全国进行批判。然而历史的发展也确

如他在书中所写：“即使是把它移植到冰雪严封了亿万年的南北极，移植到南北极的冰山高峰……也将凜然耸立，迎风怒放。”《春城飞花》深受群众欢迎，7万册书被抢购一空。曹靖华整理、注释的《鲁迅书简——致曹靖华》一书，也在1976年出版。这部书的出版，具有特殊意义。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致曹靖华的信件共292件之多，实发数目可能还要多些。除四封关于翻译《阿Q正传》的信件，这些信件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写的，它是鲁迅最后十年光辉战绩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那特殊时代，通信极其困难，为避开鹰犬耳目，信件中往往使用只有收信人才能意会的暗语、简称或代用语。有时甚至用一个外国字母代替等，如当年信中“左联”用“周莲”或“莲小姐”代替，就连收信人的姓名也常常以化名代替，仅1933年10月以后的信中，关于曹靖华的化名就有：汝珍、郑汝珍、亚丹、联亚等。对此，曹靖华在书中都附了翔实的注释。这些对于学习、研究鲁迅，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文化“围剿”的斗争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在十年动乱中，党的关怀给了曹靖华巨大的力量和勇气，在逆境中，邓颖超常常托人向他问候，给他赠送总理画册、文集、梅园纪念章、咖啡、干贝等。他把这些视为最珍贵的东西，如同当年在荆天棘地中，周恩来赠他延安小米、呢料一样，深深感念党的深情。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曹靖华悲恸欲绝。清明节前后，他每天到天安门广场参加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深夜不归。撰写了《永生的人——怀念周恩来同志》，寄托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

1976年10月，党和人民粉碎了“四人帮”。曹靖华劫后余生，返老还童，欣然赋诗《而今百龄正童年》。1977年8

月14日，诗人臧克家慨然作东，在丰泽园设宴为曹靖华 80 大寿、茅盾 81 秋祝贺。同时，中国作家协会，苏中友协也集会庆祝曹靖华 80 寿辰。曹靖华年逾八旬，豪情不减当年。他在给亲友故旧的许多信件中，都表达了要为党的事业工作到 21 世纪的愿望。1979 年春天，他奉献了《飞花集》，秋天，随全国政协考察团赴四川成都、重庆考察工作，重访红岩，缅怀革命圣地，重访郭沫若故居以及他在抗战时期的沙坪坝故居。1981 年 7 月 4 日，他应邀赴西安参加隆重纪念鲁迅诞辰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途中冒着盛夏回卢氏县看望故乡人民和亲友，还特意赴开封探望母校开封第五中学（原开封第二中学），缅怀“五四”运动踪迹，与郑、汴、洛文艺界举行座谈。他不停的四处奔波，直到年底在睡梦中与特务搏斗摔倒在地上，左腿骨折，住北京医院动手术，还念念不忘计划到各地去学习访问。

1982 年以后，曹靖华年迈多病，久卧病床。然而即使在病床上系着病情危险的红布圈，时刻离不开输灌氧气的时候，他还戴着老花镜，手拿放大镜继续写作。在他 86 岁高龄时出版了《曹靖华散文选》。他越来越怀念故乡。1985 年春节前夕出院，次日便给家乡写信说：“怀乡之情，与日俱增。”1986 年又抱重病为卢氏马耳岩灌河桥的落成，题写了“军民连心桥”。生命弥留之际，他眼含泪花，对儿女们说：“代我感谢乡亲们，说我临终时想念他们。”

曹靖华对人民的文化教育和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努力，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重。1985 年 10 月，北京大学为他从事教育、文化工作 60 年举行了庆祝会，首都文化、教育、翻译界著名专家、学者、作家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1986 年 5 月，北京大学授予他该校首届科研荣誉奖。1987 年 5 月，北京大学、中

国作协、中国译协等八单位联合在京举行曹靖华学术座谈会，河南及其家乡卢氏县也举行庆祝他从事文教65周年座谈会。

他为中苏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友谊所做的巨大努力，也受到了苏联人民的尊重和爱戴。1987年5月，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代表列宁格勒大学授予他列宁格勒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同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1987年9月8日，曹靖华与世长辞，遗体上覆盖着红旗，上面写着：“一代宗师”。他为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道德文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唐 亮

王 辅 一

唐亮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特别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唐亮，原名唐昌贤，别名唐昌明，1910年6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今永和镇）火石岭。家有父、母及两个弟弟，靠佃地耕种度日。

唐亮6岁时，因家境贫寒上不起学。族里长辈看他聪明，又是唐家长孙，议定由宗祠资助他上学。三年后，唐亮越级上了高小。

1920年除夕，唐亮父亲为躲债而奔波过度，导致肺病爆发，卧病不起，第二年3月去世。父亲的遗体还未安葬，狠心的地主就坐在家里逼着还债。他母亲走投无路，忍痛将刚满两岁的小儿子唐昌实卖给了人家，换回50块大洋来为丈夫安葬和向地主还债。唐亮也无法再上学了，由亲戚做保，到浏阳城一家纸爆作坊当学徒。他母亲守孝三年，家里生活仍没有着

落，被迫带着二弟唐昌贞改嫁他人。

1923年，孙中山在桂林誓师北伐，湖南大小军阀为阻止孙中山北伐，截断交通，纸爆没有销路，作坊倒闭，未满学徒期的唐亮只得靠干零活来维持生活。

1926年秋，北伐军进入湖南，群众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唐亮参加了浏阳青年工人俱乐部，并被推选为学徒调查组组长，负责调查作坊主打骂虐待学徒工的情况。不久，他又参加了浏阳城工人纠察队，同作坊主和老板作斗争。

1927年5月，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浏阳的革命工人俱乐部、工人纠察队被迫停止活动。唐亮返回乡间，接回二弟一起生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后，浏阳农村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唐亮参加了农民协会，担任农民赤卫队的小队长。他还参加了革命互济会和反帝拥苏大同盟等革命群众组织。

1929年冬，浏阳县诚嘉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唐亮被群众推选为乡苏维埃政府宣传文化委员。1930年8月，乡苏维埃政府筹备改选，唐亮被内定为乡苏维埃主席候选人。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从长沙转移到平江、浏阳一带休整扩军。唐亮便报名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已在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便以调学的形式介绍到红军。

(二)

1930年8月，唐亮被送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政治训练队学习，没过几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他从政治训练队毕业，被分配到红三军团第四师工作。红六师政委

员彭雪枫见唐亮为人忠厚老实，又写得一笔好字，就同红四师政治委员石恒中商量，把唐亮调到红六师担任师党委秘书，同时兼任师直重机枪连党支部书记。他得到彭雪枫的教育和帮助，进步很快。他后来说：“彭雪枫同志是我做政治工作的启蒙老师，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31年1月，唐亮被任命为红二师第六团第一连政治委员。这个连队的连长、政委作战勇敢，工作有能力，但军阀习气严重。战士们称他们是“铁匠”。由于官兵关系紧张，这个连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师党委派唐亮去一连担任政委，就是要他去改变这个连队的面貌。

唐亮到达一连后，首先加强连队党支部的领导，凡重要问题均由党支部集体研究决定，使党支部成为连队领导的核心。他深入班排，同战士谈心，了解战士的身世，掌握战士的思想动态，帮助战士提高思想认识。他既尊重连长，又诚恳而耐心地帮助连长，使连长的作风有了改变，官兵关系融洽了，成为当时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模范连队。为此，唐亮受到师党委的表扬。

1931年春，蒋介石以20万兵力，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5月16日，当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进至富田东南的中洞、九寸岭地区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红一、红三军团歼灭。唐亮所在的连队，埋伏在中洞南侧的山上。当敌第二十八师后尾部队离开中洞时，红三军团各部队从山上向行进中的第二十八师猛扑下来。唐亮和连长带领全连英勇冲杀，抓到很多俘虏，缴获许多武器。在这次战斗后，唐亮也“鸟枪换炮”，用新缴获的二十响驳壳枪装备起来了。唐亮后来回忆说：“真好笑，当时缴获这种新家伙不会用，还弄走了

火，好在没有打到人。”

1932年1月，唐亮被调到红二师第七团任总支书记。7月，调任红二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

同年8月，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红三军团从南面主攻宜黄。守敌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三个多团，依托城墙和城南峨嵋山、北华山的工事固守。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红三军团部队攻击受挫，伤亡很大，红二师第六团政治委员乐毅在战斗中牺牲。师党委当即调唐亮去接任。唐亮和团长一起调整部署，重新组织攻城，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克了宜黄城，全歼守敌，仅俘虏就达2000多人。

1933年7月，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唐亮时任红四师政治部组织科长，随军前往。8月，在攻打南平以西王台的战斗中，他左脚负伤，入院治疗。

1934年4月，唐亮时任红四师第十团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中著名的广昌战斗。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集中红军主力同国民党军在广昌以北地区进行的“决战”。红军虽然打得英勇顽强，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加上临时中央战略指导的错误，未能抵挡住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主力受到重大损失，被迫撤出广昌。唐亮所在的红四师第十团也伤亡很大。唐亮从这次失利的战斗中，对临时中央的战略指挥和战役指导深为不满，尤其对大批指战员伤亡甚为不安，加之战斗后连续在森林中宿营，淋雨、潮湿、受凉，致患重病入院，随即离开第十团，将工作移交给新任团政委杨勇。

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唐亮调到红三军团随营学校任总支书记，随军长征。随营学校当时担负收容伤病

员、筹款、接应后续部队等项任务。

在长征路上，红军连续行军作战，病号多，减员大，收容工作艰巨。唐亮经常走在后头，吃在后头，帮助伤病员扛枪、背背包，有时人手不够，他还得拖着患病的身子抬担架。

长征途中，吃饭问题是一大难题。尤其是到雪山脚下，吃粮更是困难。有一次，唐亮带着一连人刚筹到一点青稞，中央纵队路过这里。周恩来见到唐亮，询问红三军团的供应情况，并问能不能把粮食让给中央纵队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唐亮认识周副主席，又看到中央纵队老同志多，女同志多，个个面黄饥瘦，遂从全局考虑，拿出最好的一部分支援中央纵队。周恩来说：“这很好，回头我跟你们彭军团长打个招呼，谢谢你们。”

1935年5月底，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率红一、红三军团通过大渡河上的泸定桥以后，唐亮奉命率一连人守卫泸定桥，接应担任后卫的红九军团。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部队到达泸定桥以后，称赞唐亮他们任务完成得好，发给这个连队每人一块银元，以资鼓励。

唐亮随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11月，被任命为红二师政治部副主任。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为准备协助东北军、西北军迎击何应钦的“讨逆军”，唐亮随军南移至庆阳一带待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唐亮及所属部队进至三原地区休整。

1937年4月，唐亮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他根据上级指示，在组织部队休整恢复体力的同时，加强时事政策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努力学习战术技术，提高军政素质，积极进行参加对日直接作战的

准备。

(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唐亮担任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部组织科长。到职后，即奉命到由红二师改编的第六八五团帮助进行政治动员，做出征前的准备。8月底部队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9月25日，唐亮随六八五团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同年年底，唐亮调任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他根据上级要求和部队实际情况，对部队基层干部和骨干进行轮训，对新参加八路军的青年学生进行短期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杀敌本领。

1939年1月，唐亮调任第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2月，他随队挺进敌后，进入冀鲁豫边区，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1940年1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在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部队新一旅、新二旅、新三旅和第三四四旅统一整编为第二纵队，唐亮任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6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大部越过陇海路南下华中后，唐亮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1年1月，唐亮经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夫妇介绍，与张锐结婚。

当时，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发展很快，急需加以整顿。唐亮在抓地方武装整训时，从加强思想教育入手，使他们认清和旧式军队整训的区别，增强参加整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做法上，强调“由浅而深，由松而紧”，“着重于启发和示范两

种，调一个工作有基础的部队，与被整训部队在一块生活做榜样”。通过短期的整训，地方武装人员的素质迅速得到了提高。

唐亮在抓部队建设的同时，也重视加强机关建设。他在《整理各级机关的组织与工作》的报告中，强调领导机关是发号施令的首脑，是干部和优秀分子聚集的地方，它的好坏会影响到部队工作的优劣。因此，必须进行整顿，使组织健全起来，使工作秩序、生活秩序正常起来，为部队做出好样子。他主持创办了冀鲁豫军区机关刊物——《战友月刊》，宣传党的政策，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交流部队作战和建设的经验。在该刊第二卷第一期上，刊登了他亲自起草的《地方武装整训中的政治工作总结》一文。

唐亮十分重视部队的时事教育和学习。他在《加强时事教育与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就是随着与促进国际国内时局的变化而确定的。事实证明，不关心时事，即不能了解周围的情况与自己的环境，即不能认识党的路线与政策的真实意义和灵活运用的方法，即不能掌握与促进时局的发展，更会在时局的千变万化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他号召部队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他们不但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而且还要知道全世界上有哪些人，哪些人与自己干着同样或者相反的事。他们不但要知道过去、现在与将来为什么要这样干以及如何去干，而且要知道最近与将来会干出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来。”他要求政治机关要“正确地供给时事资料，有计划地进行时事教育，有组织地发动时事研究，及时解答时事疑难”，并要求“注意材料供给的及时，内容的正确与全面，形式的新颖与灵活，注解清楚，图表分明，使其容易为

大家所接受。”^① 50年后读这篇材料，仍能给人们以很多启迪。

1942年8月，唐亮调任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政治委员，同时兼湖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和中共湖西地委书记。同年12月，日伪军出动万余人，对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鲁西南单县东北的曹马集一带进行合击，妄图聚歼湖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唐亮和湖西地区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将主力部队分编为小股武装，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日伪的统治，搅乱日伪的后方，粉碎敌人的合击，不仅保持了东面与鲁南军区、西面与冀鲁豫军区的交通线，还使湖西地区的被服厂、炸弹厂在困难条件下保存了下来。

唐亮在湖西地区艰难地支撑八个多月后，因患严重的胃病，被批准离职治病。

(四)

1943年9月，唐亮到山东军区医院治疗，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为邻，从接触中，他得到罗荣桓的很多教育。唐亮在40年后回忆说：“罗帅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师长。”

1949年9月，唐亮任山东滨海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滨海区党委书记。唐亮患病尚未痊愈，就迅速到职工作。同年11月，唐亮和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一起，指挥滨海军区部队，在鲁中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莒县战役。11月14日晚，莒县

^①载《战友月刊》第1卷第3期。

伪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莫正民率30个中队共3500余人反正，迎接八路军入城。唐亮和陈士榘入城后，高度赞扬了取得策反重大成就的中共地下工作干部。莒县城的解放，使滨海、鲁中两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是山东地区八路军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范例之一。11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山东新的胜利》的社论，指出：莒县之役“是山东我军秋季攻势后最大的胜利。莒县的解放，不仅是山东辉煌的胜利，也是敌后我军的大胜利之一。……莒县的解放，伪莫正民部3500余人光荣反正，并配合我军作战，是此次胜利的极重要原因。这是我军伪军工作的重大成功。”在这以后不久，滨海军区又争取了诸城伪保安大队长张希贤率部1300余人反正。莫、张两支部队，后经教育改造，整编为八路军的一支正规部队。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日军为防备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拼凑力量，推行所谓“重点主义”，在沿海增加兵力，增设据点，加强资财掠夺，频繁袭扰、“扫荡”，特别是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并在当年5月对滨海区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使滨海区东部沿海地区的斗争形势更加紧张。当年3月，唐亮主持召开中共滨海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对策。他在总结时指出：日军采取的“重点主义”政策，是其在太平洋作战节节败退的战略防御的总方针下，所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其实质是以攻为守，我们要发挥政治上的优势，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困难，采取正确的政策，来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他提出采取积极进攻的政策，加强边沿斗争，敌进我进，乘机前进，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打破敌人的“重点主义”。会后，滨海军区的主力 and 地方武装一起，积极打击敌人，还派出许多

小部队和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袭击战，摧毁敌沿海据点，使日军控制沿海的阴谋遭到严重挫折。

同年六七月间，滨海军区以一部主力与鲁中军区部队配合，讨伐了盘踞于渚城的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一军张步云部；又以一部与鲁南军区部队配合，发起郯（城）码（头）战役，攻克了郯城和码头。这两次战役，共歼日伪军6000余人，扩大了滨海抗日根据地。

唐亮到滨海区工作不久，发现滨海区党委和滨海军区机关在整风中对少数领导干部像斗争地主一样，吵闹起哄，让他们登台亮相，感到这种做法不对头，与党中央关于整风要求的精神不相符合。他专门向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作了汇报请示。罗荣桓很快找滨海区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集体谈话。从而使滨海区的整风运动健康地发展下去。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山东军区遵照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分成五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展开大反攻。唐亮和陈士榘司令员指挥由滨海军区部队组成的第二路大军，分两线作战：在北线，向胶济路东段的日伪军进攻，攻克渚城、胶县等城，并与胶东军区部队相配合，进逼青岛；在南线，向陇海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与鲁中军区部队一起攻克临沂城，并与新四军部队相配合，进逼海州、连云港。经各部队艰苦奋战，滨海区全部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山东军区主力一部进军东北。唐亮从全局出发，把准备调往东北的部队补足兵员和物资，配备好干部，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为这些部队的进军东北创造了良好条件。为总结历史经验，宣扬滨海地区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业绩，唐亮责成滨海军区政治部汇编了

《滨海八年》一书，并且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

(五)

1946年1月7日，唐亮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同年6月下旬，解放战争全面爆发。7月，唐亮随山东野战军领导机关进至淮北。当时，山东野战军虽取得了朝阳集战役的胜利，然而在泗县战斗中消耗过大，加之当时苏皖边区首府淮阴过早丢失，部队中一度怨气比较大。唐亮在大力加强战时政治工作过程中，把增强内部团结放在首要位置。他认为，在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仗没有打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愈困难愈要加强内部团结，增强上下之间的信任感，不要相互埋怨。为此，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专门向部队发出电报，强调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团结在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周围，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同年12月，为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决定于12月15日发起宿北战役。唐亮和山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一起，指挥从鲁南以强行军赶到战场的第二纵队和第八师，乘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立足未稳，以勇猛的动作，从西北向东南实施突击，协同第二、第九纵队和第七师，逐点攻击，至19日，将21000余众的整编第六十九师全部歼灭。这是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师后的第一个胜仗。中央军委曾致电祝贺，号召华东全军：“以宿北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这次战役结束后，陈毅、陈士榘、唐

亮立即联名给山东野战军各部队下达指示，指出：宿北战役意义重大，要认真总结协同作战和分割、包围、歼灭敌人的经验，奖励参战有功的部队和指战员。

唐亮从解放战争初期胜利的实践中，认识到：对自动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士兵，很好地进行争取教育和妥善处理，是补充我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也是加速解放战争胜利的因素之一。为此，他根据瓦解敌军的原则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于1947年1月2日，主持制定了《山东野战军关于处理俘虏兵的决定》，明确规定各部队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在经过短期的审查教育，激发其阶级觉悟后，就可以及时补充部队。从而大大增强了解放军的有生力量，加速了技术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同年1月2日至20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并肩作战，在鲁南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及一个快速纵队共53000余人，缴获美制坦克24辆，榴弹炮、野炮、山炮89门，汽车474辆。鲁南战役后，华东部队成立特种兵纵队装备的坦克和指挥机关装备的美制吉普车、大卡车，大部是解放过来的坦克兵、汽车兵驾驶，火炮也是由解放过来的炮手操作的。

同年1月下旬，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的指示精神，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及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华中军区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唐亮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仍在前方工作。他和副主任钟期光一起，在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的领导下，组织和领导华东野战军的战时政治工作。当时，华东野战军除特种兵纵队系新建的以外，在11个步兵纵队中，有7

个原是在苏浙皖地区的新四军部队，4个原是在山东的八路军部队，作风不同，生活习惯也有差异，唐亮针对这些特点，领导政治机关，努力做增进团结的工作，强调各部队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同年1月底，国民党军发动所谓“鲁南会战”，在南线，集中了八个整编师分三路北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九个师沿胶济路南下莱芜、新泰地区，实行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主力隐蔽北上，寻歼李仙洲集团。唐亮不仅参与了这次战役决策的研究，还领导各级政治机关，把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边走边动员，迅速传达到部队指战员，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经20日至23日激战，华东野战军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将李仙洲集团56000余人全部歼灭。

在莱芜战役进行过程中，与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在李仙洲集团突围前放弃指挥，秘密脱离部队，加速了该集团的覆灭。唐亮在组织接待韩练成时，称赞他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妥善安排他化装离开解放区，为其尔后再次为人民立功创造了条件。

同年3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在胶济路以南地区整训。唐亮根据前委的统一安排，组织和领导各级政治机关，对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提高指战员对战争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组织团以上单位普遍建立党委会，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开展立功运动，号召人人立功、事事立功，以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荣誉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

诉苦教育，来加强对解放战士的教育、改造，使他们懂得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根源，明确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自觉地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欢迎升级的地方武装，补充野战部队。这些，就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同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参谋长陈士榘和唐亮率领三个纵队猛攻泰安，调动敌人回援，便于主力寻歼援敌。唐亮和陈士榘一起，于4月下旬指挥部队攻克泰安城，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师。然而由于援敌过于密集，打援的设想未能得手。在5月中旬进行的孟良崮战役中，唐亮和各级政治机关一起，动员全体指战员发扬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忍饥耐渴，英勇作战，为全歼蒋介石的御林军第七十四师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6月29日，中央军委向华东野战军提出分兵作战的方案。第二天，陈士榘、唐亮奉命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挺进，转入外线作战。

(六)

1947年7月2日，中央军委电令：“陈唐兵团应迅速攻占泰安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的通路。”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进军途中，开始进展顺利，于7月上旬和中旬，先后收复泰安、宁阳城和大汶口，随后又围攻济宁、汶上，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军重要基地兖州。进入鲁南的第一、第四纵队，先后收复费县、枣庄、峄县。国民党军感到问

题严重，被迫从鲁中山区抽调包括其精锐第五军在内的七个整编师西援，企图夹击转入反攻的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这样，就调动和分散了国民党军，使其对山东重点进攻、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破产。

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已渡过黄河，正在鲁西南作战，与陈士榘、唐亮所指挥的部队相距很近。为了更好地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作战，唐亮起草了《关于与刘邓部队会师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刘伯承将军和邓小平政委率领的部队是有名的常胜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优良传统，必须虚心向他们学习，密切协同动作，保证圆满完成作战任务。

同年7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令陈士榘、唐亮兵团箝制敌人，寻机打击敌人，掩护刘邓部队南进。8月1日，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纵队西进渡过运河，在济宁附近与第三、第八、第十纵队会合，均归陈士榘、唐亮指挥。时逢鲁西南连日大雨，河水猛涨，洪水遍地，国民党军又多路赶来，情况异常紧张，而陈、唐所率的五个纵队经月余转战，没有后方补给，既缺粮食、弹药，又缺医药材料，兵员严重减员，处境十分困难，但为了掩护刘邓大军南进，他们克服困难，将包括第五军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军吸引在自己周围，减轻了刘邓部队南进的压力，使刘邓大军于8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区。

同年8月中旬，中央军委指示陈毅、粟裕率第六纵队进至鲁西南地区，与先期到达的陈士榘、唐亮所指挥的五个纵队汇合，正式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9月初，陈毅、粟裕率第六纵队从阳谷、寿张地区南渡黄河，决定歼灭由曹县北犯的国

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师。唐亮和陈士榘奉命指挥第三、第六、第八纵队，从南北实施夹击，经两日激战，将五十七师师部及所属两个旅 9000 余人全歼于沙土集地区。沙土集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从山东战场和大别山区抽调四个师来援，从而有力地策应了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进行的胶东保卫战和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于 9 月 11 日致电祝贺，指出：“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并向西兵团^①全军将士致庆贺与慰问之忱。”

同年 9 月 26 日，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越过陇海路，南下豫皖苏边区，执行参加开创中原解放区的任务。唐亮在进军豫皖苏边区的过程中，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土改政策，保护基本群众，不得侵犯中农的利益，认真执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和“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制度。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从 1948 年 1 月中旬起，在漯河以北平汉路两侧地区，开始进行以土地改革教育，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唐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贯彻三查三整巩固土改学习胜利成果的报告》，中共华野前委完全同意，并作为前委继续贯彻土改学习和巩固土改学习成果的指示，印发给各级党委讨论执行。

1948 年 2 月，中央军委决定：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抽出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由粟裕率领，集中到河南濮阳地区整训，准备执行进军江南的任务；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由陈

^①西兵团即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当时，华东野战军分内线、外线兵团。内线兵团位于胶东地区作战，又称东兵团；外线兵团位于鲁西南地区作战，又称西兵团。

士渠、唐亮率领，仍留在中原作战，并归刘邓指挥。此时，唐亮和陈士渠带领第三、第八纵队位于河南襄城、禹县地区，边整训，边待机；第十纵队在豫西直接配合刘邓部队作战。

为了将新式整军中的民主生活经常化，军委总政治部于同年2月17日发出指示，要求连队普遍建立士兵委员会。唐亮和陈士渠认真学习后，认为这样做对连队建设很有必要，同时又认为士兵委员会容易误解为士兵对付干部的一种组织，于同年3月建议将士兵委员会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党中央的赞同，并在全军实行起来。

同年3月4日，华东野战军为适应形势发展及作战指挥便利，遵照中央军委电令，将所属各纵队统一编组为四个兵团：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由粟裕兼司令员及政委；以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组成第二兵团，由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委；以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第三兵团，由陈士渠兼司令员，唐亮兼政委；以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组成第四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此时，一兵团已开赴濮阳地区整训，准备进军江南；二兵团在山东作战，又称山东兵团；四兵团在苏北作战，又称苏北兵团；而陈士渠、唐亮所率的三兵团，则在中原地区作战。

同年3月，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并掩护刘邓大军休整，中央军委命令陈士渠、唐亮指挥第三、第八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及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的部队，发起洛阳战役。洛阳是我国著名古都之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敌人又筑有永久性防御工事。战役于3月9日开始。经过新式整军的攻城部队，士气旺盛，激战四日，在连续爆破和勇猛打击下，全歼国民党军第二〇六师等部2万余人，解放了洛阳。

城。这一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豫西解放区，取得了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重要经验。

唐亮在同陈士榘组织洛阳战役过程中，根据中央关于城市政策的有关指示精神，吸收接管许昌、漯河等城市的经验，在战役发起前对部队认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在战役发起后，亲自领导城市工作委员会，认真组织接管的各项工作，边打边跟进，妥善处理缴获物资。由于教育深入，组织严密，因而部队纪律状况良好。有的部队整天没有吃上饭，看到商店的饼干却不动。不少人拾到钢笔、手表、金戒指，能随时自动上交。因而群众称赞解放军是“仁义之师”。战后，唐亮亲笔写出接管洛阳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央军委认为这个总结很好，随即转发各军作参考。

同年6月，唐亮和陈士榘率第三、第八纵队在参加宛东战役后，归还华东野战军建制（随后，第十纵队也归建）。接着，根据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命令，指挥第三、第八纵队发起开封战役。

开封为当时河南省省会，国民党军长期设防，由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指挥3万军队守备。第三、第八纵队共约5万人，隐蔽接近敌人，于18日突然发起攻击，经五天激战，除刘茂恩化装潜逃外，守敌全部被歼，开封于22日解放。中央军委发来贺电，祝贺开封大捷。

唐亮在攻取开封的过程中，在对部队加强城市政策、入城纪律教育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精神，亲自主持起草了以开封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的布告，宣布建立民主秩序，逮捕战争罪犯刘茂恩，对于凡不持枪抵抗的一切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律不予逮捕，保护各阶层民主自由的生活，保护一切

私营工商业，保护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公共建筑和名胜古迹。鉴于当时占领开封的时间不可能很长，人民政权和革命秩序不可能迅速建立，唐亮便邀请社会名流组织临时市政委员会，帮助解放军维持城市秩序。在撤离之前，他又用开封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说明解放军根据作战需要暂时撤出，但还是要回来的，告诫国民党军进城不得抢掠，开封城委托临时市政委员会负责管理。唐亮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保护城市，减少混乱和破坏，减少敌对势力，同时有利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改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由于采取这些宽大政策和有力措施，对保护古都开封的完好起了重要作用。

开封战役以后，中央军委致电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等，明确提出华东野战军下一步作战任务是攻取济南。唐亮参加了济南战役的决策，亲自起草了《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动员令》，提出了“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响亮口号。这次战役，经过八昼夜激战，取得圆满成功，解放了山东省省会济南，全歼守敌10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济南战役结束后，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遵照党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在山东曲阜召开扩大会议，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这是华东野战军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分析了分兵作战一年多来部队的情况，检查了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唐亮主持制定了华野前委《关于加强组织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并经会议一致通过。这个决议的制定及贯彻实施，对于加强华东野战军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淮海战役中，唐亮根据这次战役胜利而激烈进行的情况，不断地组织部队开展政治工作活动。他提出“勇猛坚决，干脆彻底地歼灭敌人，不让敌人逃到江南去！”等战斗口号，对部队鼓舞很大。他根据这次战役持续时间长，兵员补充要求时间紧、数量多的特点，以及国民党军士兵变化的情况，把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由经过审查教育才能补充部队的规定，改为随俘、随补、随教和在实战中锻炼考验的办法。不少在淮海战役开始时“解放”过来参加我军的战士，只要作战勇敢，任务完成出色，到淮海战役结束时，也就是说经过两个多月的实战锻炼，便当上了班长、排长。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华东野战军部队兵员的来源，保证了这次战役连续地进行。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时，华东野战军部队的数量，由1946年6月下旬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3万人，增加到50多万人，其兵员大部分是来自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

(七)

1949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改为第三野战军前委。唐亮仍为政治部主任、前委委员。

为了执行中央赋予的渡江作战任务，第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立即转入整训。唐亮在《关于渡江作战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对渡江战役的政治工作作了详细部署，还运用电报、报纸等形式，领导广大指战员学习形势和任务。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坚决打过长江去，才能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渡江作战的任务异常艰巨，不仅要突破国民

党军重兵防守的长江防线，还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挑衅、干涉。为了保证部队严格执行党的城市纪律和新区政策，唐亮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一道，将广大指战员必须遵循的事项，用简明通俗的文字，印发部队。其中，《入城守则和纪律》全文如下：

- 第一 实施军管制，保护人民各阶层。
- 第二 加强纪律性，服从指挥听命令。
- 第三 宣传党政策，人民利益最为先。
- 第四 缴获要归公，官僚资本归人民。
- 第五 保护工商业，人民生活有利益。
- 第六 保护建筑物，这些财产归人民。
- 第七 城乡有区别，城市不能比农村。
- 第八 头脑要清醒，站稳立场不忘本。

随着这些规定的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对部队顺利进入城市和搞好接管有重要意义。

同年4月20日午夜，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起，胜利举行渡江作战，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5月27日解放了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

唐亮为搞好接管上海的工作，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于5月上旬和中旬，在苏州附近的木渎镇，主持召开接管上海城市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进行政策教育、纪律教育和城市生活常识教育，还特别要求各部队教育指战员树立主人翁的思想，爱护公共财产，保护人民利益，严格遵守城市政策，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谦虚谨慎的作风，抵制资产阶

级思想的侵蚀。第三野战军的部队进入上海后，模范地执行政策纪律，涌现出不少“南京路上好八连”式的连队，赢得了上海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按照党中央原定的部署，南京解放后由第二野战军负责军管。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二野要执行解放西南的任务，中央又决定由三野接替二野负责南京市的军管。唐亮于6月底率一批干部从上海到达南京，着手交接工作。同年9月，中央任命唐亮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由于市委书记粟裕因病离宁治疗，原市长刘伯承指挥部队进军西南，唐亮就和副市长柯庆施、市委副书记江渭清以及原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等一起，领导南京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担当起整顿治理南京的重任。他吃在办公室，住在办公室，昼夜守在岗位上，为建设新南京而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次年5月，唐亮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唐亮在领导改造旧南京、建设新南京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他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加强与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指示，经常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共商建设新南京的大计。他多次主持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把困难摆出来，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共同克服困难，加快建设新南京的步伐。

唐亮把加强南京的社会治安，作为建设新南京的头等大事来抓。南京解放初期，官僚政客、地痞流氓横行，特务、土匪大肆活动，凶杀、强奸、纵火、抢劫不断发生，恐怖恫吓笼罩着金陵古城。唐亮本人也多次接到恐吓信。他毫不畏惧，按照镇压与教育、军管与民管的政策，在组织加强公安和部队卫戍的同时，在一些工厂企业建立基干民兵队伍，在居民点和街道

组织起治安保卫小组，形成了公安、部队、民兵、群众四结合的治安体系。到1950年1月，破获各类案件2000余起，遣送蒋军散兵游勇2万余人返乡，安置失业人员近5万人，对惯盗惯偷强迫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进行改造。随着治安工作的加强，南京的社会秩序逐步安定。

唐亮在组织南京工业恢复生产、振兴经济的过程中，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上。南京市当时私营的永利铔厂，是全国第一个大化肥厂，由于原料困难，资金不足，无法开工生产。唐亮和在该厂的军管会干部研究，教育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自觉地减少1/4的工资，来换取复工生产。这种做法，得到党中央的赞同。1949年8月20日，新华社专门作了报道。

解放前，有无数革命志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唐亮经常号召南京人民，学习这些先烈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用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的实际行动来作为最好的纪念。南京各界人民为纪念革命先烈，在南京雨花台兴建了人民革命烈士墓。1950年7月2日，唐亮主持了人民革命烈士墓奠基礼。目前，这里已辟为雨花台烈士陵园，成为人民瞻仰、凭吊革命先烈的场所。

同年8月，唐亮奉命返回华东军区。当时，中央军委批准撤销中共第三野战军前委，成立新的华东军区党委，统一领导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所属各部队，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由于军区其他领导人忙于地方工作，故华东军区的日常工作，实际上落到唐亮和先后担任参谋长的张震、张爱萍的身上。

(八)

1950年8月19日上午，在南京市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大楼会议室里，陈毅主持召开了中共华东军区党委会第一次会议，唐亮、张震、陈士榘、张爱萍、张凯等出席。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军委8月11日批示的精神，分析了部队形势，讨论了近期的工作。陈毅在讲到分工时，明确唐亮不要牵入具体事务，而要负责军区党委的日常工作，特别是关于方针政策的掌握。

8月，唐亮在华东军区剿匪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指示：剿匪，是建设新江南不可超越的阶段，它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密切结合”，“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推动了剿匪工作的进行。在各地区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华东军区部队共剿灭土匪23万余人，使华东地区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加巩固。

1950年春，唐亮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抓了团以上干部的整风，强调要增强战斗队的思想，克服官僚主义和居功骄傲的思想，增强内外团结。他在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认真分析了渡江后部队思想的变化及原因，提出了加强思想建设的要求。

唐亮在工作中坚持原则，要求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对倾向性问题敢抓敢管，不讲情面，不徇私情。50年代初期，

华东有几个军部改建为军兵种机关，有的单位发生乱分东西的现象。唐亮把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叫到南京，用华东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他们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他们认识错误，退赔了乱分的东西。进入大城市以后，个别干部被糖衣炮弹所击中，挥霍浪费，甚至腐化堕落。唐亮和党委、纪委的同志一起，抓住典型，严肃处理，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

唐亮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决定。他要求党委成员思想作风要正派，办事要公道；经常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不以权谋私。他备有专车，可是他夫人张锐到医院分娩，却让人用三轮车送去。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变动，都由组织安排，自己从不示意，更不作特殊照顾，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格，向他们提出了“政治上要自觉，业务上要自强，经济上要自主，生活上要自理”的要求，教育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搞特殊。正因为他的表率作用好，因而人们敬重他，信任他。

唐亮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注意公私分明。他家来的重要客人，到机关招待所招待一下是不困难的，可他从不沾那个便宜。1951年夏秋之间，陈毅司令员从上海到南京检查工作，唐亮请这位老首长吃饭，却不进高级招待所，只是请到自己家便餐招待。管理员刘公庭考虑到陈毅是四川人，唐亮是湖南人，都爱吃辣味，于是炒了一个辣子鸡，一盘炒牛肉丝，一个鱼，一盘素菜。他俩坐在小饭桌边，边喝酒边吃菜，边吃边谈，很开心，很满意。

1952年10月，唐亮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

理部部长。他同党委其他成员及干部部门一起，抽调大批干部去组建华东军区空军、防空军、公安军和装甲兵的领导机构，加强华东军区海军、炮兵、工程兵的领导机构，组织部队进行了干部评级工作，随后又进行了评定军衔的工作。

唐亮重视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他认为，不大力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就难以掌握现代军事技术。为此，华东军区专门举办干部文化学校，选调部队团以上干部和战斗骨干离职补习文化。他号召部队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把学习文化的空气搞浓，鼓励干部战士为国防现代化而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他组织各部队大量招收青年知识分子，经军政大学、军大分校、步兵学校短期培训后，分配到部队工作，使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 with 部队老干部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推动了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唐亮对海防战备抓得很紧。他把保卫海防，作为全区部队的首要任务，多次率领机关工作组到浙江海岛巡视，提出了大陆支援海岛、大岛支援小岛、后岛支援前岛等重要原则，对推动岛屿战备建设、保卫海防起了积极作用。

1954年2月，唐亮任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9月，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任命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1月，华东军区奉命组织陆、海、空军对浙江——江山岛进行登陆作战。唐亮参与领导了战前的准备工作，为这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努力。4月，遵照国务院及国防部关于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调整的决定，华东军区番号撤销，先后分建为南京、济南、福州军区。唐亮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许世友任司令员。9月，唐亮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二

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唐亮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始时，大会主席团曾提名他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唐亮深感不安，于9月4日给出席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刘伯承和副团长贺龙、聂荣臻、黄克诚写信，恳求从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去掉他的名字。其理由：一、本人的历史不长，条件尚不完全具备，恐有负党的期望。二、名额有限，某些资格比他老、能力比他强的没有列入，他被列上感到不安。三、本人年龄不算很大，再过几年为时不晚，多锻炼一下有好处。八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经过研究后，采纳了唐亮的要求。但他的高尚品质却被许多同志所称赞。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时，他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

1958年9月，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了唐亮和与会代表。当月下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视察了驻宁部队。唐亮和许世友向毛主席、刘副主席汇报了南京军区部队的情况，受到毛主席、刘副主席的称赞。

1959年初，唐亮针对当时浮夸风盛行的情况，在南京军区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的成绩很大，在肯定成绩时，用不着浮夸，浮夸不是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成绩既然是事实，何必浮夸呢？浮夸反而会损害成绩，掩盖成绩的本来面目。面目清晰的就不要擦粉。浮夸会真假不分。我们不要浮夸，要实事求是。”他在深入基层时，强调做工作必须实事求是，要科学分析，符合科学规律，使跃进的步子更稳健更轻快。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当时曾被指责为“右倾保守”。

唐亮经常到训练现场、国防工地检查，作调查研究，很受

群众欢迎。1959年4月19日《人民前线》报上，曾刊出一首赞扬唐亮的诗《唐政委在工地》，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唐政委到坑道口，
紧紧握着战士手，
口口声声道辛苦，
又问寒来又问暖。

同年4月，唐亮出席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任命为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国家经济发生困难，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看到唐亮家里孩子多，吃粮困难，给他家送去一些大米和白面。唐亮对帮助管生活的驾驶员王国城说：“我家吃粮困难，别人家吃粮也困难，别人家能过得去，我们也能过得去。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我们不能搞特殊，一定要把这些米面送回去。”王国城明知唐亮家里吃粮确实困难，可也没有办法，只好按他的要求将米面送回管理局。

1964年1月，唐亮由于长期紧张工作和过度的劳累，身患冠心病，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在休养期间，他仍努力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还采取多种形式了解部队情况，为部队建设提出合理建议，积极支持在职领导同志的工作。他还于1965年专程去徐州审查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展品，以便全面反映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淮海前线总前委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唐亮被任命为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唐亮对当时很多事情百思不解，思想非常苦闷。他对工人停产、学生停课和发生武斗，对许多老干部被抓为“走资派”，都很反感，由不理解产生了抵触情绪。为此，他受到“造反派”的训斥。在那一段时间里，他对党、对国家、对军队的前途非常忧虑。然而，他仍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信这种异常的状况不会持久，社会主义事业必将继续前进，党的正确领导一定会得到恢复。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不久，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调唐亮带一个学习组，到军政大学领导揭发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斗争。他明知军政大学当时是个“重灾区”，揭批的任务重，但仍然愉快地服从命令，迅速由南京赶赴北京受领任务。

1972年1月，唐亮以学习组长的名义到军政大学开展工作。他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批判了林彪、黄永胜、张秀川在军政大学的倒行逆施，团结教育全校广大师生员工，使军政大学的建设走上了轨道。5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唐亮为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唐亮便和校长肖克一起，挑起了整顿军政大学的重担。

那时，唐亮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一方面，要领导师生员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另一方面，又要抵制“四人帮”的阴谋活动。1974年2月，王洪文两次“批示”，要军政

大学党委批判并处理一位高级干部。唐亮和肖克研究后，将此案压下，并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使这位高级干部免遭迫害。3月3日，江青“批示”，说“军大的盖子没有揭开”；3月5日，江青又在一封匿名信上恶狠狠地批道：“军大领导不知是一些什么货色，要发动群众把他们烧一烧。要放火烧荒。”对此，唐亮和肖克一面将情况报告叶剑英副主席，一面发动群众，将斗争矛头引向揭发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从而粉碎了“四人帮”妄图搞乱军政大学的罪行。

唐亮和肖克在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同时，认真抓了学校自身建设，充实教员队伍，组建教研室，建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为正规办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7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决定进行院校调整，军政大学分建为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唐亮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强调要在团结、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搞好分校建院。他着重抓了政治学院的筹建。当年9月，唐亮被任命为政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他强调：要恢复和发扬罗荣桓元帅办政治学院的优良传统，把办校的指导思想搞端正，作风搞正派，组织搞坚强，工作搞扎实。1978年12月，唐亮任政治学院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唐亮在政治学院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来自“左”和右的干扰进行斗争。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总部规定的办校方针，研究制定新时期军队院校教学指导思想，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传统，改革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这时，唐亮患了结肠癌，经常发低烧。经过手术后，仍继续为院校建设操劳。唐亮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和革命工作，而对他本人和家属、子女的事情却

不放在心上。他夫人张锐是1937年春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按照规定可以享受副师职待遇，唐亮只要说一下就能办得到，可他就是没有讲，直到他去世以后才得到解决。

唐亮曾当选为中共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并被选为第十一届中央军委委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年6月，中央军委批准唐亮离职休养，移居南京。他离职以后，仍以很大的热情，从事总结历史经验的事情。他应济南战役史料丛书的约请，撰写了《回忆进行济南战役的决策前后》一文；应淮海战役史料丛书的约请，撰写了《回忆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的政治工作》一文；应八路军历史丛书的约请，撰写了《里应外合夺莒城》一文。他的这些著述，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他还应中共山东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邀请，帮助审阅了中共滨海区党委大事记等史料。可以说，他从离休直到临终前，都是为总结历史经验而操心。

1986年11月20日，唐亮因患十二指肠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唐亮去世后，许多老同志写诗词和文章表示悼念。张爱萍写的《悼念唐亮同志》的诗说：

革命不怕风霜，
任劳任怨无懈，
为党卫国为民，
英灵光照日月^①。

^①1986年12月12日载《解放军报》。

唐亮为人民解放事业所创造的业绩将永载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值得怀念和学习。

附 本文主要依据和参考资料：

1. 唐亮自传（1955年6月）。
2. 唐亮1984年至1986年多次同笔者的谈话记录。
3. 唐亮起草的文电和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材料。
4. 1949年7月至1950年5月的《新华日报》。
5. 1952年至1965年的《人民前线》报。
6.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战史，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
7. 《唐亮生平》及唐亮治丧方面的资料。
8. 陈士榘、张震、肖望东、傅奎清、钱抵千、龙潜、鲍奇辰、赵易亚、奚原、刘宗卓、谭肇之等的批件或谈话记录。
9. 曾在唐亮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
10. 有关悼念唐亮的文章。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唐亮的夫人张锐和子女唐东原、唐军辉、唐军凯、唐军光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致谢意。

罗 明

黄 奕 明

罗明 1925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福建党组织和 闽 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时，罗明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在闽西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从而受到打击，被撤销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职务。1945 年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事作了正确结论。罗明一生坎坷，屡受委屈，但他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生^①。

(一)

罗明，原名罗善培，又名罗亦平，1901 年 9 月 24 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枫朗区岩下乡上岩村（现属平原区）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生父罗百历，当私塾教师，收入很少。生母鄢迎，在家佃耕少量土地。一家数口，生活极其艰难，欠债越积越多。1906 年，由于债主逼债，万不得已，父母只得忍痛将排

^① 《罗明同志悼词》。1987 年 5 月 13 日《南方日报》第 3 版。

行第二、年仅 6 岁的罗明以 300 块光洋卖掉，以偿还债务。

罗明的养父罗镜荣，结婚多年还没有儿女。收养了罗明后才生了一个女儿。罗明从小聪颖，深得养父疼爱。但他 8 岁那年，养父就去世了。养母肖炎，管教儿女严而有方。她不识字，却善于督促罗明在课余时间用功自学，使罗明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罗明 13 岁小学毕业，无力升学，便到枫朗圩他五叔的小杂货店当店员兼伙夫；两年后，又转到一家当铺，仍当店员兼伙夫。

当铺的股东中有一位长期住在上海，常把阅读过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寄回店里来。罗明每天晚上关上店门后，就在煤油灯下读这些报纸，日积月累，使他提高了文化水平，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

1919 年底，当铺停业，罗明又回到小货店当店员。1920 年夏秋间，原枫朗圩当铺的一位老板带他的两个儿子到潮州去报考金山中学，邀罗明作陪。到了潮州，在大家的劝说下，罗明也参加入学考试，并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他家里无钱供他上学，但族人同意从祖上的学租（科举时代考上秀才的人才能享用）中拨钱给他作学费。就这样，罗明得到了上中学读书的机会。

罗明入金山中学后，深感这所学校的教学水平低，教学进度慢，学不到知识，用钱又多，便返回家乡，在百侯步梯小学当了算术代课教师。

1921 年暑假，在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就读的同村学生罗扬才返回家乡度假。他向罗明详细介绍了集美学校师范部免收学费、膳费、宿费等情况，鼓励罗明前往报考。暑假行将结束，罗明随罗扬才一起赴厦门，考进了集美学校师范部，插班

进入二年级。

(二)

1921年秋，罗明进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按学校规定，他入学后第一学期当旁听生，自己付钱交膳费，期末考试及格，第二学期便转为正式生，享受师范部学生的各种待遇。

罗明对集美学校的环境和学习条件都很满意。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科学知识，对数理学科尤其有兴趣，用心钻研，成绩优异。还阅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并且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和以后从事革命活动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23年5月10日，学校当局以“屡次鼓动群众违抗校令”为由，宣布开除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杨望苏、刘荆荫二人的学籍。11日，各部学生派代表要求校长叶渊“收回成命”。校长拒不答应，全校学生遂举行罢课，在校主住宅门外静坐一天，向校主请愿，继续要求取消开除学生的决定，还要求撤换校长。但校方又出布告宣布开除学生代表14人，并宣布提前放暑假，强迫学生离校^①。当时罗明被选为班代表之一，参加了罢课和请愿，后因患病也和其他同学一起被迫离校回家。他对学校随意开除学生的做法极为不满，产生了转往他处求学的念头。

1924年8月，罗明在去广州途中，在汕头客店遇到了金

^①集美学校：《民国十二年本校大事记》。

山中学时的同学蓝裕业。蓝裕业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领导成员，中共党员。当他了解到集美学潮的情况和罗明的想法后，对罗明说：你们闹风潮反帝、反军阀、反对学校当局的压迫，很有意义，但因缺乏核心领导，所以失败了。他动员罗明仍回集美学校，并对罗明回厦门后进行革命活动的方法，给予具体指导。经过蓝裕业的启发、引导，罗明决定返回集美学校，领导学生开展反封建军阀压迫的斗争。

新学期开始，罗明在集美照常上课。他利用课余时间与罗扬才、李觉民、刘端生、邱泮林、陈乃昌和罗良厚等志趣比较相同的同学商议，决定在学校秘密建立国民党左派的组织。他们按照蓝裕业的意见，直接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杨匏安（共产党员）联系，请他把入党登记表、证件、文件等寄来，在师范部各班和中学、水产、商业、小学等部，先后发展了国民党左派成员130多人，并在各部各班建立了秘密小组，全校成立了领导小组，由罗明、罗扬才、李觉民、刘端生和邱泮林五人组成。为了便于活动，该组织对外称为福建青年协进社^①。1924年冬，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委任罗明为团的通讯员，并鼓励他们继续做好工作^②。从此，罗明等就在中共广东区委、共青团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在集美学校国民党左派组织建立的同时，罗明等还成立了星火周报社，油印出版《星火周报》，由左派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编辑，以反帝反军阀为中心，宣传革命理论，也谈及学生的

① 《集美学校周刊》第100期第15版，民国14年4月16日。

② 罗明：《厦门集美学校初期的革命活动》，《厦门党史通讯》1986年2期；高素霞、陈少斌：《民主堡垒、革命摇篮》，《厦门党史通讯》1986年2期。

学习、生活、愿望和前途等问题，送给同学秘密传阅。不久，

《星火周报》改为铅印，一部分仍送阅，一部分出售，一直出版到1925年5月。《星火周报》是福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早期刊物之一，为闽南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①。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噩耗传到集美学校，全校师生十分悲痛。学校当局发出通知，4月16日在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左派组织和学生会决定联络师生员工参加追悼大会。在追悼大会上，罗明登台演讲，说：“诸位先生，诸位同学！现在孙先生死了，孙先生以前所负救国救民的责任，都分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负这种责任，一定要有孙先生那种牺牲奋斗的革命精神……要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和同胞，才对得起国家和社会。”罗明的演说词曾全文登载在同日出版的《集美周刊》上，并得到很高的评价，说“罗君于孙先生之革命精神，独能发挥尽致，颇属难得”^②。

同年5月1日，集美学校学生会召开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学校的师生员工参加了大会，还发动了校外的筑路工人、打石工人参加，气氛十分热烈，学校当局害怕学生又闹风潮，就在大会后几天，由师范部主任找罗明谈话，要他提前毕业离开学校，并说学校可以发一张毕业证明书，供他去考大学或当教师用，以后补发正式文凭。开始时罗明拒绝离校，后经左派组织领导小组研究，认为罗明已成为学校当局注意的目标，为了避免革命力量遭受损失，同意罗明离校。同时要他发

①罗明：《厦门集美学校初期的革命活动》，《厦门党史通讯》1986年第2期。

②罗明：《集美学校孙中山追悼会上的演说词》，《集美学校周刊》第100期第18版，民国14年4月16日。

函给共青团广东区委汇报集美情况，请求赶快派人来指导工作和发展党、团组织。罗明5月10日离开厦门返家乡。6月初，蓝裕业以国民会议促进会代表的身分到了集美学校，在集美学校吸收了李觉民、罗扬才、刘端生、邱泮林等7人为共青团员，成立了厦门第一个团支部^①。

(三)

1925年6月，罗明从大埔赶往汕头，于7月初乘船到达广州。与共青团广东区委取得联系。这时，蓝裕业已从厦门返回广州，担任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出版的《工人之路》总编辑。他安排罗明担任该刊的采访员，并为该刊编辑地方新闻。罗明每天上午复习功课，下午去罢工委员会采访新闻，晚上到《工人之路》编辑部参加编辑工作。

8月，罗明参加了广东大学的入学考试，被录取入理预科。入学后，他参加了学生进步组织——新学生社。在该社负责人的建议下，他在广东大学的社员大会上介绍了厦门集美学校学生运动的情况，获得了好评。9月12、13日，罗明由共青团员饶君强（饶卫华）、张穆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②。

10月下旬，罗明被委任为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部干事。当时，杨善集任团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他对罗明的成长进步很关心，把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

^①高素霞、陈少斌：《民主堡垒、革命摇篮》。

^②连尹：《罗明同志与福建党组织的建立》，《革命人物》1986年4期。

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文石印本）三本书送给罗明，罗明对这三本书非常喜欢，十分珍惜，反复阅读，后在闽西交给苏区中央局铅印出版了。

杨善集和罗明都很关心厦门团组织的发展和厦门的建党工作。1925年11月和1926年1月在厦门大学就读的罗扬才和在厦门教小学的李觉民，先后到广州出席学生会和国民党“二大”。罗明向杨善集汇报了罗、李的情况，由他们两人介绍，吸收罗扬才和李觉民加入了共产党。随后，罗明又征得杨善集的同意，经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穆青决定，让广东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罗秋天转学到厦门大学。这样，厦门就有了3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共支部，选罗扬才为支部书记。这是中共在厦门的第一个支部^①。

1926年2月，中共广东区委委任罗明为特派员，到厦门招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员和发展、整顿厦门党、团组织。为了工作方便，罗明还被委任为共青团广东区委的特派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林伯渠任部长）的特派员。罗明一到厦门，即与中共厦门支部研究，发信给集美左派的同学，请他们早返厦门报考广州农讲所。经过考试和个别谈话，录取了朱积垒、郭滴人、陈庆隆、朱文昭、胡永东、李联星、黄昭明、温家福、王奎福等9名学员。原计划在厦门招收农讲所学员15名，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干扰，没能完成任务。对已录取的学员，罗明代表农民部发了旅费，买好船票，送他们上船前往

^①罗明：《风雷激荡闽粤间》，见《广东党史资料》第2辑。连尹：《罗明同志与福建党组织的建立》。

广州。

罗明在招收农讲所学员的同时，着手进行厦门党团组织的发展和整顿巩固工作。他和罗扬才等一起分析、研究了情况，先在集美学校的团员和左派中发展了刘端生、邱泮林等人为中共党员，又在厦门发展了刘大业等人为中共党员，分别成立了7个支部。共青团组织也发展了一批新团员。为了便于领导，成立了党团特支，阮山任书记^①。

罗明于4月初离开厦门返回广州，中共广东区委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他不再回广东大学读书，调到区委宣传部任秘书，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在广东区委宣传部期间，罗明按照区委的决定，主办了一个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主要是广东各地经过组织部门送来的党员，也有一部分是大学的学生党员。训练班学习的内容，主要参照农讲所开设的课程，并且请农讲所的教员来讲课。但学习时间比农讲所短，只有1个多月。罗明和学员一起听课讨论，解答学员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并且经常向陈延年汇报训练班的情况，及时得到他的指导。

1926年7月初，罗明到汕头，向中共汕头地委书记赖先声传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关于开办东江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培养农工运骨干的指示。汕头地委常委迅速对开办养成所的工作做出了安排。遵照国共合作的精神，东江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由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和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共同筹办，并建议国民党党部副主任兼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副专员林修雍为所长，罗明任教务长。养成所于7月18日开学。罗明安排好

^①连尹：《罗明同志与福建党组织的建立》。

教务处的工作，并且主讲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史。

9月初，赖先声调往中共广东区委任秘书长，由罗明接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罗明鉴于任务繁重，恐难以胜任，于10月初前往广州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工作时，曾向陈延年和周恩来提出，可否另派得力同志担任地委书记。陈延年表示相信他能胜任此职，并鼓励他说：“你已经过一年多革命的考验。当此大发展时期，应大胆担负工作。汕头地委常委中还有彭湃、杨石魂等同志，他们对农工运动有实际经验，在农工群众中有很高威信，大家团结一致，就能把工作做好。”陈延年还根据当时的局势，对中共汕头地委的工作作了指示：（1）应加紧巩固和扩大工会、农会的组织，发展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并在斗争中敢于打击地主的武装——民团，锻炼和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2）要宣传北伐战争，发动工人、农民拥护和支援北伐战争。对北伐军中欺压工农的，要组织工农反对他们。

（3）要警惕资产阶级右派叛变革命，提防他们的突然袭击^①。陈延年这种提纲挈领的指导，使罗明从纷繁复杂的工作中抓住了重要环节。他回到汕头后立即向地委传达这些指示，并积极贯彻执行。

在此期间，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员提前结业，从厦门招收来的9名学员返闽时在汕头逗留。他们已在农讲所加入共产党，将要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分回福建汀、漳等地开展农民运动。这时，福建仍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而中共广东区委已授权汕头地委领导福建厦门、闽南和闽西的工作。罗明

^①罗明：《风雷激荡闽粤间》。

按照广东区委的意见，通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苏联顾问的翻译胡秉铎，介绍他们随北伐军经梅县返回闽西、闽南各县，为后来闽西根据地的创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同年12月，北伐军进到福建的漳州和福州。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调罗明到福建，成立一个领导厦门、漳州、泉州、闽西等地党组织的机构，由罗明任书记，中共汕头地委书记一职由郭瘦真接任。

罗明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在汕头地区工作虽只有短短几个月，但那时广东区委的正确领导，陈延年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对我的亲切教诲，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及其对北伐战争的支援，都使我久久难忘。”^①

（四）

1927年1月初，罗明从汕头坐船到了厦门。这时，福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军于1926年12月初进入福州，继而收复福建全省；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中共组织也有较快的发展。罗明与厦门党组织的同志磋商，决定成立中共闽南特委，受广东区委领导^②。中共闽南特委在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出决定，要求各地党组织通过各地的政治监察署开办训练班，大力培养工农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③。根据这一决定，2月中旬，漳州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开办，3月下旬，

①罗明自述。

②罗明：《忆福建早期建党情况》，《福建党史通讯》1987年6期。

③陈子彬：《关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和龙岩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情况》，福建《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5期。

上杭开办汀属 8 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上述养成所虽然由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影响，没有按预定时间完成培训计划，但它传播了马列主义，为闽西、闽南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正当革命形势胜利发展之际，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加紧阴谋活动，策划反革命政变。1927 年 3 月下旬，罗明在广东大学时的一位同学专程送给他一份台湾出版的日文报纸，经翁振华翻译，知道报上载有中国将要发生反共事变的消息^①。罗明记起了陈延年、周恩来关于要防备新资产阶级突然袭击的指示，赶快和在漳州的特委成员研究。大家根据各种迹象，认为国民党右派有叛变革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必须有所准备。果然，福建的国民党右派先在福州、厦门动手了。4 月 9 日，厦门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市委组织部部长）和副委员长杨世宁（市委工运委员）被捕，关押在海军司令部。中共厦门市委立即派人赶到漳州向闽南特委告急。罗明得到消息，召集特委连夜开会研究对策。经讨论作出几项决定：（1）罗明立即赶往厦门处理事变后有关事宜；（2）结束漳州农工运动人员养成所，让学员返回原地开展工作；（3）加强党的机关和支部的秘密工作；（4）翁振华有色彩（指有公开活动，在群众中暴露了身分），介绍去上海，其爱人妇运委员谢志坚调去厦门。4 月 11 日，罗明到厦门，气氛相当紧张。厦门各工会的工人纠察队集合起来，手持木棍，到海军司令部门前示威，高呼口号，要求释放他们的委员长。海军司令部却派出大刀队

^①《罗明同志谈福建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福建党史资料》第 3 辑；连尹：《罗明同志与福建党组织的建立》。

举着“格杀勿论”的横布额在街上巡行，威吓群众，并用军舰将罗、杨等押往福州监禁。罗明和中共厦门市委讨论应变措施时指出，工人纠察队游行示威，表示工人群众的激愤和反抗，是可以的，但达不到迫使当局释放罗、杨的目的。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强秘密工作，有色彩的要调离或隐蔽起来，工厂的党组织不要暴露，各工会组织要注意团结，提防资产阶级反攻倒算。大家提出市委书记罗秋天、宣传部部长吴世华有色彩，应调开。罗明决定调闽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刘端生来担任厦门市委书记，并补充了其他干部。厦门市委稳定下来后，罗明和罗秋天离开厦门返漳州。

根据“四一二”后到处笼罩白色恐怖的严重形势，罗明回漳州后即召开特委会议，进一步讨论应变措施。大家认为，闽西的上杭、永定、龙岩、平和等县农运工作基础较好，要提防反革命势力的反扑，巩固和发展这些县的农运成果。会议决定罗明和罗秋天前往闽西巡视，特委机关仍留漳州，由特委常委兼秘书长邱泮林和工委的许士森、农委的李联星等主持日常工作，重大事情同罗明联系；并规定特委机关与各地联系均采取设联络站口头传递的办法，不再印发书面文件或材料^①。这些决定，实际上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村，转向农运基础较好的闽西山区。

特委会议后，罗明和罗秋天先到永定县的下洋。下洋是一个小圩场，店户多为小商人，原集美左派学生、共产党员陈正、曾牧村、卢肇西、曾宪安等人已在这里创办了下洋公学；原在县城从事农运的胡永东也因县城形势险恶转移到这里工作。罗

^①连尹：《罗明同志与福建党组织的建立》。

明认为这里环境好，有下洋公学作掩护，党的力量也较强，可以把这里建成一个活动据点，并让罗秋天留在这里领导永定工作。

5月7日罗明由曾宪安带路，抵达上杭县城。这天晚上，上杭的反动军队包围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工会，抓走了张楷、包究生和周继英等人，还挨户搜查傅柏翠（四人都是国民党左派）。包究生、周继英第二天就被反革命派杀害。罗明召集党团员开会，要求大家认清革命前途，注意隐蔽斗争。几天后，他又赶到龙岩。龙岩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已有6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被捕入狱。罗明同陈庆隆、郭滴人等取得秘密联系，安排了龙岩的工作，还曾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但没有成功。罗明又返回下洋。

5月下旬，罗明到平和时，平和县农协会的办事机构已从县城迁至九峰上坪，就在朱积垒的家里。罗明认为这里离县城仍太近，不安全，与朱积垒商量后决定转移到地理环境和群众条件都较好的长乐乡去。长乐是罗姓族居的地方，罗明用罗绍华的名字同当地群众联系。罗谷香家有多余的房子，他一听“绍”字符合罗族辈序，便亲切接待，同意借出一边横屋供县农协会使用。这一切安置好后，罗明建议农运工作要向四周发展，并且和朱积垒到附近农村去发动群众。长乐很快成为平和农运基础较好的据点。

不久，罗明又回到永定。这时永定的农运工作已在县城南面的下洋、陈东坑、高头，东面的湖雷等地铺开，而北面溪南里等地还是空白点。罗明找中共大埔县委书记饶龙光等人商量，请他们派一个合适的人在溪南里一带开展工作，但未有答复。6月，罗明到大埔县参加大埔农军攻打县城，再次向饶提

出派人的要求。饶龙光答应了^①。饶向罗明介绍了在大埔当小学教师的张鼎丞的情况，说县委已决定吸收他入党，但还未通知他办入党手续，暑假期间他回永定去了，可以通知他留在当地工作，并在那里办理入党手续。罗明得到这样一个人，非常满意，高兴地赶回下洋，约张鼎丞前往湖雷见面。当罗明将党组织的决定告诉张时，他要求派一干部来一起工作，可以安排在小学当教师作掩护。罗明表示同意，不久便调了罗秋天去。

5月上旬，罗明接到上杭同志来信，请他到上杭卢丰去指导工作。中共卢丰支部的蓝为仁、蓝为龙兄弟原是集美左派，回上杭后加入中共，在卢丰建立了党支部和农会。罗明到了卢丰，蓝氏兄弟召集秘密会议讨论了党和农会的发展工作。他们还说，上杭驻军土著军阀蓝玉田因事变后得不到正式编制和军饷，对蒋介石不满，为了生存和发展，想向左派靠拢。蓝玉田要蓝为仁兄弟着手恢复国民党县党部，做些群众工作。罗明认为可以对蓝玉田做些争取的工作，同意由蓝氏兄弟恢复国民党县党部，用这种公开的身分，促进工农运动的开展。罗明知道上杭驻军罗步月是蓝玉田的部下，蓝玉田的新变化，是营救龙岩被捕同志的好机会，于是他又转到龙岩。

7月间，罗明到龙岩时，被反革命派通缉离开福建的邓子恢，从江西崇义又辗转回到龙岩，要求恢复党籍。罗明认为邓是留日学生，在江西入党，被通缉后不怕白色恐怖，要求恢复党籍，继续参加斗争，这种精神很可贵，对他的要求表示支持和赞同，后经龙岩党组织讨论通过并办了手续。接着，罗明和中共龙岩组织派邓子恢和谢宝萱负责去上杭找蓝玉田营救被捕

^①黄肇崇：《四上闽西》，《福建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

关押的同志。蓝玉田命令罗步月把被捕的6位同志全部释放了①。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至同年7月，以罗明为书记的中共闽南特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采取一系列应变措施，及时地将革命组织转入地下，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在危急的关头，为党保存了革命力量②。

(五)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从武汉派陈明、陈昭礼到福建恢复中共组织，在漳州找到了中共闽南特委机关，并通知罗明返回漳州。8月，陈明、陈昭礼和闽南特委成员在南靖县召开会议，改闽南特委为闽南临委，陈明任书记，罗明任宣传部部长。这时，南昌起义和起义军南下消息已在报纸上登载，临委同意罗明的建议，由他再去闽西，一边巡视工作，一边代表临委设法同起义军建立联系。罗明赶到上杭蛟洋，从蓝玉田部匆匆撤离上杭县城的迹象判断，起义军将要到上杭来，于是便留在上杭等候。

9月上中旬，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先后到达上杭。罗明和蓝为仁等前往起义军前委驻地看望周恩来等。周恩来高兴地向他们介绍了南昌起义的情况和部队南下的任务，并要求地方党组织做好下面几件工作：1. 交通运

①陈子彬：《关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和龙岩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情况》。

②魏金水、伍洪祥：《深切怀念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罗明同志》，1987年9月18日《福建日报》第2版。

输；2. 粮食供应；3. 警卫和探听敌情；4. 收容和医治伤病员^①。罗明和蓝为仁等表示一定把这些工作做好。罗明还代表临委汇报了闽西党的工作和敌情，并请求留一部分部队在闽西帮助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周恩来说要集中兵力下潮汕，部队不能留下，同意留下50枝步枪和一分子弹给地方党在闽西发动武装斗争。

起义部队离开后，罗明和上杭党组织利用留下的枪支守卫上杭县城，等待潮汕作战的音信。至10月上旬，仍然没有获得确切的消息，罗明便到峰市河头城找温家福了解情况。过了几天，朱德带领在三河坝激战失败和在其他地方失散的一部分起义军，经过峰市、武平向江西转移。罗明赶紧写了一封信，派温家福追送到武平，请示朱德要不要把队伍带来闽西。朱德到了闽赣边界，给罗明回了信，说部队不回闽西了，闽西的武装斗争由地方党组织负责部署。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明和蓝为仁等便撤出上杭县城，把枪支带到北四区去建立农军。

不久，罗明收到闽南临委转来中共“八七”会议的文件和中央致闽南、闽北临委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对如何组织武装斗争，大家都还没有经验。后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消息传来，罗明开始意识到革命斗争需要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发展。因此，他以农运基础比较好，革命力量比较强的上杭、龙岩、永定、平和等县为据点，积极准备发动农民暴动^②。

①谭天度、罗明等：《回忆周恩来总理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

②魏金水、伍洪祥：《深切怀念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罗明同志》。

12月5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漳州成立。陈明任临时省委书记。罗明被选为常务委员，并决定省委机关设在厦门。会后，罗明前往平和长乐传达了“八七”会议文件精神 and 临时省委关于当前任务的决定，要求加紧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卫军，准备武装斗争。罗明还写信给饶平县农协，请他们支援平和县农协一些枪支弹药。

1928年2月初，罗明回到厦门。在2月10日召开的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改组了临时省委常委，罗明任书记，并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

同年6月，罗明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25日，罗明在讨论政治报告的大会上发言，介绍了福建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情况。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问题，他表示“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关于革命潮流的高涨与低落问题，他认为“应把‘现在已经高涨’与‘可以高涨’两层分别清楚”。他还说：“我以为依福建及其他地方的情形来观察，1. 统治阶级矛盾很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能稳定；2. 改良主义不能实现，可以断定革命潮流不久便可高涨，不过究竟‘到什么时候高涨’，‘高涨的程度如何’，那就要看我们主观的力量而定”^①。

大会结束时，周恩来曾和罗明谈了一次话，问他愿不愿意留在莫斯科学习。罗明考虑后回答说：能留在莫斯科学习是很好的。但福建省委派来的代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②，我应该回

①中共六大政治报告讨论第十八号发言（影印件）。

②福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共3人，罗明和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工委委员许士森；另一位是代表共青团的团省委书记孟坚。会议期间，许士森肺病加重，医治无效，不幸去世，所以罗明说“福建省委派来的代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去传达大会精神。他又说，闽西的武装斗争已经开始，这次大会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等纲领，我也应该回去贯彻。周恩来同意了罗明的意见，没有把他留下来。

随后，共青团福建省委选派的代表孟坚调到东北地区工作，这就更加重了罗明回福建传达和贯彻“六大”决议的任务。同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正式成立，刘谦初任书记。当时，罗明仍在归国途中，未参加省党代会，但被选为省委常委和候补书记。10月，罗明回到上海，按照中共中央决定返回福州市，在中共福建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六大”决议。11月初，省委领导同志分别到全省各地传达贯彻“六大”决议，罗明和共青团省委书记陈柏生一起先到厦门，然后转往闽西等地进行传达。

闽西地区从当年3月开始，掀起了农民武装暴动的高潮。虽然由于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而遭受挫折，但杭、永、岩三县的游击区仍存在。罗明和陈柏生先到永定溪南里找到了中共闽西特委，然后和特委、县委负责人一起到合溪开会。在讨论“六大”精神时，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大革命是不是失败了，开展游击战争对不对，有没有前途等等。罗明结合当地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目前“局面很严重”，群众“斗争的情绪已渐低落（趋向调和）”，“豪绅地主暂时得势，他们不但不能对农民退让，而且一定加紧压迫和剥削民众”，这“必引起农民群众的仇视与反抗”，“阶级的冲突必因此加强”。他还说：“目前我党的组织力量虽然很弱，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已散布得甚普遍，以后不难恢复并发展我们的组织”。所以“在客观和主观方面不久有再起斗争的可能”^①。大家听后很受鼓舞，

^①罗明致福建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

克服了一些同志在困难中产生的一些消极情绪。

罗明在永定逗留了10多天。当地环境很险恶，走路和住宿都要提防反动武装的袭击。合溪会议后，罗明和中共闽西特委的几位负责人到坎市特委机关，研究了贯彻“六大”精神的具体部署。随后，罗明又前往龙岩、上杭，刚到上杭，就得到中共闽西特委机关被破坏的消息，特委委员李西挺、曾甲和机关炊事员范炳元被杀害，凶残的反革命派把被害同志的头颅挂在永定县的城门上，因为其中一人的面貌与罗明有些相像，所以曾误传罗明也被杀害。

罗明不避艰险，在闽西各县巡回传达中共“六大”决议，“‘使大会的决议很普遍地深入于党员群众中’，从而大大地推动各地武装斗争的发展”^①。

（六）

1929年2月，刘谦初调离福建，后由罗明接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7月，中共中央调黄钊任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改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翌年1月，黄钊离开福建，中央又决定罗明任福建省委书记。这期间，罗明主要在厦门主持省委工作。在他的领导下，1930年5月，在厦门进行了一场胜利的破狱斗争。

1930年7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决议和行动计划陆续传达到福建省委。在省委会上，有的坚持要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罗明、王德等大多数委员则认为厦门、福州的工人运动正在恢复，进行暴动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同意

^①魏金水、伍洪祥：《深切怀念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罗明同志》。

立即在这些城市发动武装暴动。会后，由秘书处将讨论情况和提出的问题整理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则批评福建省委“右倾保守”^①，要求无条件地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命令。罗明等仍坚持福建不能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的意见，但经过省委激烈的讨论之后，只好同意“遵照中央的通告”，把党团省委合并组织了行动委员会，罗明任书记^②，后来也搞了一些飞行集会，在晚上散发传单，到街上公开演说，呼革命口号，组织群众示威游行等。结果暴露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受到损失。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不久，中共福建省委接到中央通知，要罗明、王德和黄剑津3人到上海另行分配工作，福建省委书记一职由王海萍接任。

1931年1月，罗明到上海。当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开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找罗明谈话，要他检查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罗明如实地汇报了福建受立三路线的影响所犯的“左”的错误。这位宣传部部长认为立三路线是右倾，指责福建省委在农村搞游击战争是犯了“右倾”路线错误。罗明对此表示不理解。于是，他极其不满地对罗明说：不承认犯路线错误，就不分配你的工作^③。过了两个多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罗明被分配到闽西苏区工作。

①罗明、王德给中共福建省党校研究室的信（1983年4月3日）。

②《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成立总行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8月15日）。

③《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第239页。

(七)

罗明于1931年4月初离开上海，经大埔的交通线进入闽西，到了中共闽粤赣边苏区特委所在地永定县的虎岗，任特委组织部部长。这时，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刚开始，罗明按照特委的分工到永定开展游击战，较好地完成了配合红军作战的任务。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罗明和张鼎丞率领一个红军独立团在杭、永、岩三县开展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进攻，同时牵制敌人，掩护红十二军出击长汀。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闽西与赣南苏区便联成一片，闽西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闽粤赣省委（闽粤赣特委于5月改称闽粤赣省委）机关迁至长汀。

1931年11月，罗明接中央红军前委的通知到了长汀。年底，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卢德光携巨款逃跑，罗明接任临时省委书记。1932年3月中旬，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大会按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将中共闽粤赣省委改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被选为省委常委。经苏区中央局请示中共中央，决定罗明为省委代理书记。

3月下旬，红军东路军入闽。4月初，毛泽东、周恩来等抵达汀州，与罗明商量后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政治和军事部署。罗明和省委常委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红军攻打漳州的决定。他反复强调红军完成任务后回师中央苏区，不长期占领漳州。罗明和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分别介绍了漳州的敌情我情和地形地物，后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红军入闽报

告，并指示苏区要做好后勤支前工作。

会后，罗明起草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宣言》，并以省委名义发了通知，号召闽西工农群众立即动员起来，配合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战。过了两天，罗明陪同周恩来到长汀县所属区、乡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率领东路军经上杭向龙岩挺进，在上杭县城电告省委，要罗明赶去随红军行动。罗明接通知后到了上杭，日夜兼程前进，赶上东路军。

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在龙岩、永定、坎市一线歼灭了张贞部下杨逢年旅，克复龙岩，并乘胜迅速向漳州进军。4月19日，红军全歼张贞师，20日攻占了漳州城。罗明协助东路军政治部与中共漳州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着手建立地方政权，成立闽南革命委员会，组织地方武装，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政治部还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漳州召开盛大的军民庆祝红军胜利攻克漳州大会，罗明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在会上讲话，号召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拥护中央红军，反对蒋介石军阀官僚政府的压迫和剥削，在闽南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展开斗争，并和全国人民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①。

“五一”节后，毛泽东找罗明商量，说中央红军不准备在漳州久留，请他同闽南地方党组织联系，抓紧时机，进一步发动群众，把枪支弹药发下去，扩大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红军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在闽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①罗明：《回忆毛主席率领红军攻打漳州》，《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

毛泽东在漳州时，收到漳州、厦门等地许多学生、教师和艺术工作者写来的信，要求参加红军。毛泽东把信件转交罗明，要他负责联系并帮助这些知识分子随红军进入苏区工作。罗明这样做了，在回汀州路上，与这批知识分子同行。

（八）

罗明在进军漳州途中跌伤了腰，返汀州后住进了福音医院进行手术治疗。这时，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中央主力红军转到北线广昌、宁都一带，闽西的红十二军和独立第七师也奉命调往江西，留在闽西苏区与国民党军作战的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八、第九师共3000人。国民党驻漳州的十九路军向闽西苏区进犯，占领了龙岩全县和永定的坎市、虎岗一带；广东军阀部队占领了上杭县城，并不断向上杭的卢丰、茶地、白砂等地进犯。闽西地区的形势相当严重。此时也在福音医院疗养的毛泽东找罗明谈话，扼要讲述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提出了闽西苏区如何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的意见。罗明出院后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传达，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决定罗明兼任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随后，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以罗明为书记，方方、谭震林等参加的前敌委员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杭、永、岩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前敌委员会依靠群众和地方武装打击国民党十九路军和广东军阀的进攻，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杭、永、岩的干部和群众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可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路经上杭、白砂时，对该地区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取得的胜利不但不鼓励，反而

指责罗明不该到边缘前线。他们当面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①

为了更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21日，罗明在新泉就长汀、连城和新泉的工作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月底，又在旧县写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罗明的两份报告从实际出发，直率地反映了闽西苏区斗争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的意见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强调要坚持闽西的游击战争，“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②。

第二，避敌锋芒，抓住时机，独立第八、第九师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北边发展，“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地连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面发展”^③。

第三，在国民党重兵“围剿”苏区的情况下，要把扩大主力红军与发展地方武装结合起来，“在这时扩大红军应特别以长汀为中心”，“至于其他各县如永定、武平以至上杭，我认为在敌人进攻比较紧张当中，应先抓到这个时机来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如果不重视发展地方武装，不坚持游击战争，仍要在杭、永、岩边缘区扩大主力红军，而这些地区的群众没有武

①罗明：《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②③罗明：《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装保卫，听任敌人摧残，“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①

第四，在财政上，杭、永、岩地区的土地税款等收入不宜完全集中到国库，应留有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人员的生活就无法维持。

罗明在两次报告中提出的主张，是切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反映了杭、永、岩广大群众的愿望。但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未被接受，他反而遭到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把罗明的意见和他在福建省委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联系起来，认为中共福建省委已形成了一条“反抗党的进攻路线”^②的“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③

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下，要求各地分兵把口，硬打硬拚，认为“红军独立第八师和第九师不能向北发展，而应留在岩、永、杭前线抵住敌人的进攻”^④。他们无视罗明对形势的客观分析，竟指责罗明向北积极发展的建议，“根本上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根据地，向后方逃跑退

①罗明：《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转引自1933年2月18日洛甫的《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

②博古：《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斗争》第3期，1933年2月23日。

③《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

④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62页。

却”，甚至进一步推论说罗明“所以主张向汀、连一带发展，不外是因为这一带只有团匪没有白军的缘故。如若白军一来，那当然只有像杭、永、岩一样又是逃跑了。”^①

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不顾苏区特别是边缘区斗争的具体环境，不仅要在苏区实行义务兵役制，搞红军的所谓“正规化”，机械地分配扩大主力红军的任务，而且还要普遍搞什么拥苏同盟、反帝同盟等等名目繁多的群众团体。对此，中共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写了一封信给省委，提到“反帝同盟拥苏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我觉得必须尽可能的减少，或合并”^②。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已经从推理中认定，“依照他（指罗明）的路线做法，那我们在敌人这一大举进攻的形势之下，不但应该抛弃杭、永、岩；抛弃汀、连，而且应该抛弃整个苏区根据地，以至根本取消苏维埃革命！”^③这么一来，杨文仲的信就成了“罗明与杨文仲同志的政纲”^④，成了罗明、杨文仲“不但主张取消党，而且主张取消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⑤，已“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⑥的罪证。

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发动反“罗明路线”的目的也并不只是针对罗明个人，而是要进一步反对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打击中央苏区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各级党、

①洛甫：《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1933年2月18日），《斗争》第3期，1933年2月23日。

②④⑥博古：《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

③⑤洛甫：《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

政、军领导干部，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苏区得以全面贯彻。他们没有隐瞒这个目的，曾公开用讽刺的口吻说：“企图拿罗明与斯大林比较，那正像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①在这里，他们公开骂的是罗明，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他们写道：“罗明处处想依靠中央苏区的红军来打平天下，大红军一来他立刻高兴得发狂，大红军一去，他立刻失望得哭泣。1931年7、8月时，红军占领汀州，罗明跟着卢德光立刻抛弃了原有根据地，把省委搬到汀州。1932年5月红军东下占领漳州，罗明又发疯一般把省委一切工作丢开，随大红军同到漳州。对于如何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如何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巩固党的领导作用……，一切这些问题，在罗明同志看来始终是次要的。罗明同志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现在，发展成为公开的、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是毫不足怪的”^②。这段话与闽西的历史和罗明的经历是不相符的，但通过这些历史事例点出了罗明与毛泽东的关系，其意图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反“罗明路线”的实质是继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之后彻底否定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3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案中提出了“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等紧急任务。为此，中央局还强调，必须展开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认为福建省委已经“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武断地说：“这

^{①②}洛甫：《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

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上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为此，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立刻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改组省委机关，“并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2月24日，中央派代表到长汀召开各种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当时，罗明不在汀州，对于这场斗争还一无所知。他在上杭看到《斗争》报上登载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和有关文章时感到很突然。过了几天，他接到省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回汀州开会。在他返汀州途中，遇到了从汀州来的张鼎丞，才了解了一些在省委反“罗明路线”的情况。

罗明到汀州后又接到通知，要他赶快往瑞金作检查。到了瑞金，中央局几个干部找他谈话，批判他的“错误”。接着，一位临时中央领导人和他谈话，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分析。罗明问道：“我自己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由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县参加游击战争，为什么说是‘退却逃跑’呢？”对此，他得到的回答是：从路线上讲这就是“退却逃跑”。在讲及扩大红军的问题时，罗明还引用列宁的话反驳对他所谓“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富农路线”的指责^①。

随后，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找罗明谈话，劈头就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

^①罗明：《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缘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他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于这些话，罗明后来才明白是指向毛泽东的①。

罗明在瑞金期间，白天、晚上连续参加大小会议，一连被批斗了好几天。随后，他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返回汀州在中共福建省委召开的省临时代表会上作检查，中央局派人参加。会议最后由中央代表作总结，并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和撤销杨文仲的中共新泉县委书记职务的决定。罗明被批斗、撤职后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杨文仲被批斗、撤职后也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后来在长征途中光荣牺牲了。

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红军长征时才不得不停了下来，有些地方还延续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结束。10年之后，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作出了明确结论。

（九）

1933年3月，罗明和爱人谢小梅一起到瑞金叶坪，罗明被分配到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校任教育处长和党班班主任。

罗明这时处境尴尬。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董必武鼓励他说，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你要向前看②。同志间的关怀，

①罗明：《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②罗明自述。

使罗明感到无比温暖，他逐渐摆脱了精神压力，积极工作，以过去办革命干部训练班的丰富经验，处理好校务、班务，得到师生们的敬重，也受到董必武的赞扬。他还参加讲授“党的建设”，并且编写了一本《党的建设》的教材^①。

同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陈云、罗迈代表中央局通知罗明和谢小梅一起前往厦门、福州，领导当地党组织推动地方群众工作。临离开瑞金时，中央党校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校党委委员陈潭秋在会上热情洋溢的致词欢送，使罗明深受感动。学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各地反对“罗明路线”时受到批判，随后调来学习的，大家也受到很大鼓舞。

12月初，罗明和谢小梅到达厦门。在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扩大会上，罗明传达了中央局的指示：1. 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反蒋抗日；2. 要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释放政治犯，支持民众运动；3. 发展党组织和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他还告诉大家，形势好转时准备成立中共福建省委（在白区的）。会后，罗明和谢小梅又到福州，罗明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上作了同样的传达。但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和宣传部部长（后来两人被捕叛变）又召集会议要罗明检查所谓“罗明路线”的错误，并将罗明隔离起来。翌年1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罗明得中央局通知，和谢小梅先后返回江西瑞金，仍回中央党校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转移。这时，罗迈到中央党校告诉罗明说，准备派百余名学员去苏联学习，要按下述条件挑选和提出名单：一是政治坚定，有工作经

^①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叶笃初、侯少文给罗明的信（1985年11月16日）。

验和能力；二是身体强健，能过艰苦生活和能长途走路到海边后转赴苏联。罗明逐个和被选上的学员谈话，但没有直接告诉他们准备去苏联，只是说要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到了出发前，罗明才知道罗迈所要挑选的学员果然不是派去苏联学习，而是跟随红军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形势日渐紧张。有一天，罗迈告诉罗明，中央决定调他到红军部队工作，要他从医院接回谢小梅，准备一起调动。这时谢小梅刚生一女，尚未满月，他们就把孩子送给附近一位红军家属，然后跟随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

罗明和中央党校部分学员被编入中央后勤纵队，在政治部做联络、宣传和收容工作。一路上，他和几个同志沿途进行宣传鼓动，收容掉队人员，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5年1月9日，罗明随纵队进入遵义城。他和一些同志奉总政治部命令，采用各种形式，对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并协助遵义各种群众团体召开代表会议，成立遵义县人民革命委员会。他们还在遵义进行扩大红军工作，12天中，有数千工人、农民参加了红军，成绩很大。

遵义会议后，林伯渠向中央后勤纵队传达了会议的主要内容。不久，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罗明任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在红军渡赤水河时，一、三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向行军所经村镇的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使红军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

二渡赤水后红军回师攻打娄山关时，罗明和地方工作部的同志赶上山顶做宣传鼓动工作，并参加救护伤员，因突遭敌机

轰炸，罗明左臂受了重伤，被担架抬下山去治疗。行至贵西横渡北盘江前，中共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找罗明谈话，说红军要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要罗明和谢小梅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运，由去贵阳搞工运的朱祺领导^①，并介绍了一位川籍老人给他们带路前往。罗明清楚地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险的任务，但既然是中央的决定，他接受了。

(十)

1935年4月，罗明和谢小梅离别了红军长征队伍，改装成小商人，跟着朱祺和带路老人向贵阳方向走去。

由于红军在这一带刚刚过境，反动当局对过往行人盘查很严。傍晚，罗明等一到关岭县城就被巡查的士兵扣留起来，寄押在关岭县监狱。当晚，朱祺被审问后与带路老人先获释放。但他离开时一点钱也不肯留下，只说到贵阳再设法见面。罗明和谢小梅在第二天晚上被法官提审时各被打了20板，仍被关押，10多天后，关岭县调换了县长，清理监犯时，才获得了释放，继续向贵阳方向走。没有旅费，他们卖掉穿用的衣服，风餐露宿，徒步辗转，终于到达贵阳。

当时的贵阳，国民党的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不论白天黑夜，城门、街道、客店都有军警盘查。罗明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与朱祺相约的暗号，但一无所获。因为拖欠客店房租，店主介绍谢小梅去给保长家当佣人，罗明去当清道夫，后又改为消防队挑水。挑水是项劳累的重活，一个月后，罗明肺病加重，吐了

^①罗明：《遵义会议前后》，《丰碑》第32页。

血，竟被解雇。罗明失去了工作，生活无着，不得已到当地天主教堂贫民医疗处看病领药，并在教堂内找个角落，铺张草席安身。这时，他们已听到贵阳当局在追查一对共产党夫妇的消息，加上找不到朱祺，无法与当地党组织联系，立足尚难，更谈不上开展党的工作。他们再三考虑，决意离开贵阳，回广东寻找党组织。但路途遥远，身无分文。罗明只好写信给亲属请求支援。在收到上海的堂兄罗悬弧和家乡的养母的汇款后，他们便启程经广西返抵广州。广东当局也到处抓共产党人，不能久留。他们向同乡借了点钱，又坐船前往上海。希望能通过熟人，找到党组织。哪里知道，当他们在上海找到堂兄罗悬弧的家时，又被人出卖了。

罗明一到上海，他的堂弟罗调金即向特务机关告密。第三天，罗调金雇来了黄包车，说是送罗明去医院治病，其实是特务设下的圈套，罗明被捕了，谢小梅也被扣捕。罗明在牢房里病发吐血，一度昏迷不醒，后被送进特务机关办的医院。在狱中，任凭特务们审讯、劝诱，甚至让已叛变的朱祺出来指证，罗明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当他的堂兄罗悬弧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便通过宗亲请求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司令官罗卓英设法营救。罗卓英打电话给上海公安局局长，要求把罗明和谢小梅解往南京。

约在8月间，罗明被押解到南京，关进特别监牢。谢小梅作为犯人家属被软禁，与看守人员住在一起。一天，两名武装人员押送罗明去同罗卓英见面。罗卓英问了罗明的身体状况，又说江西的共产党已被他消灭了，要罗明去看一看，还说车子都准备好了。罗明知道一登上去江西的车子，就意味着向罗卓英投降，便回答坚决不去。罗卓英诱降计划落空，罗明又被押回监牢。

10月下旬,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南京办事处派人来接罗明出狱。监狱管理人员说是保外就医。这时,罗卓英部已由江西调往浙江丽水,他们将罗明押往丽水,并在上海火车站释放了谢小梅。

罗明被软禁在丽水的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罗卓英仍想软化他,并派一个集美学校的同学来做说客。罗明鉴于当时的处境,回答说:“我不想再参加政治活动了,愿意去教书。”^①罗卓英目的仍未达到,罗明仍然被软禁。

1935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发生了华北事变。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发表抗日救国宣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逐渐高涨。12月下旬,罗卓英告诉罗明,说陈诚来电,要他往武汉商谈抗日。罗卓英还说:“‘士可杀不可辱’,我知道你可杀不可辱。因为日本要进攻,我调到浙江丽水作抵抗准备,希望你帮助我。”^②

罗明到了武汉,陈诚约他去谈话,问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罗明被囚禁已将近半年,对中共的“八一宣言”和随后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都不很了解。可他对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坚信不疑,对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的宣言还记得很清楚,便联系中国共产党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签订抗日反蒋协定的事,在陈诚的会客厅里畅谈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陈诚听后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现时要派人去与共产党联系。红军到了陕北,你可以去

①②罗明自述。

找陈云先生，我和他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认识的。罗明洞悉陈诚的计谋，回答说：你如真有诚意，可以派正式代表去。

过了二三天，陈诚又约罗明谈话，要罗明留在武汉专门研究抗日的事。罗明说他自己患病，还想回家乡探望年老的母亲。但一有抗战事宜，只要打一个电报通知，可以随时出来。陈诚只好同意他回家乡去。

罗明从武汉回到丽水，向罗卓英谈了与陈诚见面的情况。罗卓英笑着说，以后不要对外说及此事。至此，罗卓英也不再留难罗明。于是罗明得以到上海，不久与谢小梅一起返回家乡广东大埔县。

（十一）

1936年春，罗明回到家乡。他离开上海前，广东大埔县私立百侯中学校长杨德昭曾约他谈话，有意请他到百侯中学任教。回大埔后，在百侯中学执教的邱泮林关心他的生活出路问题，也向校董会和代校长罗牧推荐。不久，罗明受聘为百侯中学教师。

1937年暑假，杨德昭校长从香港拍来电报，聘罗明为百侯中学代校长。他用减低部分教职员薪金的办法，缓解了极度紧张的经费困难，使学校继续办了下去。

全民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一直在寻找中共组织的罗明，从谢小梅娘家（在龙岩）的来信中，得到中共领导的闽西游击队仍在龙岩一带活动的消息，便立即以探亲为名，请假去了龙岩。他在龙岩找到了游击队办事处，又由办事处派人把他带到白砂。这时，正好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领导人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温阳春等在白砂开会。罗明见到了老战友，找到了党组织，欣喜若狂，他向党组织汇报了两年多来自己经历的详细情况，要求恢复党籍。虽然在当时还未能解决他的党籍问题，但从此，他与省委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①，按照党的指示，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罗明回到百侯中学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结合战时农村的实际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传统，提出在学校实施抗日救国教育的方针：1.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抗战思想；2.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3.锻炼学生的坚强体魄；4.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和艰苦奋斗作风；5.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生产与战备知识^②。按照这五项方针，他首先改革教学内容。如国文课选择《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其他进步刊物的文章作为补充教材；公民课的内容不适合抗战形势需要，印发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义取代之；还安排学生定期到农场参加生产劳动。在课外，则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举行以抗战为内容的演讲、作文比赛和时事讨论、演剧、歌咏等活动，还在校内悬挂马、恩、列、斯、毛泽东、朱德、孙中山、蒋介石画像，使地处偏僻山区的百侯中学，弥漫着一派联合抗战的气氛。

罗明还鼓励侯中师生参加青抗会、妇抗会、战时美术宣传队、时代剧社、百侯区教育会等抗日团体，在百侯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统一领导下，向群众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由百侯中学发起，召开了大埔县各中学、各社团代表的联席会议。罗明是会议主

① 《中共闽粤赣省委方方致中央报告》，（1938年1月10日），
《中共闽粤赣省委给南委的报告》，（1938年1月17日）。

② 《百侯中学校史》，（1983年11月）。

席团首位成员^①。会上通过了他起草的大埔各界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十条。这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大埔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期间,中共大埔县委书记肖明定期与罗明联系,中共地下组织面临的许多工作和困难问题,也得到罗明的支持、配合和协助解决。

1938年冬,罗明到永定会见张鼎丞,张要求他设法找一部收音机、一张闽粤军用地图和一些马列主义书籍。罗明很快把事情办好,派两位青年送去。据当地的群众和干部反映,罗明当时被视为“该县抗日救亡的领袖”,“百侯成为大埔的抗日救亡中心地区,百侯中学成为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摇篮”^②。

1940年端午节前夕,罗明按照杨德昭意见,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方方同意,前往南洋为百侯中学筹款,并且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筹募抗日将士慰劳金。1941年秋,罗明回到香港。这期间,他为百侯中学筹集的经费早已陆续汇回,侯中用这笔钱新建的教员宿舍和课室已经落成,增办的高中班也已开学。因此,当他回到侯中时,全校师生都到10里外的曲滩迎接,场面十分感人。

1942年5月间,由于叛徒出卖,中共粤北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后又查抄了南委机关,并追查到大埔的“天成商店”(南委的秘密机关)。罗明得到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通知中共百侯地下组织安排身分已公开的党员赶快撤离,并将学校图书馆的红色书籍、图片分散藏在农民家中。端午节前,搜

①《大埔县各社团学校联席会议》记录。

● ②魏金水、伍洪祥:《深切怀念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罗明同志》。

查天成商店的保安队连长林某带队伍来到了百侯。杨德昭校长因香港沦陷，回乡闲居，刚好在侯中。罗明从种种迹象分析，认为林某未必掌握到什么凭据，如果自己表现惊慌，反而易于暴露。他劝说杨校长保持镇静并与林某周旋，以他的地位和声望，阻止反动派屠杀无辜青年。杨德昭听取了罗明的建议，神态安详地宴请了林某，罗明也请林某观看侯中运动会，在百侯商家宴请林某时还出席作陪。罗明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使百侯中学终于避免了国民党保安队的搜查。但此后，国民党大埔当局仍然在注意侯中的动向，校董示意要罗明离开侯中，罗明事先已请示过方方，便辞去了教职。这时，闽西南的中共组织执行中共中央“隐蔽精干”政策，罗明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又中断了。

1943年粤东一带严重缺粮，大埔成为重灾区。在奸商操纵下，市面粮价飞涨，加上涌进一批从潮汕向内地后撤的难民，真是哀鸿遍野。罗明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在家乡挑起救灾重担。他在石云区成立了教育会属下的救济会，亲自前往福建产粮区平和县购粮，平和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是罗明在集美学校的同学，通过他疏通了平和县县长，准许从平和县出境粮食1500担，分三批交货。当第一批粮食运到枫朗时，全县轰动，米商也不敢再囤积居奇了，米价迅速恢复平稳。

1944年，罗卓英的参谋长罗鸣白辞职回到家乡大埔，对罗明救济饥荒的事表示敬佩。他得知大埔县县长派特务监视罗明，主动给予保护。抗战胜利后，罗明应已就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的罗鸣白的邀请到广州，随后被罗鸣白直接委派到省干训团任视导科科长。1946年1月，方方任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来到广州，并事先由肖明写信告诉罗明。但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罗明不能与方方见面，打电话也被窃听，无

法协助工作。不久，罗鸣白改任兴梅专署专员，他要罗明立即离开广州到香港去。为了罗明的安全，他还叫来警卫员开小轿车将罗明送上广州开往九龙的火车。

罗明到香港后，找到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连贯，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和准备到南洋去的想法。经连贯同意，他便办理手续，前往新加坡。罗明在新加坡一方面为筹建石云中学募款，一方面向侨胞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发动侨胞支援祖国的解放战争。在当地侨胞的热情捐助下，大埔县私立石云中学在枫朗镇筹建起来了。罗明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又作出了贡献。

1948年6月，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施行紧急法令，逮捕马来亚共产党员和华侨进步人士，对中国籍的商人和教师也横加干涉。当局曾传讯罗明多次，不准他离开新加坡。同年底，罗明接到中共香港分局的通知，要他立即回国。他以罗奕的名字解决了签证问题后，迅速返回香港。后又按照方方的指示，留在香港做策反工作。他利用各种关系，把这件工作做好。

新中国成立后，罗明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通知，要他参加广州南方大学的筹建工作。1949年10月14日，即广州解放的第一天，罗明便离开香港返抵广州，到南方大学筹备处报到。

（十二）

南方大学是华南刚解放便成立的一所革命大学。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专门成立了一个规格很高的南方大学委员会，罗明是唯一没有恢复中共党籍的委员，担任第二副校长，分工负责行政后勤方面的工作，还兼第二部主任。

解放初的广州，百废待兴，物资供应仍很困难，罗明日夜操劳，解决了南大的校舍问题，又千方百计为南大师生创设较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博得南大师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尊敬。学生们认为他亲切如“慈母”，教工们则将他比喻为“老马”^①。这是对他勤勤恳恳，忘我工作，无微不至地关怀教工学生等优良作风的评价。

1950年5月，中央召开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叶剑英校长委派罗明为南大代表赴北京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罗明。毛泽东对南方大学的办学方向，系统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给予充分肯定。罗明回校后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对南方大学的鼓励，全校师生受到很大鼓舞。

1951年冬，“三反”运动在南大开展。初时罗明任南大精简节约委员会主任，后被怀疑为贪污、受贿的“大老虎”，不仅精简节约委员会主任一职被撤销，还宣布撤销第二副校长等职务，受到隔离审查。“三反”运动后期，毛泽东对在北京开会的叶剑英、陶铸、方方等说：“罗明会是‘老虎’，我不信！”^②经中共广东省委复查，解除了对罗明已长达一年的隔离审查。

罗明虽然屡受委屈，但他问心无愧，胸怀坦荡。他曾对人说：“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也要相信自己。要大胆工作，还要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又说：“我的党籍问题也还没有解

①杨友吾、陈摩人：《教工与学生的贴心人》，《南方大学师生回忆录》，1985年。

②杨应彬：《缅怀罗明同志》，1988年4月27日《羊城晚报》第2版。

决，但组织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并尽量把工作做好，用工作来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①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他仍在党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对党的忠诚。

1953年1月罗明调任广东民族学院筹备处副主任，1954年任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原省民委主任谭天度调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由罗明任省民委主任。

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各民族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罗明极少在省民委机关，成年累月在海南岛、粤北以至粤西等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很差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工作，和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十三)

1966年，罗明参加了“四清”工作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清”工作队被撤销，他回到省民委参加所谓“文化大革命”。1967年，60多岁的罗明被迫上白云山造林，在挖树穴时跌伤，三个腰椎骨折裂，此后六七年间均卧床不起。这期间，他依然受到残酷的批斗、游街，参加集中管制和“学习”。当时，来外调的特别多，罗明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写证明材料，保护了一批好同志。1967年7月，外调人员要罗明证明张鼎丞是假党员。罗明说：“张鼎丞是党员，他的入党经过我清楚。”外调人员威胁说：“你清楚？他自己也讲不清楚是在广东大埔入党还是在福建永定入党！”罗明说：“他自己

^①杨明：《难忘的几件事》，《悼念罗明同志专刊》（1987年）。

不清楚我清楚嘛！他的入党是我经手办理的。”^① 罗明顶住压力，按照历史事实为张鼎丞的入党问题写了证明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明由衷地拥护党的正确路线。他积极参加全国政协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② 等活动，讨论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1978 年底，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1980 年 10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罗明的党籍。1986 年 12 月，中共广东省委通知，罗明在“三反”运动中的错案彻底平反。这期间，罗明主动协助有关部门纠正各种冤假错案，解决了不少长期遗留的问题。他从 1982 年至 1986 年，共写了有关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证明材料 200 多件。例如，1942 年大埔百侯中学部分教师由于斗争需要，经中共地下组织同意参加国民党。为这一问题，在解放后历次审干中，他们有的被错误处理，有的被判刑。罗明多次写证明材料，还和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赖以学、梁耀南联名写信给中共广东省委，建议为这些教师改正、平反。再如，1949 年 5 月，国民党将领吴奇伟等 10 多人起义，罗明写材料证明他们的起义人员身份，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待遇。再如，闽西老区有一些干部、群众在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罗明回忆当年情况，写材料给予证明。他这种对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主动、认真、负责精神，感人至深！

^①罗明自述。

^②建国后，罗明先后任政协广东省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务委员。

罗明认识华侨较多，同港澳人士也有交往。在落实侨务政策中，曾有泰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华侨、侨眷以及港澳同胞写信或亲自探访罗明，要求协助他们解决侨房问题。罗明在详细了解情况以后，凡符合政府的侨房政策的，转请有关部门解决，有的还协助业主向当地法院起诉才获解决。

1983年11月，罗明夫妇应泰国华侨、大埔同乡会董事长的邀请访问了泰国。他们在曼谷同很多大埔同乡和罗氏宗亲会面，畅叙亲情。罗明也代表家乡人民对泰国侨胞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表示感谢。这一次访问，时间虽不长，但曼谷华侨的热情欢迎，给罗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为自己能在暮年为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多做些工作而感到非常高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明着手做党史资料的回忆、整理工作。各级党史征集委员会成立后，罗明积极参与中央和广东、福建的党史征集和研究活动。他不顾自己年迈和体弱多病，孜孜不倦地撰写回忆录，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并力求对历史事件作出正确的评价。他尤其关心福建党史立好立准问题，在弥留时还记挂着两件事：一是回忆录还未全部完成；二是福建送来的党史稿还没有审阅。他不无遗憾地说：如果能再给我两年时间就好啦！

1987年4月28日15时5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革命的教育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罗明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6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四十八卷

作者=

页数= 3 9 5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